



法兰西的特性

人与物（上）

【法】皮埃尔·布罗代尔 著

三联书店出版

✓ F15 D

法兰西的特性

人与物(上)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顾良 张泽乾 译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 上/(法)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泽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ISBN 7-100-01780-7

I. 法… I. ①布… ②顾… ③张… II. ①法国-民族-研究②法兰西人-研究 IV. K56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7269 号

FĀLĀNXĪ DE TÈXÌNG

法兰西的特性

人与物(上)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顾良 张泽乾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振兴华联营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780-7/K·417

1995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170 千

印张 10 000 册

印张 7 1/4

定价 11.00 元

Fernand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Les Hommes et les Choses

Flammarion, 1990

据法国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 1990 年版翻译

本书由法国文化部赞助出版

目 录

第二编引言	1
-------------	---

第一部分 人口数量及其长周期波动

第一章 从史前时期到公元1000年期间的人口	5
一、史前时期的人口状况	7
漫长的时间长河	9
人体残骸和工具	13
从石器时代到农耕时代的大转变	20
异质性和多样性	22
金属时代	29
克尔特人或高卢人：他们的历史和文明	37
以多胜少	49
二、从独立时期的高卢到加洛林时期的高卢	55
罗马人征服高卢之探讨	56
康茂德统治年间罗马化高卢达到鼎盛	65
罗马统治下的高卢面对内乱和蛮族入侵	70
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	71
不可忘记蛮族入侵	77
罗马经济世界	81
墨洛温王朝时期的高卢	86
是否存在过加洛林帝国？	94
欧洲的诞生，封建制的诞生和确立	97
最后的蛮族入侵	99

经济和人口	101
周期出现转折	107
第二章 公元10世纪至今的人口	109
一、臻于完美的跨世纪周期：近代法国和近代	
欧洲的初期(950—1450年)	111
10世纪或罗马帝国的末日	111
欧洲的起步	116
法国的机遇：香巴尼和布里的交易会	127
地理扩张：十字军东征	131
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1350—1450年)	132
黑死病和百年战争	135
再谈经济世界	139
欧洲以及法国的命运	143
二、1450至1950年：一条异乎寻常的上升曲线	145
首尾相接的几个阶段	148
1850年前的人口演变过程究竟有一种或几种可能的解释？	156
三、最后的问题：医学的胜利，节制生育和	
外国移民	159
医疗和公共卫生	161
节制生育	165
教会的态度	172
法国的特殊国情	175
外国移民：一个新出现的问题	179
一个经济问题	182
种族主义问题	184
一个文化问题	188
注释	197

图表目录

距今1万至1.5万年前猛犸的分布地点	12
距今1万至1.5万年前工具的不断改进	14
尼安德特人遗迹的地理分布(距今3.5万至7.5万年)	16
距今1万至1.5万年前描绘动物形象的岩洞壁画艺术	19
公元前第六至第五千纪法国最早的农民群落	22
欧洲的黄沙土和冲积土地地区	24
公元前第五至第三千纪法国石室墓冢的地理分布	26
公元前第六至第四千纪法国新石器时代初期的主要遗址	27
公元前第四至第三千纪的遗址	28
法国青铜时代的遗址	32
铁器时代早期的遗址(公元前700—500年)	35
公元前二世纪的克尔特高卢	39
公元前五至三世纪克尔特人的征服活动	40
罗马征服前的高卢	48
新石器时代和今天卢万河盆地的居民点分布	49和50
恺撒征服高卢(公元前58—52年)	57
里昂的罗马引水渡槽	66
罗马化高卢的公路网	68
罗马化高卢的城市网	69
三世纪时的入侵	72
罗马经济世界	82
法兰克人的扩张	88
达戈贝尔特统治下的高卢	90
加洛林帝国	96
卡佩王朝时期的法国	115
安德尔河流域的老磨坊	126
与香巴尼交易会有联系的城市(12至13世纪)	128

哥特式建筑的地区分布图.....	130
黑死病的蔓延(1347—1351年).....	137
1500年的欧洲经济世界.....	142

第二编引言

困难是要找到与现实有关的假设。

琼·鲁宾逊¹

在上面几章里，我把法国的历史放回到了异常广阔、反差强烈而又几个法兰西并存的地域之中。现在，我们再在历史变革的基本框架中进行考察。从这个视野看，可以说存在着一连串既相似又不同的法兰西：它们有时狭小，有时辽阔；有时统一，有时分裂；有时鸿运高照，有时饱经忧患；有时发展顺利，有时处于逆境。这一系列的现实和变化，或不如说这一系列的“整体周期”，我想把它们当作不同的方位标，为人们提供可能的解释。这些周期犹如大海的潮汛起伏，不断冲击着我国历史的各大活动领域。

我原先曾打算把这一编称为《法国历史的长周期》。后来，我担心这个标题会造成某些含义不清，因为通常只有经济学家才使用“周期”这个词。在经济学的术语里，周期包含着历史的两个侧面，即在一个制高点的两侧各有一条斜边。上升的一边是高涨，下降的一边是衰退。制高点也就是它们的分水岭。上升部分从低点达到高点，下降部分则从高点回落到另一个低点。我所想考察的正是这种跌宕起伏的波动周期，但这里的周期之长肯定为经济学家乃至历史学家感到陌生。我真诚地相信，历史学需要有周期的概念，需要有由此产生的带点风险的总体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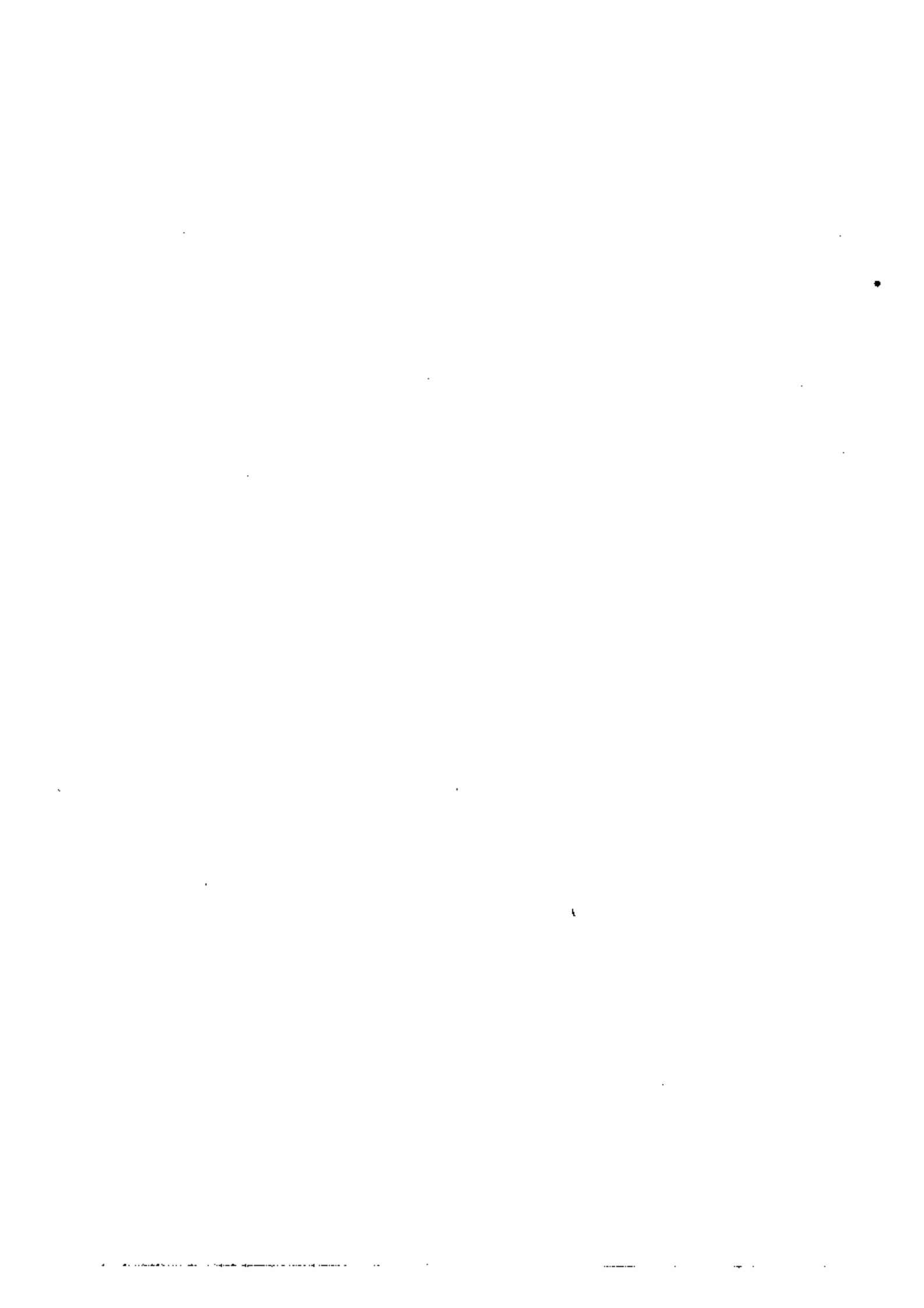
我们应该明白：这些跨度长达几个世纪的长周期并不单纯起

源于经济学。它们不尽符合把经济当作人类生活的原因和主要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这里的长周期中，原因和结果不但始终交织在一起，而且它们还通过反馈系统彼此交替，时而变成原因，时而变成动力或结果。持续的衰退，长达几百年之久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短时段内无法复原的经济萧条，这一切显然都意味着多种因素的犬牙交错，其中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技术乃至战争，等等。或者整体出了毛病，坏事便接踵而至；或者整体恢复良好状态，一切就持续高涨。总之，衰退或普遍复苏都是显而易见的现象，只不过它们的真实原因几乎不可能被确定罢了。

读者如果对经济学家目前使用的术语有所了解，哪怕是通过每天读报得知这个概念，我相信他们就会接受我赋予“周期”这个词的特定的广义。历史学家或许会对此有所保留，我们的确习惯于按照历史分期的顺序考察每个历史时期的法国：有的专攻史前史，有的研究独立的高卢时代或罗马统治下的高卢时代的古代史，还有中世纪史的专家，近代史的专家，如此等等。这些当然都是不可缺少的。但以上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国之间还有待进行比较，因此，把法国的每个历史时期都看成是个周期，也许并不过分。它们各有其产生、繁荣和衰亡的过程，它们互相衔接，从未出现断裂。

在本书第二编《人与物》中，我之所以从人口学和经济学两方面来描绘我国历史的基本框架，这是因为人口和经济是历史深层运动中最明显的和最易于把握的征兆……人口究竟有多少？物产怎样使人的生存繁衍成为可能？或者，它们又怎样迫使人向前迈进，脱离开这条或那条路线，放弃这种或那种既得阵地？安德烈·皮亚蒂埃称人口为“人力资源”，吉·波瓦²则进一步认为，人口是首要的“指示数据”，是“最少随意性的标准”。有鉴于此，本编前两章（第一章和第二章）所要探讨的乃是人口问题，即“从史前时期到公元1000年期间的法国人口数量及其长周期波动”和“公元1000年以

来的法国人口数量及其长周期演变”；第三章和第四章将着重论述经济问题，标题分别是“直至 20 世纪的农民经济——基础结构”与“直至 20 世纪的农民经济——上层建筑”。后两章将随后及时付梓。



第一部分

人口数量及其长周期波动

第一章 从史前时期到公元1000年 期间的人口

根据一项大胆的估计,自从由猿变人之后,迄今以来曾在地球上生存过的人口总数高达700亿至1 000 亿,这个猜想提出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数字。阿尔弗雷德·索维风趣地对我说:“到了‘最后的审判’的日子,还有什么地方可容这上千亿人住下?”¹按照这个数字推算,如果取个整数,迄今为止应有10亿人曾在法兰西地域上生存、劳作和活动,他们留下的遗产都已被纳入到我国巨大的民族财富之中。同今天活着的5 000多万人相比,长眠地下、已经作古的人应是他们的20多倍。不要忘记,他们仍在“活人的脚下”,比如说,香巴尼、梅多克或者勃艮第的某个葡萄园,“就是由人力开发的、经过2 000年劳动加以改造的一块土地”,或者差不多是如此²。

简而言之,数千年来,在法国这片地域上,人们辛勤劳作,兴建了大小道路、茅舍、房屋、村镇、城市,这一切都不值得大惊小怪。甚至有人大胆地说,这块地域是农民“生根立足”的地方……人口早已作为一个活跃的因素发挥作用和施加影响,促成了有史以来甚至迄今为止所取得的各项成就:拉斯科洞穴的辉煌壁画,史前期的石室墓冢和巨型石柱,罗马式艺术或哥特式艺术,无不证明了这一

事实。人口作为一切的公倍数，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对宗教的发展、国家的形成，以及对12世纪意大利城市和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都曾起过促进作用。有时候，人口因素也造成机器卡壳，使历史的车轮倒转，马尔萨斯就是这种灾难的预言者。

人口数量对人类命运具有重大的影响，这在今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1980年的世界人口已达44亿。“到2000年，人口至少将增至60亿”，人口专家指出，在21世纪，“将人口稳定在100亿至110亿之间的希望看来并不现实”。不幸的是，他们的这种推断不无根据³。12世纪时曾有“民众则国强”的说法。法国经济学家古达尔在13世纪时也曾指出：“政治界有一句公认的格言，那就是说，唯有众多的人口才能造就一个强大的国家。”他还说：“国王的真正利益何在？……王国的强大取决于臣民的多少”⁴。当然，人口太多也有害处：在当今的世界，考虑到印度或中国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限制人口增长，有谁还敢将古达尔的主张付诸实施？

往昔的情形无疑并非如此。这并不等于说，相对的人口过剩从没有造成过危害，而是饥馑和瘟疫每次都能遏制人口的增长。只是自近代以来，世界人口才持续不断地增长，至少在整体上从没有出现过停滞。

一 史前时期的人口状况

认为史前史的一切都不如文明史，这是不老实的态度，至少也是不严格按科学办事的态度。

——让·马卡尔⁵

我们不能说史前史不是历史，不能说在高卢之前不存在高卢，在法国之前不存在法国，高卢和法国的许多特征要由罗马征服前几千年的历史作出解释。尼采认为，应该想象出“人类在史前时期——迄今以来最长的时期——所做的一切”⁶。这些垒积起来的生活板块，这些漫长得不可思议的时段悄悄地、不露声色地流传到我们这一代人。因此，怎么能说在文明史与史前史之间没有延续和衔接呢？过去的历史学家往往在上古史和中古史⁷或中古史和近代史之间的分期问题上孤注一掷，不惜以自己的名声作赌注。今天的历史学家所下的赌注难道不正是如何确定史前史与文明史的分期吗？

不幸的是，史前史的诞生迄今还不到一个半世纪。1837年，布歇·德·彼尔特在索姆河流域冲积层台地中发现了被认为是人类在史前时期使用的燧石手斧及其他石器。布歇·德·彼尔特费了好大的劲终于在1860年使人们接受了他的结论。他自1847年起陆续发表的第一部考古学著作《克尔特人时期和前洪水期之古物》，正

如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一样，曾经受到人们的怀疑和嘲讽。就在1859年，一批英国学者越过英吉利海峡，对布歇·德·彼尔特的发掘成果进行了鉴定，对他的工作给予了肯定⁸。这是一件革命性创举，因为承认在被地质学家们确认为极其古老的地层中埋藏着人的陈迹，这就完全推翻了人由上帝创造的传说，在观念上产生了一场超出今天我们想象的翻天覆地的革命。直至那时，甚至某些学者也根据《圣经》的传统解释，认为人是在公元前4000年被上帝创造出来的。伊萨克·牛顿并不将自己的研究局限于数学和天文学，他曾对古埃及用象形文字记载的编年史嗤之以鼻，因为它竟狂妄地声称，埃及的法老比世界本身还古老几千年⁹。

在数十年时间里，由于布歇·德·彼尔特的努力，特别是他的同代人达尔文的努力，由于他们提出的独创性见解，人类起源的历史奇迹般地向前延伸了很长时间。早期农业、早期村庄、早期城镇的历史随之上溯到更早的年代。与我们有关的法国的历史自然也是如此。

崭新的史前史所展示的前景照例在史学界没有立刻引起轰动，这是合乎情理的事，因为这意味着从一个知识领域向另一个知识领域的过渡，历史学家对史前史表现得无动于衷，几乎显得格格不入和迷惑不解。他们只把史前史看成是一个简单的准备阶段，往往寥寥数语就一笔带过，随后又照旧讲述其历史故事，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然而，史前史在积累大量证据、提出崭新推断和众多假设的同时，又在文明史以前的许多世纪打开了一个无底深渊。请大家想一想，根据我们的测量，文明史在人类进化的全过程中不过占千分之一的时间。为了对这一演变过程有足够的了解，我们需要其他学科的协作和配合。史前史学者已学会了应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方法,其中包括孢粉学(研究古代的花粉粒)、古生物学、植物学以及不久前刚刚起步的现存原始部落研究和人种学。单凭自身的菲薄力量不能摆脱自然支配的原始人类,在几千年间曾像其他群生动物一样,只是依赖其社会联系才能维持生存。

以上科学取得的成果并不能使史前史研究的任务轻松多少,因为有关的材料还有待作出新的解释。正如科兰·伦弗鲁所指出的,不能指望邻近的学科给你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¹⁰。此外,不久前,测定历史年代的科学新方法(如碳十四测定法,钾—氩测定法,树木年轮分析法以及其他更先进的测定法)又对前两、三代杰出的史前史学家确定的历史框架和文化渊源提出了众多的和重大的质疑。因此,特别在欧洲史前史的问题上,一切都还有待重新解释。¹¹

所有这些情况都使史前史成为一门生气勃勃的、动人心弦的学科,但同时又使它成为一个正在变动中的领域。只有经过多次出现错误和纠正错误,经过反复提出暂定的假设,史前史才能向真理靠拢。正因为如此,史前史学始终处于更新的过程中。

漫长的时间长河

根本的问题,人类起源的问题,至今仍没有得出定论。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新发现层出不穷,每一次发现都对原来描绘的总体图象有所修正。

暂且从目前已知的材料出发,如果我们通过类人猿和人猿的主干考察人类这一支脉,我们可把东非南方古猿的起源(根据目前采用的有关远古人类的这种或那种定义¹²),几乎追溯到公元前500万年、1500万年或4000万年。加布里埃尔·坎普无可奈何地承认说,随着新发现的接连问世,“人类的起源正不断向更加遥远的过去推移”¹³。

然而,倘若我们仅把好奇心局限在人类的严格范围内,我们今

天应把人类的出现定在他开始直立行走的时候，即是说大约在200万年以前，甚至可能还要更早一点时间。第一个双足直立的“能人”并不是首先制造和使用石器的动物。某些南方古猿早已会这样做了。但是，身躯直立能使双手得到解放，而另一方面，他的脑容量(开始时只有600至700立方厘米)从此将逐渐增大¹⁴。依靠高度发达的大脑作指挥，并由进行操作的手相配合，“人便在各方面发展他的惊人才能”：思维、记忆和语言¹⁵。继“能人”——可能是非洲人——之后，接着出现了生活在温带地区的“直立人”，然后是“早期智人”和“智人”，最后一种人属于已臻完善的晚期智人，即今天的你和我。

仍按目前已知的材料看，我们猜想在“法国”的领土上，公元前180万年前，已经有了“直立人”的存在。在上卢瓦尔省，地处中央高原的希雅克遗址，近年来曾发现了肯定用手砍砸而成的几块砂石，以及第四纪“维拉弗朗阶”的陆生哺乳动物群¹⁶。这可能是欧洲大陆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活动遗迹。但是，在同一地区发现的索利雅克遗址距今约100万年，我们对这一时间的考证更有把握¹⁷。此外，考古学家1958、1962年在位于罗克布吕讷镇(阿尔卑斯滨海省)的瓦洛奈小溪边上发掘出的名叫“狐洞”的石窟，提供了95万年前人的遗迹。洞穴中除古动物——猕猴、南方象、原马和猫科动物——残骸外，还有相当粗糙的石器和骨雕。可惜的是找不到人的骨骼化石(石器远较骨化石易于保存)，人曾在这里穴居过却是显而易见的，这是迄今所知的欧洲最早的人的穴居地¹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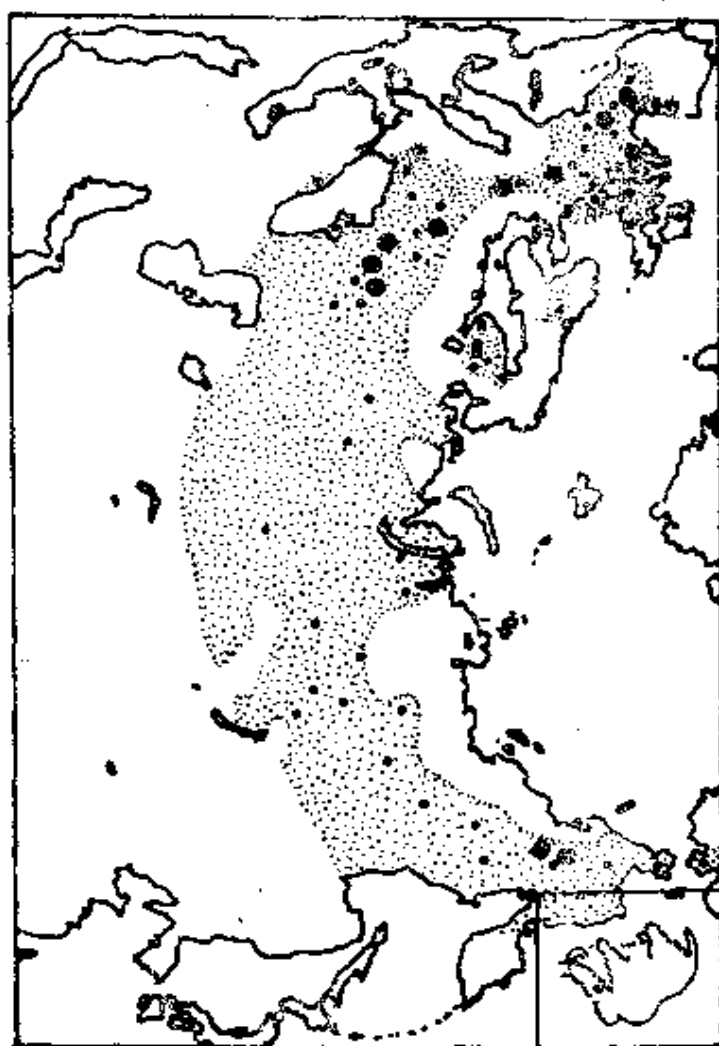
如果认为史前期在我国这块土地上至少可以延续到青铜器时期(直到公元前500年为止)，它的时间跨度确实长得惊人，几乎达200万年之久，或者说2万个世纪！为了对这段令人不可想象和难以置信的时间长河进行研究，首先能向我们提供帮助的便是地质学家。他们测定的地质年表把整个第四纪(或如人们常说的“更新

世”)加上“维拉弗朗阶”(属第三纪末期)视为人类诞生的阶段,但把延续至今的第四纪末期(即“全新世”)排除在这一过程之外。

地质学家又把这一段极其漫长的时间分为四个连续的冰期。阿尔布莱希特·彭克用位于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麓的四条河流分别为它们命名,在对这四条河流的探测过程中,他获得了远古时代地球交替变冷的证明。按时间顺序排列,这四个冰期分别是“贡兹”、“明德”、“里斯”和“玉木”。贡兹冰期起自公元前200万年,玉木冰期止于公元前1万年。当然,不但每一个冰期的形成相当缓慢,而且冰期之间还存在气候转暖的间冻期,它们同样十分漫长并且没有规律。每个冰期又可分为若干阶段(如贡兹一期、二期、三期,玉木一期、二期、三期、四期等),分别与一系列缓慢的气候变化相适应。气候演变几乎是难以觉察的,但经过若干千纪的累积,最终会导致巨大的变化¹⁹。与此同时,人、动物和植物根据气候的冷热变化向地球南部或北部迁徙:严寒把适应温热气候的生物驱向南方,炎热则把习惯群居的驯鹿和野马赶到北方。总之,每次迁徙的原因都是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

为了能有一个大致的概念(凡在过去的漫长黑夜中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从理论上讲,都可能在未来的漫长黑夜中重新出现),读者可以设想,今后的数千年或数百万年内,如果各大陆像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样仍受气候变化的支配²⁰,地球就必然会经历一个新的冰期。在欧洲,厚厚的冻层将会覆盖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荷兰、德国、波兰、俄罗斯北部、不列颠诸岛(直到伦敦附近)。法国除阿尔卑斯山等地势较高的部分外,其他地方将一如既往,不受巨大冰川的影响。然而,包括巴黎在内的巴黎盆地以及法国的大部分地区,会变成西伯利亚式的冻土带、草原或森林,即是说,一望无际的冰雪、草原和森林,给人、动物和整个大自然带来无穷无尽的影响。冰川神奇般的膨胀把水冻住,造成海平面的下降,部分海底

将重新暴露出来,使包括英国在内的不少岛屿与大陆联成一片。在冰川的前方,由这些庞然大物刨蚀下来的岩砾堆积起鼓丘,而细小的砂粒则随风吹到远方,如中国和欧洲各地,并最终形成黄土层。多瑙河盆地或阿尔萨斯平原的黄土,巴黎外围台地的软湿土均起源于此。这些土质疏松宜耕的地区曾是法国和欧洲第一批农民的福地。



距今1万至1.5万年前猛犸的分布地点

在冰川(当时覆盖欧亚大部分地区)、草原和冻土带之间,从西班牙北部到西伯利亚伸展着一条人和动物(主要是猛犸和驯鹿)过往的通道,几乎整个法国都位于这个得天独厚的区域之内。(引自路易·勒内·努吉埃,《文明的诞生》,1986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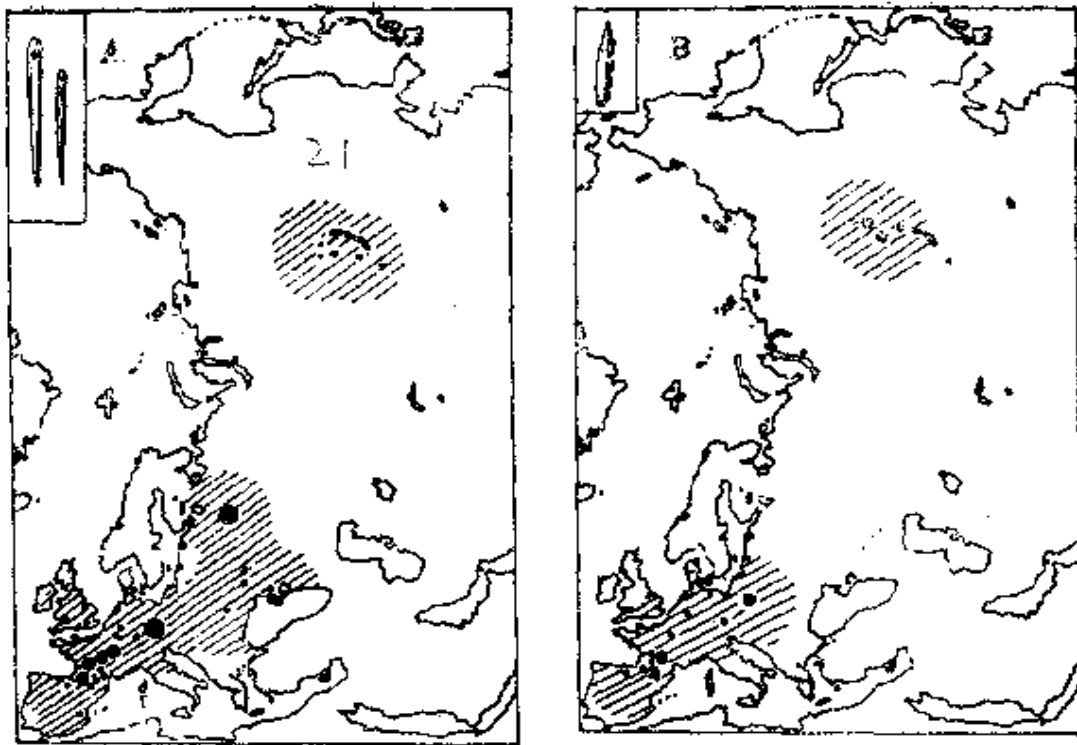
在确定史前期的任何一个考古发掘遗址以前，首先要根据动植物的遗迹或残存食物，辨认出当时应属于哪个冰期或间冰期。前面提到的瓦洛奈河边的那个洞穴是欧洲已知的最古老的人类遗址，洞内的居民大约生活在100万年以前，即“维拉弗朗阶”，地中海沿岸的法国南方当时正处于贡兹冰期的严寒期间。人们在洞穴中除发现冻裂的石块和磨利的燧石外，还有寒带陆生动物的化石²¹。

公元前1万年左右，当最后一个冰期，即玉木冰期结束时，出现了持续的温和气候——大体上与今天相当——狍鹿逐渐向北方迁移，而猛犸则因不能适应而消踪匿迹。西伯利亚厚厚的冰层中保存着一些乳齿象，历经数千年之久仍完好无损，科学考察队不久前曾找到过这些巨兽。多少世纪以来，在北西伯利亚的部落里，一直流传着猛犸象的各种传说。当地的雅库特人和通古斯人有时发现这些巨象竟四足直立，仿佛刚刚丧命；猎狗扑上去撕咬，把它们当作在地下生活的大鼯鼠，或者当作一见阳光和空气便立即死去的水生动物²²。

湿润性气候也会有所起伏。由此出现了前北方期、北方期、大西洋期、亚北方期、亚大西洋期等气候类型²³。每一种气候类型特别有利于某一种树木或动物的生长，如牛、马、榆树、橡树、山毛榉、栗树、榛树，从而自动地影响人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人体残骸和工具

成千上万年间，在冰雪覆盖的冻土带或被水浸泡的丛林中（每当气候转暖，渍水退去，土地便重新显露出来），人和野兽杂居共生。人的活动不免留下踪迹：零星的或几乎完整的骨架，宿营和篝火的痕迹，还有数以百计的工具，虽然大多已经破碎，有的在开沟挖地过程中散失，有的被文物爱好者从博物馆中窃走。



距今 1 万至 1.5 万年前工具的不断改进

图 A. 带孔的骨针 (距今 2 万年)

图 B. 复合工具: 燧石薄片或骨制锐器装在木柄或骨柄上和嵌在木制或骨制的齿槽内, 并可随时替换。(引自路易·勒内·努吉埃,《文明的诞生》。)

“人体”残骸是历史的重要见证。但是, 最古老的人体残骸已不复存在, 它们早被酸性土壤蚀化了。在法国, 一系列原始工具的使用比已知最早的人体化石早 100 万年。1949 年, 在蒙莫林 (东比利牛斯省) 附近的一处洞穴里发现了一块原始人下颚, 与著名的海德堡下颌骨 (公元前 60 万年) 十分相近。尽管具体年代尚难确定, 但可以肯定, 是在“海德堡人”之后 (约为公元前 40 万至 45 万年之间)²⁴, 可能是在“陶塔维人”之前。在东比利牛斯省的一个山村发现的陶塔维人距今已有 10 万至 15 万年时间。这一发现曾引起了轰动。考古发掘分两个阶段进行: 首先在 1971 年发现了一个年约 20 余岁的青年男子的左顶骨, 随后于 1979 年在离原址 3 米多远的地方, 又发现了右顶骨, 二者恰好拼成一副完整的头盖骨。这是一个

直立人的头盖骨，脑容量接近1100立方厘米，额下方的“白洛嘉脑回”^①的发育状况与现代人没有任何差别。由此，人们得出了令人振奋的结论：这个直立人已有说话的能力，只是他使用的语言还让人捉摸不清²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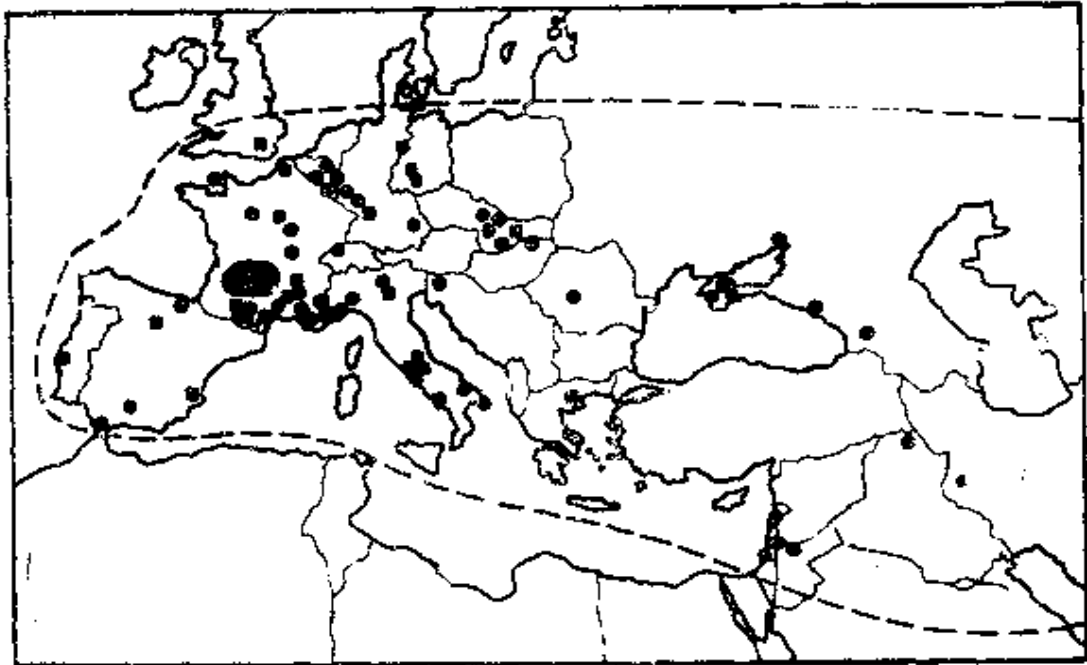
此外，陶塔维人生吃猎获的动物。在阿拉戈的拉科纳洞穴里——洞穴位于狭窄的韦尔杜布尔河谷（阿格利河的支流）的对面——没有发现炉灶的痕迹²⁶，而火的使用最早可上溯到距今50万年以前。在尼斯附近的特拉阿马塔穴室中，人们曾发现了多处火灶²⁷，据测定，时间应在公元前40万年左右。

夹在峭壁之间的韦尔杜布尔河谷是一个天然的庇护所，不仅对生活在明德冰期的陶塔维人异常珍贵，而且对为数众多的陆生动物群也十分有利。这些动物的骸骨被好几代猎人堆集在洞穴的不同高度，其中可以辨认出的就有马、象、原牛、岩羊、麝牛、鹿、豹、穴狮、极地狐、熊、猞猁、豹、哨兔，等等。与这些动物残骸混在一起的人的遗体已被砸碎，以取出骨髓和脑髓，这似乎表明当时的人有着噬食同类的行为²⁸，类似的情形在其他考古遗址中亦可见到。这种习俗存在于整个史前时期，直至公元前第六千纪。食人肉有时似乎出于一种礼仪，人们甚至怀疑它与实行墓葬有一定的联系²⁹。

距今将近10万年前，直立人被所谓尼安德特人所取代³⁰。这种智人无疑遍布整个中东和欧洲，法国自然也不例外。至于他们是否还在这一广阔地域之外活动，考古学家对此众说纷纭。不过，至少在欧洲地区，他们具有鲜明的特征，容易得到辨认。总之，长期被误认为是野蛮人的尼安德特人从此已经恢复了名誉，他的脑容量甚至比现代人还要大（平均达1600立方厘米，而现代人则为1400

^① 原文为 *cap de Broca*。Broca 全名保罗·白洛嘉，是法国人类学学会的奠基人（1824—1880），职业为医师。他发现了被称为白洛嘉脑回的大脑左前区的清晰言语区。——译者

立方厘米)。他们已被证明是相当灵巧的劳动者,说话时语音也比较清晰³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最早对死者实行墓葬。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进化已可以说臻于“完善”,皮埃尔·肖努因此把他们称之为“完人”。人们发现的大量标本(仅在法国本土发现的就有100余件)为我们展现了生活在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的某些恒久特性,不仅涉及生活方式和石器工艺,而且还具有严格的人种分类学意义。总之,他们完全属于一种独立的人种,在长达600个世纪的岁月中,在一片辽阔的地域上,始终保持着自己固有的特征。



尼安德特人遗迹的地理分布(距今 3.5 万至 7.5 万年)

尼安德特人的遗迹以法国中央高原的西部最为集中(黑圈)。

然而,在没有任何明显征兆的情况下,尼安德特人在过了不到 5000 年后竟突然消失(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这一时段无疑是十分短暂的),他们被人种与其迥异的晚期智人所取代,而这种晚期智人已经属于现代人的范畴了。这一过渡是怎样发生的呢?史前史学家无从就气候因素或其他因素提供不容置辩的解释,尤其因为在这一关键的过渡时期,人们至今尚未发现任何确能说明问题的

尼安德特人化石。整个人种普遍进化的可能已被排除：在如此辽阔的地域上安定地生活并可自由交换人种基因的人群，他们的进化势必十分缓慢。因此，从原则上讲，尼安德特人只可能与另一新人种相遇——无论相遇的方式是和平的或非和平的，当时的环境（尽管我们对此不知其详）又对这一新人种十分有利，因而他们迅速而完全地淘汰了尼安德特人。由此可以指导出一种纯理论性的假设：他们受到一次人们无法想象其来源的外部“入侵”，因为在尼安德特人出现在欧洲之前，在地球的其他地方，从澳大利亚到伊拉克、撒哈拉和挪威，人们已经发现了“现代”人的存在。“现代人”可能从巴勒斯坦进入了欧洲，而在5万年前，他们已与真正的尼安德特人生活在一起，后者只是在很晚以后方才灭种³²。

总之，从距今约3.5万年起，晚期智人已几乎遍布地球各地，占领整个法国。他们已经是现代人，具有为医生熟知的解剖学特征，虽然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别，但这些差异不过预示着当今法国的人种类型而已：地中海人种、阿尔卑斯人种、北方人种³³。他们对宗教的明显关注可以表明，他们与我们具有相近的心理状态。最后，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晚期智人竟开始产生艺术灵感和对艺术形式的追求。在旧石器时代的后期，已出现了“送子娘娘”这类女神的小雕像，还有大量的绘画、雕刻和塑像装饰着洞穴的岩壁，还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成千上万件用石块、骨块、象牙、鹿角和犴角加工制作的用具。很晚才为人发现的精美的岩洞壁画令人惊叹称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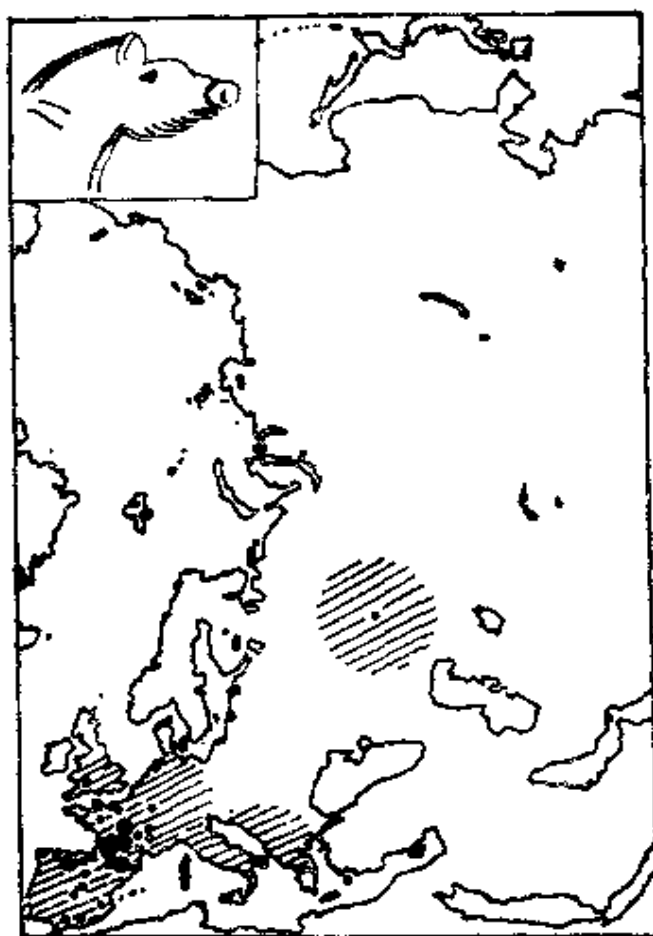
这些艺术形态经历了缓慢的演变，从粗略的图形发展到拉科斯基岩穴奇妙的现实主义题材，最后又简化为某些可能具有象征意义的几何符号³⁴。这一演变大约延续了200个世纪，距今约3万年至1万年时间，这对历史学家来说，委实是太长了。人们不难想象，相比之下，罗马式艺术或哥特式艺术经历的时代是多么短暂，

更不用说印象派或立体派，后者的盛行充其量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

法国和西班牙北部地区的岩洞壁画是这种早期艺术的杰出代表。在佩里戈尔地区峭壁耸立、水流蜿蜒的韦泽尔河谷，“上古时代人的栖息地比比皆是：艾齐、科罗马尼翁、拉姆特、莱贡巴莱尔、丰德戈姆、勃朗岬、洛塞尔、拉洛热里、莱马赛伊、拉马德琳、勒穆斯蒂埃、拉斯科……”皮埃尔·加索特写道，“人类圣地之多堪与埃及、尼尼微、雅典、罗马相媲美”³⁵。

关于早期艺术在这里勃兴的意义，人们曾经提出过许多问题。自然，谁也不会认为这仅是为艺术而艺术。晚期智人以捕猎原牛、猛犸、野牛、马、原羊和熊等野生动物为生，他们的绘画和雕刻也许是想借助图像使猎物着魔。在三兄弟洞、马达齐尔及其他地点的壁画上，对着野兽跳舞的蒙面人也许是会施魔法的巫师、神汉或祭司，只是我们对祭司在主持什么仪式一无所知罢了。还有那些令人神往的和莫明其妙的“书写符号”，它们又象征着什么呢？总之，壁画的表现力并不只是使人肃然起敬。弗朗克·布尔迪耶甚至认为，法国西南部与西班牙接壤处的这些山谷的文化发展水平超过世界其他地区，那里的壁画艺术可以作证。欧洲后来丧失了这一优势，只是在公元12和13世纪以后，才重新夺得领先地位，并一直保持了几个世纪。

在玉木冰期的最后几千年期间（这个时期有时被称为“孢鹿时期”），后期智人的物质生活相当充裕。孢鹿容易捕猎，由此提供的肉、皮、骨、“角”便成为人们衣食的来源以及制造帐篷和许多小工具的基本材料。此外，在所谓马格德林文化期——距今15 000年——人口出现了一定的增长，开始向山麓地区和欧洲北部扩展³⁶。这是经济繁荣和技术进步的一种迹象，工具也得到了普遍改进，石器制作技艺也日臻完善。



距今 1 万至 1.5 万年前描绘动物形象的岩洞壁画艺术

岩洞壁画主要分布在法国及西班牙北部。(引自路易-勒内·努吉埃:《文明的诞生》。)

尽管技术的发展因地而异,并且有明显的中止和断裂,但创造发明已成为各地的普遍趋势。尼安德特人改进了他们用燧石制作的刃具、刮削器和钻头。由此出现了可装有木柄、用途各不相同的一系列小型工具,有的仍是石器,有的则用骨头加工而成。例如,用燧石制作的各种刮削器的外型变得更加精巧,表面光滑,刃口呈锯齿状;凿子、石刀、钻头、带孔眼的针、鱼钩、带倒刺的鱼钩,也都制作精细。引人注目的梭罗特文化期³⁷仅延续了 3 000 年,尽管没有自成流派,却留下了制作精良的薄石片,石片刃面都经过精心研磨,厚不过 1 厘米,长有时达 30 至 35 厘米。捕鱼技巧(尤其是捕鲑

鱼)和狩猎技巧均得到很大改进,由投掷器抛出的石镖和利器使人能进行远距离的攻击。不过,真正的武器革命——弓箭的发明——直到距今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才终于出现。随着最后一个冰期的结束,全球的气候开始转暖,变得像今天那样温和,人们的生活从此将发生根本的变化。

从石器时代到农耕时代的大转变

事实与我们出自本能的想象相反,气候变暖并没有立即导致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善。它反而使既存的狩猎型文明陷于严重的困境。稠密的森林迅速扩展,与此同时,冰川的融化造成洪水横流,到处泛滥成灾。海平面不断上升,淹没了大片海岸地带。在冰雪封冻的草地上,不再有成群的麋鹿和野马,人们只能在莽莽丛林中设伏捕猎麋鹿和野猪,并且开始采集植物,从而部分地改变了原来的生活习性。食物发生了明显变化:大猎物日渐稀少,较易捕捉到的小型野生动物相对增多,植物在食物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籽粒、草茎、榛子、榛实、毛栗、桑椹等等都成了充饥之物,而最丰富的食物来源则是大海、湖泊和河流中的鱼类,还有贝类和甲壳类动物。在考古发掘中,人们有时发现不计其数的甲壳和其他食物残存混杂在一起。

鉴于上述情况,人们过去往往断定,在被称为中石器时代的这一艰难的过渡时期³⁸,后期智人的后裔经历了倒退和衰落。今天,人们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要求他们发挥智慧和创造的适应阶段。虽说在最后一个冰期结束前艺术确已消失,但工具的种类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恰恰相反,工具变得越来越小型化、专门化了,不但雕凿精巧,而且还聪明地组装成复合工具,配有木柄或木杆³⁹。狩猎活动更加困难,但人从此开始使用弓箭,可以在远距离射杀猎物。诚然,箭既可以成为捕杀动物的工具,也能够当作射杀

人本身的利器。罗贝尔·阿尔弗雷德甚至断言，“人在史前期发明弓箭的重要性不亚于现代人发明核武器”⁴⁰。为了让人信服，不免要使用夸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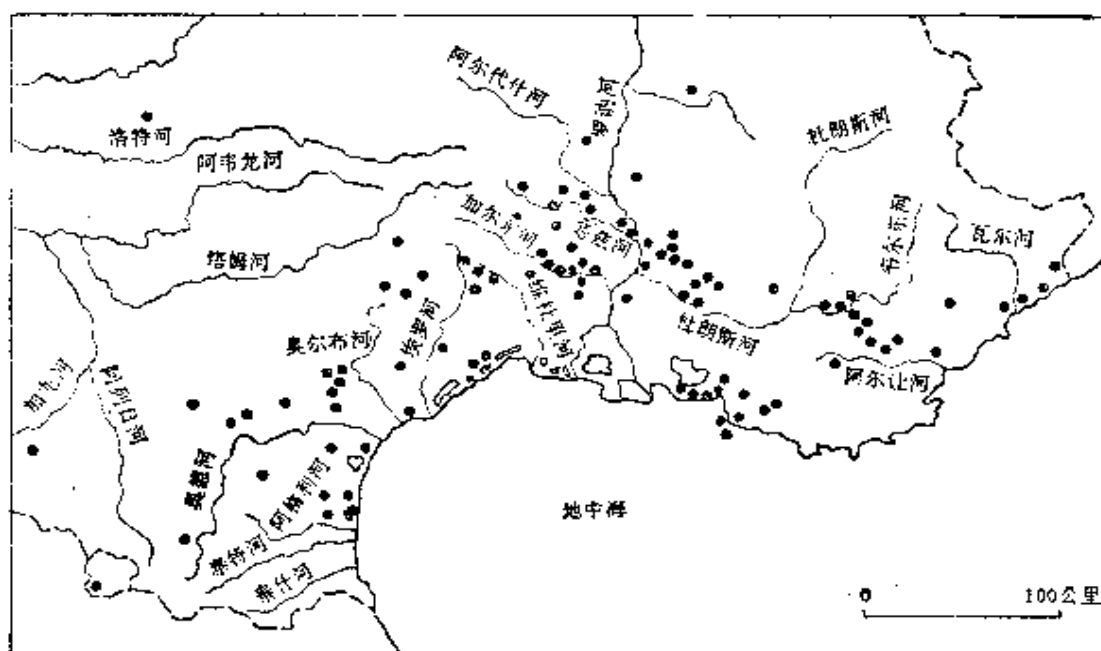
最后，从公元前第七千纪开始，法国出现了农业革命的前兆，再过二、三千纪以后，史前期的猎人渐渐变成农民。第一个前兆便是加强采集禾本科植物，特别是巢菜类（如在瓦尔省），甚至包括菜豆、豌豆等豆科植物（如在埃罗省）。虽说农耕活动在当时尚未正式开始，但采集和存储活动至少已经相当普及⁴¹。

第二个前兆更为清晰，就是绵羊的饲养。绵羊最早可能从远古的中东传来，驯育绵羊在中东始于公元前第11或第10千纪。这个时期正值爱琴海航海活动的发端。因此，绵羊（在欧洲古生物谱系中从未发现过绵羊的祖先）于第七千纪在东欧出现，于第六千纪在西地中海沿岸（包括法国南部的地中海沿岸）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再过一个千纪以后，人们在阿基坦地区开始饲养绵羊，到公元前4500年左右，绵羊已在布列塔尼沿海一带出现⁴²。

可见，在西地中海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以前，畜牧活动已经开始。这个大断裂，或者说，学会从事农业的这场革命，预示着高卢、法兰西乃至整个欧洲的诞生，耕地、草地、房屋、村庄及以农为本的农民将从此应运而生。

这场农业革命——其重要性可以与18世纪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等量其观——的发源地位于近东——野生粮食作物的故乡。农业生产这一重大创举伴随着或紧随着其他几项新生事物的出现而问世：实行定居，畜养牲畜，制造镰刀、磨盘等农业生产工具，制造细石器（不再是粗石器），发明陶器。这一系列文化财富将花数千年时间才逐渐普及，它们在欧洲的传播大体上通过两条不同的渠道，即沿多瑙河河谷从东到西的陆路和横跨地中海的海路。根据放射性碳十四的测定，我们可从时间上判明以上传播的路线和过程，我

们顺便也能看到两个法兰西——南部和北部——怎样分别形成。



公元前第六至第五千纪法国最早的农民群落

这些群落主要分布在阿尔卑斯滨海省至鲁西水平原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它们向内陆的推进相当缓慢。

异质性和多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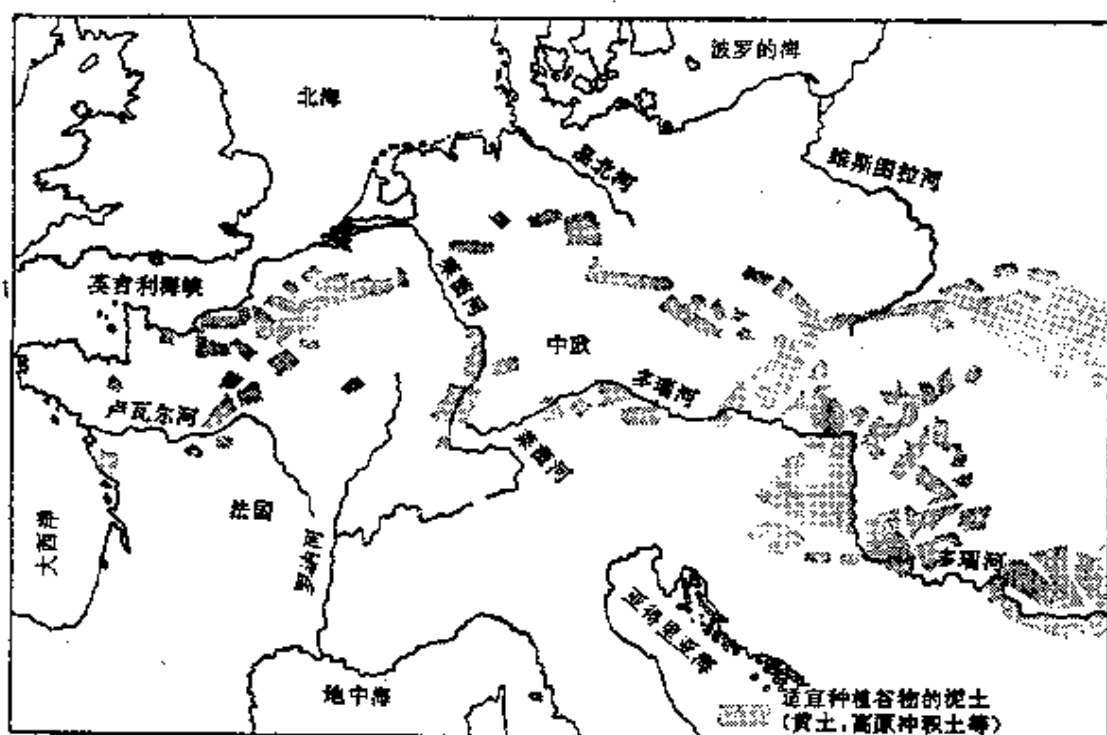
地处十字路口的法兰西将受到普及新石器的两大浪潮的冲击：法国南部首当其冲，于公元前5000年从地中海的方向受到了冲击；过了500年后，法国北部和东部从多瑙河方向接受了新石器的影响。由此可见，南北两大地区分属不同的文化氛围，各具独立的地区特点。（见本页和24页的地图）。

就南部而言，新石器的传播尽管起步较早，但发展进程并不明显。新石器肯定来自海外，传播因此先从沿海地带开始。但这并不意味着移民给新土地带来了新知识。迄今为止对为数不多的人体骨骼所作的分析使雷蒙·里凯得出结论说：“任何移民”的可能性均应予以排除⁴³。此外，也没有发现任何突发性的断裂，只存在“思想或技术的传授，促使土著社会内部出现独特的创新”⁴⁴。让·

吉兰纳认为,尤其重要的是,最早的样板——在东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的农业——在传播过程中发展很不平衡,一再被地中海各盆地的停滞状态所扭曲,这些地区起着“一连串的过滤器”的作用。在法国这片土地上,结果造成了当地居民对新文明的缓慢适应,他们没有完全抛弃原来的传统,但同时又逐渐开始饲养牲畜,实行定居,从事农业活动和制造陶器。陶器的制作当时遍及整个西地中海地区。陶器制品经常嵌有甲壳(特别是“鸟蛤”,由此得名的“鸟蛤陶”被用于确指法国南方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业已存在的绵羊和山羊饲养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以致毁坏森林,造成水土流失。在公元前第五千纪时,最早的村庄建立了起来,尽管相当简陋,但人们已能辨认它们的遗址,如在科比耶尔地区的山坡上,就有季节性牲畜的过冬营地,在平原的山岗上还有度夏营地⁴⁵。

最初仅限于沿海一带的“地中海文化群”逐渐扩展到中央高原的南半部,扩展到阿尔卑斯山麓,然后再不断向北伸展。

法国北半部的情况完全不同,那里确实出现了一次断裂。来自多瑙河流域的移民把农业原封不动地搬到这里,建立起完全掌握农业技术的农民群落。当然,从人类学角度看,这些移民与当地原来的居民完全不同⁴⁶。从公元前5000年开始,多瑙河河谷的这些农民逐渐向西迁徙,旨在寻找与他们习惯耕作的土地相类似的新的淤积地。公元前第五千纪中叶,他们越过了莱茵河。但只是在过了五个世纪以后才到达巴黎盆地。与这些外来的农耕者相反,当时法国北部的居民还是一小群、一小群的狩猎者和采集者。但是,由于迁居者仅在河谷地区肥沃的冲积土上劳作,他们不费力气就迫使依旧生活在中石器时代的土著居民躲到荒瘠地区去或就地适应环境。他们按多瑙河的建筑样式,用木料或土坯建造可容纳一大家人居住的宽敞住所(最大的能容纳10余人),他们的村落有时甚至可达200多居民。与地中海地区居民不同的是,他们是真正的农



欧洲的黄沙土和冲积土地区

为中欧农耕者所寻求的黄土和冲积土地区展示出第五千纪时农业沿多瑙河向莱茵河及巴黎盆地发展的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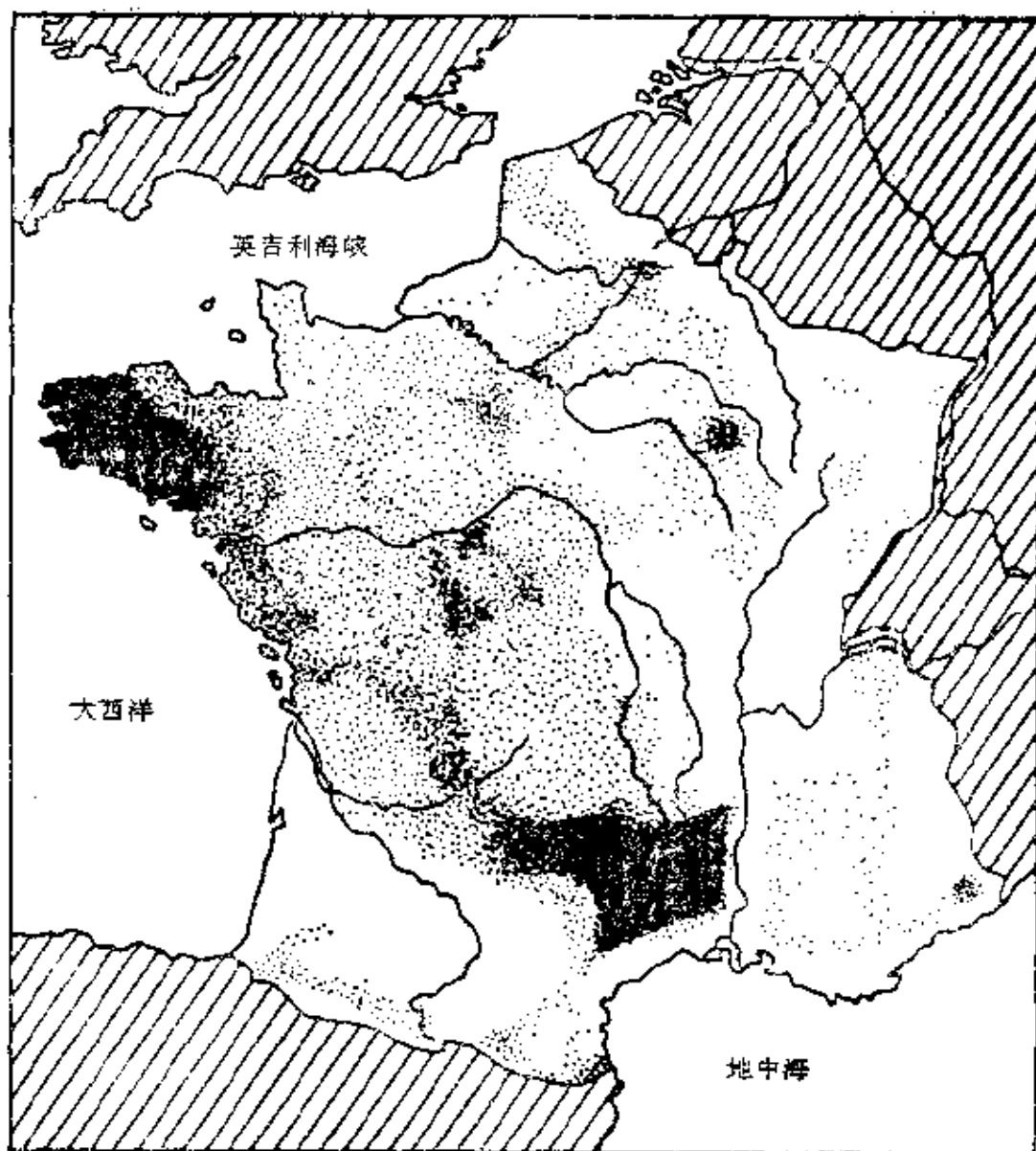
民，从原籍带来了他们已然熟悉并且行之有效的生产方法。他们砍林开荒，实行刀耕火种，种植小麦和大麦，饲养牛、猪等家畜（很少养绵羊），他们继续从事狩猎，但野物在肉食品中仅居次要地位。他们制作的独特的陶器因其纹饰而被称为“带纹陶”⁴⁷。

由此可见，新石器文化在我国的建立具有不同的特征：南方是“鸟蛤陶”文化，北方是“带纹陶”文化，它们各自独立发展，互不干扰。不仅如此，在西部的大西洋沿岸，且不论其起源如何（可能是来自海上），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背景，一种既非鸟蛤型亦非带纹型的特殊陶器，特别是一种奇异的巨石建筑⁴⁸，这些古迹一直保存至今。长期以来，史前史学家拒不承认这些庞然大物是土著“野蛮人”的创造，因为它们是“真正的”文明杰作，因而只可能来自东方。依据某些形状的相似（特别与克里特岛米诺斯文化风格的

圆顶坟墓相似)，考古学家曾推测，可能是来自爱琴海的经验丰富的航海家把这种“崇拜巨石的宗教”带到这里，使它们于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首先在西班牙（那里也存在巨石建筑），然后在大西洋其他沿岸地区广为传播。可能正是在这一稍晚的时期，我们在大西洋沿岸的祖先终于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碳十四测年法使所有这些假设全部落空。欧洲已知的巨石建筑以法国布列塔尼地区和葡萄牙（并非西班牙）最为古老，它们比包括埃及在内的东地中海地区的任何石建筑出现更早。事实上，从公元前第五千纪开始，在神秘莫测的条件下，这种在很大程度上由当地产生的新文化突然全面开花，出现了最早的石室墓冢，如位于莫尔莱附近的巴尔纳内石室，11处公共墓墩竟长达70米，墓顶呈圆拱状，另有一室似为禁地⁴⁹。殉葬品中有一些不加任何装饰的光滑陶器。巨石建筑大概是已由农民组成的原始社会的产物，分布在整个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尽管不同地区的建筑形式各有明显的差异。这些原始社会将忠于巨石建筑的传统。在法兰西西部，巨石建筑延续了2000年之久，后来，到了公元前第三千纪时，法国南方纷起效仿，石室墓冢遍布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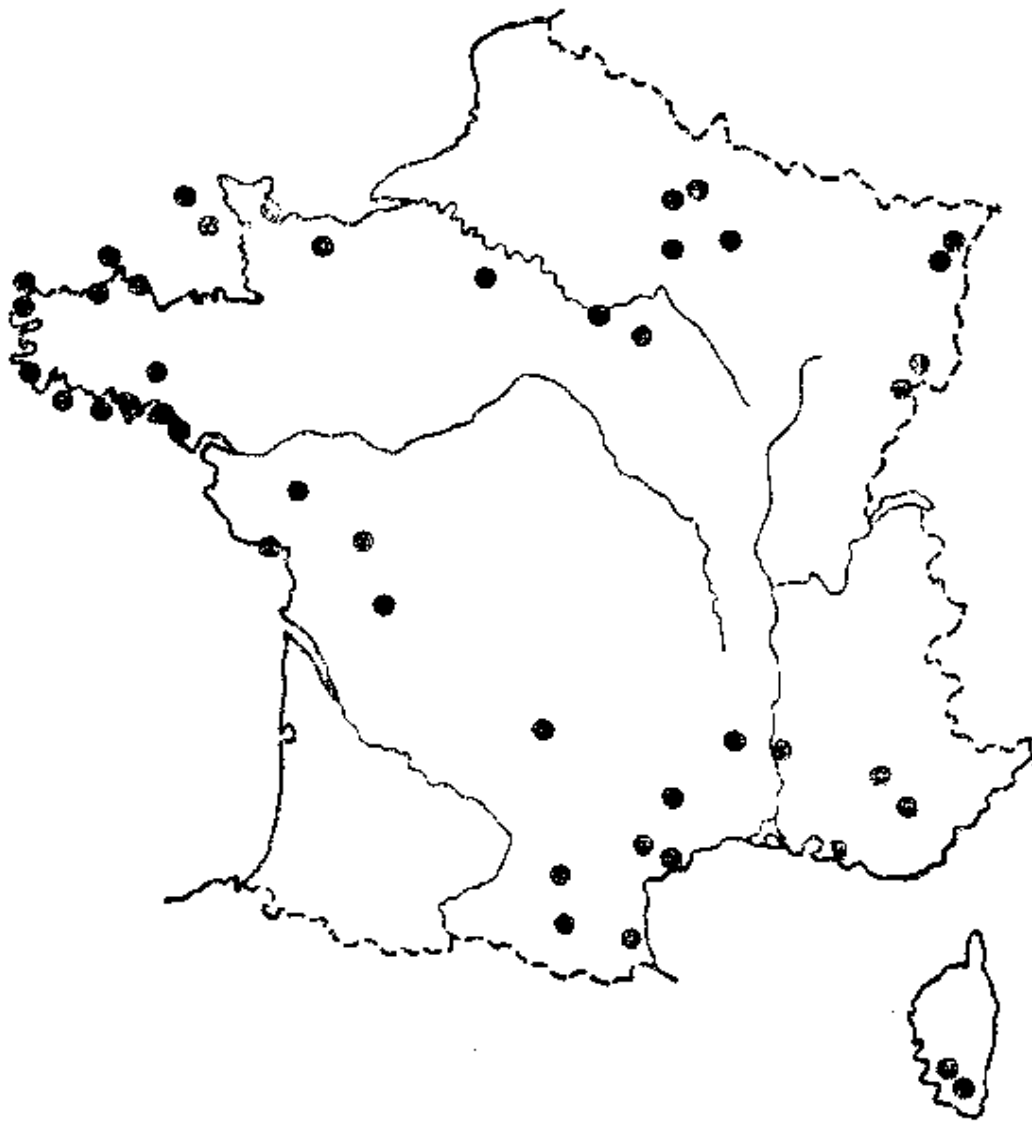
到公元前第四千纪初，法国共分为三个不同的文化区，中间被中央高原所隔开，后者不免同时受到三种文化形态的影响。自公元前3500年以后，三种文化之间建立了联系，因而同一种文化或者同一种文化中的某些因素逐渐覆盖整个法兰西的国土，东部地区除外。这种独具一格的“夏赛”文化大约于公元前3600年在南方形成，“以原有的居民为主体，吸收了来自地中海的文化影响”⁵⁰。当时的陶制器皿造型美观，线条细腻，焙烧恰到好处，并饰有几何图形；工具制作也相当精巧，其中包括大量利刃，除刀和镰以外，还有许多形状各异的箭矢，几种磨光的石斧，以及捣槌、碾碾、磨盘等脱粒和磨面工具，反映出当时的食物相当丰富。



公元前第五至第三千纪法国石室墓冢的地理分布

该图展示了巨石集体墓葬在法国从其发源地布列塔尼向南方扩展的概貌，历时达2000年之久。

在人口巨大增长的推动下，这一文化迅速表现得咄咄逼人，并经由罗讷河谷向北方推进，经由高斯山和诺卢兹山口向阿基坦地区渗透。让·吉莱纳⁵¹据此得出结论：结果形成了一种“全国性的新石器文明”。这不等于说它抹煞了一切地区差异，而是为区域文化统统打上了可供辨识的烙印。在它的强大推动下，地区文化经



公元前第六至第四千纪法国新石器时代初期的主要遗址

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分布可以看出，法国有三个不同文化区域同时存在并各自独立发展，它们被中央高原所隔开。

过演变最终形成了共同的文化源流，尽管相互之间存在着千差万别。

事实上，我倾向于认为，“夏赛文化”的扩展大体上反映着依然处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革新之外的居民后来陆续被新文明所同化。在人口急速增长的催逼下，从事狩猎或饲养活动的先民终于决定转化为农民。他们走出了丛林，甚至对森林进行开垦，这与雷



公元前第四至第三千纪的遗址

遗址展示法兰西“民族”文明的雏形。在夏赛文化时期，交往已十分活跃。该文化覆盖了除东部以外的几乎全部国土。（参见让·吉莱纳：《法兰西以前的法兰西，1980年版。）

蒙·里凯⁵³提出的关于巴黎盆地于公元前第四千纪末期突然建立文明的见解不谋而合。人类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与其近邻——制作带纹陶器的农耕者——迥然相异的人种类型，他们更接近于中石器时代的远古居民。此外，巴黎盆地虽然与“夏赛文化”在全国各地的急剧传播相联系，它却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工具，一种似乎用来

砍伐林木的特别坚固耐用的工具；我们据此完全可以设想，当地的居民曾经进行垦荒，开发新的耕地。“夏赛文化”之所以具有扩张力，难道不正是由于它使整个法国本土得以完成新石器革命，并且为其人口增长所必须的粮食资源提供了保证吗⁵³？

与此同时，交换活动日益加速。因此，在西部地区石室冢墓的陪葬物中，人们发现了属于“夏赛文化”的新陶器；反之，在北部滨海地区普吕絮利安的作坊中制造的“圆柄斧”在其他地区亦有发现。这种用粒玄岩制成的石斧不仅在布列塔尼、英吉利海峡、马耶纳省、大西洋岸卢瓦尔省流传，而且在莱茵河流域、阿尔卑斯山或比利牛斯山等地区都可以找到。同样地，原产于菲尼斯泰尔省用角闪石制作的光滑的石斧也可见于其他地区⁵⁴。

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文化的全面扩展，因为在法国各地，村庄范围在扩大，数量在增加，农业稳固地确立了优势。新石器社会中盛行的对送子娘娘这类女神的崇拜在法国从此兴起，但在法国出土的小塑像通常用陶土制成，造型相当粗糙，数量也比较少，无法与东欧或中欧为数众多、形象优美的小雕像相提并论。自然也有例外，在洛特省上卡普德纳克地区的夏赛文化遗址出土的石雕像十分壮观，其制作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这一发现给学者们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因为除了可能与南斯拉夫公元前第五千纪的某些卵石雕刻有些相像外，它不同于人们熟知的任何塑像。总而言之，除开某些诞生于旧石器时代的“维纳斯”塑像和“布拉桑普伊圣母”动人的面庞外⁵⁵，奇特的“卡普德纳克女神”也许称得上是法国本土最古老的史前期雕塑⁵⁶。

金属时代

随着人类开始使用金属，史前期也终告结束。金属技术的应用起源于东方或欧洲的巴尔干地区，后者是欧洲冶金业的发祥地。

自公元前第五千纪末年起，人们首先开始冶炼黄铜，随后是铸造青铜，最后才出现冶铁。因此，根据传统的分期，可分为黄铜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种技术陆续传入法国，在时间上有相当大的间隔，其中黄铜约在公元前2500至1800年间，青铜约在公元前1800至700年间，铁器始于公元前700年。上述这些技术的传播无不与外来居民的侵入有关。

黄铜文明具有双重性(事实上，石器工具仍占主要地位)，因而人们经常将这一文明称之为“铜石并用的时代”。这一文明经由意大利北部和伊比利亚半岛传入法国。炼铜业自公元前3000年起已在以上两个地区建立。到了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法国南方开始出现几个与矿场相联系的冶炼基地，主要分布在塞文山以及阿韦龙、凯尔西、洛泽尔、朗格多克等地区⁵⁷。

直到公元前2200年左右，铜的生产仍停留在个别地区，后来才被纳入到所谓“钟鼎”文化的范围之内，并日渐向各地扩张⁵⁸。这种外来文化的遗址在欧洲各地到处均可发现，其特征表现为呈“鼎”形的陶制和铜制器皿(“钟鼎”文化由此而得名)。这些器皿据说是由塔霍河流域和中欧地区的移民传来的，尽管确切地点至今尚未找到。这些外来的移民究竟是些什么人？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是手持弓箭进行武力征服的武士，另一些人又认为他们是推销精美的陶器以及匕首、钳子、锥子、针等新奇铜制品的流动商贩。这些旅行家长途跋涉，足迹遍布伊比利亚半岛、波河平原、撒丁岛、西西里岛、罗纳河谷、尼德兰、爱尔兰、英格兰、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以及几乎整个的法国(奇怪的是巴黎盆地不在此列)。全靠这些无处不在的流动人员，人们可看到“欧洲统一观念”的首次出现。有人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正是印欧语最早的普及者⁵⁹。我们对此姑且存疑。

无论如何，在法国本土，这些属于“钟鼎”文化的移民没有构成密集的、同质的部落，以致有排斥或同化土著居民的任何可能。事实恰恰相反：他们与当地居民显然相混杂和被同化，他们留下的坟墓采用传统的群葬制（如果他们自成群体，便会采用分葬制）。

然而，正当黄铜的冶炼在法国蓬勃发展的时候（公元前2000年），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放弃了纯铜器的中东和中欧却转而采用比纯铜脆性较小、韧性较强的铜锡合金，即青铜。这一巨大的技术进步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才传到西方。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后果：首先，为寻求不可缺少的锡而使商业往来更加活跃；其次，优质工具很快取代了石器工具；尤其重要的是劳动分工（如农耕者、矿工、手工工匠、冶炼匠、商人、武士）更趋加速，从而产生了阶级区分和等级制度。可以说，将青铜铸造技术输入法国的外来居民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在这一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少数武士，可能还有冶炼匠⁶⁰。分葬制也成为社会等级的标志：上等人物自立坟墓，带着武器、珍宝和装饰等个人物品葬入墓穴⁶¹。武功卓著的英雄被尊奉为新的神明，这些手执武器的男性战神的出现，使新石器时代农耕者顶礼膜拜的“送子娘娘”黯然失色。此外，火和太阳也成了人类崇拜的新对象。

这种文明向各地广为扩展。在公元前1800至1200年间，群葬制几乎消踪匿迹。布列塔尼古老的石室墓冢从此只埋葬一位死者。唯一的例外是地中海沿岸的法国南部和西南部以及从比利牛斯山至阿基坦地区一带，那里仍保存原有的墓葬传统⁶²。不过，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对当地居民实行肉体消灭。我们不妨可以推想，当地居民大概为新主人充当奴隶和仆役。

从公元前1800年起，冶铜业在法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青铜铸造最初仅限于广义的罗讷河地区（瑞士的瓦莱州、罗讷河谷、汝拉

山、阿尔卑斯山),但其产品——包括精致的匕首、利斧、珍珠、手
 镯、装饰别针、锥子和铜针——却远销勃艮第、中央高原、阿基坦、
 朗格多克和鲁西永等地区。罗纳河就这样一跃而成为连结地中海
 和德意志内陆的通道。



法国青铜时代的遗址

青铜器在法国有两大生产区,西部的大西洋沿岸和东部的阿尔卑斯山至阿尔萨斯地区。(参见让·吉莱纳,《法兰西以前的法兰西》,1980年版。)

三个世纪以后,在整个大西洋滨海地区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冶

炼场,同时成批制造青铜器这一至关重要的新事物(石器工具从此被彻底淘汰)。每一处炼铜中心专门生产这种或那种类型的矛、斧、刀、剑。这些产品分别在梅多克平原、布列塔尼、诺曼底或卢瓦尔河—加龙河地区制造,行销全国各省,并在同一市场上出售⁶³。

除大西洋滨海地区和广义的罗讷河地区外,法国第三个铜器制作中心是阿尔萨斯。鉴于莱茵河彼岸的居民迁入阿尔萨斯,并随后向巴黎盆地和中西部地区扩展,当地的文化渊源与前两个地区略有不同。阿尔萨斯的巨斧和刀具也行销法国南部,沿索恩河顺流而下,进入汝拉山区和中央高原。他们制作的陶器别具一格,一直远销到夏朗德地区⁶⁴。

公元前1200至1100年间出现了一次重要的文化断裂。整个爱琴海盆地当时处于巨大的动荡之中,居民纷纷迁往中欧,一部分后来更越过了莱茵河。他们的文化别具一格,因为他们对死者实行火化,而大家知道,丧葬方式确实事关重大。装有骨灰的陶瓮被并排埋在类似公墓的“瓮场”。这种“瓮场”文化涉及法国四分之三的领土,也正是经济条件最优越的地区。平原地区村落的大量出现,犁铧的使用,坡地的开荒垦殖,役马和车辆的使用⁶⁵,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社会生活的长足进步。唯独大西洋沿岸置身于这一运动之外。而距大西洋沿岸不远的巴黎盆地当时已成为活跃的商业活动中心,成为大陆影响和大西洋影响互相争夺的对象。

不过,即使在移民已经站稳脚跟的地区,原有的地方文化仍起着显著的作用。在勃艮第等地区,土葬和火葬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同时并存,有时甚至在同一处公墓实行两种丧葬方法。地区的差异也相当明显,以致某些考古学家把文化特征与“外来居民”相等同,认为法国曾相继出现五次入侵浪潮。让·吉莱纳则主张,应该根据不同的地区,考察文化特征的不同形成过程,他甚至怀疑是否“果真出现过外来居民的入侵”。他问道:各地居民在与

“流动商贩或充满活力的团体”接触的过程中，为什么就不能逐渐趋向于文化适应呢⁶⁶？

总之，青铜时代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日趋活跃的经济交流时期（铜锭和锡锭通常被运往很远的地方，起码也是从布列塔尼运抵阿尔卑斯山或西班牙），一个几种文化并存和互相渗透的时期。

铁器时代（自公元前700年至罗马征服高卢）同样也是充满动荡的时期，这是因气候变化带来的困难造成的。更为寒冷而潮湿的气候导致湖水淹没滨湖地区，使山毛榉、槲木、松树、云杉等各种乔木覆盖了山坡。森林面积的扩大显然有利于新兴的炼铁业的发展，炼铁技术比冶炼青铜技术更复杂，要求高温，需要消耗大量木材。炼铁技术曾长期是古赫梯王国的一项秘密，后来逐渐外传，不知何时经何路线抵达西欧。可能是腓尼基人经地中海传入法国，也可能经由欧洲陆路随多次越过莱茵河的移民浪潮而来⁶⁷。

铁器时代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即从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七世纪的哈尔施塔特文化期和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的拉坦诺文化期。较之史前史的其他阶段，我们对铁器时代的文明有更多的了解，不过对由此产生的许多难题，我们往往不能作出解答（这也不足为怪）。

哈尔施塔特文化的情形肯定是如此⁶⁸。我们对新迁徙的居民知之甚少。他们是西欧最早出现的骑兵（使用马匹在法国领土上虽然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但它们只被用作驮畜），也是炼铁技术最早的传播者。他们带来了一系列铁制工具和新兵器，其中的重剑使他们对仍然使用青铜匕首为武器的敌人具有不可抗拒的优势。因此，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来自巴尔干北部的多利安人——他们也已骑马——早在哈尔施塔特时期之前几个世纪，已在希腊



铁器时代早期的遗址(公元前700—500年)

集中在所谓哈尔施塔特文化侵占的地区,位于卢瓦尔河以南和以东。(参见让·吉莱纳:《法兰西以前的法兰西》,1980年版。)

给予灿烂的迈锡尼文化以毁灭性打击。

“高卢”并未经历这样的剧变,那里发生的事主要是渗透、重合和侵蚀。“从洛林和香巴尼直到卢瓦尔河三角洲这条直线以南”的全部地域逐渐被入侵者所占领。人们可以依据他们的墓冢⁶⁹找出他们的入侵路线,不论实行火葬(“瓮棺”文化的习俗)或土葬,死

者都有兵器陪葬，主要是剑，有时还有战车和鞍轭。关键的事实是，在这些个人坟墓中，首领人物的坟墓特别奢华。显而易见，骑士社会等级森严，这一特征构成高卢社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并一直保持到罗马人征服时为止，甚至随后还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然而，高卢人的先祖究竟是谁？一些人认为是原始凯尔特人，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属讲印欧语的人种，但并非凯尔特人，根据的理由是：“真正的”凯尔特人，即所谓拉坦诺文化的外来移民，在抵达高卢时，摧毁了当地人防守的营垒。这条理由并不充足：凯尔特部落之间不是也经常发生争斗的吗？验证凯尔特部族的唯一有效标准无疑应是他们操何种语言。可是，对于哈尔施塔特时代的居民使用何种语言，我们一无所知。无论如何，他们像随后的凯尔特人一样，是从中欧过来的移民，并且将自己的影响从奥得河扩大到了西班牙。

但是，在他们入侵的当时，一些特殊的因素对于未来高卢的地域和社会的演变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事实上，公元前七世纪、六世纪和五世纪将是地中海文明繁荣昌盛的时代，希腊城邦、腓尼基人和伊达拉里亚人竞相进行开疆拓土的殖民活动。公元前600年，福西亚人在高卢的土地上建立了马赛利亚城——今日马赛的前身。该城地理位置极其优越，商业十分活跃，不仅通过罗讷河—索恩河长廊从“高卢”市场吸取丰富的资源（包括布列塔尼的锡），而且经地中海广开货物流通的大门，尽管伊达拉里亚人和迦太基人不时进行骚扰。伊达拉里亚人从意大利北部出发，早已翻过阿尔卑斯山的一些山口进入高卢，迦太基人则先经由西班牙，随后又取道大西洋的海路袭击高卢⁷⁰。

高卢朝南方发展商业是否构成哈尔施塔特文化末期的主要特征？当时，一些古城堡和设防山寨陆续建立了起来。在埋葬王公要人的高大坟墓中，不仅有四轮车和个人用品等陪葬物，考古学家

还发掘出许多源自希腊和伊达拉里亚的珍贵物品。1953年，在布列塔尼的维克斯古城堡的脚下，发现了一位少妇富丽堂皇的墓穴⁷¹。这位少妇佩戴各种饰物，躺在一辆四轮车上，身旁有三只来自伊达拉里亚的青铜盘，一只银盘，两只阿提卡式的杯子，还有一只外壁饰有武士和战车的大型双耳青铜壶（高1.65米），这只双耳壶从此以维克斯青铜器闻名于世⁷²。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居然能把它从遥远的产地运到维克斯。据考古学家的推测，这只双耳壶应是在科林斯或古希腊的另一所作坊中制造的，也可能产自小亚细亚的福西亚……

维克斯墓的建造年代约为公元前六世纪末，当时正值拉坦诺文化开始渗入高卢东部地区，入侵者无疑已被称为克尔特人⁷³。维克斯城后来在公元前五世纪初突然被摧毁，位于德龙地区的佩格堡也同时被毁。过后不久，汝拉山区的沙托营垒也告失守⁷⁴。哈尔施塔特文化的土崩瓦解与新移民迅猛异常、势不可挡的入侵同时发生，入侵者逐渐遍布法国的大部分领土。他们肯定是英勇无畏的武士和骑兵，技术精湛的铁匠，心灵手巧的工匠；尤其，他们还带来了辉煌的神话、新的宗教、独特的文化以及他们自己使用的印欧语言。他们就是我们的祖先高卢人。

克尔特人或高卢人：他们的历史和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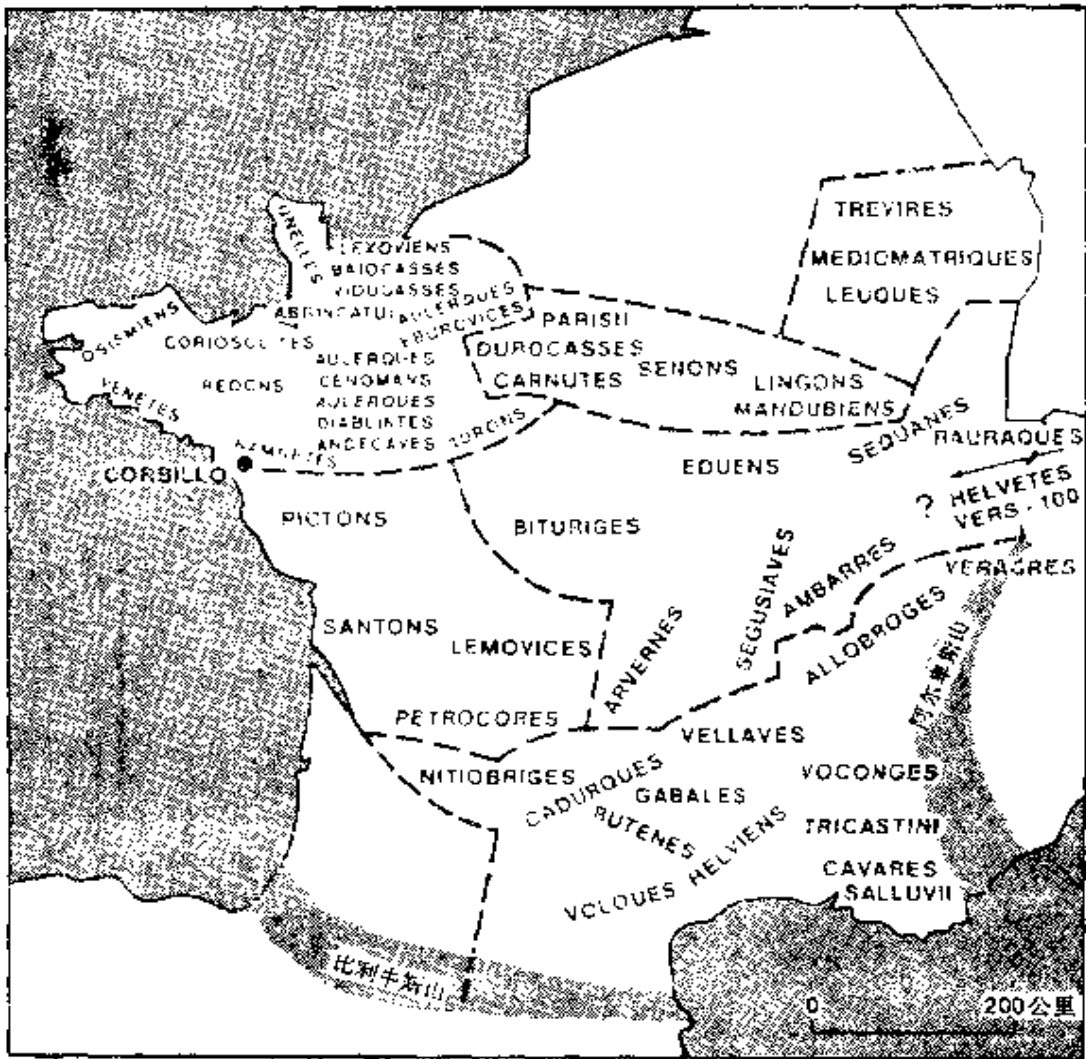
说到拉坦诺文化的克尔特人，我们告别了史前时期，进入到文明史的朦胧阶段。然而，这还不是历史的曙光，后者只是在罗马征服高卢时（公元前58年至公元前51年）才开始出现。对于“法兰西”历史这一漫长的序幕，我们仍缺少详尽的资料。

高卢人就是克尔特人。那么，克尔特人又是何许人呢？是讲印欧语的人种。这一确指仍不具体，因为印欧语人种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包括分布在从大西洋到恒河的旧大陆各地的众多部

族。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所讲的语言具有亲缘关系，因而语言学家们认为几乎可归为一类。关于这个问题，以往提供的解释极其简单：讲印欧语的居民原本是单一的人种，他们居住在濒临波罗的海和北海的日德兰半岛的南部。这一人种后来分散成许多部族，每个部族又各自形成独特的语支。遗憾的是这种四平八稳的见解如今已被放弃，但又没有任何一种新的解释能够取代它。

克尔特人属于印欧语人种的西欧分支（同他们以前的哈尔施塔特文化时期和“瓮棺”文化时期的居民，甚至同公元前第三千纪末“钟鼎”文化时期的居民一样）；命运决定他们生活在辽阔空旷的大地上。从公元前七世纪起，他们大概住在欧洲中部的波希米亚，这一四边形地区是各种影响交融汇合的必经之地。人们因此不把克尔特人看成一个人种：人种学家一直把他们区分为短头型和长头型两类。公元前五世纪时，他们的人种混杂与现代居民相差无几⁷⁵，随着他们不断占领新的领土，这种混杂也就变得更加突出⁷⁵。我们最好也不说克尔特人是一个民族，因为民族这个宽泛的字眼有着太多的含义。我们当然决不会说他们已是一个国家。他们可能源自一个居统治地位的家族，一个征服了其他部落的部族；后来，他们的文化像油渍那样一点点扩散，最后形成了一个“总体”。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构成这样一个总体，显然需要投入强大的力量，有赖于各种机遇的凑合，再经过反复的变革和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巴里·康利弗⁷⁶的解释令人神往，因为唯有这种解释说明了上述历史进程的意义。按照他的说法，整个进程派生于一次遥远的意外事件：公元前七世纪时，随着多利安人的入侵和“海民”神出鬼没的骚扰，灿烂的爱琴海文明突然崩溃；而爱琴海文明在对外扩展影响的同时，曾使从埃及到希腊、再到赫梯人的小亚细亚的东地中海地区成为极其活跃的文化和商业交流中心⁷⁷。设想有一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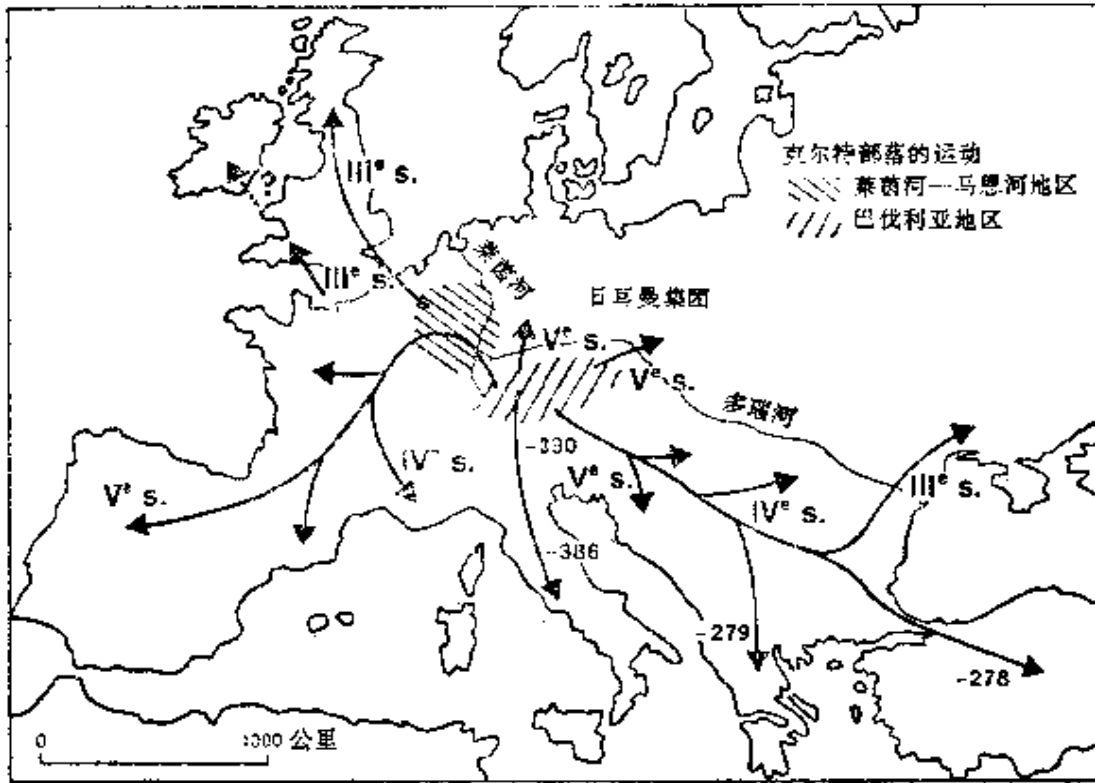


公元前二世纪的凯尔特高卢

本图展示罗马征服普罗旺斯前(公元前121年)高卢的民族组成状况。

遮光的灯，就像猎人使用的那种暗灯，在夜间监视远处猎物的动静，这盏暗灯突然熄灭了。中欧当时的情形就是如此，它必须自己摸索，自谋生路。正如二千年过后，即在公元五世纪的蛮族大规模入侵后，北欧——尼德兰——只能自力更生重建家园，进而成为中世纪欧洲活跃的经济中心。上述过程的实现使中欧受益匪浅；中欧地区完美的炼铁技术长期曾是赫梯人的秘密，如今经巴尔干半岛和伊利里亚地区向外传播，促成了一个善于制作铁器和能征惯

战的部族的诞生。凯尔特人可能就是部族的后裔。几个世纪以后，他们人数众多，生活欣欣向荣，接着又进行了一系列旷日持久的征服活动。



公元前五至三世纪凯尔特人的征服活动

凯尔特人从巴伐利亚、莱茵河和马恩河之间的地区（于公元前六世纪占领）出发，朝着各个方向进行扩张，但在北方遇日耳曼人而受阻。

凯尔特人迅猛、急剧的扩张持续了三四个世纪，波及的地域相当辽阔。在我向雅克·哈尔蒙⁷⁸借用的简图上，读者当可一览无遗。在几个世纪期间，面对希腊人、罗马人、伊达拉里亚人等地中海城市文明的侵蚀，凯尔特人除了使用武力就别无选择，唯有武力才使他们抵御和遏制这一侵蚀。

凯尔特人以巴伐利亚为起点，不断向西方推进。在征服莱茵河中下游地区的同时，他们于公元前六世纪在莱茵河和马恩河之间的地区安顿了下来。然后，他们又以这一定居地出发，继续挥戈

西进,席卷高卢全境,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伊比利亚半岛西部。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他们到达大不列颠,并征服了爱尔兰。

与此同时,从公元前五世纪起,凯尔特人还从巴伐利亚出发,越过布伦纳山口和圣哥达山口,进犯意大利,于公元前 386 年夺取罗马,控制了维内蒂人、伊达拉里亚人和利古里亚人居住的波河流域(内高卢)。他们向意大利南部的进军遭到了罗马人和伊达拉里亚人的阻击⁷⁹,因而仅占领从阿尔卑斯山到亚得里亚海之间的一个狭长地带。

最后,朝东方向,凯尔特人沿多瑙河河谷进入巴尔干腹地,并深入到小亚细亚。希腊古城德尔菲于公元前 279 年被洗劫一空。他们于公元前 278 年越过波斯普鲁斯海峡,同年建立了加拉提亚王国,并一直保持到公元前 230 年。这里同西班牙一样,距根据地十分遥远,凯尔特人在扩张的强弩之末,无力与占领区众多的居民相抗衡,不得不实行妥协。他们的影响虽然相当明显,但最终促成了“成分不一的凯尔特混合型部族”⁸⁰。

雅克·哈尔蒙依据历史顺序重现的这一过程尽管并非无懈可击(可用的上古史资料始终有待重新作出解释),但我认为相当可信。这种进犯成功的范例并非绝无仅有。我们不妨根据辛布里人和条顿人——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的混血人种——的入侵(公元前102至101年),或根据赫尔维蒂人的迁徙(被恺撒于公元前 58 年所阻止,当时正值罗马开始征服高卢),推想出凯尔特人的胜利进军该是什么样子:男女老少浩浩荡荡地结队前进,战马和战车不绝于途……整个部族杂乱无章地往前走,并在几个世纪期间,改变了地中海和欧洲的命运。凯尔特人的长驱直入是内陆欧洲和地中海欧洲的对抗,是部落和城邦的对抗⁸¹,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对抗,原始经济和货币的对抗……长期势不可挡的凯尔特人既不建立城市,又不建立国家,更不知帝国为何物。他们不追求恒久的政治目

的,又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征战计划。冒险精神,掳掠成性,有时加上人口过多的压力,促使他们向外发展。他们也可能彼此争斗,甘愿充当雇佣军,为西西里或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为埃及或迦太基出力作战。米希莱曾写道:“谁想找到盲目的勇敢和廉价的鲜血,只要收买高卢人就行了。”⁸²

高卢人和凯尔特人实际上同属一个部族。凯尔特人是希腊人对这个部族的称呼,罗马人则把居住在高卢的凯尔特人叫做高卢人。为方便起见,当涉及这一部族的整体时,我们便使用凯尔特人这一称谓,在只涉及法国领土时,则使用高卢人的称谓。但是,恺撒在其《高卢战记》的开端介绍当地的区划时,他把尚待征服的中部地区(从加龙河至塞纳河)称做克尔提卡,其南侧称为阿奎塔尼(从比利牛斯山至加龙河),其北侧称为比尔吉卡(从塞纳河至莱茵河)。

凯尔特人从东部侵入高卢后,便在阿尔萨斯、洛林、香巴尼和勃艮第实行定居⁸³;他们砍伐森林和开采铁矿。他们在其他各地的分布不如以上地区那么密集:朝莫尔旺地区和中央高原的移民相当稀少;再往南去,高卢人被夹在罗讷河下游河谷的两侧,东面遇到伊伯尔人的抗拒;西面又遇到利古里亚人的抵御,总之,当地居民即使被驱逐或被征服,也并未被消灭。亨利·于伯尔⁸⁴在他论述凯尔特人的著作——至今仍不失为经典之作——中,强调了入侵者人数众多。这是把凯尔特高卢的语言、文化和社会扩张归功于人种的更新。事实上,这些从一开始在中欧便与其他民族相混杂的凯尔特人,在其迁徙途中,还把他们遇到的大批异族一起带到高卢。从此,在高卢发号施令的凯尔特人更有充足的时间使自己与被征服者相融合。殖民征服和文化适应的历史进程长达几个世纪。

凯尔特人在高卢成功的原因在于他们强制推行了他们的语言

和生活方式，只有南部例外。在他们所获得的文化成就中，经济显然起了巨大的作用，活跃的经济有助于种族的融合。但还必须指出，高卢的谷物生产和手工制作并不是由克尔特人开创的。早在他们到来之前，除森林、沼泽及泛滥成灾的江河两岸外，乡村已在各地建立了起来。当时森林的面积的确要比今天大得多，尤其是在卢瓦尔河以北，森林覆盖了博斯、奥尔良、加蒂奈、布莱索瓦、佩尔什……⁸⁵。大麦、小麦和小米的种植已有悠久的历史，当时尚未出现的作物是啤酒花、燕麦、栗树和葡萄。葡萄于公元前121年罗马征服普罗旺斯后才在当地落户，随后再传到克尔特卡地区。此外，由于早已存在的传统，高卢人在林间饲养成群的绵羊、山羊、牛和猪（牲畜饲养甚多，在罗马入侵前，高卢的腌肉和羊毛已行销罗马）。克尔特人热衷养马，马匹的繁殖可能是他们的功劳⁸⁶。同时，他们肯定也是炼铁技术的传播者。在拉坦诺文化初期，高卢的许多省并不掌握这种技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克尔特人还推广了铁器农具的使用，铁器在哈尔施塔特文化期的高卢十分罕见。

总的说来，恺撒在高卢征战时经过的乡村，当地农民的耕作技术肯定领先于罗马人。有些热心人把轮犁的发明归功于高卢农民，这一说法还值得商榷，因为至今发现的许多铁犁头只适用于步犁，而不能与真正的轮犁配套，后一种犁不但可以翻耕土地，而且还能犁出垄沟。但高卢人至少完善了耕作技术，因为在罗马入侵的前夕，他们已能翻耕板结的地块，而一般的步犁对此显然是无能为力的⁸⁷。比勃腊克塔周围的爱杜安部落已在地里施撒石灰⁸⁸。此外，高卢人还拥有一些优良的工具，如割草的大镰刀、砍柴刀和斧子，甚至还有收割机（当时还只是一种新奇之物，并未普遍推广）。据老普林尼说：“这种组合装置配有锯齿形外边的盛谷箱，下设两个轮子，当由牲畜牵引前进时，割下的谷穗便会落入盛谷箱中”。高卢盛产谷物，其利弊兼而有之，因为入侵者在推进过程中

可保粮食供应无虞。

罗马人还发现高卢不乏技艺高超的工匠。他们不仅能锻造铁器和进行镀锡(普林尼将镀锡工艺的发明归功于比图里吉人),而且还能加工铁器、银器和金器。为了满足高卢人对装饰品的喜爱,他们制作漂亮的手饰、华美的珐琅制品(这是他们的特长之一)、精良的武器以及带有珍贵饰物的马衔。他们开采铁矿和金矿,如位于塞文山脉吕茨河畔的布拉桑普伊矿。一位磨坊主兼业余地质学家于1850年在地质勘探中发现了“罗马征服之前高卢人使用的铸币”⁸⁹。公元前四至一世纪克尔特人的长剑也表明当时木炭炼铁技术的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用于加工皮革和木材及雕刻金属的专门工具的品种之多令人不胜惊讶,除个别例外,工具的门类与现代已相差无几⁹⁰。

高卢的工匠能织造亚麻和羊毛制品,并将其染成人们所喜爱的鲜艳悦目的颜色。他们对木料和皮革的加工尽善尽美,而罗马人并不懂得这些技术(用木桶代替酒瓮便是克尔特人的一大创举)。他们在欧洲最早制造肥皂,又是心灵手巧的制鞋匠(如制作厚底木屐)和制陶匠,并能制作巧夺天工的金属器皿。

最后,在独立高卢时期,城市已经诞生,城市手工业也已形成。虽然比较不能说明一切,但从公元七世纪起,法国城市中行会的建立似乎标志着城市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后面还将会谈到⁹¹。值得强调的是,既然在比勃腊克塔的下城发现了一个专门的工匠居住区,这个事实足以表明,随着经济活动的进步,劳动分工在高卢也不断发展。

农业、手工业的繁荣兴旺与一定规模的商品流通有着密切的联系。独立的高卢当时确实是个对外开放的地区。陆路交通(尽管人们还不能称之为大道)及海运和河运均已存在。罗马人将把这一切继承下来。车辆在陆地行驶,说明道路并不如人们所说的

那样简陋。除按战车式样建造的轻便、迅捷的豪华马车外，还有四轮重型货车（这些车辆都是凯尔特人的创造，由罗马人于公元前三至二世纪时所仿制⁹²）。此外，高卢从北向南被“大道”所贯通，主要运送琥珀以及布列塔尼和英国的锡，经鲁昂转塞纳河、索恩河和罗讷河的水运，最后抵达马赛。这条通向马赛的道路，人们也可称之为阿维尔尼人之路，因为阿维尔尼人在罗讷河上扼住这条通道的要冲。

海上运输也同样存在。凯尔特人当然并不善于航海，这个道理不言自明。但在阿摩里卡地区，尤其在岛屿四布的莫尔比昂海湾，凯尔特人找到了船舶建造者和水手。那里是维内蒂人的家乡，按照阿兰·吉约姆⁹³的说法，他们对航海的爱好于公元前五世纪时因一艘腓尼基船驶抵布列塔尼海岸（布米尔科远航）而受到启发或从此确立。维内蒂人建造大中型船舶的生涯从此开始。高卢建造的这些船舶在大西洋和英吉利海沿岸往返航行，前往英格兰及盛产锡矿的锡利群岛。他们与迦太基人达成协议，将锡矿从科努瓦耶地区运到宽阔的维哥湾。只要迦太基控制着西班牙，莫尔比昂的贸易活动就能朝南北两方面发展，甚至远届奥西斯姆地区（今菲尼斯泰尔省）。维内蒂人的船队虽然强大，但并非仅此一家。例如，他们必须与在菲尼斯泰尔至埃斯科河之间航行的船只合作。此外，内河航行则是皮克顿人和桑顿人的天下，他们的船只往来于卢瓦尔河和吉伦特河流域。后来，当恺撒对阿摩里卡人发起进攻时，曾征用过这些船只⁹⁴。

恺撒在《高卢战记》中把高卢的城市称为“奥皮多姆”（即设防城市）或“于尔布斯”，后一词原则上也确指城市。使用这一对同义词，难道只是为了避免重复？在恺撒的笔下，阿莱西亚有时被称为“奥皮多姆”，有时则被称为“于尔布斯”。实际上，在独立的高卢，城市—村庄网也就是集镇—村庄—村落网。村庄或村落只有几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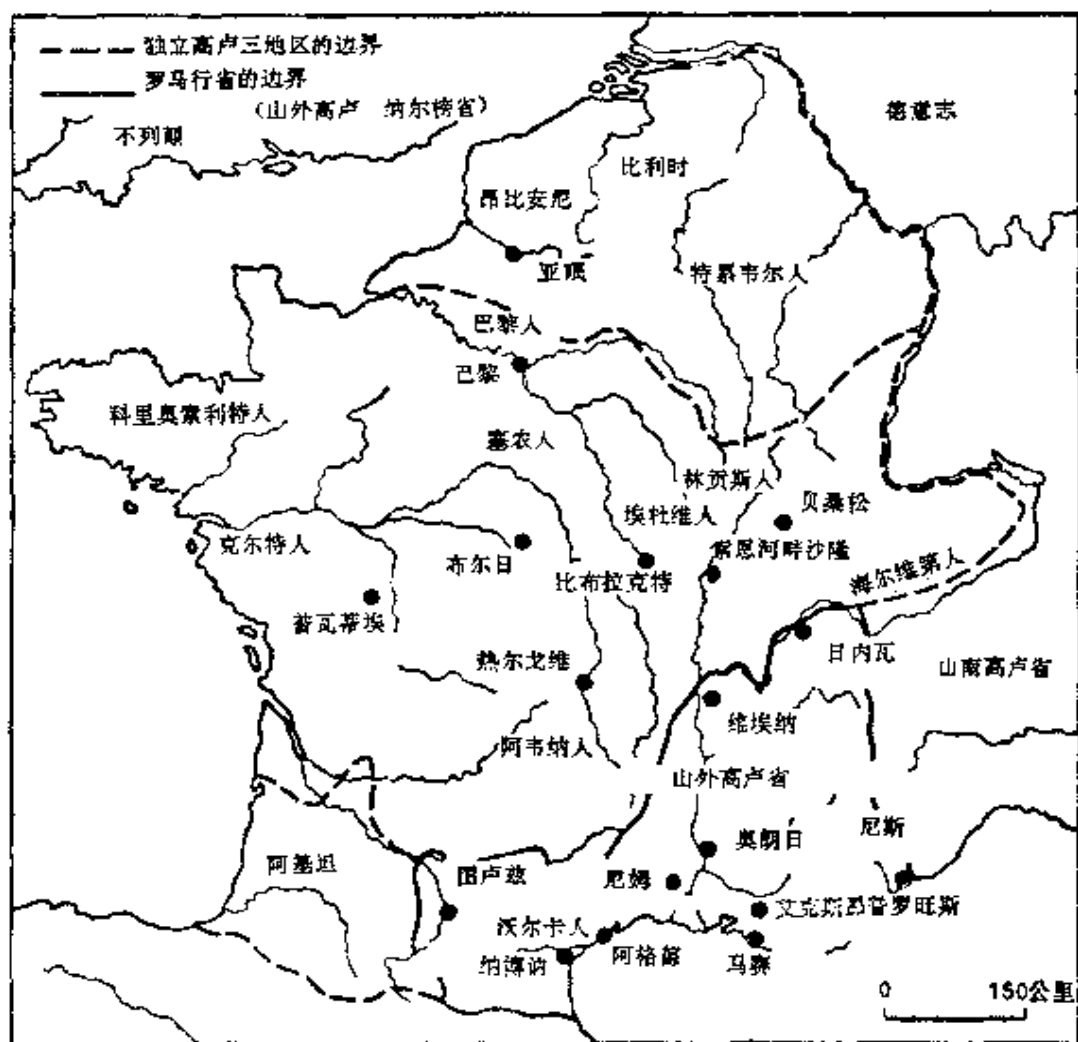
茅草土房，不开窗户（灶烟从屋顶排出）。集镇可能起着城市的作用，但相当简陋。“奥皮多姆”才是唯一值得注意的城市。人们习惯说：城市必有城堡，城堡也是城市。除某些沿河的要塞城市外——布尔热（比图里吉人的首府，即阿瓦里克）就是这种情形——“奥皮多姆”都建在高处，如比勃腊克塔、盖尔哥维亚等。它们通常有深沟高垒为屏障，城墙厚约4米，用土、石、厚木板围筑，城内留有相当开阔的空地（比勃腊克塔有135公顷，阿莱西亚有97公顷⁹⁵）。每遇危险出现，平原地区的居民和畜群便进城躲避。城内的部分土地建有房舍，甚至有高级居民区、神庙及手工作坊，其重要作用已如前所述。问题在于这些要塞城市是否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城市，即政治、宗教、经济中心。凯尔特历史上最杰出的学者之一旺塞斯拉·克鲁塔对此深信不疑，但相当多的历史学家持否定的态度。

在我看来，城市的作用在公元前二世纪至一世纪时发生的明显变化中得到了证实。“奥皮多姆”正是在这两个世纪中出现的。在此之前，凯尔特人没有修建护城工事，他们强大的武力无疑足以保障安全，这就是所谓克尔提卡的和平。罗马统治高卢初期推行的和平属于同类的现象。城市作为避难所逐渐向高处发展，是否与凯尔特人努力日渐衰落，与困难和威胁不断增长有关？人们不禁会想起公元前121年罗马人占领“行省”或公元前102至101年辛布里人和条顿人悲惨的大迁徙。这些部落无疑属于日耳曼人，但他们定居在克尔提卡的北部边境，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及日德兰半岛以南，他们肯定受到了凯尔特文明的影响（他们的首领甚至使用凯尔特人的姓氏）。且不说他们是否已被凯尔特人所同化，他们依旧保持着攻城掠地的习性。虽然旺塞斯拉·布鲁塔力图缩小他们的危害性——罗马人的恐惧心相反则夸大这种危害性⁹⁶——我们应该承认高卢各部落之间的频繁战事毕竟是个不容抹煞的事

实。因此，“奥皮多姆”肯定起到了防御作用，并使当地居民受到了保护。更何况，无论是在高卢境内或境外，这些居高临下的设防城市将是抵御罗马进犯的唯一手段。罗马人只是在进行长期围困之后，才能把城市攻破；西班牙的努曼西亚（公元前134—133年）和高卢的阿莱西亚（公元前52年）都是例子。

那么，为什么城市的防御职能——所有的中世纪城市也都围有高墙——会排斥其经济职能呢？旺塞斯拉·克鲁塔相反把“奥皮多姆”的出现与社会的更迭联系在一起。从公元前225年起，克尔特人彻底停止了对外扩张。在这以前，不存在任何城市：一些类似“乡村民兵”的“武装农民”作为自由民生活在由几户人家组成的村落中，他们随时准备跟随首领去从事冒险，或充当雇佣兵，或进行新的征战。在对外扩张彻底受阻后，居住日趋集中，人身依附和尊卑等级不断加剧，整个经济也大有进步，而“奥皮多姆”的涌现恰恰正是这一切的产物⁹⁷。怎么能无视克鲁塔的这一结论呢？不但农民的经济活动自发地创造了已具有城市职能的集镇，而且高卢全境存在经常的贸易往来无疑也要求建立起一系列商品交换站以及众多的服务设施，进而导致常住人口的集中。恺撒远征高卢期间不是在切那布姆（今奥尔良）、诺维奥杜努姆（今讷韦尔）和卡比约努姆（今索恩河畔沙隆）等地都发现有定居的罗马商人吗⁹⁸？面对罗马人的入侵，维尔森吉托里克斯为使敌人不能从城市中获得粮食供应，曾推行了焦土政策，而比图里吉人则因首府阿莱西亚的“华美壮丽”，不忍把它付之一炬。当然，我们不要以为这里真有什么“壮丽”的建筑：高卢的城市没有留下一座石砌建筑物。房屋大多用土坯垒造，难怪西塞罗⁹⁹深有感触地说：“再没有比高卢城市更丑陋的了”。因此，我们不妨推想阿莱西亚的“壮丽”在于它的经济生活。比图里吉人为守卫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城市陷落时，恺撒发现城里还有大批存麦¹⁰⁰。此外，比勃腊克塔城内的手工

作坊区难道不也是经济繁荣的见证吗？阿尔贝·格勒尼埃曾就比勃腊克塔遗址的发掘撰写过一篇专论¹⁰¹，他正是持以上的见解。既然如此，阿兰·吉约姆恐怕没有理由把保尔—玛丽·杜瓦尔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审慎，牵强附会地硬说成是存有怀疑¹⁰²。在阿兰·吉约姆看来，高卢既没有城市，也不存在国家。皮埃尔·博诺的说法比较准确，他写道：“如果高卢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城市，至少城市的胚胎已在那里孕育成长……西欧和中欧的许多城市将由此脱胎而出，有的是小城市，还有不少大城市”¹⁰³。



罗马征服前的高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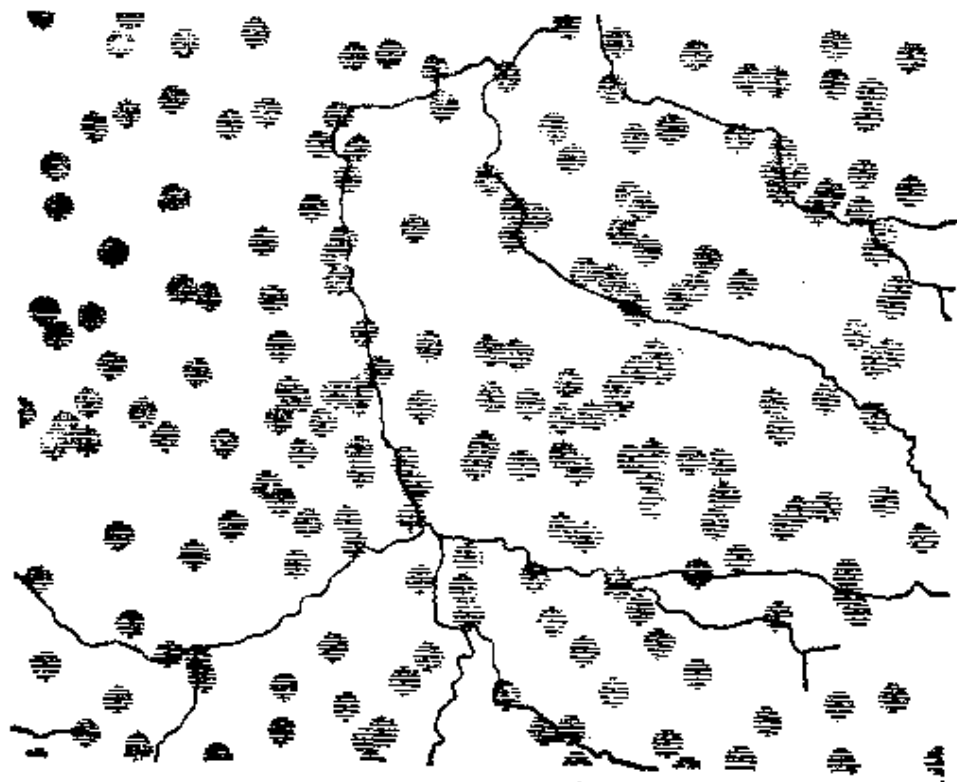
以上对凯尔特人迁入法国的过程只是作了极其简略的概述，

故意没有涉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怎样认识他们的文明？怎样透过克尔特人各自为政的部落割据认识其文明的统一？为了找到这种统一性，关键是要考察他们的社会组织 and 宗教信仰，以及“德鲁伊特”的作用（但有关这些祭司的传闻轶事应该一律撇开）。关于这一切，我将在另一章中再作阐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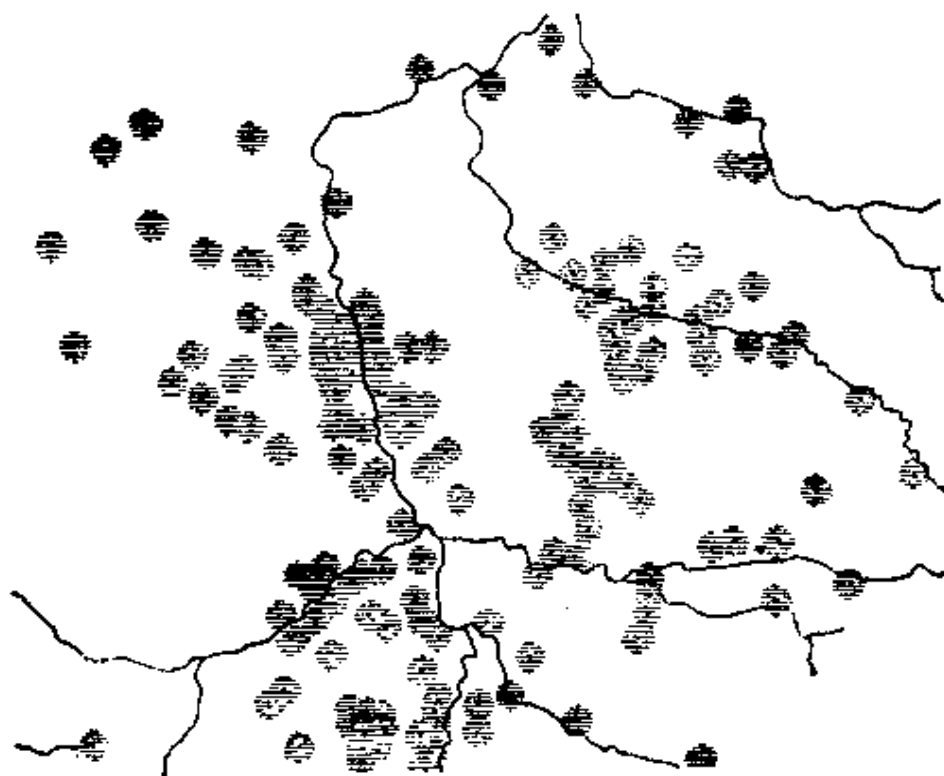
以多胜少

为对我国的史前史作一概述，以上的篇章委实太短，但又太长。所以说太短，是考虑到我们拥有的史前史知识尽管显得支离破碎，但涉及面却相当宽广；所以说太长，是因为初次涉猎史前史的读者希望把我们描绘的这一详尽轮廓印入脑海，却又很不容易。这里能否归纳出几个重要的结论呢？

首先，无疑应该确认以下的事实，很久以前，法兰西地域的人口便异乎寻常地稠密。人口众多的原因部分地要由我国的地理位



置来解释：法国位于八方际会的十字路口。埃马纽埃尔·德·马尔托纳¹⁰⁴认为，欧洲从东到西呈漏斗状，越是靠近大西洋，地域也就越狭小，而法国正是这个漏斗的狭窄的颈口。各种影响都朝法国的方向涌来，并在大西洋沿线停止前进。法国因此成为一张罗网，一处陷阱，这里的居民势必要相互融合。科兰·伦弗鲁认为，从中石器时期以后便可发现的大西洋沿岸地区的人口集聚将能说明为什么在布列塔尼会出现巨石建筑，它是我们的史前史的非凡见证。随着新移民带来农耕技术，人口的迅速增长使可耕地日见减少。每个居民点都因此注意紧紧地聚集在巨石的周围，巨石既是他们的集体基地，也是他们的地域标志¹⁰⁵。



新石器时代和今天卢万河盆地的居民点分布

新石器时代和今天的区别在于，沼泽丛生的冲积河谷过去无人居住，而在今天，高原地区的居民则纷纷迁到河谷地带。路易·勒内·努吉埃认为，这个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农村人口平均为每平方公里10至20人（居民点当时多于现今，但每个居民点的人口显然比今天少得多）。（参见路易·勒内·努吉埃，《史前时期的人口分布》。）

人类学家雷蒙·里凯¹⁰⁶说，居民的积聚和融合使人种混杂在法国大幅度加剧，以致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那里的居民“变成不折不扣的现代人”，“更加明显地以法兰西人的面貌而出现”，也就是说，已经具有今天的种族多样化的特征：阿尔卑斯人，北方人，地中海人，洛林人，等等。这一见解与费迪南·洛特的一句俏皮话不谋而合。后者说：“实际上，当代的法国人要想知道他们祖先的模样，只用看一看周围的人，或者在镜子里照一照自己就够了”¹⁰⁷。

然而，在进行总结时，更为重要的显然是进行统计。我们的祖先究竟有多少人？对这个问题，我们无法给予确切的回答，这并不是要紧。至少在近20年来，史前史学家对当时人口的分布、数量、密度和增长等问题越来越感兴趣。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的是数量级。科兰·伦弗鲁最近反复强调说¹⁰⁸，人口密度的增加实际上促使一切发生变革：游牧民族的定居，农田的精耕细作，社会等级制的出现，领土区划的实施，等等。这是毫无疑问的。经过千万年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流浪之后，“捕食型的人”变成了“生产型的人”¹⁰⁹。农业逐渐建立了起来，与此同时，人口在持续增加。史前期的人口增长可能高达十倍，甚至是一百倍。特别在公元前3000年到1800年期间，“法兰西”大地渐渐布满了村庄、村落和人，以及开垦的森林和耕种的土地。根据路易·勒内·努吉埃¹¹⁰的计算，在这巅峰期前后，在后来被称为高卢的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居民总数可能高达500万人，最低限度也有250万人。他所提供的地图展示某一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人口的分布和该地区当今人口的分布，可供我们作出有益的比较。在某些地区，夏赛文化期的居民点甚至比今天还多。当然，史前史学家有理由提醒人们，这些遗址并不一定属于相同的时期，因此，如果只是简单地把它们加起来计算，就有可能出错。但是，人口过于密集还有其他征兆：许多村庄的四周深沟高垒，村内贮存大批粮食，从而表明战争已经出现。在集

体坟墓中，人们还发掘出成堆有箭痕的尸骨以及大量箭头¹¹¹。

公元前第二千纪时发生的长期而急剧的衰退或许也是人口过多的又一征兆。人们注意到了衰退造成的危害，却说明不了衰退产生的原因¹¹²。可能是瘟疫蔓延，类似旷日持久的百年战争初期在西欧流行的黑死病。由于找不到更好的理由，人们怀疑瘟疫或许与气候反常有关。但人们也可以作出其他的解释：恰恰因人口增长过快造成的饥馑（黑死病流行前的情形正是如此），或者因缺少新的土地引起你死我活的争斗，还有可能因出现了新的外族入侵（在铁器时代第一阶段的末期，即在第一千纪）。不论如何，及至铁器时代第二阶段，高卢的人口又有了明显回升，这种发展趋势一直持续到罗马入侵的前夕。

高卢当时恐怕不会达到2 000万人口，这一数字是亨利·于伯尔、亚历山大·莫罗·德若耐斯、费迪南·洛特、阿尔贝·格勒尼埃、卡米耶·尤里安等人所作的乐观估计。克尔特人侵占高卢和欧洲，无疑带来了精耕细作的农业，形成繁荣兴旺、人口众多的地区。某些拉丁语作者认为，人口过剩也是高卢多次移民的原因。根据尤利乌斯·恺撒的推测，高卢人当时总人数为1 000万。卡尔·朱利尤斯·贝洛赫提出只有570万¹¹³。古斯塔夫·布洛赫则认为500万¹¹⁴。欧仁·卡芬雅克¹¹⁵推断在800万与900万之间（作者引用并修正了恺撒在《高卢战记》中提供的人口统计数字，特别是公元前52年在围困阿莱西亚期间对高卢援军所作的统计数字）。

能不能说，800万至900万这个数字仍然是偏低了？特别是，当时的纳博讷作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已有将近70年的历史，其人口密度与意大利不相上下。卡尔·费迪南·韦尔纳认为高卢本身的人口为700多万，如果包括罗马的行省在内，整个高卢人口则在1 000万至1 200万之间¹¹⁶。其实，数字多少无足轻重。从以上数量级的众说不一中可以看出，高卢以前的高卢，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到公元开

纪这3000年内，曾经是人口不断变动的大舞台。变化的趋势是先增长后减少，然后又出现新的增长。这些以百年为单位的长周期，我早就指出，尽管它们延续的时间很长，仍与传统周期相似；传统的人口周期自公元11世纪开始，到1350年达到顶点，接着在不到100年内急剧收缩，时间比1350年至1450年的百年战争略为短些。高卢在史前期的人口运动并不这样“迅猛”，但是，周期性的交替运动与后来中世纪法国所发生的事有着本质的相似。

然而，这些漫长的、连绵不绝的周期必定包含着相当严密的结构；人口运动并不意味着绝对的人口分散，而是要求有一定规模的财富、文化、技术和人员的交流。这种情形已与文明史十分相近，它只能是一定的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所产生的后果。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高卢以前就有一个高卢。二者之间并且还存在着一个衔接阶段。尽管对努吉埃在统计村庄和居民时提出的基本论据持有保留意见，我还是倾向于认为，在公元前1800年时，史前期的高卢人口为500万。这就是说，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人在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竞争已经基本结束，人种的融合不但已经开始，并且还将持续下去。后来的入侵，特别是凯尔特人的入侵——人们认为入侵十分剧烈和频繁，产生的文化冲击十分强劲有力——将在当地居民中逐渐被同化；当地居民被入侵者所征服，有时甚至被逐出家园，而他们将重新崛起，卷土重来，再次欣欣向荣。人口的数量无疑保持着稳定。在面对罗马的入侵时，情况不也正是这样吗？在五世纪时的蛮族入侵面前，在使今日法国感到忧虑的过多的移民面前，情况难道不也同样是这样吗？重要的因素是当地的居民，他们始终占着多数，外来者经过长期的同化终于与当地居民相融合。

我们暂且把这些问题搁置一旁，留待以后再谈。在这里，重要的是确定史前期的遗产在我国人口中应占什么地位。法国和法

国人是这一遗产的继承者，尽管人们并不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血液学研究至今尚处于起步阶段¹¹⁷。但是，假如有一天，在我们的血液（今天法国人的血液）里，终于可辨认出史前期的血液，这难道会让人感到惊异吗？我们孜孜以求地追溯历史的渊源，正是为着同一个目的。

二、从独立时期的高卢 到加洛林时期的高卢

继史前的“高卢”之后，出现了四个首尾相接的高卢，这就是所谓独立时期（初史时期）的凯尔特高卢、罗马时期的高卢、墨洛温时期的高卢和加洛林时期的高卢。显而易见，这些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段既具有相继性，也具有相似性；它们都经历了各自的繁荣阶段，随后又无一例外地衰落了，仿佛每一次都注定要失败、要消逝似的，不论这种失败和消逝的形式和理由是什么。

既然如此，这些时段是否存在一种重复的、内涵的体系或进程呢？以若干世纪为周期的这种变化，它们的缓慢的繁荣和衰退，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无一不呈现出令人难以觉察的进程。不幸的是，由于缺少足够的资料，统计学对于这些变化趋势的解释满足不了我们一半的需要。有鉴于此，有一、两位历史学家甚至怀疑是否确实存在上述趋势。

我个人的见解是，为了研究这些遥远年代的问题，需要引入一些经济学术语，以便说明在这些晦暗的世纪里，经济虽然不能构成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但它的作用决非无足轻重。其实，谁又不明白这一切呢？

从经济角度看，至关重要的是，在大体上延续了千年之久的这四个漫长的历史时段中，尽管经济曾出现倒退和复兴，政治也曾发生种种波折，但没有出现足以改变生活结构和深层平衡的任何革命性进程。数千年前业已确立其地位的农业是如此，中世纪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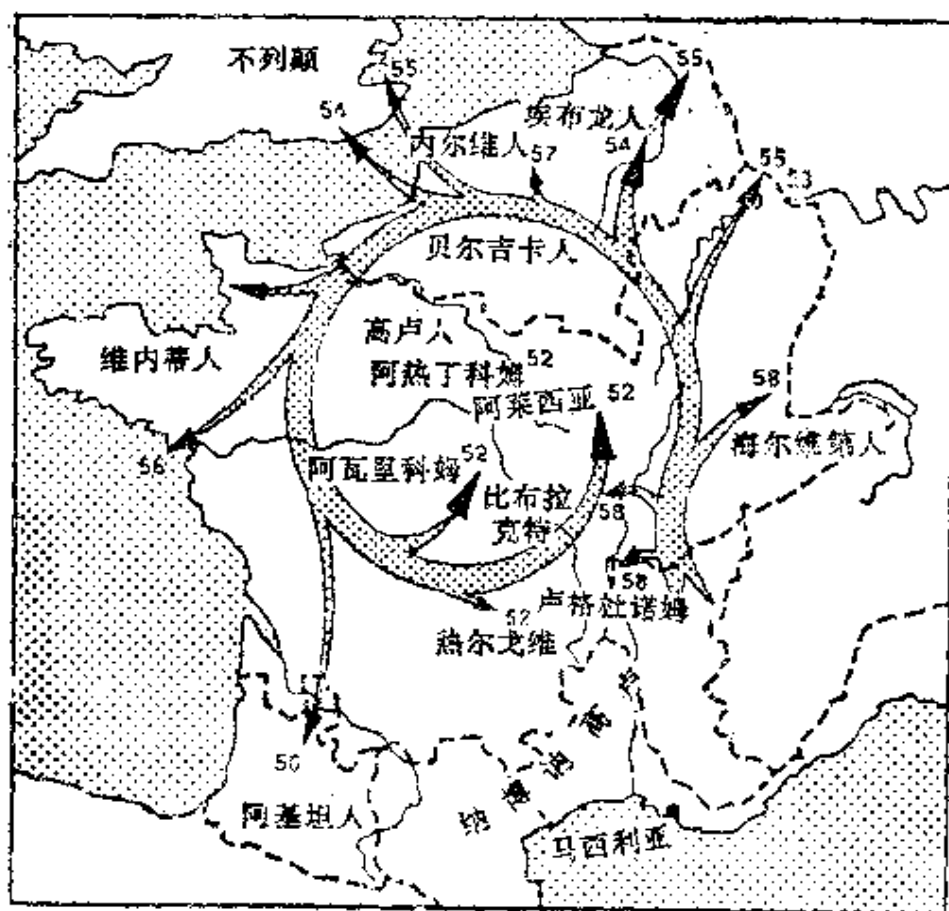
能源革命也是如此；关于后一个问题，我们将另有机会再谈。罗贝尔·福西埃的评述十分中肯贴切。他写道：“在罗马占领高卢和九世纪之间没有发生突变。”我们甚至可以像米歇尔·罗布朗那样把时间推迟两个世纪，他指出：“在1世纪和11世纪之间，持续的演变排除了任何突然的、深刻的动荡的可能性”¹¹⁸。

罗马人征服高卢之探讨

罗马人血腥的、神速的征服摧毁了高卢的独立，热尔戈维战役、阿莱西亚战役等历史事件，阿里奥维斯特、尤里乌斯·恺撒、韦辛杰托里克斯等历史人物早已为我们所熟知。我不打算对每个法国人在其学生时代早已牢记在心的这些事件和人物再详加叙述，并非因为我们反对叙述，历史本身就是要叙述情节，而且还是令人惊心动魄的情节。更何况，在本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中，我将有机会按年代顺序简要介绍法国的历史。但在这里，我们从事的乃是另一种“尝试”：如前所述，本章仅限于指出法国历史的重大阶段，着重考察人口状况，借以找出深层历史的节奏。为此，我暂且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到历史的一个侧面。我要谈到独立时期的高卢，但并不想为它提供一幅完整的画像，即使是草图式的画像；事件、人物、制度、社会、经济以及神圣莫测的方面，这一回我都无法

的感情色彩，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实在关系重大，历史学家怎么可能不带丝毫偏见呢？

首先使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罗马征服高卢只花了几年时间（公元前58年至公元前52年），而控制西班牙却费了两个世纪之久。斯特拉波（几乎就在高卢人溃败时诞生的一位希腊地理学家）早就指出过这一反差¹¹⁹。



恺撒征服高卢(公元前58—52年)

罗马军队在辽阔的领土上进展如此神速，这表明当时的高卢拥有相当稠密的陆路网和足以供应军用粮草的农业资源。

“长发”高卢拥有抗击外敌的一切条件：众多的人口（或许有1 000万居民乃至更多），高于罗马统治下的地中海地区的人口密度，一定程度的繁荣。繁荣一说未免夸张，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

在恺撒大军抵达前夕，高卢曾出现过相当严重的危机。就算确实有过危机，但从种种迹象来看，高卢的经济还在健康地和协调地发展。考虑到这些，就不应该对灾难作出草率的或片面的解释。

比如，能否把一切归诸罗马军团的军事优势和恺撒的军事天才？继击溃赫尔维蒂人和日耳曼人之后，罗马军团在英格兰登陆，摧毁维内蒂人的海上力量……使高卢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我们显然不应低估恺撒的作用，以及他的大智大勇和用兵神速。难道这足以成为理由，使勇敢善战、装备精良并有大批骑兵支援的高卢人在初战失利之后，居然就全线崩溃？这就等于承认，人们对当今法国人指出的各种优点和缺点，全都可以栽到这些高卢人的头上。

高卢人的溃败并非只有一种解释，而是有着多种解释。不要忘记罗马出征长发高卢并非“一举成功”，而是三次征讨的最后结果。在第二次布匿战争警报频传、迦太基人尚未溃败以前，罗马人曾通过三次血战（公元前197年、194年和191年），控制了内高卢：从不把罗马人放在眼里的高卢武士以前曾一直打到罗马，赤手空拳地与罗马人作战，并且嘲笑对手笨重的装备。后来，在公元前121年，罗马人占领了“普罗旺斯”，位于阿尔卑斯山和阿基坦之间的纳博讷，即外高卢中人口最密集的聚居区。在占领了这一战略要地以后，罗马不仅获得了通往西班牙半岛的自由通道，而且还给阿尔维尼人的霸权以致命打击。罗马人还占领了罗纳河至日内瓦湖之间的阿洛布罗克斯人的领土。普罗旺斯成了他们向北方进军的桥头堡。

由此可见，在恺撒征服高卢前，已曾有过几场重要的序战，正如阿兰·吉约姆所说，这些序战已破坏了“克尔特地区”的结构¹²⁰。最后一场序战大概在恺撒出征前60多年进行。然而，这不等于说，这些插曲与独立高卢的迅速瓦解没有联系。从事殖民征服的法国首先占领了阿尔及利亚（1830年）和突尼斯（1881—1883年），然后

才强行打开摩洛哥的大门，时间就晚得多了（1911—1912年）。

高卢的失败应归罪于自身的四分五裂和政治混乱吗？显然是的。米希莱¹²¹说高卢“混乱成一团”。如果高卢当时业已形成“民族”，或者仅仅形成一个严密的政治整体，人们甚至可以认为出现了背叛行径：埃杜安人、雷莫瓦人以及“勾结”和追随恺撒的许多高卢骑士，还有林贡人——这个强大的部落位于交通要冲朗格勒的周围，曾多次向入侵者提供金钱。事实上，高卢是由不断互相冲突的许多独立部落犬牙交错地拼凑而成的。正如罗马人后来所说的那样，高卢大约有60至80个“文明群体”，而每个群体都处在分崩离析之中。总之，高卢在政治上像是一团散沙。“同族的亲情，共同的语言、宗教和文化，竟阻止不了他们反目相仇”¹²²。德鲁伊特祭司竭尽全力，也无法把高卢人组织起来对入侵者进行抵抗。由于这种深刻的分裂状态，我们的国家成了唾手可得的猎物。恺撒可以煽动不和，制造分裂，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人们不难想象，假如高卢当时众志成城，就会对罗马人进行有效的抗击。

事情也许确实是这样。不过，人们同样有理由提出相反的论点。前面曾说到，在高卢进行的闪电战和西班牙进行的旷日持久的征伐之间，有着惊人的鲜明对照；我们可以认为，差异起着重要的作用。高卢位于比利牛斯山以北的开阔地带，物产丰富，人烟稠密，并且有现成的交通网可供使用，因而粮草应不存在困难；西班牙位于比利牛斯山以南，有自然屏障的保护，而且人烟稀少，粮食资源不甚充足¹²³。斯特拉波又指出了二者另一个更具意义的差异：西班牙人实行化整为零，坚持开展所谓游击战；高卢人采取的方法则是迅速集结兵力，这样做并没有削弱抵抗的实力，但容易暴露弱点，容易孤注一掷。概括说来，正是高卢的同心戮力，能够调集庞大的援军，它才在公元前52年的阿莱西亚大会战中为一决雌雄而招致全军覆没。相反，假如分散作战，它本可以拖住入侵者，

使他们处处受阻。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殖民”战争的经过可为斯特拉波的见解作证。为了进行比较，我们且看公元七世纪时穆斯林的扩张：他们于643年征服叙利亚，于636年征服埃及，于641年征服波斯，莫不一举成功，而波斯在几年前与查士丁尼的罗马还是旗鼓相当，甚至分庭抗礼。可是，伊斯兰为占有马格里布的不毛之地，却足足花了50年时间（650—700年），而且控制并不牢固。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同心抗敌，于711年也一蹶不振，落入伊斯兰之手。

说到这里，我们还不能把恺撒成功的原因解释清楚。历史学家对此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特别是在过去，有些历史学家为罗马的胜利而庆幸，他们认为这一胜利为法兰西进入拉丁世界奠定了基础，使拉丁文明成为当今法兰西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古斯塔夫·布洛赫¹²⁴在1911年发表的著作（该书列入厄内斯特·拉维斯主编的《法国史》）中曾这样谈论过。另一些历史学家，如费迪南·洛特¹²⁵，则把罗马的征服看成是我们民族历史的灾难，是其独特演变的终结，是强盛的“法兰西”的毁灭。民族主义情绪更为明显的卡米耶·尤里安甚至认为，没有罗马的征服，高卢有可能吸收已在马赛（该城建于公元前600年¹²⁶）立足的希腊文明，这一点自然尚待证明。的确，当时高卢使用希腊字母，且非仅限于少数文化精英。照斯特拉波的说法，高卢人“用希腊文起草商业契约”¹²⁷。

如果不顾历史的既成事实，硬要凭假定去改写历史，各种推测当然都是行得通的。至于阿兰·吉约姆，他深信高卢自身就足以同化阿里奥维斯特统率下的日耳曼人¹²⁸，尽管过了几个世纪之后，罗马统治下的高卢却无力抵御蛮族的入侵，并因此而终于毁灭。照这么推测，我们还可以设想另一种情景，假如恺撒在阿莱西亚战役中失利，罗马就会放弃高卢，就像瓦鲁斯在战败后（公元9年）撤出日耳曼地区一样；日耳曼地区远不如高卢开化，也许正是这个理由（姑且不谈其他理由），才难以被征服。可是，为什么不作相反的假

设呢？假如罗马在易北河而不是在莱茵河建立起边界，欧洲的命运不也就可能完全改观吗？

事实上，被征服的高卢很快就对战胜者屈服，向意大利和地中海的文明敞开了大门；不管它是心甘情愿或是出自无意，高卢的屈服深刻地改变了它的命运。高卢贵族无疑很早与战胜者合作，协助罗马对高卢进行文明同化；罗马的统治在征服高卢之初异常严酷，但随着蒂伯尔（公元14—37年）和克劳狄一世（41—54年）的先后即位，开始变得宽容大度。正如历史学家齐格弗里德·简·德·拉埃¹²⁹大胆指出的那样，“这两位皇帝尽管受到古代史官的极力诋毁，却对罗马帝国的稳定和持久作出了真正的贡献”，他们采用某种联邦制取代了殖民地共和制。我们顺便指出，高卢北部地区的绝大部分陆路网¹³⁰也是克劳狄一世统治时期修建的，这是他赠给高卢的一份厚礼。公元48年，置罗马权贵的强烈反对于不顾，他在元老院中增设了高卢地区的“元老”议席。

然而，我们也不宜把话说得太绝对了。在罗马被人讥称为“高卢人”的克劳狄一世（他出生于里昂），虽然力求平定高卢，使之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属国，但他毕竟也迫害德鲁伊特祭司，后者不得不流亡到“不列颠”去。因此，与其说是宽宏大度，不妨把这看作是一项明智的怀柔政策，而这一政策早在奥古斯都时代已经生效。恺撒的这位继承人在高卢作过四次视察，最长的一次是在建城于公元前43年的里昂，逗留时间为公元前16年至15年，最后一次视察在公元前10年，是为了镇压莱茵河边界的骚乱。不是他把高卢划分为四个行省（纳博讷、阿奎丹尼亚、鲁格敦南西斯、比尔吉卡），并且像恺撒一样，继续在高卢招募士兵吗？他还建立了许多城市，为了装饰它们，他不惜挥霍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部分珍宝以及自己的部分财产。尼姆的方形神庙，加尔河上的高架引桥，奥朗日、阿尔勒、维埃纳、里昂等地的剧场，以及许多重要建筑都应归功于

他。“奥古斯都时代的高卢”堪称“土木工程遍地开花”¹³¹。高卢贵族将陆续迁往这些新城市居住，新城市将成为传播罗马文化的中心，顺便也带动经济的进步。我们说：“建筑业兴旺，百业兴旺”。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一说法已多次被证明是千真万确的。

文明同化的另一项有利因素是：高卢南部毗连西班牙和纳博讷，后者在“三个高卢”即高卢另外三个行省之前已经罗马化了。

此外，由于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守卫，高卢得以免遭来自莱茵河另一侧的外族侵扰。当时防卫这条边界的兵力有十余万众。韦伯芴和图密善这两位罗马皇帝进一步加强了防御力量，他们在莱茵河右岸建起了筑有堡垒的“防线”。这条防线北起柯布伦茨，沿内卡河布防，与多瑙河相会合。在这道防线南侧，直到莱茵河畔，罗马移民垦殖区向远方伸展。

最后，公元43年，克劳狄一世御驾亲征，罗马军团进占并征服“不列颠”即英格兰：此举使高卢的北部海疆顿时获得了保障。布洛涅城拔地而起，矗立在港口的高大灯塔保护罗马航队的安全航行，这支舰队将长期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海面执行巡逻任务。然而，对于长久未曾安享太平的人民来说，罗马帝国所提供的安定及和平自然具有很大的说服力。罗马为当地和当地人用拉丁文命名，称作 Gallia 和 Galli（意即“高卢”和“高卢人”），“克尔特”和“克尔特人”的称呼随之消失。罗马在完成了殖民征服后将给高卢带来自己的文明。它还将确定莱茵河为边界，这条由恺撒划定的边界把高卢与克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中欧分隔了开来。

高卢处在包围和保护之中；道路的开通，城市的形成，学校的出现和军队的存在（军队也向高卢人广开大门）导致高卢的罗马化。虽然如此，高卢仍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才无保留地接受新命运。尽管有蒂伯尔和克劳狄一世的宽宏大度，尽管有先进的文明提供各种有利的条件，罗马统治的第一个世纪依然是动荡的，

骚乱此起彼伏，有时甚至出现骇人听闻的、流血的反叛。对于这种反抗，是否应像某些法国历史学家那样，被怀旧的民族主义所陶醉，并且夸大它的意义呢¹³²？无论如何，我宁可赞同古斯塔夫·布洛赫（1911年）以及其他许多历史学家稳健的判断，事实上，这些反叛反映了一个被征服的民族或多或少意识到的屈辱感，反映了不同地区不同的不满情绪，反映了被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并因地籍统计而深感不安的农民的愤怒，反映了已经罗马化的高卢贵族的恼怒，他们对帝国行政当局的狡诈同样忿忿不平，还反映了手工匠们的怨恨，他们为了摆脱财税官员的盘剥，有时不得不逃到莱茵河另一侧去。

在尼禄皇帝统治末期，局势的动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公元68年皇帝驾崩后爆发的那场危机动摇了整个罗马帝国的根基。暴动的浪潮在高卢许多地方蔓延，有的是由原来效忠于罗马的高卢贵族领导的。暴动在这里遭到镇压，又在其他地方变本加厉地展开。除此以外，一些罗马军团利用统治集团的内讧群起谋反。莱茵河军团于69年向高卢进发，其中包括比利时和日耳曼的许多杂牌部队。高卢险遭一场洗劫。凯厄斯·尤里乌斯·基维利斯是巴塔维人，确切地说是日耳曼人。他利用当时的局势，成了溃军的首领。他主动提出，让高卢的城市重新获得自由，并建立一个高卢王国。高卢王国甚至在欣喜若狂的气氛中宣告成立，境内一度已不再存在任何罗马军队。

后来接连发生两起事件，使人们恢复了清醒的头脑。一方面，高卢人对以往的日耳曼入侵者尚存戒心，这种不信任自然有其道理：基维利斯大概正准备对高卢开战，他不是正有计划地在拆毁罗马防线工事吗？另一方面，消息传来，罗马的内战即将结束，“通情达理的皇帝”韦伯芎已获得胜利，并且重建强有力的政权。他已下令意大利、西班牙和不列颠的全部军队就近向高卢方向运动。在一

片惊慌失措之中，兰斯城邀集高卢的所有城市派出代表在该城聚会。会上主和派占了上风，并以整个高卢的名义向特雷维尔人发出通告，吁请他们放弃战斗。特雷维尔人拒绝了这一请求，但很快就被帕蒂里乌斯·塞尔亚里斯率领的一支强大的罗马军队所击溃。以后就只剩下基维利斯了。然而，这不过是罗马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战争而已。节节败退的基维利斯最后只得选择退回莱茵河的彼岸¹³³。

这一流血事件是高卢反抗罗马征服的最后一次重大行动。自公元前52年到公元70年，长达百年之久的罗马统治终于使高卢接受了罗马的同化。

随着时间一年又一年地过去，岁月之功可谓水滴石穿：不应忘记，从阿莱西亚一战失败（公元前52年）到476年西罗马帝国的覆灭（只是名义上不再存在），前后至少经历了五个世纪。我们可以设想，从法国制服阿尔及尔摄政府（1516年建立）到1962年放弃占领，阿尔及利亚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昔日的历史不像今天这样过往匆匆。江河的水流在源头奔腾澎湃，到了下游则缓缓而行；与此相反，历史却是首先缓慢流逝，越是接近我们的时代，越是加快前进速度。经验的积累，加上客观条件的帮助，造就了罗马化的高卢。究竟是福是祸，就由各人去评判好了。

无论如何，我不能同意米希莱的说法：“高卢神话般地像大西岛一样消失了”¹³⁴。因为，在阿莱西亚一战失败以后，高卢并没有真正伤筋动骨。在皮埃尔·朗斯¹³⁵看来，高卢仍是一股暗流，而且一直是法兰西历史的地下活水。无论人们愿意与否，正如拉丁遗产一样，我们的凯尔特遗产是不容否定的：我们始终保留着这种二元性。然而，从文化的角度看，应该说在高卢这块土地上，凯尔特世界丧失了两大阵地。在语言方面，某些乡村即使曾长期使用凯尔特语，有时一直用到12世纪¹³⁶，但它在法语中毕竟只留下点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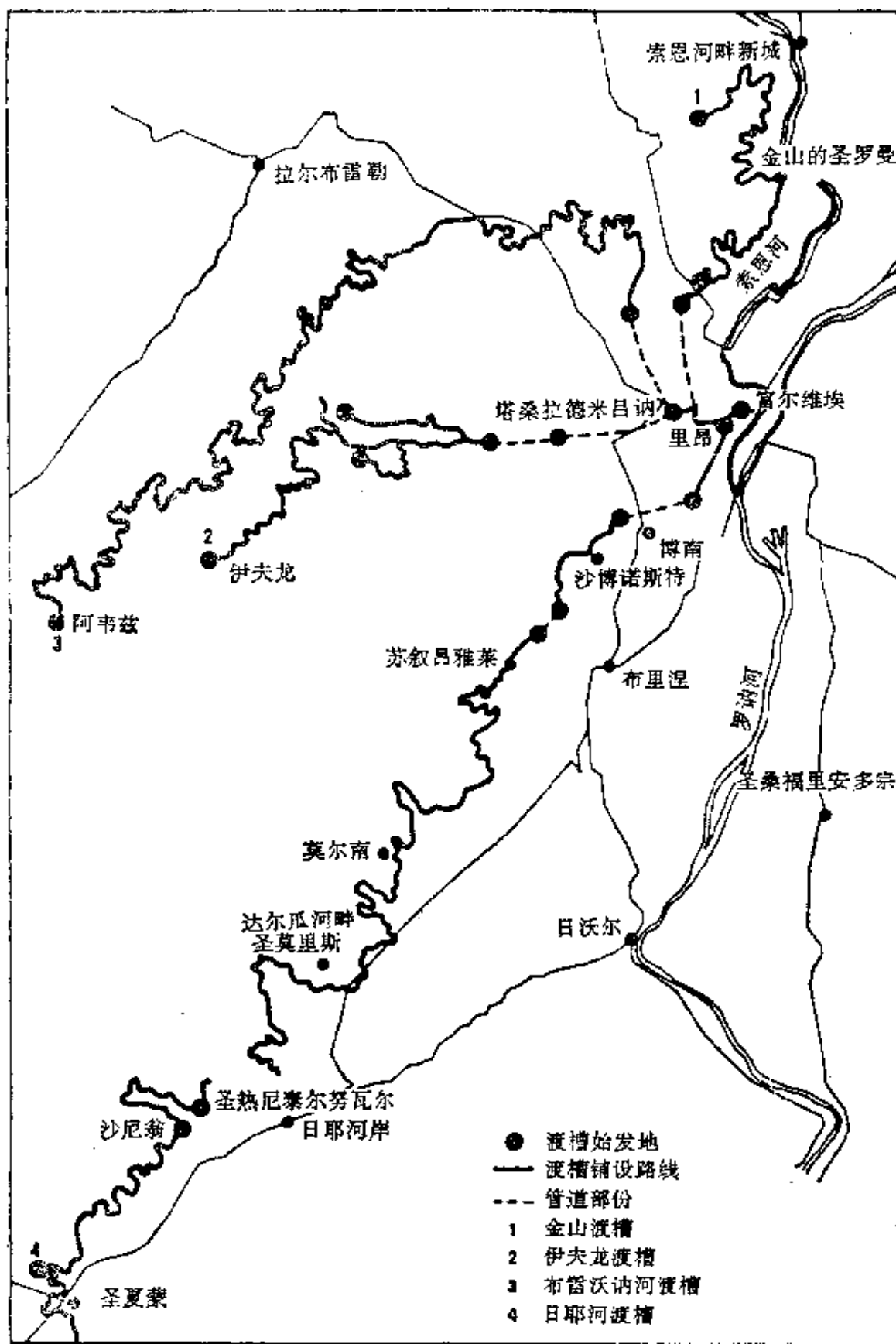
痕迹(布列塔尼语是六世纪或稍早时从不列颠诸岛再度引进的);在宗教方面,尽管德鲁伊特教仍长期活跃,并与罗马的多神论相安无事,但在基督教及其唯一的上帝面前,最终还是败下阵来。从此以后,这种宗教只在民间信仰和神话中作为旁门左道残存下来。那么,人们能否说高卢遭了“文化灭绝”之灾呢¹³⁷?

康茂德统治年间罗马化高卢达到鼎盛

在恺撒征服高卢后两个世纪,即在马可·奥勒略皇帝的不肖之子康茂德(161—192年)统治时期,罗马化高卢达到了鼎盛。高卢的命运与罗马帝国本身的兴衰相联系:一兴俱兴,一衰俱衰。事实上,高卢已被纳入到一个堪称经济世界的范围之内,这个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地区集团随着同一种节奏搏动。其经济活动,往东朝波斯、印度、印度洋方向延伸。在欧洲北部,面对波罗的海和北海,以布洛涅为基地的罗马舰队监视这块空旷的海域;向南它受到了辽阔的撒哈拉大沙漠的阻隔,但仍取道今天的摩洛哥,获得苏丹生产的金沙。总之,正是这个庞大的经济整体的波涛起伏、脉搏跳动和风云变幻决定着高卢的全部生活。

当马可·奥勒略皇帝去世时(161年),罗马帝国仍然繁荣昌盛,高卢安享“罗马的太平盛世”直至二世纪中叶。道路、城市、贸易的蓬勃发展使高卢的面貌焕然一新。高卢的人口又重新增长:征服酿成的生命损失,大规模的杀戮以及大批人沦落为奴隶一度使高卢居民锐减,如今人口缺额已补足有余。对于征服者的残暴,无论作何估计都不为过:整个整个的部族——如生活在莱茵河和埃斯科河之间的阿杜阿图克族和埃布隆族——不是被灭绝,就是被套上镣铐出售¹³⁸,恺撒几乎使“整个意大利的奴隶集市货满为患”¹³⁹。

费迪南·洛特¹⁴⁰估计,在恺撒入侵前,高卢人口可达2000万,



里昂的罗马引水渡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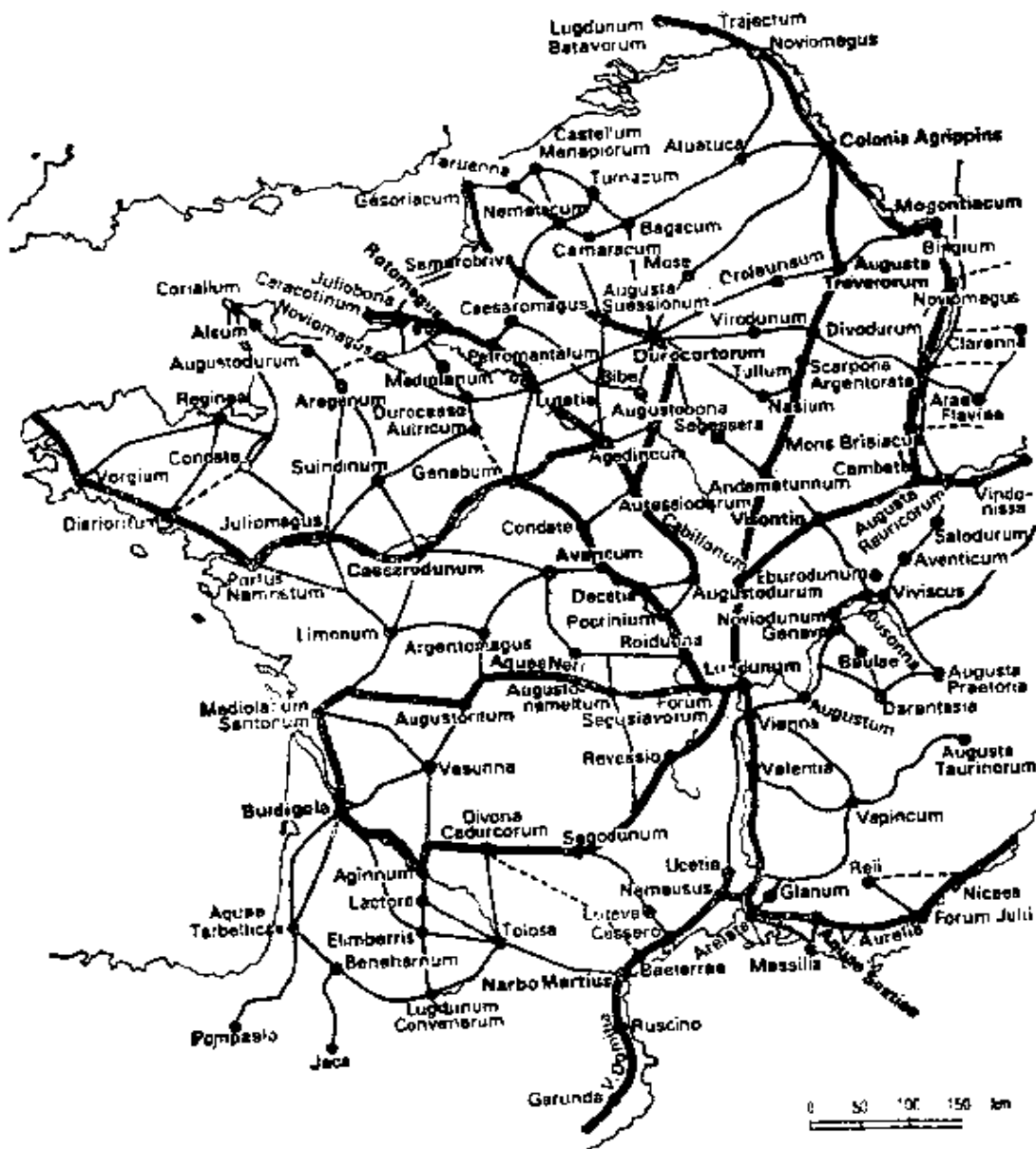
向里昂供水的四条渡槽足以说明罗马化高卢的居民点规模庞大。由于蛮族入侵无可挽回地毁坏了这一引水系统，里昂后来不得不部分放弃旧城。

这未免有点夸大。但是，卡尔·尤利乌斯·贝洛赫¹⁴¹走到另一极端，据他的计算，公元14年高卢的人口不超过490万（其中，纳博讷的居民为150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5人，高卢其他地区的居民为340万，人口密度为6.3人）。据贝洛赫的估测，当时的罗马帝国面积为334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达5400万，即每平方公里的密度为16人。而在帝国的范围内，他给繁荣的高卢计算的人口密度却是如此之低，这在我看来是难以说得通的。即使按照他提出的罗马帝国人口密度的平均数计算，面积为63.8万平方公里的高卢，人口也应达到1000万左右。卡芬雅克估计高卢当时至少有800万至900万居民，新近建立的人口历史学认为这个数据“相当可靠”¹⁴²。我们就以这个数据为准，但再过150年后，在马可·奥勒略和康茂德统治时期，即高卢达到繁荣的顶峰时，那里的人口又是多少呢？

卡尔·尤利乌斯·贝洛赫这一次却毫不犹豫地提出了一个高得多的数字。他说，罗马帝国于三世纪初人口空前增多，自恺撒去世后，居民人数增加了一倍。据他的估算，高卢人口从公元14年的500万（这一数字后来经他更正，可能达到600万或700万）一跃而上升到至少1000万，或者1200万，甚至1400万，人口密度也达到每平方公里20来人¹⁴³。我认为他的这些估算要比罗素的估算真实可信得多。我们且接受1000万居民作为最低数字。不妨估计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10%，而不是罗贝尔·福西埃¹⁴⁴提出的20%（每5人中有4人住在乡下）。高卢当时大约有100万人生活在城市，假定城市就在1000个左右，每个城市大概平均有1000居民。

诸位不要为上述数字表面上似乎很小而气愤：它很可能还嫌太高了一点。有人对15世纪相当富裕的德国¹⁴⁵作过一次类似的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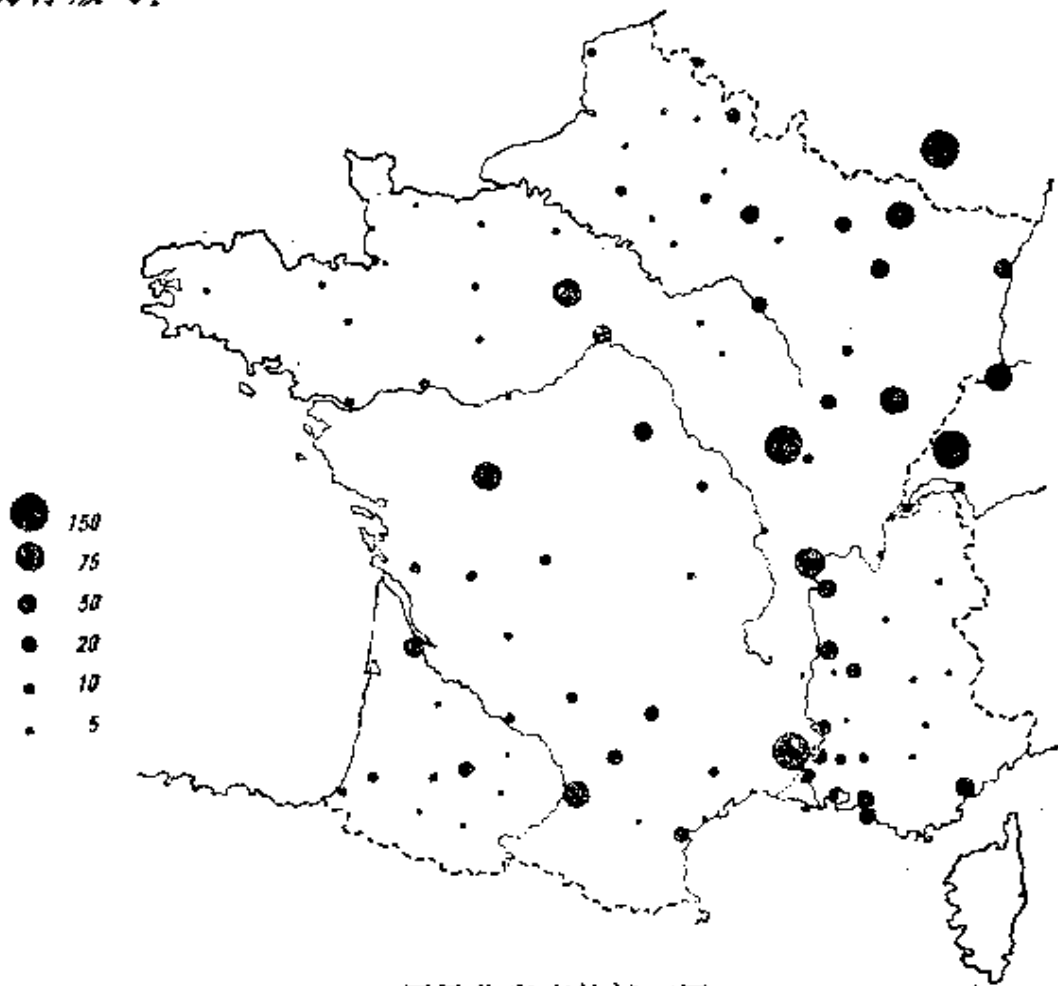
计，结果表明城市的平均人口居然仅 500 人！因为除了面积约占 200 至 300 公顷的城市外，罗马化高卢还有一大批房屋都以秸秆盖顶的小集镇，镇上的中心广场只是附近农民前来出售城里人所需的各类食品的集贸市场。集镇虽小，却也起城市的作用。我们不要忘记，八世纪时，第戎城内还有为数众多的茅草房¹⁴⁶。费迪南·洛特说，在罗马统治时期的高卢，“尼姆、图卢兹、奥坦、特雷沃



罗马化高卢的公路网

密布整个高卢国土的公路网可为罗马化期间的人口增长和生产发展充当见证。

等占地最大的城市，其居民从未达到过 5 万人”¹⁴⁷。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这已不是一个小数字。高卢繁华的都城里昂可能达到 8 万至 10 万人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罗马化高卢的所有这些城市都各有其蔚为壮观的剧场、凯旋门、温泉浴池和竞技场。里昂的引水系统堪称奇观！维埃纳城的供水系统也是一绝！乍一看，这些为城市供水的渡槽建筑简直让人难以相信竟是真实的存在。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不过是城市的装饰物，“是影剧中的蒙太奇”¹⁴⁸。未来将把它们脆弱暴露出来，但未来不也往往是对过去的背叛吗？



罗马化高卢的城市网

本图是对公路网分布图的矫正。城市的分布可使人们对帝国的战略要道一目了然：罗纳河、索恩河的水道通向莱茵河边界，穿越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的陆路则通向西班牙和加龙河谷。

总而言之，高卢的城市化及其形式正是罗马化的鲜明表现。各个地区罗马化的程度不尽相同，由此展示的历史差异又为原有的多样性增添了新的特征。罗马对控制罗讷河和索恩河的水道特别重视，由此往北经由默兹河或摩泽尔河可达罗马帝国始终倍加关切的莱茵河边界。每当形势有所恶化，特雷沃将取代里昂，成为高卢真正的都城。罗马同样格外重视纳博讷，因为图密西亚大道和奥雷利亚大道经由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通往西班牙。比高卢其他地区早70年被征服的纳博讷人口众多，对罗马文化也更加开放，因而当阴暗的年代到来时，罗马的统治在那里仍得以保全，直到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分别于415和443年占领该省为止。

所有这一切都要列到法国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本总帐上去。在同法兰克人的斗争中，法兰西岛也长期捍卫了自己对罗马的忠诚，但在蛮族世界团团包围之中，它显得像是一块飞地。

罗马统治下的高卢面对内乱和蛮族入侵

公元二世纪末，约在170至180年前后，罗马的统治开始不稳，局势后来更进一步恶化。莱茵河边界首先出现动荡：162年，成批的日耳曼人向今比利时北部地区渗透；174年，其他武装团伙侵入阿尔萨斯。我们不要夸大这些动乱，秩序迅速、顺利地得到了恢复¹⁴⁹。确保高卢和平和安宁的边界只是到了后来，于253年才真正被法兰克人和阿拉芒人所突破。从本书第72页的地图可以看出，高卢东部的半壁江山受到了侵犯，入侵者往南深入到罗讷河下游地区和西班牙。在一片恐慌和混乱之中，高卢将领波斯图穆斯于260年被部下拥立为皇帝，这一举动并不是对罗马谋反，而是为了驱逐外敌。波斯图穆斯经过八年的奋斗，终于获得成功，并乘胜追击外莱茵的蛮族，在高卢恢复了秩序和信任。但到268年，他在

今德国的美因兹被部属所杀，因为他禁止军队进行劫掠。高卢帝国不久也随之灭亡（波斯图穆斯的最后一位继承人泰特里库斯于273年被奥勒略皇帝击败），两年后，即275年，高卢东部边界重新被打开了好几个大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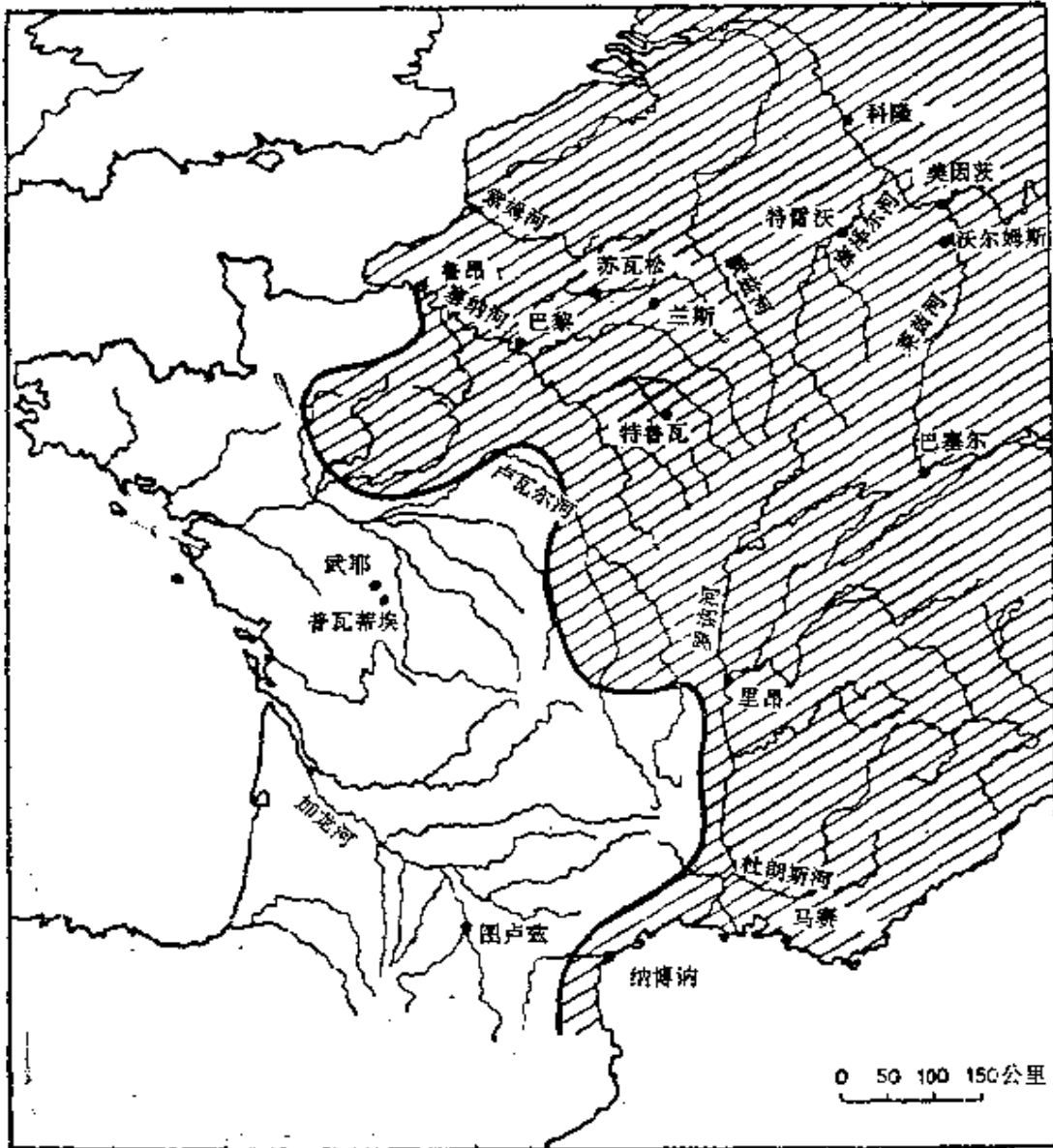
战乱这一次遍布整个高卢，全国被淹没在血和火之中。事实表明，秩序再也不能像几年前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得以恢复。就在那时，城市纷纷据险固守，迫不及待地建筑防御工事。顺便指出，当时距人们常说的蛮族入侵还有一个世纪。确实，只是到406年12月31日，才发生了拉达盖斯的大举入侵，蜂涌而来的各部落越过冰封的莱茵河，狂涛般地席卷整个高卢。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这股浪潮带来的破坏可能还不如275年的突破边界那样严重¹⁵⁰。

我们且记住这些年代：253年、275年、406年。它们证明高卢的衰落发生在五世纪大规模入侵之前。高卢衰亡的过程，或者说罗马帝国衰亡的过程，就像是久病不死的病人。史学界长期以来对以下的问题争论不休：罗马帝国是由自身的原因死亡的吗？它就是自己的掘墓人吗？或者如安德烈·皮加尼奥尔¹⁵¹所说，它是在蛮族的攻击下被颠覆、被“扼杀”的吗？我们必须结束这场论争，至少也要回答这些问题。这是因为我对这些问题持有相当特殊的观点。但是，在这些领域，谁又敢说确有把握呢？

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

正同罗马帝国一样，高卢也受到了来自内部的打击。它同时经历了一场政治危机和一场社会危机，前者使国家的权威、帝国的权威蒙受威胁，后者使等级制的基础岌岌可危。尤其，经济生活也显著恶化。尽管经济危机的原因并不明朗，但事实却是有目共睹的：人口锐减本身就是许多经济活动急转直下的证据。

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和必然后果乃是农民大众（他们占高卢



三世纪时的入侵

人口的最大部分)中日益蔓延的骚动:“扎克雷”式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几乎不能平息,因而历史学家很难确定其发生地点。就在耕地的附近,一望无际的森林、沼泽地、山岳和荒原覆盖着辽阔的空间,那是各种不逞之徒的藏身之地。“野地”(tractus)和“荒野”(saltus)¹⁵²等用语都确指这些“蛮荒”世界,构成了在城市和乡村之外的第三种类型的空间¹⁵³。高卢到处可见的大片森林是城市乃至“文明”乡村的“清平世界”的反衬。森林里阴森恐怖,夜晚穿过密

林会使人毛骨悚然。据说，按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规定¹⁵⁴，凡深夜在森林中行走者必须吹号示警，否则一被抓获，即可被当作罪犯处置。实际上，只有法外之徒以及亡命出逃的罪犯才去森林中躲避，就像美洲殖民地的奴隶逃离种植园，来到人迹罕至的森林中寻找安全的栖身地一样。

高卢的农民，无论是隶农或小自耕农（后者又称自由民，但仍保持极大的依附性），他们的处境不断恶化。由于劳动力日渐稀少，权势显赫的大地主力图强制农民留在他们的大庄园，为他们耕种土地。今天，根据考古发掘，尤其是通过航空遥测，人们了解到，大庄园的数量比历史学家以往所认为的要多得多。例如，在索姆河盆地，人们长期以为那里的耕地集中在城市中心的附近，农村几乎是一片空白。然而，罗热·阿加什利用航空遥测技术进行观察，却发现除零星小村落外，“大庄园星罗棋布”（已准确地测定了680处庄园遗址）¹⁵⁵。航空遥测工作目前正在布列塔尼地区进行。

在罗马统治下的高卢，大庄园大概占有耕地面积的绝大部分。每个庄园通常经营1 000公顷左右的耕地、草场和林地（有时更多），此外还有大片房屋。以蒙莫兰（上加龙省）的一个高卢—罗马大庄园¹⁵⁶为例，它拥有1 500公顷土地和18所房屋；在瓦尔福兹·阿邦库尔（索姆省）的庄园，房屋的长度达330米¹⁵⁷；地处贝济埃附近的加奈庄园，房舍建筑较小，长度和宽度分别为100米和62米¹⁵⁸；离波尔多不远的一座庄园筑有防御设施，大体上已初具城堡的规模；该庄园当时名叫布古斯·勒翁蒂，今天已成为一个小镇，名叫吉伦特河畔布尔。目前在瓦兹河畔克雷伊附近正进行考古发掘，人们已发现了一些新庄园，包括厚实的墙壁，成堆的碎瓦片以及用于引水和排水的铅管碎片。据说还找到原始的窗玻璃或至少是被插入铅制框架中的玻璃碎片¹⁵⁹。

大庄园至少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是主人居住的正房，室内的

起居设备应有尽有，建筑呈罗马式风格！屋外廊院围绕，屋内可取暖和洗澡……西多瓦纳·阿波里奈尔（430年—487年）465年6月在奥弗涅地区离克莱蒙20公里处的阿维塔居斯庄园（现已证实即今天的艾达特村）避暑，他向住在酷热的城市里的一位朋友夸耀自己生活的闲适，庄园的浴室可与公共浴场“相媲美”¹⁶⁰。那里确实是人间的乐园。但在主人居住的正房旁边，另有一些“简陋建筑”，或与生产有关（地窖、谷仓），或供奴隶居住：开饭的大厨房和睡觉的卧室。此外，还有关押罪犯的禁闭室和管家及其妻子的住所。管家指挥奴隶干活，负责生产和经营。庄园四周通常建有围墙，庄园中可能还有一处祭祀场所，不过对此人们尚存疑问。

庄园的布局一般采用罗马农学家瓦罗和科卢梅拉的方案：选址时注意房屋的间隔，保证主人的住房总是朝东和朝南。在罗马帝国的其他地方，这样的布局不是也屡见不鲜吗？许多这类庄园后来自行解体，并被村庄所取代，而“庄园”一词随后也改变了含义¹⁶¹。可以肯定的是，“圣本笃时期建立的隐修院都采用这种庄园的建筑形式”¹⁶²。

但是，我们更感兴趣的不是庄园的围墙，不是架屋的木梁，而是在其中生活的人。在罗马统治下的高卢，庄园人口的极度集中，使它像是“一座真正的乡村工厂……比19世纪英国或法国……的城市工厂……更加拥挤”¹⁶³。这是一台奴役人、压榨人的机器。将近451年时，一位对穷人的命运抱有怜悯心的僧侣这样写道：“当小自耕农因遭抢劫而失去房屋和土地时，或被税吏扫地出门时，他们便到富人的领地躲避，成为外乡移民……他们在富人的土地上安顿下来，只是饮鸩止渴，结果沦为富人的奴隶”¹⁶⁴。甚至乞丐、流浪者、坏分子和逃兵也被强行招募，“终生束缚在土地上，成为主人奴役的对象”¹⁶⁵。因此，我们不应轻信小自耕农或外乡移民这些好听的名词而上当受骗。罗马帝国对待奴隶和外乡移民几乎很

少有什么区别：正如人们后来所说，外乡移民不过是农奴而已。

愈到后来，痛苦愈难忍受¹⁶⁶，迅速遍及各地的奴隶制“似乎在地中海各部落中比在克尔特人中更加盛行”¹⁶⁷。花样翻新只是使压迫变得更加沉重。由于生产效率较高，大庄园自动扩大规模，甚至在无意中就兼并了邻近小自耕农的土地……奴隶制就这样不断发展：奴隶可能约占当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为维护奴隶制的存在而必需的人员补充由无数次劫掠所得的俘虏提供保证，甚至在罗马统治高卢结束后，情况将依然如此。例如，在达戈贝尔特一世统治期间（629年—639年），王国军队在对阿基坦的征伐中带回了大批俘虏，他们“像狗一样”被成双结对地捆在一起¹⁶⁸。但是，各地奴隶的寿命通常都很短：以美洲为例，在17、18世纪的种植园里，奴隶干活的年限平均只有7年。

为了保持充足的劳力，防止奴隶逃跑，需要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也就是说，要有能够经常不断进行镇压的工具。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过渡（即建立一个依靠富有阶级的强权政治）难道不正是奴隶起义的结果吗？然而，到了康茂德皇帝统治时期，罗马在高卢的统治日渐削弱，骚动、暴乱和农民起义接连发生。相反地，在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的统治下（284—305年），罗马帝国又恢复了权威，奴隶制一度卷土重来，但也历时未久，农民骚乱迅速又重新高涨。

已知最早的一次骚乱出现在186—188年左右，揭竿而起的农民在马特尔努斯¹⁶⁹的率领下，袭击和抢掠村庄及大小庄园。初期的胜利曾使起义队伍有所壮大；但是，在当局出兵镇压后，他们终因力量悬殊而土崩瓦解：历代农民起义都抵挡不住训练有素的军队。虽然连遭失败，起义农民仍坚持地下斗争。马克西米安扫平了从阿尔卑斯山到莱茵河的农民暴动，但游击活动仍持续不断。

三世纪时，由于税收过重、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农民到处蠢

蠢欲动，以至当时出现了一个新词，即所谓“巴戈德”运动（该词可能源自凯尔特语“baga”，意为战斗）¹⁷⁰。440年前后，萨尔维安¹⁷¹在为巴戈德运动辩护时写道：“我现在就来谈一谈巴戈德，他们被嗜血成性的坏人剥夺了财产，蒙受打击，惨遭杀戮，甚至丧失了使用罗马人姓氏的荣誉。我们把不幸归咎于他们，我们把巴戈德这个恶名强加给他们，我们应对此承担责任。我们把他们当作是不可救药的罪犯。然而，如果不是我们的法官贪赃枉法，判处他们流放，剥夺他们的财产，这些巴戈德又从何产生？”¹⁷²

最严重的事可能是起义农民配合蛮族入侵，与外敌勾结，乘机混水摸鱼，使混乱局面变得益发不可收拾。战乱和劫掠不但来自外部的蛮族，而且也来自土生土长的蛮族。无论他们是军队的逃兵，或是大地主的奴隶，他们终究都成为苦难深重的高卢农民的伙伴。

漂泊不定的起义农民往往进行长距离的转移。起义活动在西部高卢更为活跃，那里有无数的森林作为庇护所，同时罗马当局的统治在那里历来比较薄弱，早已陷于萎顿的状态。五世纪时的一部名为《牢骚满腹》的戏剧——其作者不详——值得人们回味。一位剧中人要求勒·拉尔“赐予他力量，使他能够制人而不受制于人”，勒·拉尔回答说：“你到卢瓦尔河畔去生活吧”¹⁷³。他解释说，在那个地区，“人们只受自然法则的支配”，“可以为所欲为”。不妨打赌，《牢骚满腹》的剧作者所影射的正是“巴戈德”运动。

在最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中，皮埃尔·杜凯斯¹⁷⁴成了起义者的辩护士。他在颂扬他们所起的作用时，大胆地写道：“被屠杀的巴戈德虽败犹胜”。他们坚忍不拔的斗争摇撼了奴隶制，促使它朝较不残酷的农奴制转化——这对劳动者肯定更有好处，因为不同于奴隶的农奴拥有自己的房舍、家室和一块田地，并且社会束缚也从他的双肩转嫁给了土地。农奴比奴隶享有更多的自由，生产效率

自然也随之提高。不过，这种变化远远没有随着罗马统治高卢的结束而完成，至少要等到加洛林王朝时期，甚至还要靠后！经济、政治、社会等许多因素将影响这一进程，这不是皮埃尔·杜凯斯用马克思主义的简单逻辑所能完全解释得了的。因此，我认为，城市的急剧衰落使农村得以获得某种自由。在加洛林王朝时期，自由农民可能为数甚众，尽管此后这种小土地所有制将“日趋衰落”¹⁷⁵。

对于“巴戈德”农民起义，我这里并不想作全面的考察，我只想说明，高卢在农村的统治在骚乱的影响下，已削弱到了什么程度。显然，蛮族入侵所动摇和摧毁的并不是一个健康的躯体。

有人或许会问：是否正由于三世纪时的这些困难和不幸，基督教才作为一种希望的寄托，在高卢逐渐广为传播？回答大概是否定的。最早的基督教团体大约于170年已在马赛、里昂、奥坦等几个城市中出现。但是，即使在177年发生里昂殉教事件时，它们还只是人数不多的小团体，大部分信徒不是希腊人就是讲希腊语的东方人。只是到四世纪末时，即确立宗教信仰绝对自由的米兰敕令(313年)颁布后很久，基督教才开始在高卢显示影响，而高卢民众自愿投入它的怀抱，尚需等待更长的时间。

不可忘记蛮族入侵

历史学家以往总是把罗马帝国和高卢的解体完全记在蛮族的帐上。传统的解释竞相抬高蛮族的丰功伟绩：从拉达盖兹(406年)的大举入侵直到西哥特人(412年)和勃艮第人(443年)在高卢站稳脚跟。罗马人及其“蛮族”同盟者在卡塔洛尼平原的决战(451年)中大获全胜，标志着蛮族入侵的告终。在这一战役中，他们打败了匈奴王阿提拉以及来自中亚的匈奴骑兵；匈奴人在这以前曾将中欧和日耳曼地区的部落逐向欧洲西部。一个明显的、致命的危险排除了。蛮族的轮番入侵难道不是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事吗？作

为历史学家，难道我们今天有理由轻视蛮族入侵的作用吗？回答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

低估蛮族入侵的作用，第一个根据便是入侵者人数甚寡。早在1900年，汉斯·德尔布吕克¹⁷⁶已在他撰写的一部经典性著作中揭示了这一事实。

当时的法兰克人可能仅8万之众，勃艮第人10万，汪达尔人为2万（他们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时大约有8万人），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蛮族。面对人口高达数百万的当地居民，他们必定受寡不敌众这一规律的制约。亨利·皮雷纳¹⁷⁷曾喜欢说，蛮族虽然使罗马帝国疮痍满目，但他们终究被淹没在当地居民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转而使用拉丁语和罗曼语，失去了自己的宗教，转而信奉基督教。

吕西安·罗米耶¹⁷⁸说他们是些“狼吞虎咽、高声喧嚣和臭气熏天的歹徒”。然而，又有谁不用这些尖刻的话语诋毁他们呢？一位久享盛名的历史学家认为，法兰克人是“罪恶的渊藪，堕落、叛逆和残暴的温床”¹⁷⁹，似乎罗马帝国后期的历史却是充满着美德、宽厚和公正！在人们原来的心目中，蛮族是朝着西方冲杀而来的凶猛的武士；如今却摇身一变，变成了另一种形象：“正当他们进逼帝国的城下，竟发现城池不攻自破，他们在惊诧之余，便踮着脚尖走进城里”¹⁸⁰。因为，对日耳曼人来说，罗马帝国的城墙不就是魔鬼之墙吗？弗朗索瓦·基佐是实行这个转变的先驱，他指出蛮族的首领“坚持要接受罗马的衣钵，正如土著爱穿欧式军服一样”¹⁸¹。

这一切难道是完全合理的吗？难道这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吗？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罗贝尔·福西埃¹⁸²恐怕是第一位持论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家，分别对进入高卢的部落和对高卢当地的居民作出公正的介绍。我们下面就来看他所提出的论据。

首先是关于入侵者的人数。人们正确地指出，向西进军的部落人数不多。但是，在高卢各地，除了武装入侵以外，还有“蛮族”血液的不断注入。有人甚至说，移民的总数高达100万人。如按人们所说——我对此并不相信——当时罗马统治下的高卢的人口约为2 000万至3 000万，相比之下，100万这个数字仍然无足轻重。但如果认为高卢人口仅为1 000万，混居的居民比例自然就会有所不同。不过，皮埃尔·杜福尔奈¹⁸³坚持认为，在萨瓦地区，入侵的勃艮第人少得可怜，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他甚至断言，当地的高卢居民所能见到的勃艮第人，大概不比二次大战期间法国农民所能见到德国人更多。同样，在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入侵的程度也无法同里昂以北、中央高原以西或巴黎盆地相比¹⁸⁴。

但是，即使蛮族只占少数这个事实得到确认，少数却往往是社会的酵母。它们改变着社会的面貌。尤其，莱茵河彼岸的蛮族居民很早就开始进行渗透。渗透的方式成千上万，沿着罗马的进军路线迤邐前进，渗透过程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莱茵河不但是防御的屏障，也是一个过滤器，是招募士兵和劳动力的可靠途径。蛮族或作为奴隶在大地主的土地上安身，或作为士兵凭着一张所谓“投宿证”与当地居民长期生活在一起，并进而完全被同化；不论属于哪种情况，他们“一小群一小群地淹没在高卢农民大众之中”，“为中世纪前期‘亦农亦战’社会的诞生助了一臂之力”，没有“军事成份长期、缓慢地渗入”到社会的最低层¹⁸⁵，这一社会的诞生就很难得到解释。他们将在各地改变农业的面貌，因为在庄园被破坏、被焚烧以后，村庄或分散的小村落便随之问世，再现日耳曼先民的居住布局。畜牧业也得到了发展，在许多方面改变了农村经济活动的面貌。最后，这些日耳曼入侵者不再像在塔西陀时代那样与罗马人征战不息。在罗马物质文明的影响下，自动实现了真正的进步。人们不止一次发现有日耳曼人在罗马军队中当兵，在罗马军

团或辅助部队中担任军官，并取得与罗马公民同等的地位。简而言之，这些农民或贵族大体在相同的水平上逐渐实现了种族融合，但是这次融合不是通过入侵和劫掠，而是平安无事地完成的。

奥古斯丁·梯叶里的理论不能照搬，今天任何一位史学家也不会接受他的理论：“旧制度”贵族的祖先是法兰克人，农奴和雇农的祖先是高卢人。依我之见，倒是法兰克贵族加入了当地高卢贵族的行列（其基础要比前者深厚得多），而高卢贵族之所以能够保持其地位，不仅因为他们与法兰克人“通力合作”，而且因为他们教会上层找到了保护伞。在我看来，关键在于法兰克贵族巩固并确认了一种社会等级制，这种等级制将随外界的影响而变化，并照例经受随之发生的各种挫折，但其延续时间却与“旧制度”存在的时间不相上下，甚至更长。

尽管如此，高卢的居民因蛮族入侵而备受蹂躏：奸淫烧杀，掳掠无度，部队的频繁过往以及长期驻扎，还有入侵者的敲诈勒索。高卢肯定出现了人口锐减和经济崩溃的现象，虽然人们对其严重程度无法估测。一位历史学家指出¹⁸⁶：“我们敢说入侵使居民人口减少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就某些地区而言，特别是在北部和东部，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由于饥馑蔓延、疾病肆虐，一半以上的人死于非命”，与此同时，“乞丐大军遍布全国”。

城市蒙受的灾难尤其深重，很早就据险自守。市内修建的防御工事供居民在其中避难。一些宏伟建筑被拆毁，石块被临时用于建造更高的护墙。但是，面对蛮族的突然袭击或持久围困，城市仍不免陷落：反叛、恐惧、饥荒、缺少饮用水均可使城市不战而降。罗马皇帝尤里安（361至363年）在巡视高卢期间喜欢在巴黎的前身吕岱斯城逗留，他在给雅典人的信中写道：“城墙已遭破坏的高卢城市约有45座之多”¹⁸⁷。

大概也有一些地区免遭劫难：南方“从来就不像里昂以北或中

央高原以西地区那样多灾多难”¹⁸⁸。根据拉丁诗人奥索尼乌斯的见证，在四世纪的图卢兹，“没有出现突发事件，生活还过得下去……如同前几个世纪一样”¹⁸⁹。但是，总的说来，城市有所衰退：城里的空地种上了作物和蔬菜。城市重又变成了只有狭窄街道的小镇，街道两旁是低矮的茅屋。大地主纷纷离开城市，返回自己的庄园，以便据守庄园，就近掌管实在的产业，摆脱城里不堪忍受的赋税。亚历山大·鲁斯托夫¹⁹⁰写道，自从丧失了昔日繁荣的集市以后，城市勒紧裤带，节衣缩食，依靠近郊的田地养活市民。在供水管道被切断的里昂城，居民纷纷迁离老城，出外求生。乡村的人口同样在减少。庄园最后也纷纷破落，在这一方面，考古发掘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证据。荒地的面积不断扩大。然而，不论灾难的打击有多大，不论人们对此作何评论，上古社会的结束“并未带来城市的覆灭”¹⁹¹，用圣·安托万夸张的话来说，城市并没有因此“一命呜呼”。蛮族的王公将选择一些城市建立宫殿，这些城市仍将保持经济和文明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并经久不衰。人们甚至可能会感到惊讶，经济周期滑坡的持续时间之久，危害之严重，曾使罗马统治下的高卢局势不断恶化，而高卢却居然能经受住考验。难道这正如我料想的那样，是因为它具有相当高的物质水平和相当健康的肌体吗？或者，难道这是长周期并不紧紧地咬住不放？又或者，难道因为结构复杂的罗马帝国尽管江河日下，但其衰退速度却相当缓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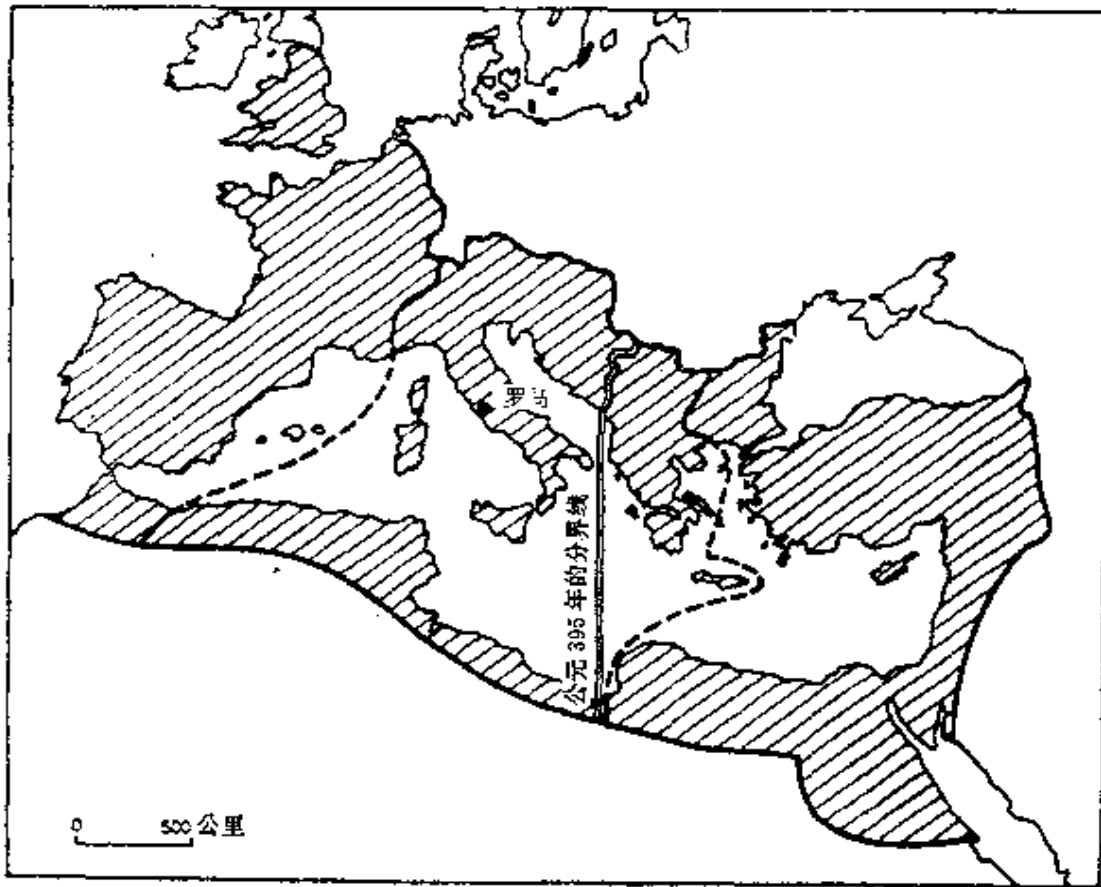
罗马经济世界

显而易见，罗马帝国的衰亡制约着、主宰着高卢的命运。但是，帝国衰亡的原因本身还很不清楚，远远谈不上一目了然。任何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要想直截了当地来回答这个问题都会感到为难。因此，对这个问题，谁能不采取理智而审慎的态度呢？我这里

想到了玛丽·贝纳岱特·布鲁吉耶尔所写的那部杰出的著作，其结论之详尽称得上面面俱到¹⁹²。

但是，如果真想弄清楚，那就必须从一开始就提出几个即使不尽可靠但至少是相当可能的假设。

罗马帝国的衰颓有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考察。应该承认，这种衰颓是十分缓慢的，因而要从长时段的角度进行观察；而且，衰颓的起因来自一系列程度不同的弱点。



罗马经济世界

帝国于395年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但分裂并没有破坏罗马经济世界的统一性。这个经济世界超越了帝国的疆界，其影响一直伸展到多瑙河、红海和印度洋。

第一个弱点表现在政治方面：罗马帝国的政权机构和军队软弱无力。在名义上，帝国覆灭的标志是西罗马帝国于476年的灭亡。就在那年，罗慕洛·奥古斯都被赫鲁利人的首领奥多阿克在

拉韦纳城废黜，帝国的徽记被送往君士坦丁堡。在我们看来，这不过是件普通的小事，帝位的废黜无非是把历时已久的既成事实正式记录下来，正如福斯特尔·德·库朗热所说：“罗马帝国早已寿终正寝，只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而已”¹⁹³。

罗马帝国也是一个经济现实。运输区域十分辽阔，特别是地中海，从海岸出发，四通八达，与四周的陆地保持联系。罗马帝国所控制的和影响所及的地域构成一个经济世界，占地球的相当大的一个部分。高卢也处在这个经济世界的影响范围之内，至少直到八世纪，甚至九世纪，即查理大帝时代。几乎可以说，罗马帝国在倾覆后仍长期保持其残余的影响。

关于这段历史的论争，亨利·皮雷纳的功绩在于他发现了这个经济世界的作用，摸到了它的脉搏，并且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观察这些黑暗的年代，其中包括五世纪的蛮族入侵以及七世纪、八世纪、九世纪的穆斯林入侵。亨利·皮雷纳的论断，特别是他的《穆罕默德和查理大帝》，又有谁人不知？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莫不表示钦佩。皮雷纳认为，伊斯兰的征服首先便是攫取地中海；非基督教徒吞并了这片海域以后，禁止基督教国家的船只驶入，进而把西方彻底整垮。

他的观点今天出现了争议。读者如果稍许有点耐心，将可看到我接受了什么和排斥了什么。事实上，在我以前，马克·布洛赫¹⁹⁴、艾蒂安·萨布¹⁹⁵、弗朗索瓦·路易·甘斯霍夫¹⁹⁶都已提出了批评、保留和异议。他们觉得只要能够证明，在那些充满危机的世纪里，地中海并没有完全关闭，高卢和东地中海地区的交往仍在继续，就能推翻皮雷纳的理论。他们并未明确指出，地中海各地的经济交流是否放慢了速度，以及在什么时候放慢了速度。

交往的减少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在我看来，这正是关键的所在。

的确，我们面对的乃是一种缓慢的衰退，这种持续几个世纪之久的衰退应对罗马帝国的崩溃负主要责任。我并不说蛮族对此毫无责任，只是认为应减轻他们的责任；同样还应减轻罗马帝国统治者的责任——他们大多是些平庸之辈，但也有如戴克里先、君士坦丁这样才智过人和出类拔萃的人物；减轻军事将领的责任——斯提利科（359—408年）和埃提乌斯（390—454年）以令人钦佩的非凡勇气，捍卫了高卢的领土完整。所有这些人，无论是伟人还是庸人，他们的事业预先就注定了不会完全成功。

如果把公元150年——罗马统治下的高卢达到鼎盛的基本标志——作为起点，把950年——加洛林王朝跌到低谷的基本标志——作为终点，人们就有权在150年和950之间划出一条下降直线，尽管这种划法相当粗糙，而且肯定不免牵强，但我对下降趋势竟延续八个世纪之久并不感到过分惊异，这八个世纪正是法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我并不是说，这条线准备无误地反映着高卢经济以及高卢以外的整个罗马经济世界以固定不变的节奏缓慢地下降。这个经济世界充当罗马帝国的活动基地，虽然经历了多次曲折，但也维持了很长时间。我至多说它是一条趋向线，我们这里考察的高卢经济将沿着这条趋向线上下摆动，有时逆向上升，有时顺向下降，升降运动对普遍的经济萧条起着加剧或减轻的作用。例如，在从克洛维（511年去世）至达戈贝尔特（639年去世）时期，后来在加洛林王朝的强盛时期，即自七世纪末至九世纪中叶，我以为经济环境可能曾有所改善，而在这两个间歇期之间，经济形势自然仍在恶化。以上这一切都没有充足的证据，只是一些简略的提示和说明，但似乎也能让人相信事实果真是如此。

无论如何，尽管出现过上述短暂的间歇——如果确实有间歇的话——总的趋势仍然是长期的衰退，这一过程大约延续到了950

年前后。亨利·皮雷纳的思想始终激励着我，但我没有亦步亦趋地跟着他走，我通过自己的思考与他殊途同归。

因为我不像他那样，把一切都归结为穆斯林征服。从七世纪开始，他们逐渐攫取了地中海的交通要道，特别是在占领了西西里岛之后，更扼住了海上东西向交往的咽喉（827年抵达西西里岛，831年占领巴勒莫，878年占领锡拉库萨）。接二连三的征服活动（634年征服叙利亚，636年征服埃及，650—700年征服马格里布地区，711年征服西班牙，最后轮到西西里）并未造成地中海对基督教国家的船只完全关闭的局面。很久以后，伊本·哈利顿（1332—1406年）才说，在那些遥远的年代，基督徒甚至不能在地中海飘送一块木板。可是，为歌颂伊斯兰的光荣历史而在事后散布的这类溢美之词，听来更像是自我吹嘘。试想，如果穆斯林不在基督教国家进行开发，他们征服海洋又有什么用处？事实上，他们需要基督教国家的合作。

埃利亚·艾什托尔¹⁹⁷根据新发现的阿拉伯语文献进行的考证为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穆斯林控制的地中海当时并不是那么充满生气；对沿岸的国家来说，它是空空荡荡、死气沉沉的一片海域。因此，不存在地中海被突如其来的神仙封闭的问题，而是当时的经济形势趋向全面恶化。只是到了九世纪或十世纪时，经济长周期才出现逆转，地中海沿岸各国的经济才普遍复苏，拉丁语地区、希腊语地区、穆斯林地区都是如此。约在970—985年期间，穆斯林地区的黄金源源不断地往巴塞罗那输送¹⁹⁸。显然，并不是这些黄金改变了经济气氛，它只是经济长周期出现转折的信号：经济从此将持续上升，并且将促进地中海和整个欧洲经济生活的蓬勃发展。

这种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经济周期，即使恰如我们所希望的，能够说明罗马帝国的衰亡过程¹⁹⁹，但经济形势本身还有待我们作

出解释。这一使命理应由世界通史来承担，而要写成一部世界通史(如果真能写成的话)，那就必须等到人们拥有像世界地理一样翔实可靠的资料以后方才可能。麻烦在于，人文科学同精确科学一样，某项解释一旦成立——我们的解释还不是这种情况——便要求对解释本身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如此反复无穷。说中世纪的衰退是以罗马帝国物质财富为背景的经济世界的缓慢滑坡，也就势必承认，罗马帝国在政治崩溃后，仍将作为一个经济世界，作为一种经济现实而长期存在。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不但罗马的经济框架维持不变，更加令人惊讶的是，罗马社会的等级制和奴隶制也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几个世纪之久。对于流传至今的拉丁文化，我们又该作何解释？欧洲，欧洲中心的法国，不是仍然没有摆脱罗马遗产的影响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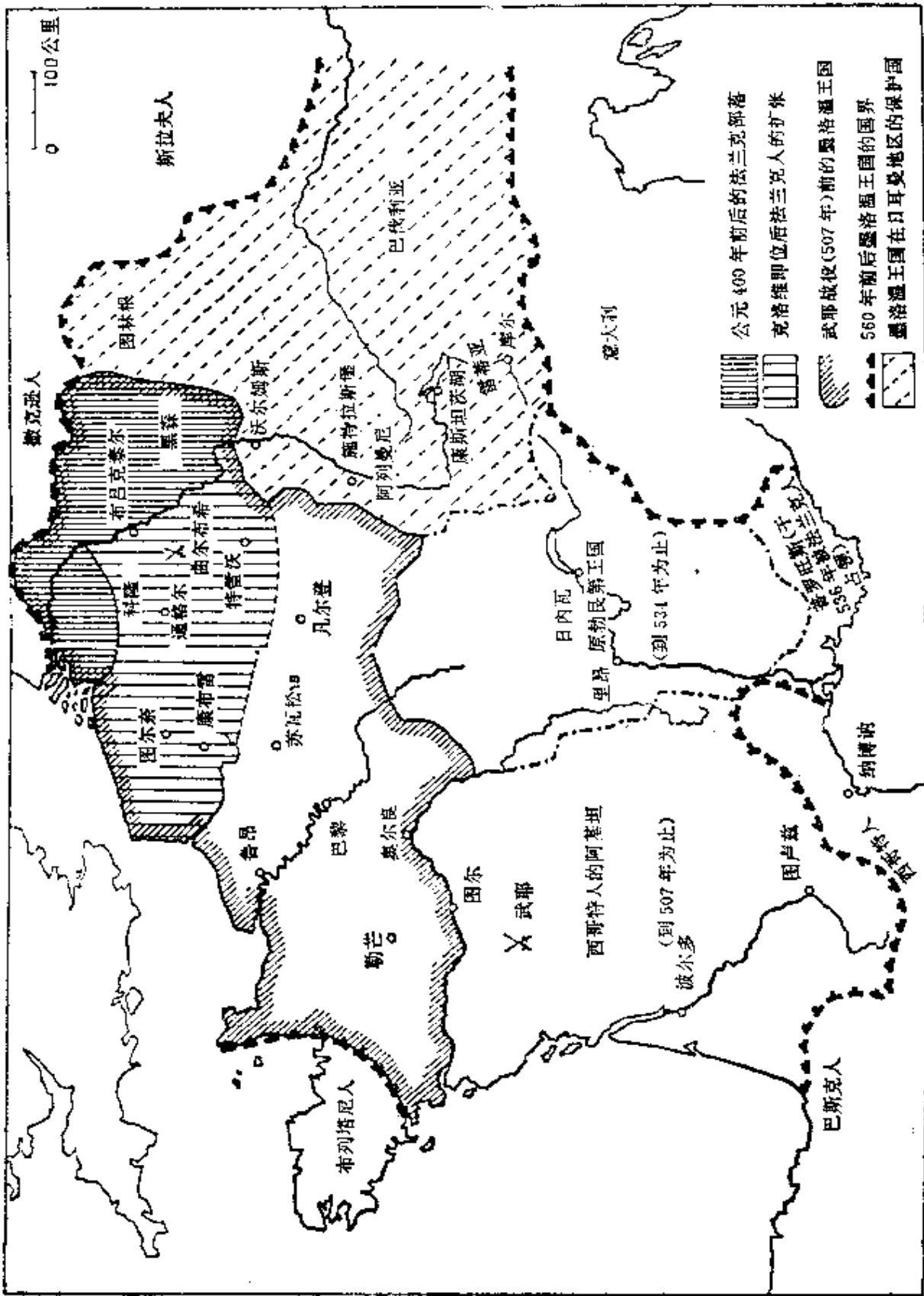
作为本节的结论，我为提出一种崭新的解释跃跃欲试，甘愿冒点风险。这种解释之所以使我神往，因为不论它是否真有道理或有多少道理，我们可把所有的问题汇总在一起重新提出。农学家兼历史学家弗朗索瓦·西哥把罗马的繁荣兴旺归因于使大庄园和奴隶劳动得以普及的外族征服。根据他的观点，奴隶制是一部动力逐渐增大的、长期持续运转的发动机，是能量的一次爆发。随着征服活动的减弱，奴隶制也势必陷入一场极其漫长的危机。如果这把钥匙能派用场，涉及罗马经济的所有问题也就可能变得简单起来：奴隶制社会虽然长期生气勃勃，但随着罗马帝国的衰颓，终于土崩瓦解；在这个社会里，交换、贸易、银行、商人怎么可能各得其所？新的发动机难道不正是农奴制吗？这一切留待以后再作讨论。

墨洛温王朝时期的高卢

继克洛维的军事胜利(486年在苏瓦松击败罗马在高卢的末代

统治者西亚格利乌斯，496年在托尔比亚克战胜阿拉芒人，507年在武耶战胜西哥特人)之后，墨洛温王朝在高卢突然诞生。此事多少有点出人意外，但如果把各种因素考虑在内，也就不难发现，一切不是从零开始的。在这以前的几个动荡的世纪里，高卢的人口密度虽有显著的下降，但并没有跌到使正常生活不能维持下去的最低点。在五世纪末，人口总数可能达500万至600万，按罗马化时期高卢的地域面积计算，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居民略少于10人。如果照罗素的估算，在蛮族入侵后，高卢的总人口下降至300万，那它又怎么能承受接踵而至的各种灾祸的打击呢？特别是来自东方的可怕的腺鼠疫，曾在六世纪下半叶，后来又在七世纪末²⁰⁰，在高卢多次肆虐。

尽管如此，高卢的人口密度毕竟显著地下降了，这一事实有可能解释为什么法兰克人的征服相对说来较为容易和较为迅速。另方面的原因，征服是从索姆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地区，即从法兰克人同其他日耳曼部落相杂居的地区为出发地。这为他们提供了双重便利：其一是可以继续从莱茵河彼岸地区的居民中招募兵员；其二是他们与罗马帝国保持一定的关系，因而事先已逐渐接受罗马化高卢的文明。对他们来说，幸运的是克洛维在圣雷米的主持下皈依了基督教，并接受了洗礼(可能在496年圣诞节，但这一日期并不可靠)。当在高卢定居的其他蛮族仍然信奉阿里乌斯教时，法兰克人和克洛维却皈依了在高卢盛行的正统教派。他们的高级军事头目迅速与罗马化高卢的世俗领袖和教会上层人物拉上了关系²⁰¹。高卢从此大门洞开，法兰克人便节节胜利。尤其，对高卢来说，法兰克人的征服——蛮族入侵中的最后一次——并不像以往那样完全是一场灾难，即使在北部地区也不例外，法兰克人在那里定居的人数远远超出了卢瓦尔河以南的地区。事实上，无论是在勃艮第和普罗旺斯，还是在阿基坦和中央高原(这些地区虽然业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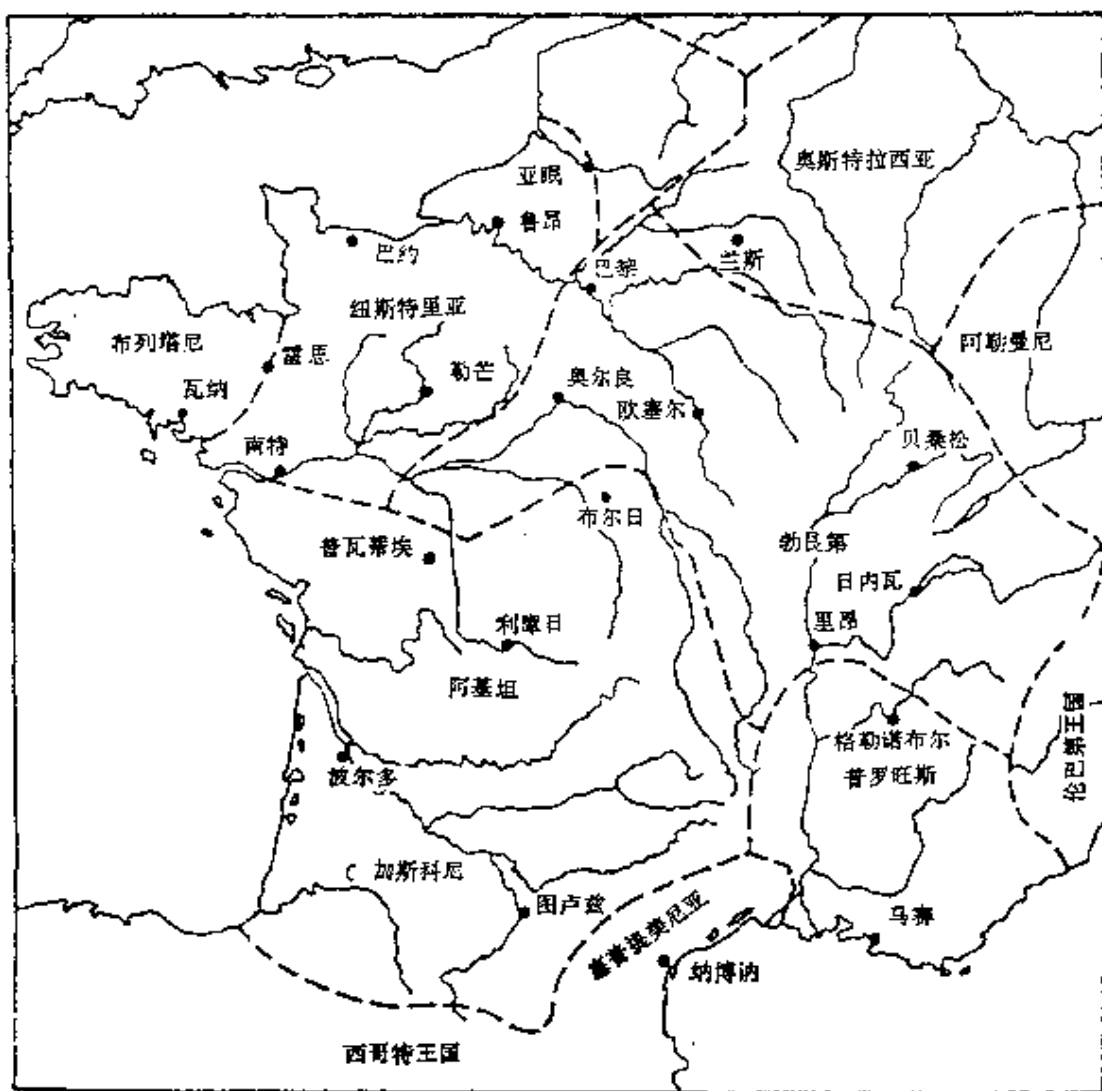


法兰克人的扩张 (参见缪塞《日耳曼人的入侵历程》)

归附法兰克人的统治，但不时出现反复)，法兰克人的殖民征服并没有广泛展开。

最后，在日耳曼方向，还有另一项有利条件：墨洛温王朝将占有巴伐利亚和图林根，因而达戈贝尔特在631年致君士坦丁堡皇帝的信中²⁰²声称，从大西洋到多瑙河都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但总的说来，法兰克人的征服结果使莱茵河的屏障基本上可以确保无忧。尽管王族内部纷争不断，尽管他们还没有形成主权国家或公有财产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法兰克人的统治，依据日耳曼传统，乃是由男性继承人平分的私有财产——尽管还存在以上重要弊端和无力实行共同治国，高卢却恢复了相对的和平，开始安居乐业的各项条件已经具备。商品流通和人员交往重新得以进行。罗马化高卢原有的城市、乡镇、农村、庄园之间的联系网依然存在。作为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的集镇数量也有所增加。集市贸易保证了农产品在城乡各地以及在主要农产区和修道院周围的地区畅通无阻²⁰³。交易会刺激和推动了商品交换，由达戈贝尔特于627年在巴黎附近的圣德尼建立的交易会就是如此²⁰⁴。最后，货币流通渐趋活跃：金币由王室和私人开设的作坊所铸造，西方的各蛮族——汪达尔人，勃艮第人，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西班牙的西哥特人——无不铸造金币，有的甚至还铸上了拜占廷皇帝的头像。

以上情形足以证明地中海经济的继续存在。更何况，马赛、纳博讷、波尔多等地继续保持与东地中海地区的联系，从那里源源不断地运来胡椒、香料、纸莎草、药材以及丝绸，甚至还有拜占廷的金币。不久前在福斯湾海底发现了一条当时驶往东方的船只，船内装有小麦、盛满树脂的双耳尖底瓮以及陶制拓片……²⁰⁵。同样，比利牛斯山区的大理石不仅被运往高卢北部用于修建教堂，也被运到西班牙和君士坦丁堡。最后，讲希腊语的叙利亚商人和犹太商人在高卢的城市里或通衢大道上风尘仆仆，积极开展大规模的



达戈贝尔特统治下的高卢

参见乔治·杜比：《法国史》。

商业活动。他们向王公出售珍贵的布匹、香料和药材，又收购金锭和奴隶。贡特朗国王于585年进入奥尔良，受到当地的叙利亚侨商的接待，他们用本民族语言向他致意。当时的奥尔良与自503年成为首都的巴黎一起，同是高卢的心脏。但在纳博讷城，589年也有叙利亚商人的行踪²⁰⁶。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当时的高卢经济对外开放，继续重视地中海的贸易。然而，由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变化，在其他动力的

影响下，高卢的重心逐渐向北方转移。

墨洛温王朝建立不久，高卢即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国土被几位王子所瓜分，但这些分界线往往与潜在的现实相适应。因此，卢瓦尔河进一步确立了它作为分界线的地位，而卢瓦尔河流域则呈现为一个相当宽阔的边境地区。这一早已形成的界线（罗贝尔·斯佩克林通过对历史和地理的考察所画出的“国内防线”），把法兰西的地域切成两块，而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切得更深（参阅第一编第78页附图）。这样说对卢瓦尔河以北地区也许是正确的，而对该河以南地区则不尽然。直至八世纪中叶，法兰克人仍称阿基坦人为“罗马人”²⁰⁷。不仅如此，在北方，从东到西又可分为奥斯特拉西亚（如果夸张一点说，奥斯特拉西亚堪称日耳曼的前哨阵地）、纽斯特里亚（与巴黎盆地一大部分地区相吻合）和阿摩里卡（即今天的布列塔尼）。六至七世纪时，克尔特人从英格兰特别是从威尔士出发，向阿尔摩里卡地区移民。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入侵，它在语言、人种和宗教信仰等方面都使布列塔尼半岛重新克尔特化了。从此，墨洛温王朝必须坚守边界，向西发展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至于卢瓦尔河以南，可以分成四个地区，即勃艮第、普罗旺斯、阿基坦和由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占领的塞普蒂美尼亚。地处墨洛温王朝肘腋之下的阿基坦和勃艮第格外珍视并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其独立自主，对当时的战乱持静待旁观的立场，幸而战乱也恰好在向北蔓延。

我不想对你们讲述弗蕾德贡德和布隆希尔德之间的自相残杀和野蛮争斗的细节，两位王后互相把对方当作死对头，前者在纽斯特里亚颇有影响，后者天赋甚高，是奥斯特拉西亚的统治者。我们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战乱不断的整个北方最初曾是高卢最落后、最野蛮、最不开化的地区。正因为如此，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才不断从南方招募文人学士和神职人员。但到了最后，却是北

方对整个法国发号施令。

确实，高卢的重心缓慢而有效地向北移动，并使北方部分地摆脱地中海的影响。至于重心开始转移的标志，人们却确定不了。地中海地区当时正处在衰退之中。马赛和阿尔勒在七世纪时已经在走下坡路，与此同时，默兹河下游和莱茵河下游地区——尼德兰——却利用大西洋与英格兰、北海、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的贸易活动，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就在布洛涅一落千丈的同时，位于康什河口的昆托维克却欣欣向荣，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此外，专门用于北方贸易的银币广为流通，并逐渐取代南方的金币。

这一切在利奥波德·热尼科的一篇文章中阐述得一清二楚，该文的发表虽为时已久(1947年)，但丝毫没有过时²⁰⁸。

随着北方的进步，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加快了步伐，教堂的兴建、教区与修道院的创立如雨后春笋。我们不妨看一看当时声名远扬的卢克索伊修道院，它是圣科隆榜于590年修建的，自620年起，那里就实行了本笃会的隐修制度。总之，“可以毫不武断地说，高卢北部在七世纪时就出现了相当活跃的贸易浪潮，八世纪时它已成为法兰克王国中最活跃的经济地区”²⁰⁹。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宜过分美化墨洛温王朝时期的高卢。的确，城市恢复了生机，市内建起了教堂，郊区也出现了隐修院，但是，它们的活动和影响还十分有限。农村仍处于大庄园的残酷剥削之下。大庄园普遍感到劳动力不足，这正是人口锐减的明显迹象²¹⁰。最后，可以肯定，森林占地甚广。阿尔卑斯山脉的森林几乎连成一片，林带从汝拉山脉、孚日山脉一直延伸到阿登山脉葱绿的山峦。虽说这些一望无际的旷野可使人畜苟且偷生，但可以肯定，森林占地面积的扩大是农民放弃耕作的结果。一些历史学家因此认为，与罗马统治下的高卢相比，墨洛温王朝时期的农业在总体上有所倒退，“经营分散”，“村庄不过是被树林包围的小块飞地。乡

村景色以林木为主要标志”²¹¹。整个高卢大地上布满了空白²¹²。

可见,如果说墨洛温王朝时期的高卢经济形势尚好,那是与灾难深重的前几个世纪相对而言。在这方面,我们对亨利·皮雷纳的论断不可盲从:他抬高墨洛温时期的地位,难道不正是为了贬低加洛林王朝吗?而加洛林王朝时期的衰退应对关闭地中海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萧条承担责任。有趣的是,亨利·皮雷纳对这两个王朝时期的字帖作了比较,这一比较很有价值。墨洛温王朝时期使用行笔舒展的草体,这种书法可能并不美观,但确实是一种流行的、活泼的字体;而加洛林王朝时期使用的工笔体则沉稳、刻板、缺少生气,“前者用于行政管理和商业事务,后者用于著书立说”²¹³,一笔一划都讲究写得工整。

实际上,在历史学家中,任何人也不相信墨洛温王朝时期的高卢的相对繁荣超过了七世纪中叶。达戈贝尔特一世(629—639年在位)继群雄相争之后,完成了统一高卢的大业。但是,用皮埃尔·里歇²¹⁴的话来说,国王死后不久,事态开始恶化,“经济形势渐趋逆转”。这一衰退一直延续到七世纪末。至于衰落开始的日期,我主张选泰尔特里战役(687年)为标志,这一战役确保了奥斯特拉西亚和不平王族的胜利,并在实际上结束了墨洛温王朝的最后代表“懒王”的统治;确切地说,所谓“懒王”,其实就是“无能的国王”²¹⁵。公元687年在政治上是重要的一年,依我之见,在经济上也是重要的一年。加洛林王朝的兴起标志着短暂的、相对的经济复苏。

归根结蒂,墨洛温王朝时代——它在我们的历史中占有两个世纪——最基本的特征难道不正是罗马化的高卢社会和法兰克社会缓慢的、悄无声息的融合过程吗?“无论是在宫廷、伯爵领地、主教辖区还是广大农村”²¹⁶,都存在这两种社会的融合。人们再也分不清公墓里的棺廓究竟属于高卢人或是属于法兰克人。这两种

文化、两类居民的逐渐同化乃是历史进步的不容否定的因素。基督教克服了种种困难，逐渐深入人心，这无疑是惨淡经营的两个世纪中出现的另一重大事件。

至于说哪个事件最重要或最不重要——这是历史学家最爱玩的游戏——，让我们毫不犹豫地宣称：修道院的影响进入穷乡僻壤和王公府邸，当然是首屈一指的大事！

是否存在过加洛林帝国？

请读者原谅我用了这样一个有点牵强附会的标题，但是，我稍后将对此作出解释。我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提出一个基本的问题，即使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决定加洛林王朝时期的高卢命运的根本问题。

关于加洛林王朝时期的高卢的特点，我们首先要介绍为传统史学所重视的一系列重大事件：687年的泰尔特里战役（奥斯特拉西亚取胜），促使力量对比发生根本的变化；接着，732年或733年普瓦蒂埃一战告捷，加洛林新王朝真正的缔造者查理·马特（生于688年前后，卒于741年）击溃了穆斯林入侵者的轻骑兵；715年，他的儿子矮子丕平被推举为国王并接受加冕；768年至814年是查理大帝的统治时期，这位皇帝的光辉至今仍受世人的瞩目。800年圣诞节，他戴上了西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冠。然而，这种显然并非虚构的荣耀和强盛，随着他的儿子虔诚者路易（814—840年在位）的继位而出现众多的灾难，很快就失去了光辉。虔诚者路易可能值得人们爱戴——米希莱曾把他推崇为圣路易一般的有道明君，但是，他的软弱，他的反常的怜悯心，却使刚刚建立起来的帝国受到了沉重打击。这个帝国已经难以自卫，更谈不上如何使它巩固了。他的儿子们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的争吵，甚至在这些争吵公开化之前，便埋下了毁灭和无法治愈的灾难的隐患。凡尔登条约（843年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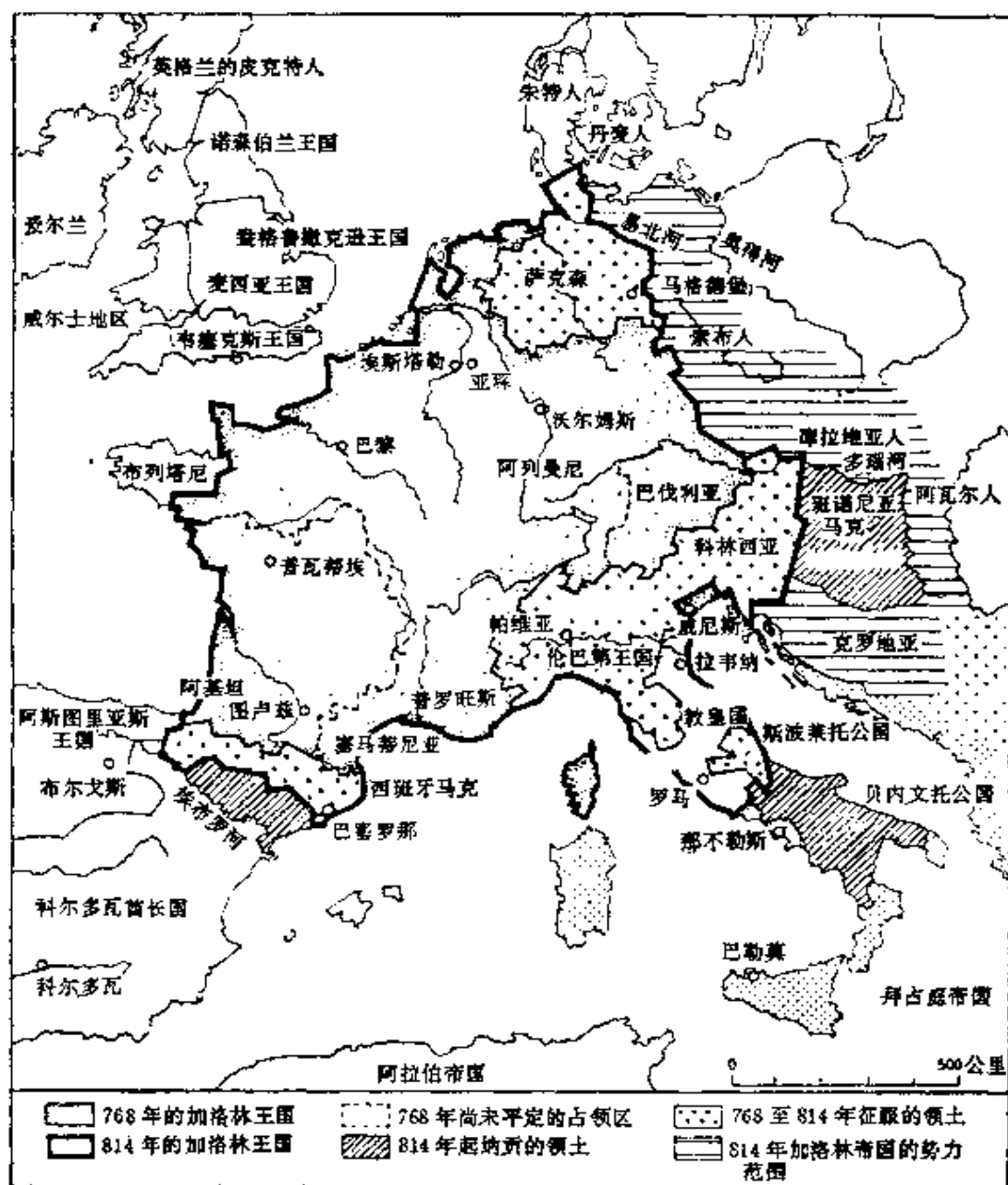
月)把帝国分为三个部分,并没有给局面带来转机²¹⁷。另一方面,20多年来,诺曼人的袭击逐年增多,他们沿着海岸和河流进行骚扰,宣告了帝国破灭的开始。

尽管如此,帝国继续存在着,至少帝位的继承从未中断。尚称聪明能干的秃头查理(838—877年)于875年翻越阿尔卑斯山前往直意大利,以便在罗马履行皇帝的加冕典礼。不幸的是,在离开“法国”的同时,他便失去了一切控制,不得不赶紧取道阿尔卑斯山回国,并且通过发布“瓦兹河上的基耶尔西敕令”,向国内的大贵族作出接二连三的让步。正如让·东特²¹⁸所说,秃头查理是在“帝国的幻想仍然十分强烈的时代和环境”中长大的,因而还将帝国的门面维持相当长的时间。然而,雅克·马多尔²¹⁹说得对,帝国“虽说名存实亡,但它的幽灵却久久没有消逝”。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鄂图大帝于962年夺取帝位,建立了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后一帝国直到1805年才寿终正寝。在帝位转至德意志后25年,即987年,于格·卡佩就任法国国王,从而建立了加洛林王朝。这一事件本身无足轻重,但它构成一条长链条的第一个环节,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后果的历史事件²²⁰。

在这三个世纪中,最重要的时期无疑是具有坚强个性的查理大帝的统治时期,而他最显赫的业绩显然是建立了西罗马帝国。如果把恩斯特·柯里图斯²²¹美化查理大帝为“近代世界的开山鼻祖”这类廉价吹捧搁在一边,我们不妨说他更像是戴克里先一样的历史人物;大体上说,这两位皇帝都想建立和恢复西方的和平与安宁。他今天很少能博得历史学家的宽容,但是,这样做是否完全正确呢?然而,恰恰是通过参照那些否定的判断,我才提出了以上的问题:是否存在过一个加洛林帝国?如果可能的话,让我们就把这场争论作个了结。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先让尼古拉·约尔加发言,既然他

毫不犹豫地投入了论战。他写道,事实上,“无论是从领土角度看还是从行政角度看,这个帝国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我们不应被城市及其驻军引入歧途。当时确实有一位皇帝,但并不存在帝国;没有皇帝的帝国是不可能的,而没有帝国的皇帝却是可能的”²²²。这显然是一种极端的说法。可是,不被加洛林帝国的武功所震惊的



加洛林帝国

历史学家并不仅仅是尼古拉·约尔加一人。在皮埃尔·勃纳西埃看来，加洛林帝国“从其诞生之日起，便是一个历史的错误”，这倒也还说得过去²²³；至于罗贝尔·福西埃，他认为“加洛林王朝本是一个死胎”。他指出：当帝国大厦摇摇欲坠时，“加洛林王朝接过了罗马帝国的衣钵，虽然几经修补，终究落得个百孔千疮”²²⁴。让·东特在他关于西方上中世纪史的那部力作中²²⁵提出的看法也几乎同样带有悲观色彩。他说道，我们不要设想“存在着一个幅员辽阔、整齐划一、结构紧密的帝国，存在着一个生活在安详与宁静之中的帝国”，他认为不如说“这个帝国阴霾密布，其核心虽然坚实，但其边缘却很不稳固”，当时“边界上正面临强敌压境”。

显而易见，查理大帝的帝国在其边界受到了蛮族入侵的猛烈冲击。显而易见，这个帝国并不是铁板一块，它由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部族所组成，而在这些部族中，有些忠于帝国，另一些却对它不是冷眼相看，就是抱敌视态度。可是，从墨洛温王朝时代开始，法兰西难道不历来就是由不同部族组合而成的吗？加洛林王朝力图吞并欧洲，不也具有不可克服的多样性吗？问题在于外患和内乱接连不断地发生。只是在800至840年期间，帝国才显得强大有力（实际上也未必完全如此）；自查理大帝去世后，这条航船也就岌岌可危了。总之，如果只考虑帝国本身的发展历程，人们或许可以说，这是加洛林王朝的一段插曲，为时不过半个世纪。

欧洲的诞生，封建制的诞生和确立

但是，怎么可以只看到这段短促的政治历史呢？难道只用三言两语就能确定它的命运吗？上述的判断诚然击中要害，但它们是完全正确的吗？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法国，从泰尔特里战役（687年）到于格·卡佩登基（987年），前后经历了三个世纪，难道这300年就没有任何重要的意义吗？

事实上，加洛林王朝构成了基督教和欧洲的起源，或者说，确认了它们的诞生。起源和诞生这两个术语完全相同，就像两个互相重合的几何图形。

普瓦蒂埃闪电战不仅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而且简直被认为是一场决战。用夸张一点的话来说——对初学历史的学生，我们或许会加以责备——，这难道不是货真价实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难道不是引起强烈反响的第一次冲撞吗？被伊斯兰国家部分地逐出了地中海的基督教如今向欧洲北部和东部扩展；圣卜尼法斯和查理大帝的军队在日耳曼地区传播了基督教并且使日耳曼势力进入了欧洲。在墨洛温王朝时代，日耳曼并没有广泛地与高卢相结合。随着加洛林王朝的征服和扩张，高卢像是穿了件大而无当的衣服而显得无所适从，而狼就在这时钻进了羊圈。无论如何，它已经处在被包围的状态，东面紧靠着一个“第三世界”。欧洲几大板块间的第一次接近即使尚欠完善，其重要性却不容否认。

加洛林王朝不仅孕育了欧洲，也孕育了封建制，即形式多样、五花八门的割据和分裂。早在墨洛温王朝时代，国家由于缺乏现金，势必要用笨重的土地来应付它所需要的各项开支，就是说，要以免征土地税或出让王室领地为代价²²⁶。墨洛温王朝的过错在于它以世袭的名义分配这些土地。照这个办法做，他们使自己陷于破产的境地。但是，在泰尔特里战役后不久，加洛林王朝的国王为确保自己的地位，在掌管一切权力的同时，加快了变革的步伐。当然，他们为达此目的，并非没有使用巧妙的手腕：他们像我们今天撤换省长一样，收回伯爵的领地²²⁷，并且派遣亲信出任教会的要职。查理·马特借口与伊斯兰教作斗争（甚至不用任何借口），随心所欲地支配教会的巨大财产。被没收的教会财产后来被赐给一些封臣，后者成为教会的下属，这对教会来说是多么可怜的补偿！

加洛林王朝的前三位国王——查理·马特、矮子丕平、查理大

帝——肯定都是强有力的杰出人物：他们毫不犹豫地收回土地；从此出让的产业（或如人们后来所说，“赏赐”的产业）只供受赐者终身受益，不再传诸后世。伯爵作为王权的主要代理人，受“钦差”的监督；必要时，伯爵可以从一领地调往另一领地，以防止他们在当地积聚财产和打下根基。给予他们的“各种恩赏”也随时可以撤消²²⁸。除此以外，加洛林王朝还发明、塑造了一个社会等级：部属和封臣都直接与君主相联系。这种联系方式一直延伸到自由民，他们都必须在国王军队里无偿服役。有钱人充任轻骑兵，最富有者加入2 000名或3 000名重骑兵的行列，马鞍和马蹬一应俱全。这些技术装备“使他们成为欧洲所向无敌的战斗部队”²²⁹。

这座大厦相当脆弱，因为从基础到顶端，它是建筑在封君的权威基础之上的。为此，自查理大帝去世后，它就出现了裂缝。虔诚者路易即位后，土崩瓦解已见端倪。在他死后形势更加恶化。在法国，经843年库莱纳的领主会议决定，“国王将不得听信谗言，或出自贪婪，随意收回赏赐”²³⁰。因此，墨洛温王朝时代的危险措施又被恢复，君主“放手地”免征土地税和出让王家田产，“将至880年时，几乎再也没有任何采邑可供赏赐”²³¹。

国家衰败的这一过程已如众所周知，也许不必再详加解释。封建制至此已落地生根。请读者稍安勿躁：我们将很快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最后的蛮族入侵

加洛林王朝自840年或850年开始没落，其根源似乎主要是在大厦的“内部”，而不在“外部”。最后的蛮族入侵当时正席卷整个西欧；在我看来，这些外在现象与其说是直接生效的原因，还不如说是结果或出现转机的征兆。因此，我们不要过高估计诺曼人、阿瓦尔人、匈牙利人、萨拉森人……入侵的作用。

所谓萨拉森人，当时指的是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包括居住在伊夫里奇亚即今日突尼斯的阿拉伯人。入侵者把这里当成征服西西里、进而攻击西地中海基督教国家沿岸的桥头堡。萨拉森人对意大利的祸害，与对高卢相比，情况不尽相同。我们不应夸大定居在圣特罗佩海湾附近、普罗旺斯海岸的拉加尔德弗雷内地区的萨拉森海盗和冒险家们的危害性。

阿瓦尔人和匈牙利人是来自中亚的骑兵。第一批入侵的阿瓦尔人和匈牙利人曾于779年被查理大帝消灭，对此我们无需赘述。他们的第二次入侵持续时间较长，劫掠活动一直深入到法国腹地，给当地人民留下了痛苦的回忆。他们很晚才被击退，但后患却一劳永逸地根除了：这一辉煌的胜利是鄂图大帝于955年8月10日在莱希菲尔德战役中取得的，战败者撤到了后来被他们称为匈牙利的国土上。

对欧洲和法国来说，诺曼人的威胁更加可怕。他们乘坐轻型战船，不时奔袭欧洲沿海防卫薄弱的据点。他们在内河水域横冲直撞，溯江而上，直逼内陆。他们多次抢劫了卢昂和南特，并于885—887年间围困巴黎，但在那里遭到了卡佩王族的祖先、坚强者罗贝尔之子、法兰克族的首领厄德的英勇抵抗。此外，勃艮第曾被洗劫一空，卢瓦尔河和阿列河亦曾成为抢劫者的通道，他们一直到达奥弗涅的心脏地带，克莱蒙曾三次遭到破坏和焚烧²³²……

这些毁灭性的入侵难道真能说明加洛林王朝的节节败退吗？今天，历史学家们再也不相信这一点。保尔·罗兰写道：“就像五世纪蛮族入侵造成了古代世界崩溃的传奇一样，这种说法不值一驳”²³³。安娜·隆巴尔—儒尔丹持同样的见解，她指出，这些袭击和破坏“从未使贸易交往中止过”²³⁴。雅各布·冯·克拉韦朗甚至认为，诺曼人的劫掠使教会和修道院积聚的贵金属重新投入流通，从而使西方经济恢复了生机²³⁵。更何况，诺曼人早在袭击高卢以前

已通过和俄罗斯的交易活动，积聚了大量贵金属。

上述论断与莫里斯·隆巴尔²³⁶所持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他们看来，穆斯林的征服重新使中近东的“财富”得以流通，并且再度为地中海地区的经济注入了活力。但是，我们是否应该受这些说法的诱惑呢？事实上，从来就不是黄金或白银推动着经济生活；恰恰相反，正是经济的增长和活跃吸引了金银，并推动了货币的流通。经济形势主宰一切，它在必要时总能创造、找到并使用所需的货币。

经济和人口

回过头来再谈长周期经济形势。我想如同分析墨洛温时代的高卢那样，论述加洛林时期的高卢。据我看，在长周期运动的促进和支撑下，高卢的经济从七世纪末至840—850年（大致年代）有所上升，然后从850年至950年（又一个大致年代）又转入退缩，而且退缩的速度比上升快得多。米歇尔·卢什承认，退缩包含着“一系列形式各异的危机”；“新一轮的周期性衰退似乎已经开始”²³⁷。

我们在讨论这类问题时，无疑必须借助许多假设。不过，这一次，我们拥有更多的历史资料可供使用。让·东特已为我们扫清了障碍，使我们在前进时不会冒太大的风险。他所收集的论据将引导我们得出与他几乎相同（但并不完全相同）的结论。

我们把有关的阐释归纳如下：

1. 首先必须摒弃以往的先入之见，即认为加洛林时期的高卢建立在小型领土单位的基础之上，这些小块领土对外封闭，被“成片的森林、荆棘、荒原和荒地包围着”²³⁸。总而言之，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可以肯定，加洛林王朝的行政当局一再告诫王室庄园的管家，“如无必要，尽量不上外面去寻求或购买任何物品”²³⁹。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庄园就不提供剩余产品或不把这些

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事实上，每个地区——包括城市、要塞、乡镇甚至村庄——都布满繁星一般的市场，历史资料提供了大量的证据²⁴⁰。在864年的一份文书中²⁴¹就有这样的记载：“在城市和集镇，必须对在集市上出售面包、肉或葡萄酒的农民严加管束……以防他们欺骗买主”。

地方集市的普遍存在并不排斥城市，交易会和港口从事活跃的远程贸易。在北部，从康什河上的昆托维克到弗里斯的杜尔斯特德，港口的远程贸易尤其活跃。有的港口好景不长，其中一些兴起于八世纪，但到十世纪时便不复存在，以致“人们今天很难确定它们的原址”²⁴²。但是，它们显而易见的繁荣表明高卢的经济生活正继续并加速了自墨洛温时代开始的贸易重心向北倾斜的运动，其中包括与诺曼人进行的贸易，因为诺曼人对高卢的入侵并不始终表现为劫掠。高卢各地进行远程运输的商品有小麦、食盐、木材以及包括香料在内的奢侈品……可以断言，达到一定规模的经济绝不可能在死气沉沉的自给自足制度下继续生存。硬说加洛林时代的高卢像是死水一潭，各地形成互相分隔的小单位，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在当时的高卢，行旅不绝于途，天主教神父浪迹天下，修道士因修道院境况不佳而被迫外出谋生，还有抗命的农奴——“巴戈德”运动仍在继续——且不说朝圣者、士兵和商人。“加洛林时代的社会几乎完全建立在流动的基础之上”²⁴³。

为了使图像更为完整，还要指出的是，金币在公元700年前后消失了，银币取代了它的地位。正如让·东特所指出的，流通的银币数量远比今天人们所想的得多得多，“数以百万计，而不是数以万计”²⁴⁴。最后还应提到商人：叙利亚商人恐怕已经消声匿迹，而犹太商人仍留在那里。无论是在阿尔勒或尼姆，还是在美因兹（小麦集散地）或凡尔登，人们都能重新找到活跃的移民中心，其中凡尔登是重要的奴隶交易市场：犹太商人从斯拉夫地区买回奴隶，再

把他们卖往穆斯林控制下的西班牙。由于拜占廷帝国对犹太商人或多或少关闭了门户，他们便从埃及或叙利亚绕道而行，足迹甚至远达印度和中国。与此同时，一些新商人也出现了，他们是意大利商人、弗里斯商人、斯堪的纳维亚商人²⁴⁵。在巴黎，经过885—887年的围困之后，又有谁会见到诺曼商人而感到惊异呢？

2. 查理大帝时代的高卢居民人数与墨洛温时代大体相等。从八世纪开始至九世纪中叶，人口甚至可能有所增加，这不仅与山区居民向平原迁移以及历史资料提及的垦荒面积的扩大²⁴⁶有关，而且与穆斯林突然侵占西班牙(711年)后当地的基督徒²⁴⁷纷纷逃往高卢西南部有关。藏于圣日耳曼-德普雷、圣贝尔坦、圣雷米等修道院的财产登记折²⁴⁸表明，在那些土地肥沃的地方，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为50人。但是，同样明显的事实是，土地贫瘠的地区及确实荒无人烟的地带依然存在。

关于人口总量，历史学家根据为数甚少但却具有启示性的史料作了各种推测。我认为应该摒弃约翰·罗素所提供的数字（九世纪中叶时居民总数为500万）²⁴⁹，因为这个统计显然偏低；可以设想，只是在人口平均密度较低的情况下，入侵者才能长驱直入，但是，如果人口总量达不到一定规模，就不足以保证我们在前面简要提到的那些经济活动的开展。因此，即使作出各种保留，查理大帝帝国（面积为120万平方公里）的居民可能达到1500万至1800万，其中高卢（指其原来的面积，占帝国的一半）可能有750万至900万居民。这正是卡尔·尤利乌斯·贝洛赫很早以前提出的数字。他说道，这一时期的人口约在800万以上，略少于罗马化高卢的鼎盛时代²⁵⁰。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今天的历史学家一致公认，“从840年起，大概直到950年”，“人口增长……陷于停顿”²⁵¹（这是最重要的事实），因为随着农奴制的空前推广，农民的人口有所收缩。对于奴

隶来说，农奴制是一种解放和改善，但对当时大概仍然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自由民来说，它不啻意味着境况的恶化已变得不可忍受。

3. 有关货币史问题的讨论尤其引人入胜。让·东特为说明这个问题作了冗长的论述。我想使用“经济世界”的现代术语（这位史学先辈于1957年去世，尚不知道这个术语²⁵²）对他的思想作一概括，我以为这不会曲解他的原意。

请假定，我在这里画一个圆圈，把拜占庭帝国，以及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都放在圆圈内。九世纪时，那里曾是金币的一统天下。在圆圈的外面，请放上波斯，瓦朗吉亚人控制下的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和加洛林王朝的高卢，最后再加上穆斯林占领的西班牙和北非，以上地区都流通银币。这一分布可以说明三件事：

1) 伊斯兰处于分裂状态，这是人们往往忘记指出的事。

2) 经济世界的中心可分为两个强大的经济区域，一个是拜占庭帝国，另一个是靠近地中海的东伊斯兰地区。这两大经济区互有联系，因为拜占庭缺少黄金，受制于生产和主宰贵金属的伊斯兰。以上描绘的图像与后来近代欧洲的情形相类似：在近代欧洲，西班牙通过塞维利亚和加的斯（今安达卢西亚地区）向世界供应从美洲获取的贵金属。

3) 九世纪时的这种两极并存和互相竞争的局面，无论对伊斯兰还是对拜占廷来说，都是其衰弱的根由。

毫无疑问，为了使总体视野清晰可见，这幅画面忽略和抹除了许多众所周知的事实和现象。例如，我没有指出：伊斯兰世界其实使用两种货币（金币第纳尔，银币迪拉姆）；在金币占统治地位的地方，白银至少也以银锭或者甚至以小银币的形式流通；自九世纪末起，为了阻止诺曼人的侵扰，加洛林王朝用黄金向他们纳贡；总之，黄金和白银始终可进行交换，其等量的比价为1:12（后来更是如

此)。

说到这里,我想只用一个标准来衡量,这个标准不尽精确,但行之有效。在一个经济世界(就是说,由互为联系、互相作用的各种经济组合而成的一个整体)中,黄金占优势的地区必定是整体的心脏和统治中心。瓦朗吉亚人(诺曼人)在辽阔的俄罗斯进行的侵袭令人击节称奇:他们在途中建立了基辅城,最后抵达黑海沿岸的君士坦丁堡,与伊斯兰相会合。但是,朝另一个方向,在俄罗斯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保存的大量穆斯林货币(总数超过20万)画出了一条虚线,穿过从黑海直到瑞典的整个“俄罗斯地峡”,反映出一种极其奇特的商业联系,几乎是这一遥远时代最富英雄主义色彩的贸易交往。这几十万块铸币之所以原封不动地保存在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是因为同西方的情形恰恰相反,那里没有熔铸货币的工场²⁵³。然而,我们仍应注意到,皮雷纳谈及的这条货币“虚线”并不是由金币构成的,那是穆斯林商人为在这些仍然处于原始状态的地区购买商品而输出的银币。因此,如果说黄金代表发号施令的中心,白银就意味着经济世界的边缘,即被统治的地区。难道需要举例证明吗?自从倭马亚王朝的西班牙——这在伊斯兰世界相当于美国的西部地区——于十世纪开始从苏丹取得金砂后,西班牙便进入了从银币向金币过渡的时期,这样,久而久之,西班牙也就成了伊斯兰地区的一个强国。另一个例子更能说明问题。西方重新开始铸造金币(热那亚,1250年;佛罗伦萨,1251年),正值基督教对其周围的经济世界确立物质优势的时候,基督教世界从此也就成为经济世界的中心。

你们不难猜想到这些判断可得出什么结论。如果说高卢在墨洛温王朝时期仍与金币流动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公元700年前后,加洛林王朝却脱离了金币流通区,这就意味着当时的高卢已沦为经济世界的边缘。此外,高卢通过输出农产品、木材和

奴隶，作为对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的屈服，难道不是千真万确的吗？这后一特征给高卢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这是不发达国家的特性，与拜占廷帝国或伊斯兰世界相比，高卢显然不足以充当文明的代表。

此外，还应注意，在公元870年以后，穆斯林的金币在高卢业已绝迹，“最近发掘出的少数几块阿拉伯金币是于840年前埋在地下的”²⁵⁴。这个论据不算十分有力，但作为九世纪中叶发生的大转变的证据，它毕竟反映着当时的“主导”倾向。九世纪时，人们略微增加了银币的重量（这表明银币有所贬值），尤其是铸造了辅币，面值为银币的一半或四分之一；有鉴于此，让·东特认为，辅币的铸造表明民众的生产和消费更加接近市场经济，他的这一见解大概不能自圆其说。他写道：“真正的经济革命恰恰就在这里发生，而不在别处：发展大宗贸易，与远方建立经济关系，这些显然都很重要，但比这重要一千倍的乃是把成百万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引到市场流通中来，这才是不可逆转的伟大事件，是标志着加洛林时代进入近代经济世界的伟大经济革命！从此以后，大小生产者纷纷出售其产品，而大小消费者则购买这些产品”²⁵⁵。

但是，不管怎么说，自从市场问世以来，情况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假如当时确实发生过这一进步，它也只能表明经济的“上层建筑”尚存缺陷。从理论上讲，这一设想并不是不可能的，或许甚至是令人神往的。劳动力的匮乏在当时相当突出，可能正是这一原因才迫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解释。人们能否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政治的厄运有时竟可能转变为经济的福运，促使居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为了得出这一结论，必须了解货币流通速度、价格运动以及许多鲜为人知的其他事实，不过，让·东特能够提出以上的问题，已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周期出现转折

总之，一个很长的经济周期自 850 年达到顶峰后，逐渐就走向衰退，直到公元1000年后，再次出现大规模的经济振兴。显然，我不揣冒昧地提出的这一周期本身还有待作出解释。1100年前后，稍早也罢，稍晚也罢，西方的经济气候不断转好，并将延续几个世纪。这是经济形势的转折。然而，任何一种转折都会提出各种复杂的因果问题，我之所以将因果并列，这是因为我们不能把进行中的历史过程完全归入这一范畴或那一范畴之中。

公元1100年前后出现的振兴表现为经济的普遍高涨，国家的衰颓破落以及社会的解构。所谓振兴，也就是向农奴制的进一步过渡，农奴制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以后，将对长期以来死气沉沉的经济生活起着推动作用，其中自然包括生产的革新和飞跃在内。用这一假设作为本章的结论并不为过。



第二章 公元10世纪至今的人口

“有些事情可以弄明白，
有些事情只能作假设。”

——让·东特¹

本章将尽可能弄清并说明长达十个世纪的历史进程。即使采用长时段这个独一无二的、方便的视野进行观察，那也还是成败未卜，甚至失败比成功的可能更大，然而，为做这件事而去冒点风险毕竟是值得的。

在这段极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只出现过一个堪称例外的、但一眼便可看到的低谷，用居伊·博瓦的话说，一个“广岛”²。1350至1450年间法国和欧洲人口的急剧下降和滑坡表现为饥馑、黑死病和百年战争这三大灾难。无论在法国还是在西欧，至少需要一个世纪（1450—1550年），甚至两个世纪（1450—1650年）才使这一深深的、久不封口的创伤得到愈合，原因是死亡人数竟占人口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一半，有时甚至达70%³。

不过，自1450年至今，这种规模惊人的浩劫再也没有发生过。差别之大不容计算：为了作出整体的解释，关键是要看到，1450年是一次断裂，是在我国今后的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的、意义极其深远的一次断裂。

有待我们考察的一千年历史可以断然切成几乎相等的两部分。950年至1450年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长周期，一个独立

的、持续几百年之久的长周期，在我们看来，它在我国历史上所有同类周期中具有最鲜明的非对称特征，非对称性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它的存在，并且不使任何人感到惊异。在各种有利因素的帮助下，自950年至1350年出现了缓慢的上升；1350年至1450年则是迅速的（相对而言）倒退，其中又可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⁴。下降的速度大体上等于上升的速度的四倍。这种不对称具有规律性，因为人们失去某种东西总是比获得它时要快得多。

然而，在漫长的第二阶段，即从1450年至今，经济形势却始终处于相当稳定、相当迅猛的上升状态，即使也曾出现短暂的倒退，但总的说来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没有陷入真正的灾难。因此，如果说1450年至今存在着跨世纪的周期（正如我所认为的那样），我们所面临的也仅仅是上升时期；根据预期推测，世界人口将呈长期增长的趋势（21世纪中叶将超过100亿），不可能很快出现任何下降的前景。只是在人口下降的条件下，经济生活的不断上升才会被姗姗来迟的周期性逆转所取代。我们肯定不会为以往或未来的现实感到遗憾，也无需为这种理论框架寻找辩解而感到苦恼，理论是对事实的认同，但不能任意左右事态的演变。

通过以上观察，我们首先看到，前五个世纪与后五个世纪恰成鲜明的对照，这一反差伴随着其他的反差，并说明其理由。我们已看到它们的各种表现形式，并从中得出了应有的教益。剩下的问题该是如何解释这一缓慢的、长期起决定作用的运动机制，这些机制左右着历史进程，使历史进程可被人们所理解，至于我们能否解释得通，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一、臻于完美的跨世纪周期： 近代法国和近代欧洲的初期

(950—1450年)

从10世纪到百年战争结束，历史学家把这个时期称作上中世纪(德国人)或下中世纪(法国人)，我更喜欢直截了当地说它是把西欧引向巨大变革的近代初期：法兰西和欧洲将从此应运而生。近代初期与其继往开来的前后时期都不相同。向上追溯，它脱胎于加洛林王朝的欧洲，依旧保留着罗马的内在结构；向下延伸，它显示出以城市、资本主义和王国为特征的真正的近代风貌，并且仅仅在百年战争的苦难结束后不久，才确立其统治地位，因为我国在进入近代初期后，将顶不住自身成长的压力，可怕的衰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它的成功带来的后果。

10世纪或罗马帝国的末日

跨世纪周期就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之所以说完整，因为我们可同时观察到它的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之所以说连贯，因为我们从10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可不间断地对这一周期进行追踪。周期结束的时限，毫无疑问是在1450年左右；至于其开始的时限，却不大容易确定。

应该承认，借助于公元1000年这个整数，把欧洲放在新飞跃的起点上，确实让人动心。1000年经常被描绘成人们战战兢兢地等待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刻，这对揭示一个阴暗的历史最低点本该是

最好的选择。但是，一方面，不能肯定当时的民众确实深受恐怖之害，何况教会对恐怖这个说法反应强烈。今天的历史学家⁵认为，昨天的历史学家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被悲剧心理所迷惑，从而摇身一变，充当起导演的角色来了。另一方面，十世纪并不如某些编年史家所说的那样，是个“金戈铁马、战云密布的阴暗时代”⁶。

事实上，一些征兆业已表明，当时存在着有利的平衡和复苏，经济状况尚称健康，甚至出现某种飞跃，或者至少是飞跃的先决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最后的入侵——诺曼人、匈牙利人、萨拉森人——停止了。这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有利因素。与此同时，城市恢复了活力，并日趋壮大；其防御工事被拆除了，郊区兴建起来，教堂更遍布各地。在马恩河畔的沙隆、桑斯、博韦、桑利、特鲁瓦，宏伟的大教堂拔地而起，它们随后将在12至13世纪哥特式建筑兴起时，终于消失⁷。货币铸造中心不断涌现，市场正在形成，一些交易会开始或恢复了活动⁸。远程贸易规模越来越大，交易路线也越来越明确，弗里斯的呢绒⁹行销整个基督教世界。以上种种足以使我们有充分理由把欧洲人口兴旺的开端定在公元950年。我们知道，在长时段运动的框架内，日期的确定一般都不能十分精确。既然如此，把时间稍稍提前或稍稍推后也就无关紧要的了。

这一新的高涨之所以包含50余年的时间，是因为11世纪显而易见的欣欣向荣经过了预先积累的准备阶段，其时间之长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蛮族入侵的中止大概为许多事情提供了解释：半数诺曼人于911年在塞纳河下游地区定居了下来；德意志在梅泽堡（933年）和奥格斯堡（955年）先后胜利地阻挡了匈牙利人的进犯；萨拉森人的入侵随着地中海经济活动的普遍衰退也有所收敛。对欧洲和法国来说，这是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一次机遇，一个天赐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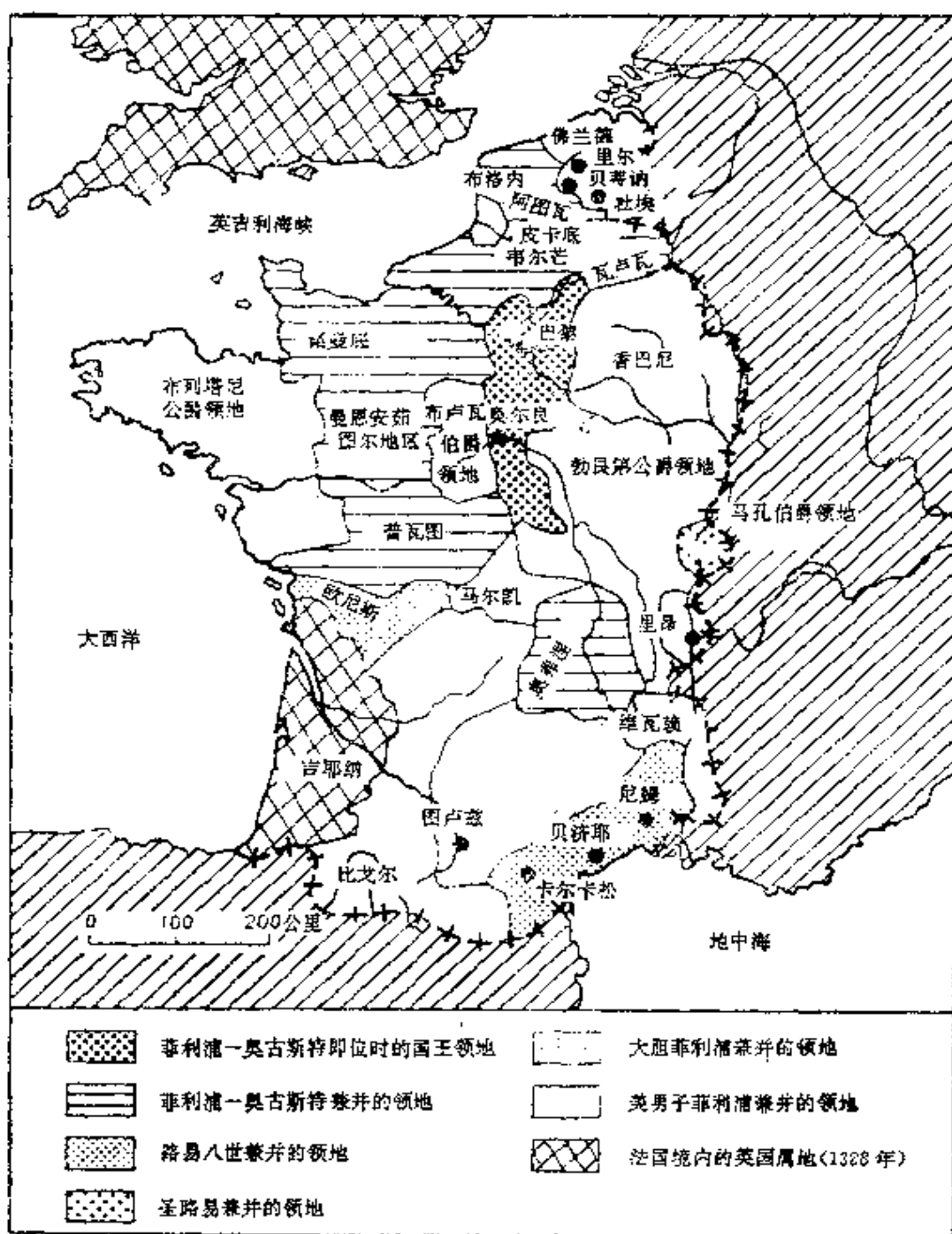
机，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因为如果说西方曾在漫长的世纪中对外来者敞开门户，那是因为长期以来它的人口严重不足，防卫能力也相当薄弱。但是，后来，它的人口逐渐有所增长，城市的防御能力也得到了加强。人们在实践中学会了与匈牙利轻骑兵或与溯江而上、沿江而下的诺曼人战船作斗争的方法。总之，经常以原因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东西，同样也有理由被认为是一种结果。欧洲的重新强盛部分地解释了蛮族入侵的中止。

此外，不要以为法兰西至此已经统一，已经可以安居乐业。内战的烽火从未熄灭：领主之间仍在争王称霸，封臣的叛乱和劫掠有增无减，国王为扩大自己在新省区的权力穷兵黩武，而在英法两国之间，从1109年起就在法国本土上开始了所谓“百年战争的序幕”¹⁰。抢劫、杀戮、巧取豪夺、惶恐不安成了家常便饭，由此导致了教会和国家的干预，宣扬“上帝的和平”和“上帝的休战”，提倡组织联盟，其成员应通过盟誓保证在若干年内，或某年的一段时间内，甚至在一周的某几天里，以和平的方式对待他人。“愿从今以后，在主教辖区或伯爵领地内，任何人不得随意闯入教堂，任何人不得劫走马匹、马驹、公牛、母牛、公驴，不得盗走绵羊、山羊和猪；愿任何人不得胁迫他人去修建或围困城堡，除非在自己的土地、自由地¹¹和封地¹²上……愿任何人不得伤害手无寸铁的僧侣或与他们结伴同行的人……愿任何人不得绑架农夫或农妇以便向他们勒索赎金”¹³。这是勒皮大主教居伊·德·安茹于990年前后倡议的第一份盟誓文本。不过，这里还应补充说，骑士和农民只是在被主教的侄子们纠集的一些武装团伙包围后，才同意签订了第一份“上帝的休战”书。因此，不要操之过急地侈谈公元1000年后法国的和平，名符其实的和平在1250年之后才姗姗来临¹⁴。事实上，战争也是一门谋生之道，像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在普通繁荣的条件下常盛不衰。

因此，10世纪及其以后几个世纪的欣欣向荣是和经常与之背道而驰的进程同时并存的。这是历史的深层运动，是即使不能根治其全部创伤至少也能使其中一部分伤口得以愈合的经济活力。

从这种深刻的变革中可以看出一个很少为人揭示的基本事实，这或许就是罗马的生活框架和物质结构的逐渐被破除。罗马帝国在其扩张的鼎盛时期曾经是一个强大的经济世界，一个面对地中海、享有舟楫之利的活跃而协调的整体。地中海的沿岸地区被以罗马——罗马和意大利——为中心的经济活动所吞并和控制。随着帝国的首都从罗马迁往君士坦丁堡(324年)，经济世界的中心随之东移，其结果对由狄奥多西一世(395年)划分出的东部地区——东罗马帝国有利。但是，无论是这次断裂还是476年西罗马帝国的覆灭，都没有破坏罗马世界的经济框架，经济世界的物质基础尽管已经缩小，但仍继续存在。拜占廷依靠其金币、华丽的丝绸、舰队、收复失地的挺进以及为数众多的自由农民，继续统治着已在西方立足的蛮族，甚至在较小程度上也控制着伊斯兰教占领的国家。但是，克洛维统治下的高卢和于格·卡佩统治的法国仍把目光转向地中海。它们属于边缘经济区，拜占廷与这些边缘经济仍有联系，后者仍受到它的诱惑和控制。

罗马的另一个持久的遗产是奴隶制。我们不应忘记弗朗索瓦·西戈最近的论断¹⁵，在共和政体时代，罗马和意大利的农民征服了罗马帝国驻足的空间。但是，意大利半岛优势地位的确立有赖于奴隶制的推动，正是奴隶制创造了大地产和大庄园，并且生产出剩余的农产品。随着奴隶来源的日趋困难(再也没有征战，没有俘虏)，大庄园在意大利终告衰退，但在北非、西班牙和高卢却继续存在。奴隶制在这里即使没有新的发展，至少仍得以延续。罗马化的高卢逐渐向庄园制过渡，虽然不够全面，但范围相当广阔。庄园制后来在高卢也出现了衰退和变化。为了使奴隶制继续保持下



卡佩王朝时期的法国

去，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进行能够获得奴隶的战争。然而，战争只是在高卢内部及其边界进行，强大的政权不复存在了。究竟是这一政权开创了封建制？还是封建制吞噬了这一政权？原

因不同，结果却是一样。

另一方面，自由农民仍始终存在。加洛林王朝正是依靠自由农民的支持¹⁶，才不惜滥用民力，一再进行对外的征服战争。

因此，虽说高卢各地依然像罗马帝国后期¹⁷一样布满着奴隶，总的形势在十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变化了。农奴制逐渐推广，站稳了脚跟。这自然也会对自由的小地产主有所损害。但是，在取代奴隶制的同时，农奴制将成为进步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农民的解放。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通常也拥有土地。拥有土地刺激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促使他们创造剩余产品；如果缺少剩余产品，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上层建筑便将是不可想象的。这里也许可以提出与弗朗索瓦·西戈对古代奴隶制的论断相似的认识：农奴制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工具。

十世纪及随后几个世纪出现的伟大革新也是一个新的经济世界对罗马经济框架的取代。地中海再也不占领先地位，优势转到了西方，转到了欧洲大陆。意大利的复兴、低地国家的崛起构成了经济活动的两极，而在中间则是香巴尼和布里交易会产生的向心力¹⁸。根据阿尔芒多·萨波里和吉诺·卢扎托¹⁹等出类拔萃的中世纪学者的见解，一场“真正的”复兴终于宣告开始了。但是，“复兴”一词意味着旧工具的重新焕发活力，这是否恰当呢？在我看来，这是一次创造，一次不容否认的革新，它宣布了欧洲的诞生。

欧洲的起步

1. 人口：经济兴旺的第一要素乃是人口增长。随着居民人数的不断增多，地域的凝聚力有所加强；村庄、集镇和城市与日俱增；贸易交往不断扩大；一种严密的结构便应运而生。但是，为了对人口的繁衍作出判断，我们通常必须与地区的“抽样调查”或一般估测打交道，但这只是了解一个概数。罗素认为，法国1100年前后的

人口为620万，将近英格兰人口的五倍（据《土地丈量册》的统计，英国1086年的人口为130万）²⁰。然而，《堂区和住户概况》指出，1328年法国年时的人口约为2000万²¹。如果1100年的居民数为620万是正确的（在我看来，这一数字偏低），人口就增长了三倍多。1086年时人口为130万的英格兰在临近1346年时已达370万。其增长幅度同样接近三倍²²。根据意大利、丹麦等国的人口资料，威廉·阿贝尔得出结论说，在整个欧洲，人口几乎也以三倍的速度在增长²³。

无论如何，人口猛增是实现繁荣的条件之一。临近1300年时，平均寿命“在英国为30至35岁，明显地高于古罗马时期的平均寿命（约为25岁），与1946年时中国的平均寿命大体相等，略低于1838—1854年间英国的平均寿命”²⁴。实际上，人口增长趋势一直延续了三个世纪，年递增速度可能为0.4%。身历其境的人对这种长时段节奏不一定有敏锐的觉察。因此，不要急于断言这是普遍的涨潮和天翻地覆的剧变。积累、变异和变革确曾发生，但成果并不是在朝夕之间取得的。同时，这一运动也不是同时在各地普遍显示出来的——其中存在着差距，既有富裕地区的迅猛增长，也有贫穷地区的缓慢增长、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

重要的是，无论何地，一切都与农民有关。一切都以零星的村落为出发点。法国的多样性，封建制的分散性，地方色彩的纷繁，无不由此而产生。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农民在涌入城市，补充城市人口的不足，造成城市人口的膨胀。封建主义这一术语正成为论战的对象，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要为其下一定义，面临着许多困难。封建制常常被人忽视的基本特征乃是其基础的作用，即在这制度下生活的农民无组织的、杂乱无章的活动。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的农民已经在土地上扎根，并在竭力为自己和主人生产。人们难以避开农奴制这个词，它过分突出了农民个人的社会地位，而与职业、富裕程度、以及他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和质量等因素相比，个

人的社会地位并不那么重要。“在法律身份和生活水准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些自由农民(他们依然存在)生活贫困,而农奴的生活反而优裕得多”²⁵。开创早期欧洲的农民运动旨在争取农村的独立和解放,这种解放虽然显而易见,但毕竟还不完善。

2. 土地和垦荒:正在形成中的欧洲是垦荒的产物,是发展农、牧业的产物。人们开始向大自然开战,用锄镐挖地,进行耕作,不断扩大耕地的面积。不论这是农奴或农民艰苦奋斗创造的奇迹,它毕竟从荒原、莽林、河岸、沼泽,甚至从大海那里夺得了土地,并且还恢复了撂荒地的耕种。总之,这种大规模的拓垦活动,以原有的村庄为基地,收回了处于半荒芜状态的乡土,甚至突破了原来的界限。正像马克·布洛赫所形容的那样,这是欧洲的“萌芽”,或者说,是有系统的、可能是为时已晚的拓荒活动的结果,拓荒活动由领主组织进行(有时由领主联合经营),也由修道院或国王亲自主持。

大规模开垦新土地要求源源不断地提供挥舞镐锄的劳动大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这些“垦殖者”往往通过生拉硬骗、广为鼓吹、慷慨许诺等方式招募劳力。1065年,圣德尼修道院保证对前来波旁内地区修建奥德教堂的任何人予以接待和保护,“即使是小偷或潜逃的农奴”也不例外,移民的人数陡然猛增²⁶。

扩大耕地一般是通过开垦荒地实现的。“这些不毛之地荒无人烟,长满了灌木丛和野草。莫里尼修道院的编年史为我们描绘的正是农民们用犁锄与荆棘、茅草以及漫山遍野和根深蒂固的各种杂草作殊死搏斗的场景”²⁷。

对森林开战是拓垦活动的主战场,这是一场伟大而又撼人心魄的历险。只有为数不多的森林——如索洛涅地区——可以说尚未触及。而在所有其他地区或几乎所有地区,像蓬蒂厄或维默,即使森林并未消失,面积也相应缩小,在巴黎南部的比耶夫尔、伊弗

利内、拉伊、克卢伊、洛日等地，大片丛林遭到垦荒者的不停砍伐。例如，在克卢伊茂密的森林中，从吕埃到塞夫尔河谷，沿着截断山谷的被称作克里宗谷地的中央走廊，圣德尼修道院院长苏热安置了60户居民，这便是沃克雷松村的发源地²⁸。在多菲内地区，在河谷得到开发后，鉴于当地已无林可伐，垦荒者便又一次向“阿尔卑斯山的森林发起了进攻”²⁹。

破坏森林——这在法国北方被称作“清理采伐迹地”，在南部则又名“毁林垦荒”——砍伐树林，清除树桩，这是一项耗费精力的艰辛的劳动，其结果是赋予法国农村一种崭新的面貌，这种面貌将在尔后几个世纪中继续保持，甚至常常直到今日仍没有改变。一切都由不可抗拒的需要所决定：增加耕地，以便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总起来看，耕地的扩展可能使至少半数的森林面积消失；依据一项十分粗略的计算，公元1000年时2600公顷的林地，如今只剩下1300公顷³⁰。

垦荒并非不存在危险，因为森林同耕地一样是农民的生活源泉，必须保持二者之间的平衡。不能过多地破坏森林。森林既是牧场，又是木材和燃料的储备基地。中世纪文明不就是一种木器文明吗？更何况，这一文明注定将在现代生活中保持其广泛的影响。直到今天，在潮湿的香巴尼地区，至少是在位于马恩省北部的德尔区，人们还是能够看到，木器文明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在那里，包括教堂在内的所有房屋都是用橡木建造的³¹。大家还可以想到樵夫和烧炭者生活的穷乡僻壤，想到木匠以及从事造船、制桶、制箍、制作木屐和加工铜铁器的工匠。最后，在那些完全用木料建筑、靠木材取暖的城市（特鲁瓦城在1526年的大火之后仍用木料重建）³²，不也是这样的吗？

大规模的垦荒活动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在移民的方式和经营新垦土地的形式等方面，各地存在着千差万别。例如，对夹

在瓦兹河和塞纳河之间的覆盖着冲积土的第三纪高原地带，如瓦卢瓦、苏瓦松、穆尔蒂安³³、欧克索瓦³⁴和布里等地区，皮埃尔·布律内在其令人称羨的著作中³⁵为我们描绘了一系列情趣各异的景象：村庄或呈鱼脊状排列，或依蛛网状或线条状分布；耕地实行轮作，有时侵占了不复存在的古代村庄的“居民区”；一些村落由罗马时期的旧庄园脱胎而出，是旧庄园长期演变的结果³⁶，另一些村落紧靠一个大农场，为农场提供不可缺少的劳动力。此外，还有一系列所谓“新城”，它们互不相同，各具特色。在地势较高、土地湿润、森林茂密的布里地区，历史资料要比其他地区更加丰富，这可能与它开发较晚有关。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得以发现包括领主、教会在内的各种地产主，特别是巴黎的有产者以及库洛米耶或莫城的有产者（莫城后来很快成为重要的谷物集散地）³⁷。对于别的地区，例如，对普罗旺斯或比利牛斯山区的梯田，人们也该作一番切实的调查！

垦荒的条件依据土地归属于领主、教会或农民而有所不同。其中农民的地产显然最难鉴别。然而，随着历史学家越来越重视乡村社会的最初活动，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已有了眉目。我并不想说，在塞纳河和瓦兹河之间，领主没有开展过垦荒活动，也并不认为西都会修士、普赖蒙特雷会修士以及后来的坦普尔会修士、奥斯皮塔莱会修士没有进行过清理采伐迹地的活动。但是，圣诺尔贝1120年之所以在“恶水横流、荆棘丛生、热病肆虐和野兽出没的圣戈班密林”建立普赖蒙特雷村，是因为新的修会已在苏瓦松地区富庶的土地上立足生根，那里的土地已经得到耕种，他们只要加以接收、扩充和经营就够了。那里已知的“谷仓”不下五处，分别占地275、195、235、180和143公顷³⁸，面积之大相当惊人……这是因为修会经常能以接受馈赠或进行购置的方式获得一些业已开垦的土地。他们的确带来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尤其是后来的坦普尔会

修士和奥斯皮塔莱会修士，具体地说，他们侵吞了农民的垦荒成果。早在加洛林王朝时代，农民的垦荒活动无疑已热气腾腾地开展起来了。

这种情形在弗朗索瓦·于连—拉布吕耶尔详细介绍欧尼斯和圣通日地区的那部著作³⁹里可以看到，他指出，9世纪至12世纪教会的地产来源于虔诚的捐赠，结果形成了“与领主的采邑制并行不悖的第二种等级制”。

居伊·博瓦发现和阐述的克吕尼修道院的情况与此相同。他写道：“正确评价他们的作用应从以下的事实出发：克吕尼地区土地制度的形成和农村的开发在时间上早于隐修院的成立。这要归功于自由农民的共同努力；历史资料表明，在临近十世纪时，自由农民的活动有着强大的生命力”⁴⁰。如果正如我所想象的那样，这种观察在其他场合得到证实，居伊·博瓦顺便提及的一种普遍解释就可能得以成立：农村的早期兴旺正是以损害城市的发展为先决条件的。这也就等于同意，加洛林王朝晚期的经济状况比人们通常所设想的要糟糕得多。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修士所起的“框架作用”，他们推行的土地兼并政策，他们直接经营农业的成效以及关心改善道路、桥梁等交通设施和促进远程商业活动，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后，在农业地域的调整过程中，还必须看到工具的明显改进：铁器的应用虽然并不完全取代木器，但毕竟起着补充作用；装有导轮、金属犁头和犁壁的活动轮犁在法国北部的逐渐推广（它们究竟在什么时候出现，是在加洛林时期还是稍晚一些时候，人们对此尚存争议）⁴¹；牛、马等役畜的数量大幅度增加；架在马匹肩部的轭圈代替了套在胸部的轭圈；改良耕作方法和增加耕作次数；使用泥灰改良土壤，如此等等。

3. 城市：随着农村的繁荣，出现了城市蔚为壮观的兴旺景象。这一时期创建的城市在数量上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在那些得以延续并且经常起着支配作用的古老城市的周围——诸如兰斯、沙隆、苏瓦松、努瓦永、图尔、里昂、维埃纳、纳博讷、波尔多、布尔日等主教所在地⁴²——到处都涌现出新的城市。在两种论断中——城市的发展早于或晚于乡村——，你究竟倾向哪一种？这就取决于你把侧重点放在古老城市的重新启动，或者在农村繁荣推动下新城的诞生。你既可以赞同亨利·皮雷纳或莫里斯·隆巴尔⁴³的观点，认为城市发展在前，又可以支持居伊·富尔干、乔治·杜比或林恩·怀特⁴⁴的见解，认为乡村发展在前。你还可以赞成让·法维埃不容置辩的论断⁴⁵。他写道：在法国，“城市的发展与农业的扩张不但互有联系，而且互不冲突，前者衍生于后者”。

可以肯定，城市只能依靠乡村的剩余产品而生存发展，这些产品通过领主收取地租或教会提取什一税的方式而流入城市。这就等于赞同威纳尔·桑巴特坚持的论断，即认为城市产生的原因在于市内住着享有特权的贵族、僧侣和王室成员，以及后来的资产者，所有这些都拥有土地并收取实物地租。或许，我们可把农村对城市的这种“领先”地位看作是欧洲“初期”的一个特征；到了第二个时期，15至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的情形便迥然相异，尽管当时的欧洲经济又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并随着这一转折产生种种连锁反应。但是，毫无疑义，这时是城市——一种更加优越的文明——占据支配地位，它们比农村更能忍受百年战争的灾难和考验。城市依靠其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依靠其新奇精巧的经济，居高临下地控制着周围的农业世界：这一次起飞与卡佩王朝时期不同，它不是自下而上，却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居伊·博瓦曾举诺曼底为例指出，“工、商业活动的比重猛烈增加，有力地促进了农业部门的起动”⁴⁶。

这种情形当然也还不能一言以蔽之。人们可以设想，即使在11、12世纪，举办交易会的大城市，重要的商埠和港口并不都从四周的农业发展中吸取最好的营养，而是主要依靠大宗贸易（包括远程贸易）成长壮大。受到王国监督的远程贸易从加洛林时代开始就相当活跃，货物除发往英国和西班牙外，还经由斯特拉斯堡远销东方市场⁴⁷……

总之，文艺复兴“初期”的城市——不论其发展模式如何——将力尽其能，从周围地区吸收居民，与远近各地开展贸易往来。一些居民点因得道路、河流、大海、渡口、港口之利，人口变得更加密集。在这些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城市四周，建设了关厢，成为商人云集的场所。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某些城市又分成若干不同的城区，以满足城市的各项使命的要求。“图卢兹有三个城区：主教驻地、修道院所在的圣塞尔南镇和纳博讷伯爵的城堡”。普瓦蒂埃则分成六个城区⁴⁸，数量之多为其他城市所不及。

总之，城市将在互相竞争、彼此对立的制度的掩护下悄悄地壮大生长。正是利用这种对立，它们经过耐心的努力乃至剧烈的搏斗，终于求得了解放。获得保证和“自由”，减轻沉重的赋税负担，确保自治的权利，或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变为独立的领地”，这些就是所谓城市运动（为争取城市自主权而展开的第一次城市运动于1070年在勒芒进行）⁴⁹所要达到的目的。但是，我暂且不准备就这个老大难问题多费笔墨，待到本书第三部分涉及国家问题时，我再来谈论它。

关键是要立即指出，城市的逻辑——暂且不谈城市是不是农业革命的产物——在于确保其作为上层建筑的优势地位。对城市来说，存在就意味着统治。因此，无论何时，不管其力量和成就的大小，城市总是高居农村之上，为农村充当“楷模”，并迫使农村就范。城市越壮大，它们对集镇和村庄的压迫也就越重。城市发展

进程的三个突出特征是：城市对当地多数工场实行兼并；手工工匠开始在城市开设店铺，推动城市市场的发展、行业的分工和专门化（即是说，在城市内部，出现了小型资本家，实际上他们成了行业的垄断者）；最后是城市商人的存在，他们迅速对远程贸易发生兴趣。

因此，城市肩负着在其四周传播崭新的生活方式和提高经济水平的责任。促使经济加快发展步伐的动力是货币。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另一章里再作阐述，读者自可参阅。暂且，只需指出这一变化具有决定意义就足够了。

4. 工业革命：随着经济的全面发展，技术革新竞相涌现：设置艉舵的多桅船⁵⁰，由钉有铁掌的马匹牵引的……铁轮车，铁制工具和器械……铁匠可能提供有效的服务，确立了奇特而持久的主导地位。“人们需要为马匹和更广泛地为役畜定期更换蹄铁，这使农民经常光顾铁匠铺，并在那里修理各种铁制农具。”⁵¹

但是，相对而言，这些细节与人们所说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相比还是微不足道，这次革命的蓬勃发展，全靠水力磨坊以及后来的风力磨坊的成倍增长，其中水力磨坊是罗马时代发明创造的发扬光大。在开始阶段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期中，这些用木料建造的磨坊“保护着价值昂贵的机械装置（磨盘、铁杆），……遇有战乱，人们便将它们拆卸下来妥为收藏”⁵²。和这些设备同样珍贵和同样重要的是操纵机械的磨坊主，他们是专家：“他们赖以获得报酬的磨坊……有时被冠以封地的名称，磨坊主有时受到领主的破格接待”⁵³。

一些机器就这样开始为人类造福。12世纪初叶，在法国有不下2万座水力磨坊。如果进行换算，可以认为当时全国获得了相当于60万人的劳动力⁵⁴。这是何等壮观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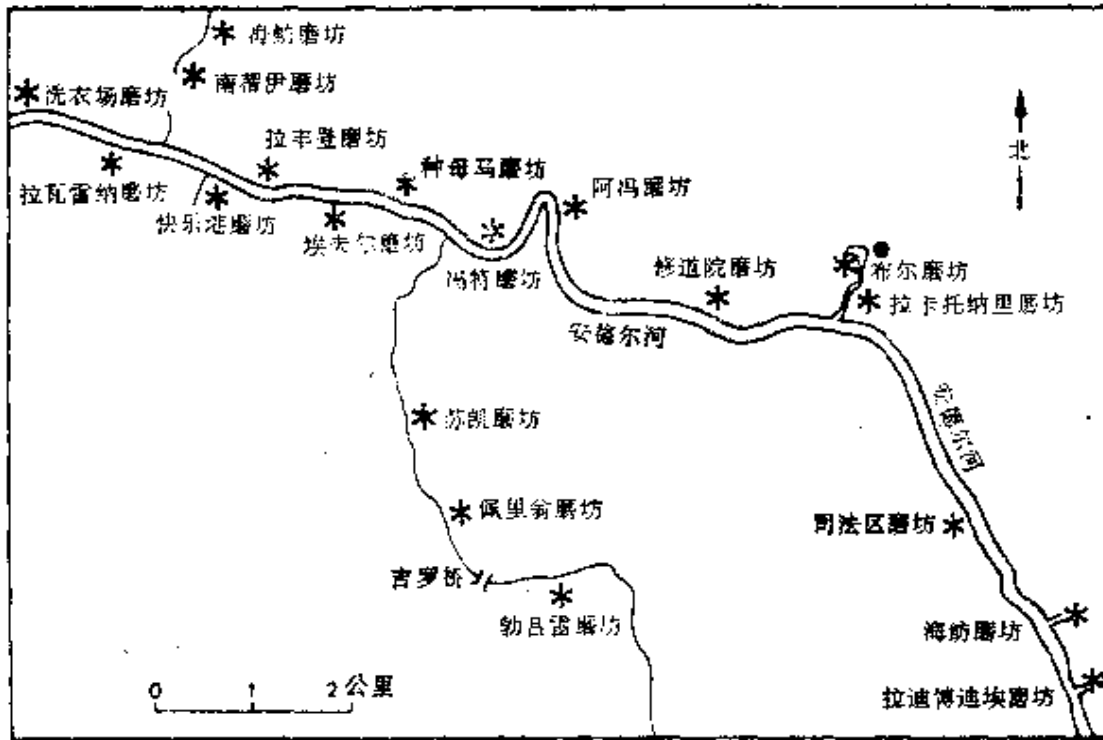
法国的水力磨坊13世纪末叶为4万座，15世纪末更达7万座，起步较晚的风力磨坊则为2万座。有人曾称水磨是“封建制”的产

物，而风磨则被戴上“资本主义”的头衔⁵⁵。这些磨坊有许多一直运转到本世纪初⁵⁶。在论及南北对立的那一章里，我们还应加上这一细节：“法国具有两种不同形式的风磨，东北部地区的磨坊采用枢轴的形式，东南部则取塔楼的形式。这种区别的地区的分界线与采用圆瓦与平瓦的地区的分界线大致相吻合”⁵⁷。

下面再来衡量机械在国家整个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这个问题相当棘手⁵⁸。人们肯定会想，磨坊毕竟尚属初级发明的成果。但在这方面，我想举出一个间接的却又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1936年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后，一名意大利人来到了贡达尔。他发现当地居民仍用捣杵在碾谷物，感到十分惊讶。于是，他安装一部老发动机带动磨盘磨面。用赚到的钱，他很快建起了一座又一座“磨坊”，总共建了20座，合理地分布在各个地区。这样，磨粉成本一下便大为降低，可能从100下降到10。他的辛苦当然没有白费，甚至因此发了大财。农民们在“磨坊”前排起长队等候开门营业⁵⁹……这难道不也就是昔日法国的景象么？

尤其，几乎从一开始起，11、12、13世纪的磨坊便具有多种用途：碾磨谷物，带动锻铁的大锤，为造纸、鞣革、榨油、梳麻等机械提供动力……根据杰出的英国历史地理学家H. C. 达尔比提供的材料，罗贝尔·菲利普相信：“我国12世纪的经济增长与19世纪堪相媲美”⁶⁰。大体上说，这也正是威廉·阿贝尔的见解⁶¹。当时的工资竟与物价同步增长，这在他看来真是一项奇迹！皮埃尔·肖努借用了W. W. 罗斯托夫关于“起飞”的说法⁶²。的确，在一系列“公倍数”的刺激下，西方的基督教世界起飞了，法国正位于这个世界的中心……到了11世纪末，甚至连交替起落的潮汛在诺曼底也被利用来提供动力⁶³。

我们还应当了解磨坊究竟是早期欧洲变化的原因还是其结果；无疑二者兼而有之。变革之大几乎与19世纪的蒸汽革命相距



安德尔河流域的老磨坊

从八世纪起,磨坊开始大量涌现。在安德尔河长约15公里的这一河段及其支流两侧,共建有19座磨坊。

不远。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蒸汽发动机可以随意移动,而磨坊却只能固定在河边。因此,无论在都市还是在村庄,都不能使这些能源和依赖它们的工业远离河流。这一状况将延续好几个世纪不变,因而构成了近代欧洲早期的特征和局限性。

另一种局限性更加严重:除个别的细小变异外,这场革命只是简单的重复,脱不开老框框。与此相反,英国于18世纪开始的真正的工业革命导致了一系列连锁革命,每一次都直接或间接地孕育下一次革命。在近代欧洲早期的确立和成功中,磨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它最终归于失败,除了上百种其他原因外,还因为这场革命没有超脱自身的局限,没有在能源方面找到新的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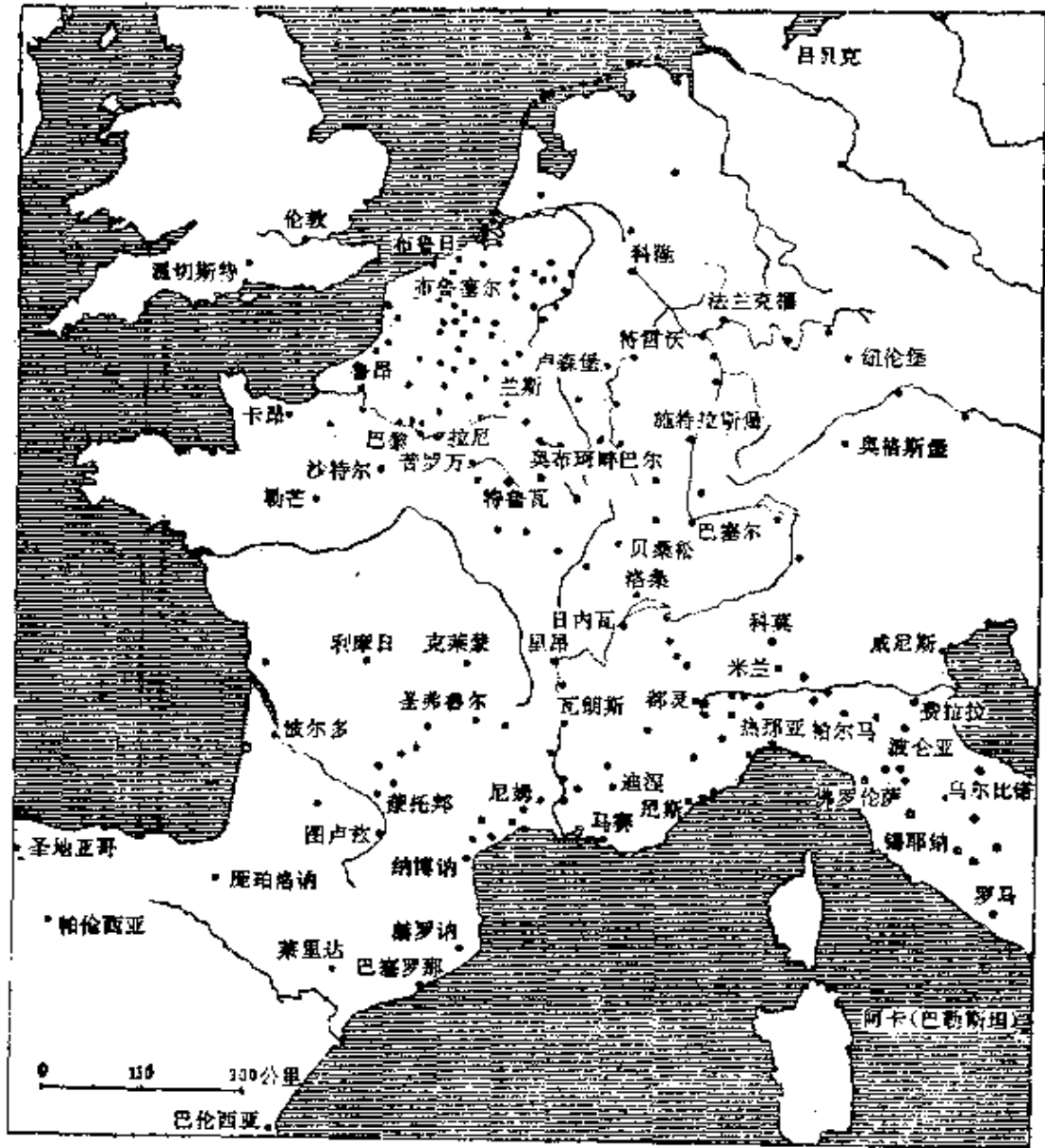
法国的机遇：香巴尼和布里的交易会

12世纪的欧洲以及在欧洲地域建立起来的新的经济世界以特鲁瓦、普罗万、奥布河上的巴尔和拉尼为中心。这一空间很早就具有经济世界的区划特征，就是说经济世界被分成中心地区、中间地区和外围地区。作为结构紧密的经济整体，它根据一些具有强制性的节奏，同时呈上升或下降的趋势。但是，在不同区域之间，仍存在着发展水平的差距。鉴于以上许多理由，建立在欧洲的这第一个经济世界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⁶⁴。

我认为，覆盖全欧的第一个经济世界的产生可归结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三项先决条件，即早熟的、很早就向地中海开放（阿马尔菲、威尼斯、比萨、热那亚）的意大利经济起着发动机的作用；在莱茵河、默兹河、埃斯科河出海口，出现了一个手工业和商业兴旺发达的经济区，并逐渐扩展到塞纳河；最后，这两个经济极点在塞纳河、奥布河、马恩河的中游地带相会合，也就是说，两边的商人在特鲁瓦、普罗万、奥布河上的巴尔和拉尼等地的交易会上定期会面。

在菲利克斯·布尔克洛及其追随者罗贝尔—亨利·布迪埃⁶⁵看来，香巴尼和布里地区的国际交易会于1130至1160年间开始发挥作用。由此可以看到，它们的兴旺显然晚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出征时间（1095年）。这个时间相当说明问题。否则，人们怎么会觉得交易会的成立是对十字军东征的一次猛烈的冲击？无论如何，晚于十字军东征的判断是不容置疑的。

正是在这些年代（1130—1160年），尼德兰和意大利北部这两个电极真正接通了电路。电流大体上经由“法兰西地峡”从南到北地贯穿欧洲。从1125年开始，香巴尼伯爵蒂博二世推行的宽松的、务实的经济措施，对驰名远近的交易会的成功起了促进作用。香料、丝绸等东方产品，意大利商人的信贷，在这里与从须得海到塞



与香巴尼交易会有联系的城市(12至13世纪)

本图显示 13 世纪欧洲经济世界的全貌及其两极：北部的尼德兰，南部的意大利。（参见 H. 安曼的著作。）

纳河和马恩河的广大工业区生产的本色布进行交换。

还有一个细节：商人不走兰斯、沙隆、朗格勒⁶⁶这条南北向的路线，而偏偏要在特鲁瓦、普罗万、奥布河上的巴尔和拉尼会面，更何况，选中的路线又不是古罗马时期建成的大道。人们对此又该作何解释？这难道是由于香巴尼伯爵对兰斯、沙隆等主教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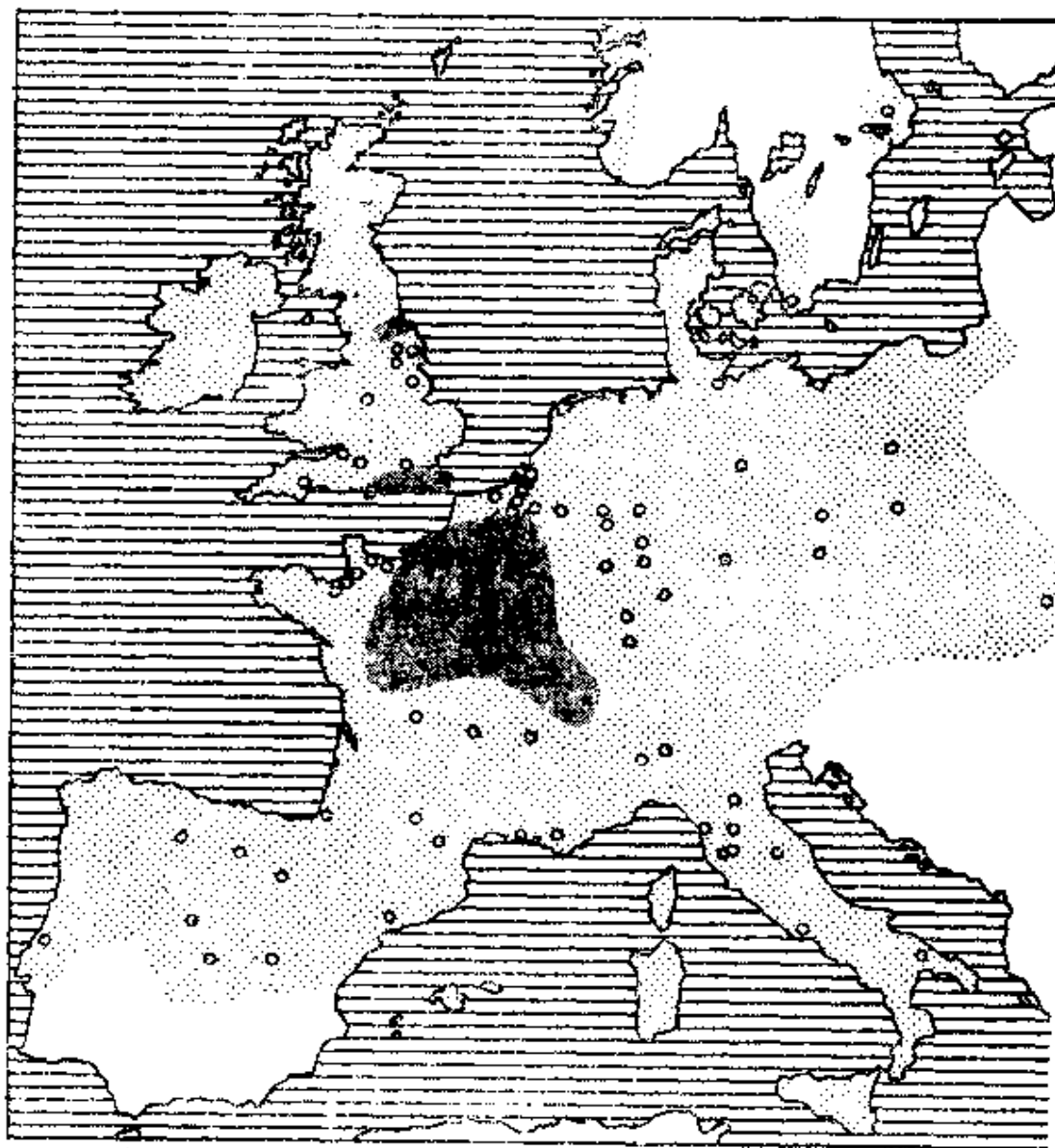
(这些城市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采取敌视态度的缘故?抑或这样做对南方商人来说是出于迫不得已或贪图近便,因为以上地点距东方产品的买主更近,也就是说,距巴黎盆地的中心和王国的首都巴黎更近?

总而言之,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正是接连不断地在特鲁瓦、普罗万、奥布河上的巴尔和拉尼轮流举行的交易会建立起了一个经济世界的中心。这个崭新的经济世界囊括了整个欧洲,首次在欧洲实现了经济生活的一体化。

这种中心地位对法国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崭新的经济世界的核心与另一个巨大的核心——巴黎——近在咫尺,这一事实又怎么可能无足轻重呢?1300年前后,巴黎至少拥有20万居民,人口数量超过任何一座西欧城市⁶⁷。巴黎之所以成为城市的巨人,这个相当宽敞的城市之所以“人满为患”(城墙建于菲利普·奥古斯特时代)⁶⁸,巴黎大学之所以享誉全欧洲,法兰西王国的司法体系之所以茁壮成长,并逐渐形成职责分明的中央机构,诞生于法国的哥特式艺术之所以向国外传播,直到13世纪末依然繁荣兴旺的香巴尼集市显然起了推动作用。在巴黎和巴黎四周,大教堂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桑斯大教堂建于1130年;努瓦永大教堂建于1131年;桑利和拉昂大教堂建于1150年前后;巴黎圣母院,1163年;沙特尔大教堂,1194年;亚眠大教堂,1221年;博韦大教堂,1247年。“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的祖先用石块垒起了……这些蔚为壮观的大型建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惊人的成就,桑利大教堂的拱穹高达18米,博韦大教堂高达48米,至此就再也没有更高的了”⁶⁹。(确实,巴黎圣母院的拱穹只有35米高。)建造这些大教堂旷日持久,它们是长时段历史的最好见证。巴黎圣母院的建筑始于1163年,直到1320年方告竣工。

鉴于以上的情形,巴黎从11世纪起已成为“西方的文化中

心”70; 巴黎大学后来在追求新思想的同时推广了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当时被人们视为科学——从而使学术研究发生根本的变革。这一切毫不为怪,从此,诗歌和文学作为首要学科的地位被哲学和经院哲学所取代。在一首尖酸刻薄的讽刺诗中,哲学家米



哥特式建筑的地区分布图

深色的网点代表12世纪哥特式艺术的起步阶段(黑圈),浅色的网点代表哥特式艺术在13世纪的扩展(白色圈点)。图中的小三角形表示不复存在的哥特式建筑的所在地。

歇尔·德·科尔努比向诗人亨利·德·阿夫朗什发难：“我埋头于学术研究……而你却搞格律、音韵之类的无聊东西。这些能有什么用呢？可以说毫无用处。你固然懂得语法，但你不懂科学，对逻辑更一无所知。像你这样的无名之辈又有什么资格自吹自擂？”⁷¹

知识的光芒并不仅仅集中在“拉丁区”和索邦大学的周围，也不局限于巴黎及其附近地区。我再说一遍，法国的哥特式艺术犹如蜜蜂分房般地向其他各国扩散。从最早的发源地法兰西岛开始，它逐渐传到德意志、西班牙北部、英格兰南部，乃至波兰的克拉科夫……尽管就总体而言、亚平宁半岛很少接受这种法兰西艺术风格，但在意大利北部，在米兰和锡耶纳，也出现了哥特式建筑。这里试举一个小例子，很能说明问题：锡耶纳城大广场上有几座宫殿式建筑的窗户采用了哥特式风格。拥有这些建筑的大商人难道没有去过普罗万城和特鲁瓦城吗？1297年，锡耶纳城市当局明文规定，为了保持总体和谐，如果要在广场上重建或修缮房屋，面对广场的窗户必须符合以下格式：“以小圆柱作装饰，不设阳台”⁷²。

地理扩张：十字军东征

欧洲出现的繁荣，如果追根究底，可能是经济增长的最基本形态：欧洲经济当时正向四面八方扩展地域：英格兰征服了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朝东欧扩张，进入了斯拉夫和波罗的海地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在公元1000年前已经皈依基督教；西班牙人逐渐完成了基督教对其南部领土的再征服（1212年，他们取得了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地中海上的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先后被收复；诺曼人占据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更有甚者，随着十字军东征的展开，地中海及其各条航线从此为西方所掌握。

大家都知道，十字军东征对欧洲、尤其对我国是一次生死攸关

的巨大考验。西方世界很早(1094年)就变得富于侵略性了。在经历了许多世纪的入侵之后,现在轮到它扮演蛮族的角色,开始侵占面前的伊斯兰和拜占庭了。轮到它进行征服、蹂躏和剥削别国,角色已经颠倒了过来。甚嚣尘上的宗教狂热只是在几个世纪之后才冷却下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粉墨登场,它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毫无选择的余地可言。费迪南·洛特喜欢暴露这些反复展开的侵略浪潮的各种阴暗面。他说,这些侵略采用暴力手段,人们有理由认为,它们与对新大陆进行的野蛮征服同出一辙。唯一的不同——但也相当重要——是美洲在遭受欧洲的打击前仍处于原始文明的阶段,或者说,在物质上难以进行自卫的阶段。因此,欧洲能在新大陆各地生存繁殖。在北非、东方穆斯林世界和拜占庭帝国,情况则完全不同;拜占庭帝国在1204年蒙受强敌入侵,但可以肯定,它并未就此灭亡。以上这些适合于长时段的判断毕竟离开了我们所要阐述的主题——欧洲的早期扩张。十字军东征是一次激烈的考验,但它使人们可以测出欧洲及其心脏地带的经济和文明水平,测出法兰西的经济和文明水平。

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1350—1450年)

在罗贝尔·福西埃看来,这100年时间或许“可与10世纪和20世纪一起,堪称欧洲历史上最动荡的一个时代”,也是法国历史上最动荡的一个时代。用这个朴实无华的标题来宣告乱世来临是否恰当?⁷³从瓦卢瓦王朝的菲利普六世的命乖运蹇到查理七世的节节胜利,如果改用一个更响亮的标题来概括这些年代,例如称之为大萧条、经济猛烈恶化,难道不更合适吗?在经历了长期的、困难的但却是非凡的上升之后,欧洲陷入了巨大、普遍、剧烈的衰退之中。我们顺便指出,这种衰退在经济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罗贝尔·福西埃指出,“西米安的门生在理论上承认衰退,认

为这场经济衰退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属于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⁷⁴或萧条阶段，纯属多此一举”⁷⁵。不论福西埃自己愿意与否，我敢肯定，他正是西米安的门生之一。我丝毫也不认为，按照西米安的学说所作出的以上解释竟“纯属多余”。事实上，这项解释包含着其他的解释，并互相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项解释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因为当整个经济基础发生动摇，长期不能恢复平衡，找不到合适的药物治疗时，那就可以断定，不单是经济，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也在起着瓦解的作用。

以往的传统解释把从1347年开始打击法国的黑死病放在突出地位，称它像是“一脚踩在蚁穴上”，使人口增长趋势陡然停止⁷⁶。但是，历史记载表明，瘟疫流行的时间晚于经济的最初衰退。自1315年至1320年，可怕的寒冬已经带来了饥馑，敲响了令人生畏的警钟。其他的饥荒接踵而至：1340年在普罗旺斯，1348年在里昂地区……时疫流行，“旷日持久，加剧了早已开始的人口锐减，使局面变得益发不可收拾”⁷⁷。

事实上，农业产量早已达到了极限，不再随人口同步增长。安德烈·谢德维尔⁷⁸在其颇有文采的著作中指出，在沙特尔地区，“1220至1230年间，经济发展已停滞不前”。乡村的空地已全被利用。“最后一批荒地也在1230年开垦。在虔诚的国王圣路易的统治下，生活肯定还不算十分难过，人们后来尚不免留恋怀旧，但是，……即使在那时，阔步前进的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至少这在沙特尔地区是如此。显然，沙特尔地区可能受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的牵累：由于过分偏北，不宜大量种植葡萄；又过分偏西，处在蓬勃发展的纺织工业区之外。因此，在13世纪初，当地的经济几乎奄奄一息，坐以待毙。然而，其他地区也不例外，在黑死病肆虐之前很久，伐林垦荒已放慢了速度，例如“1230年在巴黎周围，1250年在普瓦图、庇卡底、诺曼底和普罗旺斯，1270年在……索洛涅，1290

年在利穆赞、波尔多地区和比利牛斯山区，1320年在福雷……多菲内”⁷⁹，1248和1350年间在塞纳河畔的巴尔⁸⁰。

过早地停止伐林垦荒本身就是一种迹象。同样，人口增长到13世纪末也已告停止。福西埃认为，“在1310至1320年间，有时甚至还可以上溯到1280至1290年间，基督教欧洲的人口膨胀似乎已经登峰造极”⁸¹。这也正是罗贝尔·菲利普的见解，他根据沙特尔教区的财产和收益清册指出，人口增长的高峰出现在1280年，即说远远早于黑死病的流行。他写道：“据我们的判断，从1280年起，人口开始减少……随着经济危机的接连冲击，人口更一落千丈”⁸²。居伊·博瓦称，诺曼底“人口曲线的转折”出现在“两个世纪的交接处”⁸³。我并不认为人口变动作为标志经济发展水平的“第一要素”能够决定一切，但它无疑最清晰不过地展示出向灾难过渡的一个长过程中的各个阶段。的确，关于法国人口变动的状况，我们只掌握一个相当可靠、但也并不完全精确的统计数字：1328年，在瓦卢瓦王朝的菲利普六世即位时，法国的总人口约为2 000万（在我们看来，数字确实大得出奇）。从这个高度上，人口转为急剧下降，到1450年时，可能降到1 000万左右，也就是说，减少了一半。如果根据诺曼底地区为数有限的实例进行推断，下降的幅度甚至更大：“最低的水平……是以往有10名居民的地方，只剩下3人还活着”⁸⁴。

但是，在半个世纪里，人口急剧减少并不均衡地呈绝对下降的趋势，而是一浪接一浪地逐渐退潮。在两个浪潮中间，人口重新增长。接着，下一个波涛又卷走原有的积累。在上诺曼底，经过持续50多年的“第一次重整旗鼓”以后，于14世纪中叶因黑死病蔓延再遭浩劫：1415年至1422年，人口迅猛下降，接着在1422年至1435年略有回升；1436年至1450年，一场可怕的灾难再次降临，把一切化为乌有。居伊·博瓦找不到一个恰如其分的词来形容这场

惨祸，终于用“诺曼底的广岛惨剧”充当小标题⁸⁵。死神一次肆虐过，又残酷无情地卷地重来。雅各布·冯·克拉夫朗确信，人类的繁殖是唯一不受效益递减法则支配的产业。但是，面对生命的力量和潜能，环境不是与人类作对，便是为人类造福。

与人类作对的事是黑死病和百年战争，还有无情的效益递减法则阻碍着经济持续不断的增长。新的土地有待人们去征服，但这些土地十分贫瘠，养不活耕种土地的人。人口因此出现过剩，成为不堪重负的包袱，使一切都反过来与人作对：王国的税务机关强征暴敛，农民在“苛捐杂税”的压迫下，1337年后已难以维持生计。货币的发行花样翻新，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从1358年10月到1360年3月，银币就变换了不下22种之多”⁸⁶。在天灾人祸的再三打击下，社会状况急剧恶化：农民的生产热情一落千丈，领主们眼看自己的收益日渐减少，便蠢蠢欲动，从事战争和劫掠。一些历史学家喜欢谈论危机和“封建制度的末日”，但一种社会秩序的垮台，无非是让位于另一种新秩序而已……

黑死病和百年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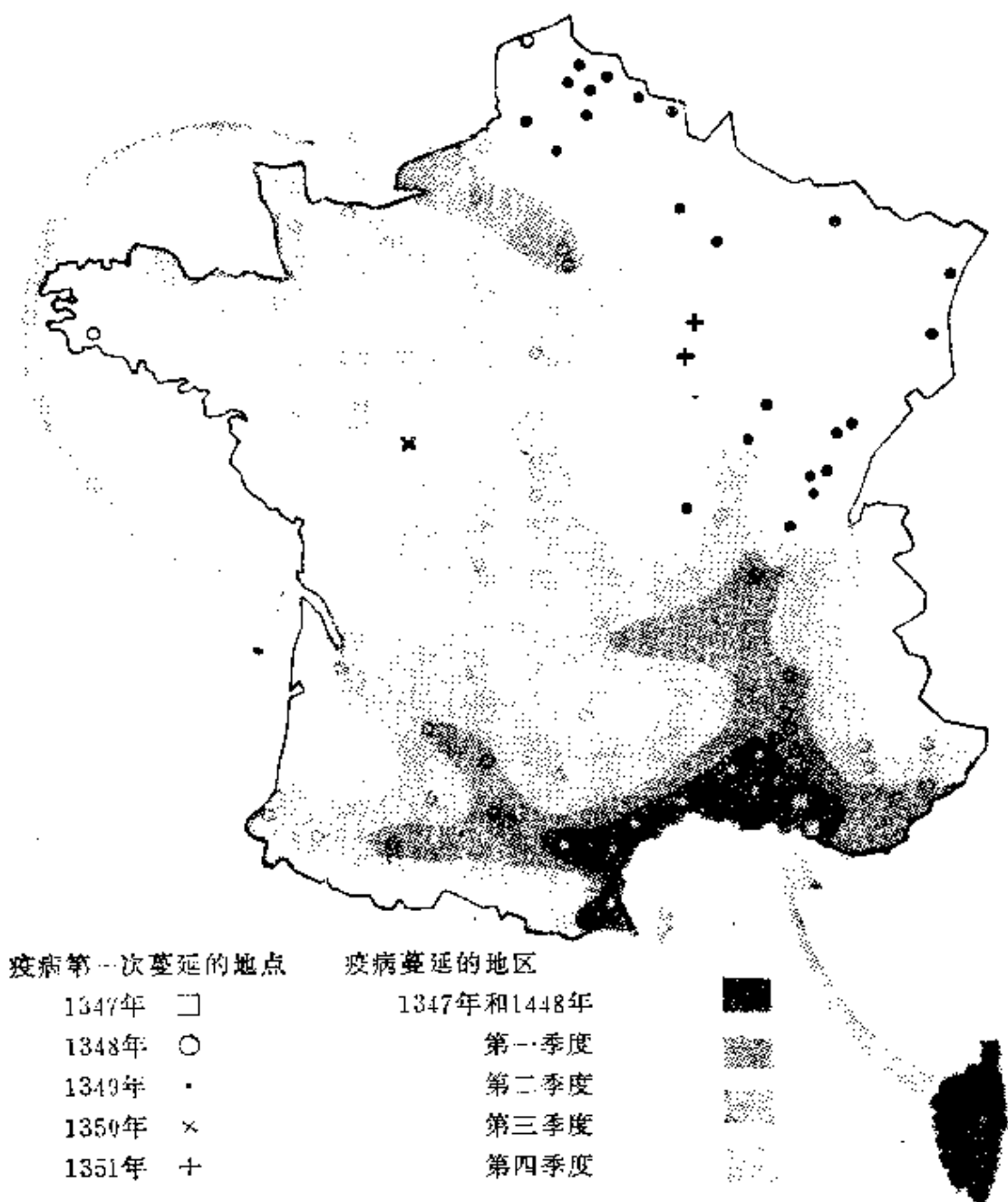
黑死病于六世纪、七世纪和八世纪曾在欧洲多次出现，到了1347年，欧洲已把远在几百年前的瘟疫完全忘记，但这次灾难却以两倍、三倍的凶猛，突然向欧洲扑来。人们当时把它看成是一场新的灾难。教皇克力门六世著名的外科医生居伊·德·肖利亚克在阿维尼翁声称，以往从未有过这样的传染病。他写道，“早先的瘟疫只在一个地区内传染，这次瘟疫却使所有人在劫难逃；某些患者原来尚可救治，如今却无一人能有生路”⁸⁷。确实，1347—1350年的黑死病蔓延极广，只是东欧的个别内陆地区，以及西欧的贝阿恩、鲁埃格、伦巴第和尼德兰等地区才在一定程度上幸免于难，这些地区不是由于它们远离瘟疫传播的主要路线，环境隔绝

对它们起了保护作用，就是由于那里的经济特别繁荣，居民的饮食条件较好，因而具有较强的抵抗力。

黑死病危害之严重与若干世纪以来由于经济危机而加剧的一般疾病完全不能相比。从南到北袭击法国全境的第一次疫病流行(1348—1349年)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在不同地区，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一半有时乃至80%或90%的居民因此丧生。恐怖笼罩着法国，笼罩着欧洲。黑死病不再离开西方，反复骚扰这一地区，这里才刚停息，那里又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一场来势凶猛的新浩劫从此开始，其特征与一千年前出现的那次浩劫几乎如出一辙。

根据比拉邦医生所作的精细调查，人们一眼便可看出，直到1670年以前，疫病似乎从未停止。1670年将标志着黑死病的彻底绝迹(50年后，1720至1722年，残酷的瘟疫在马赛地区再次流行，但这一次是经由海路传来的，只触及法国南部⁸⁸)。实际上，疫病的袭击时断时续，其中有间歇和缓和的阶段，每隔五年、八年或十年，便向别处转移。除了1629至1636年这段时间，它从未在我国的全部领土上同时蔓延。它像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不停地来回转圈。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危害逐渐减少：在17世纪，疫病只使正常死亡率平均提高5%至6%⁸⁹。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猖獗了几个世纪以后，到18世纪时，它在欧洲彻底消失了⁹⁰。这种情况与六百年前没有两样，可说是相同过程的一次惊人的反复。一些疫情严重的城市或地区当时采取了严厉的隔离措施。这些措施尽管看来行之有效，但其作用显然不宜夸大。黑死病的历史似乎服从于长时段的生物周期。

综上所述，“黑死病”的出现和蔓延是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一场人类浩劫的开端。但是，不论黑死病的袭击何等猛烈，持续的时间多么长久，它毕竟受到传染病活动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可以肯定，人口亏欠的数额巨大，但灾难一过，生活又恢复正常，伤口逐



黑死病的蔓延(1347—1351年)

(参见让·法维埃：《中世纪的法国》，1983年版。)

渐愈合，鳏夫和寡妇迫不及待地结合为夫妻(让·德·维内特说，“幸存的男女纷纷重建家庭”⁹¹)，出生率不断回升。在勃艮第的日夫里，每年成婚的男女通常不过15对，而在1349年，结婚者竟有86对⁹²。

然而，除了黑死病的祸害以外，还要加上旷日持久的战争破坏。显然，被称为百年战争的这场战祸不可与现代冲突同日而语。应该说这是“长达百年之久的对峙，而不是历时百年的战争”⁹³。其中既有政治冲突，又有社会动乱，并且时断时续，不乏休战和谈判。平均每五年中有一年进行战争。然而，军队或者因在驻地就食而四出劫掠，或者为使敌人得不到粮食供应而滥施破坏，造成农村十室九空。农民一有可能便逃往城市，置身高大城墙的保护之下。危险过去以后，他们再重返家园。或如查理七世的编年史官托马斯·巴赞所说，他们只是“在城市周围或市内”“偷偷摸摸地”耕种小块的土地，一遇紧急情况，便赶紧进城躲避⁹⁴。就这样，许多农田被荒废，战争恐惧加上人口骤减使荒地成倍增加。在回顾“圣通日地区”往事时，布勒依杜帕济贫院院长菲利普·德·拉博瓦西埃尔1441年写道：“除城市和要塞外，到处就是不见人迹的荒野……好端端的领主宅邸以及庄园和领地，如今长满了茂密的荆棘”。1472年，就在同一地区，还可以听到“昔日葡萄满枝，而今满目疮痍”⁹⁵的哀叹。

在法国各地，人们可以举出上千个类似的例证。当然，就全国而言，“除战乱不止的巴黎地区或兵痞横行的普罗旺斯这些地方外，只有很少的地区长期蒙受战争的蹂躏”⁹⁶。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地区能完全不受战争的侵扰，即使在通常免遭兵灾的中央高原——查理七世与勃艮第公爵作战时将在中央高原召集整装待命的援军——1356年也曾有努瓦尔亲王率领的英军过境。佛罗瓦萨尔写道：英国人“以前从未进入过奥弗涅地区……他们发现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使他们大开眼界”⁹⁷。

在巴黎，阿马尼亚克和勃艮第的部队大开杀戒，互不相让，使首都陷于血雨腥风之中。1418年5月，当勃艮第部队进占首都时，巴黎全城堆满了阿马尼亚克士兵的尸体，“像死猪一样被扔在泥地

里”⁹⁸。巴黎人噩梦缠身，用1346年出生的诗人尤斯塔什·德尚的话说，这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世界的末日……即将降临”⁹⁹。彼特拉克在好人约翰统治末年(1360年)重访法国，他不由得深感震惊：“对于往昔所见，我几乎已难辨认。富甲天下的王国只剩下一堆灰烬；除了城墙和堡垒庇护的房屋，找不到一栋完好的建筑。巴黎曾是一座如此伟大的城市，如今又去何处寻觅？”¹⁰⁰

然而，几经战祸的巴黎并未就此一蹶不振，直到14世纪末及此后，它仍是“为欧洲一切自命高贵的人设计服装样式，确定社会礼仪、生活方式和爱好情趣的中心”¹⁰¹。就是说，它是一座大都会，不过是在战争环境下苟且偷安、纸醉金迷和腐化堕落的都会。这种情况与阿尔伯公爵于1567年抵达的尼德兰战时首都安特卫普，或与法国前不久进行“越南战争”期间的西贡，多少有点相似。

在这一长期的苦难结束时，法国的人口大大减少。如果说在1328年时，王国的居民为2 000万至2 200万，到1450年时，算来至多就只剩1 000万至1 200万，这个数字大概略高于查理大帝时代。这是多么惊人的衰退啊！

再谈经济世界

1350年至1450年间的人口低落——两个年代都是粗略估计，或如人们所说，只是“大体合理”——并非仅仅涉及法国。翻开我们拥有的最好的通史浏览一下或在读了本书前面的有关章节后，你肯定已经注意到：有关繁荣或衰退的阐述对整个欧洲全都适用。法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处在周围电场的感应作用之下。主要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百年战争并不只是——怎么说呢？——我国一国的事，而是一场席卷整个大陆的传染病：它在欧洲生长萌发，展现自己的力量，其表现形式几乎千篇一律。无论在什么地方，武装团伙肆无忌惮地进行劫掠，只听从其长官——雇佣军首领

——的命令。“雇佣军可为这个或那个王公出力卖命，只要发放军饷就行。让·钱多斯、罗贝尔·诺维尔和约翰·法尔斯塔夫站在英国人的一边，杜盖斯克兰、格雷沙和塞沃尔为瓦卢瓦王朝效力，霍克伍德为罗马教皇服务，科洛纳受威尼斯差遣，坎波巴索和维朗德朗多出尔反尔，随时投靠任何一位主子，弗朗索瓦·斯福尔扎则自己当家，自谋利益”¹⁰²。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的历史学家只说法国蒙受百年战争的灾难，那就未免言过其实。难道唯独法国而不是法国连同欧洲一起受害？难道相同的危机信号不是到处可见？货币陷于极度匮乏；金银比价经常出现意料不到的变化¹⁰³；在工资和“工业品”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谷物价格的下跌使领主和农民的农业收入普遍减少。比价失调的现象使城市处于越来越有利的地位，因为城市经受苦难的能力强于农村。总之，从波兰到大西洋，从北海到西班牙，欧洲的历史以一个整体的面貌而出现。

但是，只是当欧洲经济世界改变发展方向，出现断裂和中心偏移时，才可能在整个欧洲发生全面的衰退。这种中心偏移现象的确发生了。

在一片欣欣向荣的100多年内，经济世界的中心曾停留在由四个城市组成的喧闹的香巴尼交易会的四边形里。天平架在这一中心的两侧左右摇摆。一端的托盘是尼德兰，另一端是意大利北部，后者由威尼斯、米兰、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城市所组成，恰如几个当今的“跨国公司”。北面的尼德兰是毛纺工业区，南部则是商业和银行业的聚集区。后一个托盘显然比前一个重。香巴尼交易会的衰落便成为一个转析点：货物流通的繁荣局面没有超过13世纪末期；交易会的转期付款，即信贷体系，至迟维持到1320年。从1296年开始，便有一些佛罗伦萨批发商移居里昂¹⁰⁴。根据税收统计，“交易会的收益在13世纪每年平均约为6 000至8 000里佛，至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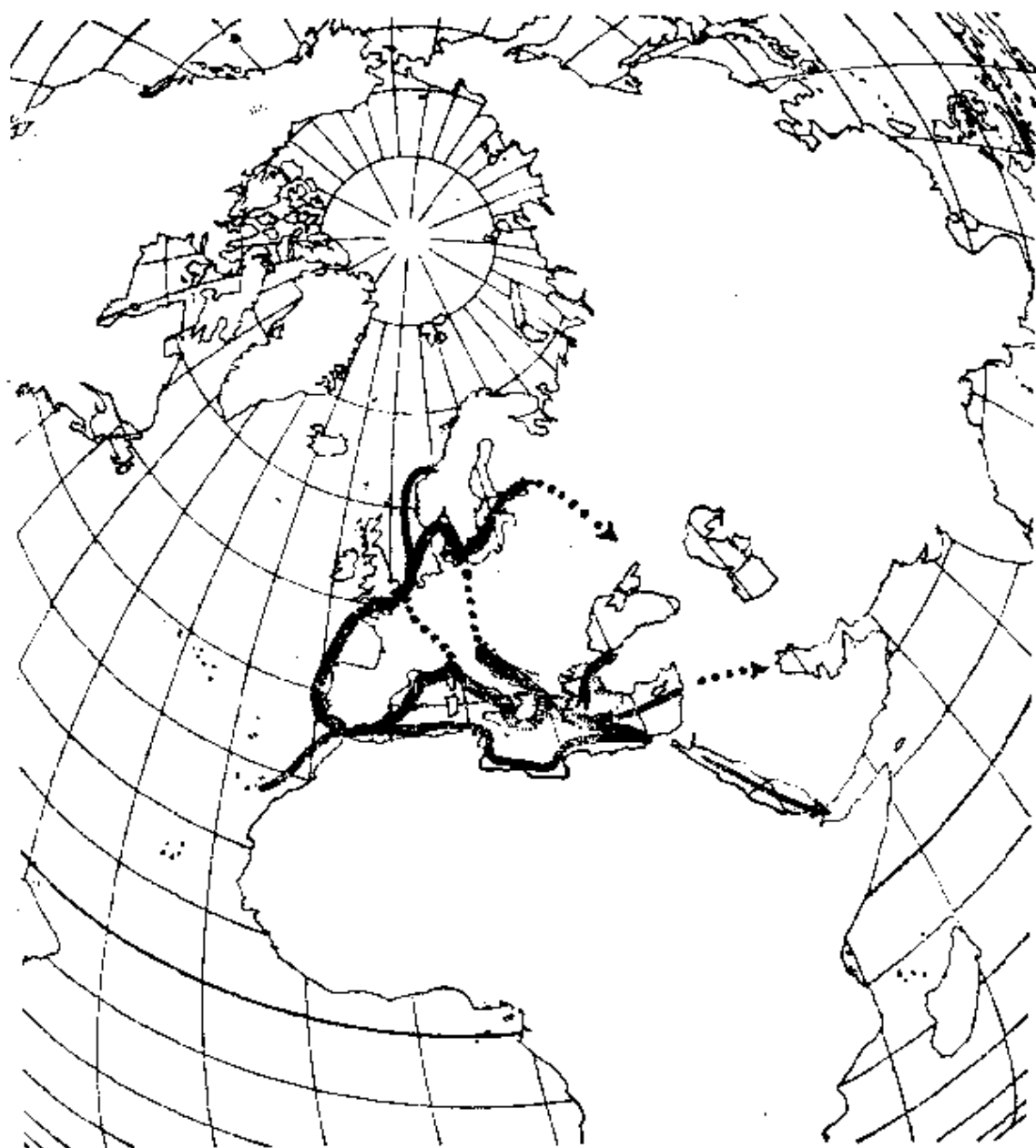
世纪初下降为1700里佛,1340年勉强回升到2630里佛。”¹⁰⁵。

总之,无论对法国还是欧洲来说,这都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实际上,意大利于1297年成功地开辟了经由直布罗陀海峡抵达南安普敦、伦敦和布鲁日的定期航班,最初使用的是热那亚的大帆船,地中海的其他船只随后相继出现(威尼斯的帆桨船于1317年才开始从事直达航运¹⁰⁶)。与此同时,经由阿尔卑斯山路进行的陆上运输活动逐渐向东转移:辛普朗山口、圣戈塔山口和布伦纳山口取代了经由塞尼山和大圣贝尔纳隘口的传统商道。法兰西地峡并没有就此停止发挥作用,但它的确遇到了挑战,并且已下降到次等地位。德国银矿的开采大概是推动陆上贸易通道偏移的动力之一¹⁰⁷。

在香巴尼交易会推动下经济日益兴旺的法国——至少法国的部分地区,例如罗讷河谷、巴黎盆地中部和东部——结果被切断了电路,几乎被排斥在欧洲资本主义的主要通道之外。这一局面具有长时段特征。资本主义蓬勃兴起的地区恰巧团团环绕在法国的四周,并与法国保持一定的距离:陆上通道横贯德国,地中海船队的航线虽然也与马赛和艾格莫特擦边,但主要经由巴塞罗那、瓦朗斯、塞维利亚和里斯本,然后穿越加斯科尼海湾,直接前往南安普敦、伦敦和布鲁日。航船通常不在法国的海港靠岸(拉罗歇尔可能属于例外,佛罗伦萨商人在百年战争期间仍留在当地,保护这座城市)¹⁰⁸。海上和陆上的贸易路线就这样在法国四周绕了一圈。

这些新的联系照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才逐渐形成体系。然而,随着天平的摆动,意大利渐渐占了上风。因此,正如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尽管在阴暗的、风雨飘摇的气候下,意大利居然“渡过了难关”。

从此,亚平宁半岛的各个城市间展开了紧张激烈的争夺霸权的斗争。每座城市都已成为与国际经济有着密切联系的重要中



1500年的欧洲经济世界

国际贸易沿着地中海(并由此延伸至印度洋)和伊比里亚半岛绕一圈,进而抵达北海和比利时。由虚点表示的陆上交通取道法国以东的德国。

心。在这以前,佛罗伦萨仅有印染业,只从北方购入粗毛料从事染色,如今引进了毛料制造,迅速发展起毛织业¹⁰⁹。佛罗伦萨不但在毛织业方面突飞猛进,并且在更冒险的银行金融业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为了与法国一决雌雄,它打出了英国牌。历来

善于窥测方向的热那亚率先开辟了经由直布罗陀通往北方的海上航线，从此建立起经常的南北联系。蒸蒸日上的米兰提前几个世纪开始了工业革命¹¹⁰。也许由于遇到了危机（危机确实存在着，甚至对得天独厚的城市也是如此），这场革命终于功败垂成，但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它毕竟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威尼斯最终战胜了全部竞争对手，它凭借的是商业资本而不是银行资本的力量。我将把它称之为老式的、传统的资本主义。虽然如此，在1340年蒙古人入侵欧洲前，推动国际经济取得更大成就的动力当时可能还来自欧洲以东的黑海和丝绸之路，后来则来自东地中海，特别是埃及（它是印度洋的胡椒和香料，以及尼日尔金砂的集散地）。威尼斯于14世纪40年代打开了东地中海和埃及的大门。此外，在地中海、里海和中东市场上，热那亚和威尼斯将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夺战。战斗长期处于胶着状态，只是到14世纪末，基奥贾战役（1383年）的胜利才使威尼斯把竞争对手热那亚甩到身后，并且确立了稳定的优势¹¹¹。威尼斯的优势使法国长期被排斥在外，处于次等地位。直到欧洲摆脱危机以后，法国的境况却依然如故。

欧洲以及法国的命运

通过以上的阐述，我希望可以说明，自10世纪或11世纪至15世纪中叶，法国和欧洲的命运已不可逆转地决定了，这几百年时间构成了我国历史的核心。

第一条理由，当时的欧洲正处在形成和巩固的过程中。确实，没有欧洲，就不可能有法国。欧洲是我们的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条件。我们在欧洲各国的包围中生活，比处在罗马帝国的卵翼之下自然要好得多。欧洲在我们的周围不断巩固和加强。我们身不由己地同时受到邻国的看护和监视。

第二条理由：欧洲之成为一个整体，仅仅因为它同时也是基督教的世界；但是，基督教世界和欧洲必须在面对另一个世界时，才能显示其特性。任何一个集团，不论其性质如何，唯有与第三者进行对抗，才能顺利形成。伊斯兰世界以其独特的方式促进了欧洲的诞生。十字军东征的重要意义正在这里。

第三条理由：经济、政治、人口、文化等因素都为欧洲的兴起奠定坚实稳固的基础，赋予它克敌制胜的力量，并且为它提供足以经受各种考验的健康躯体。

第四条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我曾指出，欧洲的勃兴最初以法国为中心。香巴尼交易会给法国带来了一个世纪的相对繁荣。但是，在一百年时间结束后，海洋战胜了陆地，法国从此再也不能真正位居欧洲经济的前列。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它被困在一个圆圈的中心，这个圆圈从意大利北部出发，经直布罗陀抵达尼德兰，随后又从尼德兰取道德国和阿尔卑斯山的陆路，折回意大利北部，与法国毫不搭界。法国因此置身事外，看着别国取得成功。它至少有两次曾经动心，企图改变这种状况。1494年9月，查理八世越过阿尔卑斯山征讨意大利，可惜未能得手；1672年，路易十四和柯尔倍尔率军进攻荷兰，仍无功而返。欧洲团团包围着法国，限制了法国的扩展，决定了法国的命运。假如法国在1494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就着手远渡大西洋，甚至在1672年仍然念念不忘美洲，法国的命运或许会大有改观。可惜这一切只是想入非非！但是，人们在回顾历史时设想另一种可能，不就更容易懂得，历史早已无可挽回地写成了吗？

二、1450至1950年：一条 异乎寻常的上升曲线

把1450至1950年这连续的五个世纪当作一个整体，当作单一的运动，同时再用拇指推上一把，使它一直延伸到今天，我们就要强迫自己暂且忘记我国经历过的众多不幸和灾难，透过一般编年史的表象，观察历史的深层。长达数世纪的时段可为我们提供最好的视野，也是进行历史总结的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

当然，人口的现实仍将是我们要考察的首要问题。我并不认为人口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我愿重申，归根结蒂，人口是与历史有关的各种力量——稍纵即逝的、经久不衰的、不堪一击的、异常强大的……力量——的忠实记录。人口是所有各种力量的综合和排列。皮埃尔·肖努说得对：“在历史学家看来，人口指数是计量器、生命线、吃水线……有人才有历史”¹¹²。

因此，不妨作一非分之想：假定我们需要的有关人口、生产、流通、价格运动等各种数字、各种曲线全都凑齐，并且每个项目都根据不同阶段分门别类，由此必定可以看到，尽管确曾发生过各种意外事件，法国却从未经历过任何可与1350年至1450年的浩劫相提并论的天灾人祸。从那时以后，法国没有受到任何致命的打击，没有陷入致使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的居民丧生的骇人听闻的灾难深渊。今天，要出现如此规模的惨祸，必须设想一场核战争——这种设想并非无中生有——把世界推向末日的边缘。

与1350至1450年间的灾难相比，我国发生的宗教战争（1562—

1598年)以及历次对外战争——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世统治期间及第二帝国期间的战争——都只能列为次等的灾难。如果我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算进去,一些历史学家和许多强词夺理的论战家将会提出抗议,并且会说这是亵渎神明和哗众取宠。他们的愤慨可以理解,但我坚持自己的看法。他们当中不是有很多人,或出于习惯,或贪图省事,认为战争是世界历史不可抗拒的节奏吗?战争造成了累累创伤,使生灵惨遭涂炭。这不幸为他们所言中,并且我们越是接近当代,所要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然而,这些创伤不论多么严重,迟早都会愈合。百年战争才刚结束,就为“漫长的16世纪”(1450—1650年)打开了通向繁荣的大门。在这期间,无论在法国本土还是在法国以外,人口总数都恢复到原有的规模。此外,还应忆及的是,虽说1350至1450年的大萧条使法国跌进了地狱,百年战争却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英国不应单独承担这场惨祸的全部责任。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出生率的隐蔽的下降,饥馑,经济的崩溃和退潮,最后还有黑死病的肆虐。

宗教战争在我国显然不能与百年战争相提并论:首先,它延续的时间要短得多,不是一个多世纪,而是36年(1562—1598年),何况在这30多年中,战火还有停息的时候。此外,敌对行动从未同时遍布王国全境(参阅第一编第一章第86—87页间的插图)。西班牙人远没有像英国人在百年战争中那样穷凶极恶,我们对他们未免责之太荷。最后,国家的经济健康状况仍然良好或相当良好。弗兰克·斯普纳¹¹³、亨利·拉佩耶尔和我本人¹¹⁴很早就指出了这个事实,但未被史学界所确认。历史著述不免把某些神话奉为不可更改的信条。尽管如此,对欧洲居民史了如指掌的罗热·莫尔斯神父在他的鸿篇巨著(1954年出版)中指出:“从人口角度看,宗教战争造成的危害并不像人们所渲染的那么大”¹¹⁵。

但是，我并不是要缩小宗教战争的影响，就个人而言，我对这些内战深恶痛绝。我毫不费力地可以想象1562年新教徒攻占里昂以及1569年至1570年夏第三次战争期间科利尼“以退为进”、“窜扰全国”所带来的破坏和痛苦：“数千名士兵丢盔弃甲”，沿途大肆劫掠，企图“重整旗鼓”¹¹⁶；亚历山大·法尔奈兹自尼德兰两度长途奔袭，迫使亨利四世放弃对巴黎（1590年）和鲁昂（1592年）的围困。但是，我在评判真理时所依据的是我自己的标准：在这30年的宗教战争期间，法国的人口似乎并未下降，因而与真正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完全不能相比，后者在德国历史上留下了骇人听闻的斑斑血痕。

对亨利四世在国外进行的战争，或对大革命和帝国时期的战争，也可作同样的认识：法国的人口又一次弥补了自己的损失，并且重新呈现出增长的趋势。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情形也大致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法国伤了元气，丧失了150万至180万人口，而且都是年轻力壮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损失估计约为60万人死亡。1911年的法国有3960万居民，1922年的人口总数为3920万（包括阿尔萨斯与洛林的171万居民）；1936年为4190万，1946年为4050万，1983年达到5460万人。

根据以上的数字，如果读者把个人的感情搁置一旁（这当然很难做到），他就必定看到，15世纪以来，尽管出现了战争、其他不测事件和陷阱，一股深层的力量正促使法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口增长繁衍。这股力量犹如滔滔江水一往无前，使法兰西能够胜利地克服各种障碍、考验和灾祸。皮埃尔·古伯尔说得好：“人口增长的‘真正的’秘密，很可能来自人的求生能力”。¹¹⁷这正是我想提出的问题。

首尾相接的几个阶段

概括起来，我们可以把这500年分为四个阶段：1450至1600年，法国差不多（只少不多）恢复到了1350年以前的人口水平；1600至1750年，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态，至多有缓慢的进展；1750至1850年，上升趋势相当明显，随后又渐次减弱，但从未消失；1850年以后，人口继续增长，但由于医疗事业和公共卫生的进步，实行避孕和外国移民的涌来，情形已有所不同。最后一个阶段当另作别论，我们这里将只对前三个阶段进行考察。

1) 1450至1550—1600年

早在所谓“地理大发现”以前，即1492年哥伦布抵达美洲和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经由好望角返回欧洲以前，人口的第一次迅猛增长已经开始。同样，在地中海，基督教世界受到土耳其人的排挤，并于1571年通过勒班陀战役的辉煌胜利而重占上风，也都是人口增长开始以后出现的事。此外，我们也不可认为，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向西欧输出小麦和黑麦对人口增长曾起过推动作用；因为阿姆斯特丹成为波罗的海重要的谷物集散市场只是1540年前后的事。西欧仅在出现了人口巨大增长后，才需要别人来养活自己。

结论是：法国和西欧（后者的人口也在增长）出现复兴的原因要从法国和欧洲的内部去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内因论者。

有人或许会说，法国的人口在跌到最低点以后，又遇到了和平的有利环境，当然会自动重新走向高涨。人口锐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当时，居民是那样稀少，以至树木和荆棘再度占领了以前属于耕地的广阔空间。到处一片荒凉景象，只是严重程度略有不同而已。诺曼底三级会议的一位议员1484年说：“从迪耶普到鲁昂……沿途道路难认；除横行乡村的盗贼外，再也见不到人烟”¹¹⁸。

在瓦兹河和马恩河之间(那里的战争蹂躏尤其严重),不少村庄、村落和农庄已沦为废墟。进行重建,离不开资金、人力和时间。有时需要一个世纪才能恢复元气。业已荒芜的土地往往由领主收回,但要恢复昔日的风貌,重建房舍及附属建筑,再次进行耕作,却很难找到愿意承租土地的农民。领主为此不得不向农民或农民集体提供更加有利的、长时限的租地条件。

在荒无人烟的朗格多克,人们见到同样的景象:常绿灌木稀稀落落地覆盖着多石的丘陵,成为野兽充斥的场所。“塞文山区的棕熊成群结伙地来到埃瓜勒和埃斯佩鲁的山坡地上安家落户;鹿群出没在灌木林和葱绿的橡树林中;科斯高原满是狼群;山鹑同母鸡一样到处可见;直到16世纪初,农民仍有狩猎的完全自由,猎物资源简直永不枯竭”¹¹⁹。一些农户在长辈的主持下进行联合开垦,全靠人多势众,使耕地逐渐恢复地力:“人们以不受饥寒为满足。大家吃同样的面包,喝同样的葡萄酒”¹²⁰。后来,奇迹终于出现:人口恢复增长,增长速度之快使当时的人感到惊奇。朗格多克在临近16世纪中叶时,“人口繁殖就像谷仓里的老鼠一样迅速”¹²¹。

法国各地当时都是这种情景。在塞纳河畔巴尔地区,1477至1560年间,“荒草、荆棘和灌木在犁头锄镐面前纷纷退却”;麦田、葡萄园和牧场重又铺满大地¹²²。房舍建筑与作物一起显示出农村的经济兴旺。一些教堂得到修复,另一些教堂则开始兴建。巴尔城的圣艾蒂安教堂于1505年破土动工,1560年始告完成。位于吕米伊附近的教堂规模稍逊一筹,也于1527至1549年间建成¹²³。更往远去,在科斯地区的圣昂托南,自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出现了真正的建筑复兴的繁荣景象¹²⁴。就这样,伴随着人口的增长,新教堂和新房屋接二连三地兴建。1572年前后,布朗托姆认为法兰西已经“人满为患”¹²⁵。人口高涨的浪潮席卷整个欧洲,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莫不如此,在德国,巴伐利亚的人文主义者阿旺蒂努斯提到,

当时出生的人如此之多,简直就像“果树开花一样”¹²⁶……甚至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也受到了人口增长浪潮的冲击¹²⁷。

我们回过头来再谈法国。人口增长最初呈不可遏制之势,随后便有所减缓,甚至出现了停顿。按照里沙尔·加斯贡的说法,“16世纪之春”大概在1520年后已经后劲不足。从此,物价开始上涨,工资跟不上物价的增长,生活水平每况愈下;人口可能已经太多了。从表面上看,这一现象的确有点反常:在14至15世纪的大衰退时期,一方面人力不足,土地荒芜,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却相当低廉,城乡居民的食物较为充足¹²⁸。而在此之后,不仅面包和葡萄酒变少了,甚至在饭桌上肉食也不多见。到16世纪中期,即1550年至1560年,又出现了为期10年的经济萧条,大体上相当于亨利二世的统治期间(1547—1559年)。

法国人口正处在恢复原有水平的过程中,但这一过程结束的具体时间却无法确定。约在1550至1570年间,人口数量可能与两个世纪前不相上下。皮埃尔·肖努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用了补偿、回收、恢复原有平衡等说法。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纯粹出于修辞的考虑,而应认为这是他着手解释的开始。肖努其实是想承认,恢复人口平衡是自动实现的,这是人的生命活力对前一个时期的混乱和灾害的压抑作出的自发反应。

生命活力究竟是什么?这是问题的基本所在。了解居民人数是否达到原来的水平,具体在哪一年达到,究竟在1550年或1600年,这些都并不重要。由于我们对当时人口的确切水平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这一问题显然还有讨论的余地¹²⁹。确实,重要的是要弄清人口增长的推动力是什么,因为无论如何,增长毕竟是个事实。1350年至1450年,化脓的伤口得到了复原和愈合。人重新驾驭了历史。究其原因,这可能是由于灾祸(黑死病、流行病、歉收、饥馑)的减轻,由于发现了新的食品来源(格陵兰岛取之不竭的渔业

资源,波罗的海的粮食,荞麦种植的推广),由于经济生活普遍的蓬勃发展(厄尔·杰斐逊·汉密尔顿反复指出,居伊·博瓦同样认为,16世纪的任何创伤都是依靠自身力量治愈的)¹³⁰。最后,还要归功于美洲贵金属的源源流入,活跃了上层的经济领域,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

2) 1600至1750年

1600年以后,人口仍在继续增长,尽管增长势头已有所减弱。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人口始终保持微弱的上升趋势,增长率几近于零。与此同时,经济生活放慢了节奏,没有出现任何重大的技术革新,并经历了一系列考验:1630至1631年、1640至1652年、1661至1662年、1693至1694年以及1709至1710年¹³¹发生的五次饥馑和瘟疫遍及整个王国,造成了严重的危机。最后一次灾祸留下了令人不寒而慄的恶名。但是,一切迹象表明,前一次灾祸(1693至1694年)似乎并不比后一次轻些。所有这些灾祸都使人口蒙受沉重的打击。

1640至1652年的那场灾难发生在投石党运动(1648—1653年)之前,并几乎贯穿着投石党运动的全过程,致使这场激烈的内部争端的危害尤其严重。依我之见,法国在这十余年的灾难期间蒙受的人口损失比在经济繁荣时期发生的宗教战争更加惨重。在投石党骚乱期间,王国的经济环境糟到极点。城市不得不对躲避士兵抢劫、寻求生计的农民大开城门。在兰斯,携带奶牛“进城逃难”的四郊农民每天夜间在关城门时出城,再在清晨开城门时进城,以便利利用夜晚溜回自己的庄园去取饲料¹³²。不但在兰斯,而且在科尔比,在圣康坦,在佩罗纳……都是这种情况。城市为此背上了不堪忍受的包袱,乡村则饱受蹂躏,田地荒芜,庄稼失收。

成人和孩子全都经受苦难的熬煎,甚至未出生的胎儿也不例外(饥馑往往使妇女的荷尔蒙周期发生紊乱,列宁格勒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被围困期间的情形足以为证)。艾马努埃尔·勒鲁瓦·拉杜里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马尔萨斯的生命节奏。儿童的死亡率高得惊人。恰如皮埃尔·古伯尔所说：“在两个孩子中，只有一个能够长大成人”¹³³。死亡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正像教堂是村庄的中心一样¹³⁴。平均寿命可能还不到30岁。

如果对称果真起作用的话，临近17世纪中叶时就可能出现与1350年类似的那种灾难和一落千丈的局面：同样的前提，同样的结局。然而，灾难并未重现。没有出现崩溃。总的来说（在不同地区之间，如在瑟堡与阿尔萨斯或普罗旺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有时甚至呈现对立的发展趋势）¹³⁵，“局面异常稳定”，尽管“人口波动犹如波涛起伏”，有时还相当猛烈，但这些起伏可以互相抵消¹³⁶。平衡似乎总在一个最佳人口总量的上下得以恢复：每当最佳人口值被超过时（出生率始终居高不下），就会出现危机，“成千上万的穷人因此丧生”。随后，出生率明显超过死亡率的现象又会重新出现。人口的“下限”最后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它经得起各种考验，包括黑死病、饥馑、投石党运动以及后来长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我不认为这一战争具有灾难性的后果）。还有在废除南特敕令（1685年）后新教徒的大迁徙（约为20万至30万人）。

为什么会出现人口的相对平衡呢？这里的原因错综复杂，并且因地而异，仅以新大陆引进的新作物为例，它们的推广就很不平衡。玉米和土豆在18世纪、甚至直到19世纪才在全国各地广为种植。但是，它们在某些地区的普及要比另一些地区早得多。法国西南部很早就栽种玉米：1640年前后，玉米已在图卢兹和卡斯泰尔诺达里的市场上标价出售¹³⁷；玉米于17世纪末在贝阿恩地区大面积种植，“居集约型作物的首位”¹³⁸。它在当地可能已是“平民百姓的主食”。同样地，在科曼日地区，玉米既是农业工人和壮工的食粮，也是彻底改变鹅、猪饲养方法的手段。

与玉米在西南部所起的作用相同，荞麦在布列塔尼逐渐成为“小民百姓”的食粮。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在整个17世纪，布列塔尼得以出口剩余谷物¹³⁹。

在法国东部，荞麦所占的比重很小，后来是土豆在那里得到了推广。1660年前后在多菲内和阿尔萨斯，1680年在洛林，早已在园地落户的土豆改在大田种植¹⁴⁰。至17世纪末，它在阿尔萨斯已被用来交纳什一税，种植面积之广由此可见一斑。在下一个世纪，自1740—1750年开始，即比法国其他地区早50余年左右，这种“现成的面包”在当地已代替谷物，成为主食，尽管小麦的种植面积并未因此减少。事实上，对肥料要求不高的土豆取代了休闲地。从此，所有的可耕地每年都得到了种植。艾蒂安·于雅尔认为，“土豆逐渐在法国全境的普及标志着阶段性的饥馑的结束”¹⁴¹。

法国和欧洲经济状况良好的另一个原因是从新大陆源源不断地运来白银。历史学家们曾长期认为，“天赐财富”的到来从1600年起陷于停顿，或至少大为减少——这是厄尔·杰斐逊·汉密尔顿振聋发聩的研究成果¹⁴²。皮埃尔和乌盖特·肖努随后又继续进行了研究，把日期推迟到1610年¹⁴³。最近，米歇尔·莫里诺依据荷兰报刊提供的材料，更把这一至关重要的日期下延至1650年¹⁴⁴。可是，这里有一个较长的延展期和一个相当短暂的中断期：其实，新大陆的白银输出在1680年前后又重新活跃起来，因而白银的匮乏只持续了30多年，虽然在这期间，这已对欧洲经济造成了危害。

如果据此把1650至1680年这一时期定为可能的中断期，我们将可以大胆地设想，以这30年时间为界，把1600至1750年的历史阶段分成两段：首先是1600至1650年，共50年，当时的经济生活虽然谈不上光彩夺目，但始终保持增长的势头；接着是1650至1750年的经济不景气，为期一个世纪，竟比路易十四亲政的时间（1661—1715年）还长。

17世纪前50年的经济衰退可能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么突出。否则,就法国情况而言,又怎么解释黎塞留在第二次就任首相职务(1624年)后,能够两倍、三倍地增加税收这个谜呢?只是在国民生产总值(即纳税人的数目和他们的收益总额)不断上升,或至少维持原有水平的条件下,税收的螺丝才可能拧紧。

从法国整体情况看,自投石党运动发生(1648—1653年)后,物质生产和经济形势便不断恶化。物价波动幅度之大简直骇人听闻。皮埃尔·古伯尔为此指出了1656—1657年至1667—1668年间所谓“转折周期”的荒诞不经,其运动曲线不是扶摇直上,就是急骤下降¹⁴⁵。然而,这些紊乱的运动所产生的后果几乎与连年歉收造成的灾难相同。借用维托尔·库拉所喜欢的形象来描绘¹⁴⁶,农民就像蜗牛一样,遇到意外情况便把身体缩进外壳,而当一切归于平静或似乎归于平静时,又会把身体从外壳里伸出来。实际上,物价从长期看趋于下跌,但是,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难道对平民的生活水平总是不利的吗?如果弗兰克·斯普纳的计算不错,当时(1701—1760年)国民毛收入仍维持在同一水平上,即年收益在12亿或15亿里佛之间¹⁴⁷。临近1700年时,法国的居民人数约为2 000万,超过了卡尔·尤利乌斯·贝洛赫所确定的当时世界强国的水平(1 700万)¹⁴⁸。

3) 1750至1850年

在这个异常动荡的历史时期的中期,法国正值大革命和帝国(1792—1815年)的急风骤雨;对这100年时间,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要比前一历史时期要确切得多,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资料的质量也不断得到改进。在人口问题上,我们同样有卓越的向导¹⁴⁹和出色的说明¹⁵⁰。

我们这里不必过分纠缠细节(尤其对资料的价值和使用不加深究);同样也不必对这一历史阶段进行过细的分期。简单说来,

1743至1770年人口迅速增长；1770年至1778年人口过剩；1779年至1787年危机卷土重来（与17世纪的危机相比，症状并不明显，而且相当缓和）；最后，在大革命和帝国的间歇期——当时人口增加不多，但毕竟略有增长——之后，人口便持续上升，直到1850年为止（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法国人口的增长幅度要低得多：1801年至1851年，法国的人口增加了30%，而欧洲增加了50%，英国增加了一倍）。

地区间的差异又一次显得十分突出，但人们毕竟可以认为，法国的人口状况尚属健康，取其整数：1789年为2 630万¹⁵¹；1801年为2 730万；1806年为2 910万；1821年为3 050万；1826年为3 190万；1831年为3 260万；1836年为3 250万；1841年为3 420万；1846年为3 540万；1851年为3 580万。因1834年霍乱流行，1831年至1839年间的人口增长一度陷于停顿，但增长趋势仍是主要的事实。

这个事实难道不有点让人觉得奇怪吗？不是有许多原因可能导致人口的全面衰退吗？这些原因是：“旧制度”的危机；1788年和1789年的接连歉收（这对“旧制度”的结束曾起了一定的作用）；从1792年4月宣战到1815年为止接连经受的各种考验：除人口外流（总数可能达18万）外，还有战争伤亡（损失人口120万，加上残酷的旺岱战争期间死亡的40万），“财产分布的变化，提高社会地位的新可能，心态的变更，法律的革新，所有这些因素都对当时的人口产生了影响，其后果甚至一直延续到1815年以后”¹⁵²。

尽管如此，法国居然克服了重重障碍，安然渡过复辟王朝、七月王朝以及短命的第二共和国（1848—1852年）的艰难岁月，人口有增无减。更使我们感到大惑不解的是，历史学家一致公认，1817至1851年间正值康德拉季耶夫周期^①的下降阶段，也就是说，透过

^① 即长期缓速经济周期，得名于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由物价、生产和商业活动的多次上下波动构成，每个周期为50至60年。——译者

上述三种政体的历史，可以看到经济生活的一个不间断的、甚至是渐进的衰退过程，直到1847—1848年出现深刻的危机为止。在“旧制度的危机”的各种表现形式中，这一范例最具有典型性：由农业发生故障而引起的衰退——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可能在整个经济的内部发生爆炸¹⁵³。它无疑是旧式危机中最后的一次，标志着旧式危机到此结束。随后出现的其他危机性质迥然不同，它们发生在实现了工业化的法国，法国的人口仍将克服障碍和困难，保持上升的趋势。

传统的历史学家认为，1750至1850年不可能由同一个模子铸就的。在政治上，这个世纪被“旧制度”的覆灭拦腰切断；在经济上，它被工业革命的起步一分为二。人口史学家相反却说，从路易十五到路易·拿破仑（先当总统，后当皇帝）期间，法国人口的发展具有某种同一性。如果听从人口史学家的教诲，人们将会确认，18世纪末年已在某种程度上向现代化迈进，而19世纪初却依旧停留于“旧制度”。历史学家安德烈·雷蒙曾一再说：基佐是18世纪的人物，并且是这个世纪最后的一位人物。两种说法虽然不同，但所要表述的却是同一个内容。至于我，我则认为，人口的历史演变位于一般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考察的彼岸：编年史的重大事件对人口运动可能产生影响，但充其量也只是暂时起作用而已。

1850年前的人口演变过程究竟有一种或几种可能的解释？

1450—1950年及以后的人口运动应该被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它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范围广阔的问题，因为这里无疑有一个主导因素：总体运动呈上升的趋势。但是，这里也有一些普遍的和特殊的原因，这些原因又是什么呢？

这些原因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对疾病的控制和食物的改善两个方面。黑死病于1720年已经在法国消声匿迹，并且自1450年以

后，我国的居民对它的抗抵力越来越强。对黑死病已有了适应性和抵抗力，这是个重要的原因。此外，天花也慢慢在减少，至19世纪时已渐趋消灭；卫生状况在19世纪取得了进步；至少从1850年开始，医疗事业更出现了决定性的变革；住院治疗大为改观；社会保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大众造福不浅。以上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里程碑。

但是，还应该指出，食品供应也发生了决定性的变革，其意义之重大如果不占第一位，也应占第二位。借用德国人的一句老话：“饮食乃健康之本”。饮食确实逐渐得到了改善。演变的过程是缓慢的，但变化毕竟是发生了，食品改善已成为人口水平得以提高或维持的基础。进步的确十分缓慢，因为法国和欧洲基本上同属农业地区，农田、作物、剩余农产品等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有所改观。在1200年前的法国，人们播下一粒种籽，可以收获三粒粮食；1300至1500年，播种与收成之比上升为1:4.3；1500至1820年间，则达到1:6.3。这些平均值是根据B.H. 斯利舍尔·冯巴特的计算得出的，应该说是完全可信的，虽然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过分偏低。但是，在三个世纪的时间里，粮食产量毕竟翻了一番以上¹⁵⁴。由此揭示出的一种深层运动，或许可以对许多问题提供解释。此外还应加上从新大陆引进的新作物——这个意想不到的、但却十分重要的因素已在上文谈到——以及外国粮食输入的增加：地中海的小麦早已源源不断地运往马赛（19世纪时，乌克兰将取代地中海东部地区和北非作为粮食供应者的地位）；波罗的海从16世纪下半叶起，开始提供小麦和大量的黑麦；水产品来自北海的渔场，更多的来自格陵兰的渔场；18世纪末，又有美国的小麦和桶装面粉……还要考虑的因素是，在“旧制度”下的法国，生活费用始终不算昂贵，与主要邻国相比¹⁵⁵，粮食供应也比较充裕。

医疗和食物改善的结果，乃是平均寿命的逐渐延长，换句话

说,也就是人口的不断老化。在人口学家看来,变化的开端出现在1750年,随后持续不断地发展下去,直到今天。有些人目前对这一现象感到不安,似乎生命战胜死亡并不是最重要的大前提,并不是进入现代后最令人欣慰的好事。他们对我们说,今后的青壮年将会人手不足,供养不了年老的退休人员。情况果真如此严重吗?须知明天的工业将不会是今天的工业;更何况,我们对就业人口是否会持续减少不能加以肯定,就业者与退休者的年龄界线也并不一定始终停留在今天的水平。

人们往往容易认为,作为不发达国家的剥削者,欧洲占有一个相对优越的地位。依仗这些特权,这些有利条件,欧洲才有今天的强盛。我认为这种想法大体上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应该把话说得婉转些。欧洲的扩张始于十字军东征,接着便是地理大发现,而这种扩张最终导致经常性的、大规模的剥削,却决非一日之功。在很长时间里,欧洲对外移民的数量一直十分有限。更何况,如果保尔·伯罗克的推算是可信的话——我想它们是正确的——在1800年时,欧洲的生活水平并没有超过世界上的其他主要地区,比如说中国¹⁵⁶。只是随着工业化的胜利,欧洲才扶摇直上,才为自己开辟特别有利的未来。姗姗来迟的工业革命既是经济、技术、社会等众多变革的结果,也是知识日益进步、农业效益日趋提高的结果。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个首要的部门至今进步不快,因为这些国家始终因循守旧,停留在农民世代相传的知识和技术水平上。简单地说,欧洲以及位于欧洲中心的法国,只是依靠自身的努力,才取得了缓慢的进展。这样一种婉转的说法可为伦理学留出一点余地:若要取得成功,必须自己发奋努力。

三、最后的问题：医学的胜利， 节制生育和外国移民

不要以为到了1850年，在进入真正的现代后，我们就能取得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可以对历史进程有比以往更加清楚的认识。我们的知识是十倍、百倍地丰富了，但我们的认识并不因此而变得十分清楚。

从1850到1985年，法国的人口、产量、财富总额以及一般法国人的福利和特权阶层的遗产都不断在增加。在六边形的国土上，汽车、公路、铁路和高炉在逐年增加，钢铁、呢绒、棉布和丝绸的产量在逐年提高，大学生人数和全国的人口也越来越多……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改善，国家的纯收入以及“人均收入”不断在增长。按通用法郎计算，即使在我国最偏僻的地区，伐木工、烧炭工、锯木工的工资也不断有所提高¹⁵⁷。我当然不是说一切都尽如人意，一切都公平合理：即使在巴黎，平民大众的生活往往还很艰苦。艰难困苦和奔走告急的事例虽然时有所闻，但生活改善毕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关于以上这些进步，关于我们享有的这些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工业化的欧洲各国无不如此——我以为不必再连篇累牍地详加解释，读者自能参阅附于本书后面的各种图表，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可显示和概括以上无可置疑的进步。在摆脱开这些枯燥乏味的任务以后，我就能轻松自如地着重陈述以下三个问题，这些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问题将能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把我们的注意力

引向当今的现实。

1. 医学事业及社会和经济的综合进步给当今的法国人以及生活在这块得天独厚的土地上的其他居民的生存条件带来了哪些奇妙的变化？

2. 往往招致种种非议的避孕措施的普及和推广在我国社会中究竟起什么作用？

3. 外国移民在我国日益增多，并且在许多方面引起了人们的不安；他们对当前和未来的法国人口平衡究竟起什么作用？

首先我想说明：

1. 在下面的叙述中，我不打算以历史的名义，去解答困扰我们的问题，这段历史或者刚刚过去，或者正在展开，一切尚在疑似之中。我不是政治家或政治决策人，也不是伦理学家。假如决定权掌握在我的手里，我清楚地知道，在应该做什么和可能做什么（几近于零）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可惜的是，法兰西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往往只能逆来顺受。我对此预先表示遗憾。

2. 我想提请大家注意，在讨论以上的问题时，不可被个人的信念所支配。为了认识现时，必须进行科学的观察。但是，由于我们主观认识的局限，客观的现时往往让人捉摸不透。这尤其因为，社会“科学”至今尚不完善，这种情况还会延续很长的时间。

我们怎么可能将道德标准搁置一旁呢？道德标准本能地、顺理成章地干预我们的观察。在数学领域，伦理学当然没有发言权；在物理学方面，它勉强可挤进一些危险区——尽管是异常危险的地区，在生物学领域，伦理学不停地低声抱怨，而且没完没了；在社会科学领域，情况还要糟糕：它抬高了嗓门，尤其当您冒失地接触当今或“未来”的问题的时候。对于昨天的历史，它多少还能调和妥协，但对今天的历史或明天的历史，势必就是各执一词，各持己见。伦理学以及我们的道德观念一起前来出席辩论。我无法把它们赶

出门外，充其量只是试图让它们各就其位而已。

医疗和公共卫生

可以肯定，再没有别的历史能比医学史更加激烈好动。更加可以肯定的是，医学史也最复杂，头绪最乱，最难阐述清楚。或许正像我常说的那样，无论在什么地方，医学史的任何一个特殊领域或局部都拼命要求覆盖通史的全部空间。

今天有许多医生认为，研究昨天的医学既不重要，也没有多少实际价值。如果往后追溯，一直回顾到1945年以前，就简直毫无益处。然而，几十年来广为应用的青霉素，不是由亚历山大·弗莱明于1929年发明的吗？作为抗凝血的天然物质的肝素，“对诊断和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的肝素”，不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瑞典发现的吗¹⁵⁸？这一切都属于不久前发生的事；在昨天的医学和今天的医学之间，确实存在着一条鸿沟，这条鸿沟并且正日益加深。

我在法兰西公学讲课时，一度曾对安布鲁瓦兹·帕雷(1509—1590年)的医学研究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并且认为自16世纪至今，外科手术工具有着某种继承性。事情从表面上看可能是如此。但是，正如外科医生兼医学史专家让-夏尔·苏尔尼亚所指出的，在如何使用几乎相似的器械方面，即使是一片刀片，甚至也发生了变化。他写道：“外科医生最简单的操作，比如切开表皮，今天也与希波克拉底时代大不相同；使用的手术刀，无论是刀口、刀尖还是刀柄都和以前不一样；(今天的)外科医生更加精通解剖学，对进刀的深浅有所控制，避免不必要的失血，注意防止出现误伤。他握手术刀的方式也有别于阿布尔卡西，有别于安布鲁瓦兹·帕雷，甚至与上世纪中叶的法拉伯夫恐怕也有不同：手腕、前臂、肩部和身体的位置都与以往迥然相异”¹⁵⁹。至于尖端外科或显微外科不断改进

的现代化器械，其灵巧和精细更为过去所望尘莫及。

尽管如此，旨在记载医学思想和医疗器械的连篇累牍的医学史显然依旧是通史的不可分割的、有益的组成部分。病人过去是怎样接受治疗的？医生过去是怎样了解人体、疾病和健康的？当局特别是城市当局过去是怎样看待保健、防病和改善公共健康等问题的？这一切对研究社会发展史均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此外，漫长的医学史在向与之相伴的通史不断扩张渗透的同时，也不免暴露其某些本质特征和深层结构。凡读过哲学家、科学史家乔治·岗基莱姆的佳作的人都知道，在自命以科学和实验为准绳的当今医学中，先验的观点依旧比比皆是，就像玛丽—弗朗索瓦—沙维耶·比沙(1771—1802年)的生机论时代一样。我们也许可再次借用苏尔尼亚教授的说法，称之为“迷信”。尽管如此，这些先验的观点(就算是迷信也罢)，今天正迅速更替，促使对生命和细胞的研究取得越来越快的、革命性的进步。

根本的变革，划时代的转折，出现在19世纪中叶。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一场深刻的革命完成了。正像让·贝尔纳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医生治病“只是在19世纪中叶，才取得合乎理性的功效；仅仅六年时间(1859—1865年)，达尔文、巴斯德、孟德尔、克洛德·贝尔纳等人的重大发现相继脱颖而出，从而促成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近代医学和生物革命的诞生”¹⁶⁰。在让·贝尔纳列举的这些伟人的名单上，我们至少还应加上弗朗索瓦·马扬迪(1783—1855年)的大名，他曾在法兰西公学执教，是克洛德·贝尔纳的导师和先驱。法国大革命过后不久，原先的医学院濒临破产，马扬迪奋不顾身地投入工作，并且标新立异，与许多人进行了不懈的、无情的论战。确实，他当时业已在物理学和化学的科学基础上，为医学和生理学开辟了道路。他开创了实验医学，堪称一大善举。由于这一功绩，他在创新者行列中确立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另一位

难得的创新者埃瓦里斯特·加洛瓦(1811—1832年)是一位比马扬迪年轻的数学家,年方20便死于决斗,仅仅来得及在最后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代数函数的近代理论。

没有任何人能比马扬迪及其学生克洛德·贝尔纳(1813—1878年)对当时行将出现的医学革命怀有更敏锐的感觉。埃米尔·利特雷(1801—1881年)在马扬迪去世后不久谈到:“他对一切旧事物全都格格不入,甚至嫉恨如仇……过去的体系、推理方式、实验方式以及各种倾向,在他眼里似乎都为正派人所不屑一顾。对他来说,科学在以往的时代中尚未立足生根”¹⁶¹。克洛德·贝尔纳的想法与利特雷不约而同,他毫不犹豫地断言,“现今的科学必然高于过去的科学,并且没有任何理由到前人的知识中去寻找现代科学成长的根源。前人的理论既然不包括尔后的发现,必定谬种流传,对现今的科学绝无任何裨益”¹⁶²。

对于这些偏激之词,我们应予以理解。马扬迪和贝尔纳满怀激情地致力于建设以经验为唯一准绳的医学科学。作为具有彻底革命精神的科学家,他们必须向控制和禁锢医学机构、医院、讲坛、教学以至达到荒唐的地步的旧制度开火。甚至在他们去世之后,他们所发动的革命,也像任何深刻的革命一样,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这尤其因为,作为至关重要的基础科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本身正在建立之中,发展的进度参差不齐,并且各有局限。随着正规医院和实验室的相继问世,新医学将慢吞吞地设计完善和终告建立。而这种新医学只是在得到国家和有关公众健康的各种机构的支持并被重新置于它们的控制之下以后才显示出自己的效能。

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根据一些令人钦佩的著作所提供的材料,仔细分析这场革命缓慢的发展过程,与今天征服宇宙的事业相比,这场革命的重大意义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只想以简捷的方式指出

这些奇迹对我国的人口发展（1982年进行的人口普查表明法国已有5400万居民）产生什么后果。其实，这些后果早已清晰可见了。1949年11月，我刚开始在法兰西公学讲课，还相当年轻，不少前来听讲的人却比我年长得多，我对他们说：“毫无疑问，在我们这所公学的创建者弗朗索瓦一世的时代，今天这样的集会是无法想象的，包括演讲者和听讲者全都在内。近代历史的奇观乃是人的寿命不期而至的延长”。死亡率的下降，正像阿尔弗雷德·索维最近所说的那样，是“对死亡这一人类宿敌所取得的胜利”¹⁶³。

我并不把这一胜利仅仅归因于医学，成千上万种进程扩大了它的影响：交通的进步，国际范围的竞争，特效药的成批生产，疫苗接种，1831年发明、1847年投入使用的氯仿麻醉，X射线，激光，电疗，光疗，冷冻疗法，器官移植，剖心手术，对心血管疾病的攻坚战，与癌症的不懈斗争……应当承认，这场以多种形式与病魔较量的战争，使千百万人的生命获得拯救的战争，对于人类来说，比那些灾难深重的政治性战争不知要重要多少倍。

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我国今天男性平均寿命为71岁，而在1900年时，法国人的平均寿命仅46岁¹⁶⁴。

这就要求我们“展望”未来的形势，而我们却几乎总是闭着眼睛向前走。使我感到担心的是，在展望未来时，人们只从片面的推理出发，想不到未来是几条路线、几种运动的汇合，其中有的还将会出人意料之外。1942年时，一位人口学家曾经预言，到1982年为止，法国的人口将达到2 900万，而我们现在却是5 400万。另一位人口学家今天预言，2100年时的法国人口将只剩1 700万。我们活不到那个时候，拿不出事实作证据，但也可以肯定这一预言是错的。有人还对我们说，照目前的情形发展下去，将来就会没有足够的年轻人工作，以支付老年人的退休金。这难道不是用今天的或昨天的程式，一成不变地生搬硬套，推测和展望明天吗？坚持陈旧观点

的现政府被失业问题所困扰，怎么会看不到，在当今的社会中，“老龄人口比例的不断增长与降低退休年龄的天真想法存在着矛盾”？阿尔弗雷德·索维的以上见解¹⁶⁵在这里顺便可以用上。

其实，明天的经济和社会格局还有待综合各种新旧因素而定型。明天的“青年”将不像今天那样，年龄在30岁以下，而是不到40岁，乃至不到50岁……人的平均寿命将不再是71岁，而是80岁，90岁……或许还要超出我的想象！这个未来的社会将拚命追求玩乐和安逸。社会将单设一个部门，专门满足这种新的需求，让公众得到娱乐和消遣，并把他们从无所事事中解放出来。这将使我国业已泛滥成灾的所谓第三产业各部门达到极度的膨胀。尤其，在机器人广泛进入应用领域，增加服务门类以后，所谓“社会就业人口”的娱乐还将有额外增加的可能。在约翰·奈斯比特看来，这些机器人不正是“明天的外籍劳工”¹⁶⁶吗？

节制生育

今天，从生存繁衍的纯生物学角度看，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处于停顿的状态，像是得了一种无药可救的顽症痼疾。在这些国家里，自愿的节制生育带来了，或者说宣告了真正的人口灾难。加上平均寿命的延长，更加速了社会的老龄化进程，使就业人口和非就业人口之间的不平衡日趋严重，达到危险的境地。因此，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欧洲，到处可以听到强烈的警告、阴郁的预测以及对避孕措施的种种指责。

我们就来介绍被告一方：避孕措施的确种类繁多，但归根到底都是为了限制生育的数量。其中包括体外射精、交合而不射精、使用避孕套、“安全期”性交、杀精子剂、避孕药等行之有效的手段；尤其是避孕药，自1960年在我国普遍使用后，已引起了一场“风俗革命”。净身、独身、晚婚、鸡奸是否也该计算在内？我将一反常例，

不对溺婴——诸如在中国——或堕胎多费笔墨，诸如此类的事肯定时有发生，但这毕竟不是避孕措施，不如称作是制止出生的一种方法更为恰当。

儿童的死亡率昨天使人口繁殖受到了限制，这一灾祸如今已不复存在（在这方面，法国几乎荣登榜首）¹⁶⁷。但在从前的时候，法国弃婴（比其他的孩子更加羸弱）死亡数量之多，令人触目惊心。“在普罗旺斯的艾克斯，从1722年1月1日至1767年12月31日，在被送进圣雅克育婴堂的4 844名孩子中（平均每三天就有一名弃婴）……只有2 224人得以幸存”。换言之，死亡率超过一半¹⁶⁸。类似的事例挂一漏万！历史学家皮埃尔·肖努在广播电视以及文章和著作里对1975年1月堕胎合法化的议案（1979年12月31日被批准）一再大声疾呼，提出抗议：“今天，人们不等孩子出生就把他们杀死，而在从前，孩子的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确一直如此）才是他们夭折的原因”。

避孕显然并非始于昨日，它不是现代的发明。但是，它在最近却成了一种流行病，它在整个欧洲畅行无阻，使这块大陆结构解体，并且正形成一场风俗革命。可是，就法国而言，这场革命的孕育要早于任何其他地方，从18世纪中叶开始，已有端倪可见。当时的人不可能不看到风暴即将降临，不可能不想到它的后果。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比欧洲邻国超前了足足一个世纪。

这一领先地位对法国的人口增长是一场不幸的灾难。正当法国的人口增长速度缓慢爬行的时候，邻国却阔步前进，工业的欣欣向荣加快了后者的前进步伐。我国在欧洲的人口比重相对下降。1800年时，法国共有2 700多万居民（英国仅1 800万，德国为2 480万），人口居全欧之首——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另当别论——占欧洲总人口的15.7%；但是，到1850年时，这一比例下降为13.3%，1900年更下降为9.7%。法国过早地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再也没有

能够(甚至没有尝试过)摆脱这种被动地位,并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当然,自从欧洲其他国家也开始实行节育以后,同样的局面便随之出现。它们同样也无法从中脱身。

因此,是否可以认为,法国失去其强国地位的时间不是1815年6月15日滑铁卢一战的惨败,而是在此之前很久,即从路易十五当政期间法国故意减少人口自然增长那时算起?阿尔弗雷德·索维解释说,19世纪期间,西欧各国的发展几乎并驾齐驱。在社会演变、政治、经济、医学以及其他领域,处于齐头并进的状态。唯有一项例外,而且只涉及法国一个国家,它比欧洲其他国家提前100年时间,“开始减少其有生力量,恰恰就在各国竞相进行世界扩张的时候”。在18世纪的这一事件的影响下,法国今后在各方面的前进步伐全都受累不浅……169

因此,重要的是勾勒出这种早熟状况的轮廓,寻找其产生的原因。我们先看当时的经济学家或人口学家(尽管“人口学家”这一名称只是于1853年方才出现)对此作何评论。

昂热·古达尔,一位在我看来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和作家,对当时崇尚奢侈的风气大张挞伐,认为这种风气给人出了坏主意,他指出:“追求舒适和安乐使法国到处都是……断子绝孙的单身汉……与其不能带着女人风采照人地在场面上出现,并为此而丢了面子,人们觉得还是不结婚为好。居然为着一辆单色的或镀金的四轮马车,为着几匹马,几名仆人和差役,许多婚姻遇到了障碍,这类事情每天都在发生,真是令人不可思议”¹⁷⁰。更有甚者,“养儿育女竟不再是夫妻结合的必然结果:人们对生育感到恐惧,因而想方设法少生少养……贪图奢侈使绝大多数人把儿女成群当作是有失体面的事。越是富有的人便越要限制繁殖后代”¹⁷¹。尤其糟糕的是,追求奢华之风“竟像传染病一样四处蔓延,不知不觉中传给了平民百姓,而平民百姓的劳动正是立国兴邦的基础”¹⁷²。以上这番

评论是在1736年作出的，当时“七年战争”（1736—1763年）刚刚开始，路易十五还将在位18年，直到1774年为止。

1758年，法国南方有一位教士，名叫让·诺维·德加维拉克。他曾谈到一些人甘愿不要“父亲”这一温馨的称呼，“有的一味追求逸乐，有的不惜泯灭天性”¹⁷³。1763年，图尔莫·德·拉莫朗迪耶尔——一位“业余人口学者”——指出了避孕措施的进展：许多人家只愿生一个孩子或根本不生。这种对婚姻的亵渎，这种卑劣无耻的行径“像传染病一样挨家逐户地蔓延”，接受忏悔的神父承认，所有的社会阶层，包括富人和穷人，无不中毒受害¹⁷⁴。1770年，德·赛夫沃尔骑士揭露了这种“卑劣行径”对健康的危害，宗教虽然全力反对，但也徒劳无益¹⁷⁵。1778年，大名鼎鼎的莫罗也断然指出：“并非只有富家妇女……把传宗接代当作‘过时的迷信’；这些为禽兽所不齿的、伤天害理的诀窍已经深入乡村”¹⁷⁶。圣让-厄德的费里内神父1782年在诺曼底传教，致力于“拯救城乡居民的灵魂”；据他说，“俄南的罪过^①——体外射精——实属弥天大罪，可在夫妇之间却司空见惯……尤其因为他们不愿有太多的子女，而又要享受夫妻生活的欢乐。无论富人或是穷人都会采用这种不幸的手段；他们的动机不同，罪孽却无区别。很少有人为此进行自责，多数

于1785年表示担心，这种道德沦丧将使出生率低于死亡率。

上述见证都确凿无误，完全可信。避孕手段广为传播，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采用，几乎变成了一种疾病。普遍使用的手段是中止性交，体外射精。但是，这种解释可能偏于公式化和简单化，即以为“贻患无穷的诀窍”是上流社会的发现，可能经由他们传到了富裕阶层，再传到城镇居民阶层，最后扩展到较晚“开化”的乡村农民阶层。一位当今的历史学家说。“节育措施在村庄出现之日，便是城市发明的道德沦丧大功告成之时”¹⁷⁹。但是，农村是否果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清白无辜”和“懵懂无知”呢？

居伊·阿尔贝洛关于上马恩省茹安维尔附近五个居民点的调查表明，17世纪时，在这些村庄里，孩子的出生时间与父母的忙闲有关，即往往在收完庄稼或在采摘葡萄以后¹⁸⁰。第一个孩子的出生不受此限，这取决于结婚的日期。然而，尔后出生的子女难道完全是按计划安排的吗？人们不难想象，计划生育势必要采取避孕措施，禁绝房事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大家知道，在当时“育龄夫妇生育率低下”¹⁸¹的下诺曼底地区，接受忏悔的神父往往归罪于避孕行为。农村显然也包括在内。1650年，库唐斯教区的一名神父在布道词中指出：“罪孽的蔓延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而且有罪之人简直懵懂无知，往往不相信自己犯下了什么罪过”¹⁸²。

因此，人们对约翰·尼古尔骑士后来于1754年作出的判断（当时被视为一项普遍真理）也就不会感到惊异了：这位冒牌骑士实际上是出生在芒斯的一名法国人，他之所以使用假名，为的是能无拘无束地谈论法国和英国。他指出：“就拿自耕农的情况来说，农村自耕农的极端穷困恰与城市出奇的富有形成鲜明对照。国家的税收负担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难以维持生计的自耕农深怕受众多子女的拖累。由于担心陷入不可忍受的苦难之中，一些人不愿结婚成家，即使在成家以后，也尽可能减少生育”¹⁸³。

历史学家和人口学家参照路易·亨利的标准和方法（根据户籍登记的统计），不久前对城乡阶层所作的调查向我们提供了类似的事实。通过这些调查，我们大体上能根据婴儿出生的有规律的或无规律的间隔期，计算出已婚妇女的生育率。由此可得出以下的结果：假如就同一进程与欧洲其他国家作个比较，避孕在法国深入人心的时间显然特别早。整个演变并不从法国革命时方才开始，但从那时起，却形成了势如破竹的潮流。至于其原因是什么，这就有待历史学家提供自己的解释。

且以位于塞纳河畔的小城默朗（距巴黎47公里）为例，直到1740年，90%的夫妇似乎尚未或很少限制生育，剩下的或是患有不育症，或是故意避免生育。从1740年起，后者所占的比重开始上升。1740至1764年间，不育或少育的家庭从10%增至17%，而在其他居民中，一部分夫妇也已采取了避孕措施；1765至1789年，节育的比例不断增大，接近全部家庭的四分之一。然而，最大的一步还是在临近1790年时跨出的：1790年至1814年，不育夫妇或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妇所占的比例从24.1%跃升至46.5%，而在1815至1839年，比例更高达59.4%¹⁸⁴。

在默朗是如此，在其他地方肯定也不例外。那么，是否整个法国都是这种情况呢？大概不是。让-保罗·巴尔岱写道：“在鲁昂，攻陷巴士底狱并没有加快节育的步伐，避孕措施一个世纪以来已在当地取得节节胜利”¹⁸⁵。他以有力的论据断然指出：“1670年时，每个家庭平均有8个孩子……至1800年，勉强只剩4个。在不到150年的时间里，卢昂人居然掌握了避孕的‘诀窍’。他们怎样在四、五代人的时间内得以使后代的人数减少了一半的呢？人口学分析并不泄露具体的避孕诀窍，但是我们从中可以了解节育的发展过程”¹⁸⁶。

相反，在法兰西岛地区的三个村庄，即博蒙—勒诺南、马尔什

鲁和勒迈斯尼—苔尼布(今属瓦兹省的博韦区)¹⁸⁷,这一进程似乎仅在18世纪末才刚开始。同样,在基纳河畔的夏蒂翁,尽管我们掌握的资料较少,仍可看出当地的节制生育约在1772至1784年间才初见成效¹⁸⁸。至于靠近里尔市的桑甘昂梅朗多瓦,属于边远的穷乡僻壤,节制生育的起步更晚,最初发展也很缓慢,只是到19世纪中叶才蔚然成风。临近1830年时,“马尔萨斯革命”¹⁸⁹才刚触及旺岱地区。

以上情形并不奇怪,因为当避孕节育初起时,法国各地的反应很不相同。同等的环境不一定产生同样的结果。一些势在必然的解释可在一个地区得到证实,但在另一地区却不一定行得通。比如,布列塔尼与诺曼底一样,“平民的遗产一律实行平分”,而且“父母对子女爱护备至”¹⁹⁰,这两个因素一般都会促使家庭节制生育。但是,布列塔尼似乎并不像其邻居那样信奉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事实上,研究的地区范围愈广,问题也就变得愈加复杂。许多因素陆续被大家所公认:父母结婚时的年龄;采用母乳哺育或将孩子交奶妈喂养;家庭成员职业地位的高低;社会地位;文化程度(大家知道,家庭形态由文化程度所决定);决定遗产分配的法律或习惯(各省之间有很大不同);最后是教会思想灌输的有效性(教会对节育进行了有力的干预)。人们试图提供的任何一般性解释都有可能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出现漏洞,都只可能在预先接受不同程度的差异的前提下才有价值。尽管如此,人们却不能因此就不愿花费力气把以下的问题搞清楚:节育现象怎样得到普及,为什么在法国蔓延要比其他地方早得多。

人们往往把一切都归咎于启蒙时代或法国大革命动荡不定、天翻地覆的年代。我们可别这样做。须知避孕节育并不是那时的新发明,其传播方式也不同于文化财富或流行病。也切莫误信传

闻，以为采用避孕措施由路易十四或路易十五时代的法国贵族所首创，以为不良的榜样由塞维尼夫人时代的达官贵人所提供，塞维尼夫人本人只是为其女儿的健康着想，才竭力要她注意妊娠的间隔¹⁹¹。

节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久远的历史时期。据历史学家说，自愿限制婴儿的出生曾给希腊的奇迹致命的打击；从古罗马奥古斯都的辉煌盛世开始，出生的孩子便日渐减少。在《圣经》里，俄南更是体外射精的象征性人物。中世纪从六世纪开始接连制订的忏悔规条使人想到，“伤天害理的诀窍”在西方的文明地区早已悄悄地四处传播。我将乐于接受让-保罗·巴尔岱的见解，他曾写道，很难设想会有绝对“拒绝节育”的社会，即使社会自称“拒绝节育”，但总有“一些夫妇在暗中捣鬼”¹⁹²。比如说，17世纪时农村私生子的出生率很低；有人从中推断，当时的年轻人在婚前不得不长期守住童贞，因为如菲利普·阿里埃斯所说，直到不久以前，他们对避孕依然一无所知，甚至从未想过。同弗朗德兰的见解一样，在我看来，这种推断是荒唐的。更何况，众所周知，向以性教唆为业的妓女无不经常实行避孕。蒙田曾说过，“许多烟花女子或淫而不孕，或孕而不育，避免生养孩子，而且天天如此”¹⁹³。这里所用的“烟花女子”一词显然带有贬意，因为蒙田随后又提到“萨比努斯贞烈的妻子”，恰与前者呈鲜明对照。

此外，教会之所以同有损基督教婚姻神圣目的之行为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接受忏悔的教士之所以焦虑不安，请示主教应对犯罪者如何开导，这正是因为夫妻生活中出现了问题，存在着教会所想到的危险。

教会的态度

必须指出，直到前不久的近代，基督教提倡的理想婚姻与我们

今天所能想象的距离竟是多么遥远。婚姻不是一种爱的纽带，更不是肉体之爱的结合。人们在16世纪的作品中读到，炽热的情爱将危及“婚床的纯洁”。凡与妻子一起“以放纵肉欲为满足”的人，“就会愿意与任何女人交欢”，即使她不是自己的妻子；“对妻子求欢无度胜过尽丈夫之责者与通奸无异”。缔造婚姻恰恰是“怀着对上帝的爱惧之心，力求少犯罪孽（追求愉悦本身就是罪孽）和传宗接代”¹⁹⁴。缔结“圣洁的婚姻”，其目的是为了“上帝赐以永福的传宗接代”¹⁹⁵，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生儿育女”¹⁹⁶。不幸将降临在忘记这一必须遵循的戒律的人头上。在博絮埃任莫城主教时，该教区的教理书告诫说，已婚夫妇的罪过“就是避免生育，这是最可恶的罪过”，夫妇双方如有可能互相许诺洁身守贞，这种情况当属例外。这种为教会所不容的罪过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教会强制犯罪者以苦行赎罪，或剥夺其领受圣事的权利，以示惩戒。

切莫以为这种婚姻观局限在不敢越教规雷池一步的虔诚教徒的范围内。蒙田关于“宗教的、虔诚的结合”，关于在婚姻中必须排斥“放荡和纵欲”以及诸如此类的高谈阔论¹⁹⁷，恐怕不会遭到接受忏悔的教士们的反对。他写道：“初试交合之欢可能驱使我们陷入淫荡而不可自拔，这不仅流于猥亵，而且对我们的妻室也造成严重伤害。应让她们至少懂得，若与他人苟且，即属厚颜无耻。她们应对我们的需求始终准备曲意迎合”。

在上述道德说教中，我引证的这番话值得注意。在婚外的两性关系中，例如男女通奸，猥亵和“淫荡”都是自然的事情。这正是根据教会的要求，划定了一道鸿沟：一边是婚姻、家庭秩序和尊严，另一边是像发情的野兽一样寻欢作乐的婚外性生活。也就是说，过性生活可以有放纵的和理智的这两种方式，两种方式原则上互不相容。布朗托姆对男女调情苟且之事不但不予苛责，而且一说起来便绘声绘色，津津乐道，但他也提到，依据“我们的《圣

经》……，夫妻之间无须用色情和淫欲……来表示彼此强烈的爱慕；尤其因为他们一旦全心投入这些肉体享乐，就会强烈渴求，欲舍不能，以致把对上帝应有的爱置诸度外”¹⁹⁸。他在别的场合还谈到了“玷污”合法婚姻的卑劣行径。但是，当这些卑劣行径——例如夫妻做爱时采用的新招式——被镌刻在高脚酒杯的杯底上，巧妙地在宫廷酒会上端给一群妙龄女宾时，他却觉得是引人入胜的游戏。布朗托姆写道：“欲知其乐者无妨一试，机敏之人愿意尝试一切”¹⁹⁹。

可见，在婚姻关系中被认为是极其严肃的事，在婚外却又那么不严肃，当然更谈不到正常。这令人感到奇怪，而更令人惊奇的是，教会的观念与社会的通识在这里竟不谋而合。例如，布朗托姆毫不隐讳地谈到，某些妇女认为她们在私通时不得不采用中断性交、体外射精的办法，“一方面是不使她们的丈夫把生下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既然没有让精液射入体内，她们就不觉得对丈夫有所伤害和给他们戴上绿帽子……为此，她们认真小心，妥然处置”⁵⁰⁰。在我们看来，得出这个结论颇具讽刺色彩，但在当时，它确实就是教会的立场：无论通奸、卖淫或乱伦，不生孩子即可减轻罪过。以上情形在中世纪的各种惩戒规章中——凡生有私生子者，对奸夫淫妇处以苦行赎罪的时间将增加一至二倍——或在17世纪的神学家和忏悔教士的辩论中都有所反映。通过辩论，教会得出的结论是：在各种奸情罪案中，有行为而无后果者危害较小，罪减一等。

神学家对罪过作了牵强附会的解释，进而力主采取以上的宽大政策。但是，要与日常生活打交道的忏悔神父对接受宽大政策恐怕深感勉强，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正是避免私生子的增多。无论如何，宽大政策只能把性生活人为地分成两个领域——婚姻生活和非婚姻生活——最终产生交错传染。就连对“俄南的罪过”的广为

传播大感惊慌的费里内神甫也于1782年承认说：由于当时的教会和医学禁止妇女在婴儿哺乳期间再次受孕，夫妻便以布朗托姆谈到的那种方式偷情交欢，逃脱长期苦守空房的煎熬，并且感到心安理得²⁰¹。

不过，很快地，已婚夫妇将抗拒教会对他们私生活的干预。基督教婚姻终于逐渐解体，这种文化平衡的结束，古老秩序的断裂，与所有同类变化一样，是慢慢完成的。

教会对避孕的谴责原则上并没有改变。但是，这些信条逐渐被广大天主教徒所抛弃。到了1842年，这已是既成事实。勒芒的布维耶大主教当时不得不承认，“几乎所有的年轻夫妇不再愿意多事生育，但在道义上又不能割舍夫妻间的性生活。当忏悔神父问到他们如何行使婚姻的权利时，他们的习惯性反应是深受震动，因为他们明白，他们不能放弃房事，也下不了决心无穷尽地生养后代……所有人都乐于承认，对配偶的不忠和堕胎行为是很大的罪过。难得有人能够相信，他们婚后必须洁身守贞，或者甘冒子女拖累的风险，否则便会犯下弥天大罪”²⁰²。

从18世纪末年开始，禁令的逐渐放松标志着避孕的加速发展。但是，放松禁令并不能成为拒绝生养的理由。16世纪时，“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家都以儿女满堂为幸事”（蒙田语）²⁰³。为什么在西

是首先发现避孕方法的国家，因为避孕行为早已发现，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并不需要向法国人学习其规则。也不要过于自信地说，法国人18世纪越来越钟爱孩子，因而减少生育，以便更好地抚养他们。直到18世纪末，弃儿在法国却是成倍增加。

目前只有两种可以接受的解释：一种是阿尔弗雷德·索维²⁰⁴的见解，我曾据理反驳，未免过于匆忙；另一种是当时我针对他的看法提出的观点。两种解释可以加以调和，但不能互相印证，它们毕竟是不同的：一种从文化角度出发，另一种则建立在经济学，或更正确地说，建立在人口学的基础之上。由于在这些领域里出人意外之事比比皆是，阿尔弗雷德·索维不以人口学家的身份出现，而竭力主张从文化方面寻求解释，我几乎要说他独出心裁。

在阿尔弗雷德·索维看来，法国出生人数的减少是法国居民摆脱教会限制、教育和束缚的结果。教会认为控制躯体有助于更好地控制灵魂。18世纪的人口悲剧是对宗教改革的一种报复。两个多世纪以前，法国曾经在罗马和路德，或更确切地讲，在选择罗马和加尔文之间犹豫不决。法国选择了罗马，因而受到了宗教改革的冲击。其间相隔几个世纪，这难道是不可能的吗？今天，我惯于用长时段的视野进行观察，自然乐于作出肯定的回答，我赞同费迪南·比松²⁰⁵等人的见解，认为我国后来推行的非教会化学校是宗教改革的复活，正如昨天的宗教改革受第二次梵蒂冈教廷会议的幕后操纵一样。

难道宗教改革是推广节育的唯一原因吗？我们不要忘记，世俗教育于16世纪开始在我国起步，大量建立的新型学校获得了文化精英和社会精英的热情支持。乔治·于佩尔对研究这些特权阶层兴趣颇浓。他们一度使教育摆脱了教会的控制，直至耶稣会于17世纪又把教育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耶稣会士并不是新教徒。他们拒绝了新教的诱惑。在我看来，他们反映着法国在宗教改

革与反改革之间最初的摇摆不定，他们努力不受改革势力或反改革势力的影响，至少在知识分子²⁰⁶、人文主义者和“不信教者”的行列中，至今还存在这种倾向。法国的文化特性正表现为这种左右摇摆、往返移动和寻找单独的道路。从蒙田到伏尔泰，甚至到后来，所有的思想家都主张独立思考。这就预先宣告了教会的失败，使它的创伤不断加剧。我以为，独立思考对法国采取节育立场起了推动作用。

我更容易相信，自古以来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法国几乎长期经受着人口过剩的困扰。这正是马塞尔·雷纳尔及其同事们的看法，这些同事曾帮助他撰写了《世界人口通史》的巨著（1968年第三版）。对于人口过剩的概念，确实应该谨慎使用。只是当人口总量和生活资料出现比例失调的危险时，才能说人口过剩。1789年时，法国共有2 600万居民，每平方公里的密度为50人多一点，人口已经过剩。那时的英国本土有800万居民，人口密度略高于法国，却不是一个人口过剩的国家。英国的国民毛收入与法国大体相等，而其人均收入却要比法国高许多。英国面临的人口极限并不像法国那么严格，人口发展具有某种弹性。它可以依靠生产率很高的农业和正在起飞的工业，正在膨胀的工业城市同时起着蓄电池和发动机的作用，随后的历史将证明这一点。与之相反，在大革命时期，法国城市的发动机出现了故障，只是到了督政府和帝国时期才重新启动运转。到了1789至1790年的关键时期，早已锈蚀的文化框架土崩瓦解，经济生活便出现了故障和困难。限制人口出生与有利于这种现象蔓延的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使日常生活的困难日趋加剧。战争期间的朝不保夕和人心惶惶更犹如雪上加霜。埃德加·基内²⁰⁷描绘了这一代人惶恐不安的心情。例如，具有良好素养的父辈认为没有必要让自己的子女接受合适的教育，因为他们年纪轻轻就要血洒疆场。这样的不安情绪怎么会有利于人口出生

呢？

在确认以上事实后，还有两点补充说明。马塞尔·雷纳尔及其合作者认为，法国的人口过剩出现在17世纪。我以为这在16世纪已是既成事实，用我在前面提到的布朗托姆的话来说，当时“法国已经人满为患”。由此可见，这种长时段的人口过剩，这种人口压力恐怕在整个欧洲绝无仅有。实行避孕是减轻这一重压的必要措施，正如在很早以前，特别是在法国南方，已有家长作主，强制晚辈实行晚婚或独身的现象。

第二点也是最后的一点：在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人口仍然增长了30%，而欧洲同期平均增加了50%，英国的人口增长率更达到100%。确实，法国在工业化道路上没有迎头赶上，而是步履蹒跚，进展缓慢。在这个时期，法国本该提高出生率，而当时的权威人士却鼓励居民按马尔萨斯的理论继续节制人口。在这一方面，学究气十足的让-巴蒂斯特·萨伊，这位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马莱—伊萨克，当可荣登榜首。他说道：“我们所要提倡的不是多生孩子，而是增加储蓄”²⁰⁸。

总而言之，“节制生育”一词最恰当不过地概括了法国历史悲剧的全过程。确实，在我国日常生活的框架中，节制生育意味着基督教传统婚姻——教会力求维护的传统——的衰落，而这种衰落是事先经过长期准备的。文化虽在历史上曾展现出光辉夺目的画面，但在其深层却从不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曾经发生的事，大体上也正是我们刚刚见过和仍可看到的情景：婚姻关系的破裂竟成为社会的通例。不过，目前的表现形式是不再在市长先生面前成婚，结婚仪式不讲排场，但仍受到法律——社会法规——的控制、制约和约束。为把男女的自由结合纳入正轨和输入电脑，明天的社会又该怎么办呢？不抛弃某些传统遗产——基督教婚礼、民事婚礼，等等——文化便不能经受住时间的

考验。今后的社会还有什么传统想要摆脱的呢？

外国移民：一个新出现的问题

我毕生主张持宽容的立场，并为此感到欣慰。但是，我并不自命有何功劳。我只是在阿尔及利亚才真正发现了犹太人问题。那是1923年，我不过20来岁。我随后在阿尔及利亚一住就是十年，生活在穆斯林的土地上，在那里学会了理解和尊重阿拉伯人和卡比尔人。后来（1935年），我在巴西执教多年，在小说《飘》所描绘的那种气氛中遇到了黑人。最后，我到过所有的欧洲国家，除个别例外，我安适地、愉快地在那里长期生活。

必须宽容，再宽容！只有这样，才能清醒地观察移民问题，众多的、一无所有的移民，今天正向我们拥来。应该设法懂得为什么移民今天竟已成为一个问题，而在这以前，法国世世代代都接纳了、消化了各种不同的移民浪潮，并在物质和文化方面都对法国有所丰富。

可能同化和接受同化，我以为这是实现无痛苦移民的最高准则。

这正是选择了法国国籍的所有外国移民——一个人也好，小群体也好——的情形，他们中有政治避难者，逃脱法西斯魔掌的意大利人，内战中脱险的西班牙人，1917年后的“白俄”，以及各种各样的艺术家、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这些受到诚意接待的移民迅速溶化在我国文明的血液和机体之中。他们并不因自己的出身而与法国广大民众有所隔阂。这些被接纳的法国人往往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出生在华沙的玛丽·斯克洛多芙斯卡（1867—1934年）即后来的玛丽·居里，同她的丈夫一道于1898年发现了镭，并于1911年获得了诺贝尔奖金；帕布洛·毕加索（1881—1973年）出生在西班牙的马拉加；阿米多·莫迪里阿尼（1884—1920年）出生在

意大利的里窝那；马克·夏加尔1887年出生于俄国的维捷布斯克；欧仁·尤内斯库1912年出生于罗马尼亚的斯拉蒂纳；沙伊姆·苏蒂恩(1895—1944年)原籍立陶宛，曾在塞雷住过很长时间，给当地人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他在作画时惯于在自己的衣服上擦画笔，至今想来颇觉有趣。要把选择在我国生活的所有外国知名人士的姓名全都列举出来，名单的确太长了。我们之所以珍爱这些杰出人物，不仅仅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贵客，同时因为他们愿意成为我们的一员，成为与出类拔萃的我国同胞一样的法国人，还因为他们为我国异彩纷呈的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

从统计材料看，重要的移民浪潮有以下几批：上世纪末的意大利人；1917年后的白俄；1920年前后在北部矿区和农庄定居的波兰人；还有逃离纳赛尔统治下的埃及或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自1871年起，依据克雷米约法令，在阿尔及利亚生活的这部分犹太人拥有法国国籍)，以及1962年从阿尔及利亚返回的“黑脚”^①(包括男女和儿童在内，其人数在100万以上)，这些他乡游子，抛弃了一切，重返故里，却没有受到起码的热情接待，往往同移民一样，全靠自己解决困难。最后，是60和70年代大规模的工人移民浪潮。

外国向我国大量移民的情形出现较晚：1851年，在第二帝国建立的前夜，外国侨民只占法国人口的1%；临近1872年，即第三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占整个居民人数的2%。其中以在北部城市、矿井和甜菜地里干活的比利时人居多，约占移民总数的40%，随后就是意大利人。吸收这些来自近邻的外国人比较迅速，尤其因为1889年6月26日的法令便于他们加入法国国籍。1914年前后，“外侨人数稳定在110万上下，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略低于3%”²⁰⁹。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甚至在尚未结束前，法国正苦于

^① Pied-noir, 指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译者

劳动力严重不足(在战场上死伤的都是青壮年),第二次移民高潮开始出现,不过这一次的移民主要来自地中海地区,特别是并入法兰西殖民帝国的北非国家(1830年,1881—1883年,1911年先后并入法兰西帝国版图)。1931年时,外籍移民达270万人,即占全国总人口的6.6%。

在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外侨的人数大为减少,1946年时仅为170万(占总人口的4.4%)。

从1956年开始,第三次浪潮迅速高涨。1976年时,移民人数估计达到370万(占总人口的7%)。在他们当中,葡萄牙人占22%,阿尔及利亚人占21%,西班牙人占15%,意大利人占13%,摩洛哥人占8%,突尼斯人占4%,土耳其人占1.5%,黑非洲人占2.3%(以上百分数依据1975年的人口普查)。他们绝大部分是经过挑选的青壮年,他们的死亡率明显地低于平均数,生育率则遥遥领先:马格里布三国的妇女平均生5至6个孩子,原籍葡萄牙的生3.3人,西班牙的生2.5人,意大利的生2人。“1975年时,全部外来移民的出生指数为3.32,而本国人的出生指数仅为1.84人,平均起来,法国所有居民的出生指数为1.93”。但是,外来移民一旦在法国扎根,根据可能追踪的线索,他们的生殖率“便下降到与土生土长的法国人相同的水平”²¹⁰。

伴随着70年代经济危机的到来,第三次移民浪潮达到了顶峰。“1974年已出现停顿……这一停顿仅仅意味着某些外国人开始回国,或者预示着移民浪潮将从此逆转?……从世界人口形势看来,似乎可以假定这是一次暂时的间歇”²¹¹。

总之,在全国范围内,外国移民破天荒地作为一个“殖民”问题被提了出来。而且这一次的殖民地是在法国国内,由此产生的种种政治纠葛又使人无从透过某些“排斥”现象——这种彼此排斥的现象是不容否认的,也是令人觉得遗憾的——找出其中复杂的背

景。是否可能把这些问题理出一个头绪来呢？

一个经济问题

外国工人在我国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与欧洲相同，均为10%。目前的经济危机及失业是否会加重法国工人对他们的敌对情绪？大概有时是可能的。但情况远不如一个政党在其最近的口号中所说的那么严重：“多了150万名移民，就有150万人失业！”

绝大多数外国工人实际上是被当作廉价劳动力使用的，分给他们的工作是为法国工人十之八九不愿问津的苦活，被认为低下的工作。把他们撵走吗？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在绝大多数法国失业工人中，恐怕很少有人愿意到劳动的底层，接替被赶走的外国工人的位置……这使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1610年事关从西班牙撵走不受欢迎的摩尔人时，瓦朗斯大主教所说过的一句名言：“以后谁给我们擦鞋呢”²¹²？撵走外国工人后，谁来给我们修路，承担工厂里的苦活和建筑工地上的粗活呢？除非出现一个铁腕政权，能够任意地、聪明地增加劳动报酬，本国工人才肯干这些活计。不久前对巴黎的街道清洁工采取的改善设备、缩短工时、提高待遇等措施，使这一行业中的本国工人有了明显的增多。

把移民当作低工资劳动力的来源，这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里都是一种固有的现象，在法国是如此，在欧洲所有工业化国家也同样如此。甚至在人口过剩的比利时，一边向法国输出劳动力，另一边又从摩洛哥输入劳动力。甚至在意大利也是一样，一个多世纪以来，它不断向美国和南美移民，并且今天依旧接受德国和瑞士的召唤，但它同时接纳突尼斯人在西西里捕鱼，接纳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的厄立特里亚人……同样，在美国，在加拿大，在南美洲或澳大利亚的工业化地区，非熟练劳工，即只有“一身肌肉”的人²¹³，也都在国内或国外招募（人们甚至可以远隔千里，对汤因比

所说的外部无产者进行剥削)²¹⁴。在苏联的大工业中心,不是同样也有非俄罗斯血统的工人吗?

事实上,外国移民基本上重现了19世纪、甚至20世纪初法国国内的人口运动。当时的工业利用了农村人口外流,从中吸收无产者,他们经受的苦难比我们今天的社会更加深重。后来,外国移民逐渐代替他们充任最艰苦的工业劳动,外国移民也部分地填补我国农村最初出现的劳动力不足(1925年前后,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出现在诺尔省和埃纳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光荣30年”的经济迅速增长,法国自然就不得不招募外国劳工。

外国劳工的生活往往十分艰苦。谓予不信,只要去看看那些破房、地窖和贫民窟……就够了。1939年以前,这些棚户往往设在巴黎早已废弃的围城工事沿线,它们今天已迁出近郊之外,移到芒特、拉约利等远郊地区。上塞纳省1980年约有20万移民,占当地居民总数的15%……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勒德扎的阿尔及利亚泥瓦工今年56岁,在法国已住了35年,他说:“在为法国人修建了那么多幢住宅之后,最后分给我一套‘低租金公寓房’应该是合情合理的”²¹⁵。但是,住“低租金公寓房”仍要花费一大笔钱,难道这是有八、九个孩子的家庭所能问津的吗?这些家庭能够像“有产者”一样过舒服的生活吗?是否可以建造一些简易住房呢?办法确实不错。可是,杯水车薪又能解决多少问题。乔治·蓬皮杜任命的雅克·沙邦—戴尔马总理曾慷慨陈词,许诺拆毁贫民区,仿佛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一了百了地动次手术是完全可能的。对于这些漂亮的言辞,人们能不记忆犹新。好吧,那就拆除一处贫民区试试:不等一处拆完,另一处又会在更远的地方出现,发展之快犹如雨后春笋。尤其,从1956年起,第三次移民高潮的到来使法国张皇失措,根本来不及做好接待的任何准备。于是,又只能因陋就简,让新来者忍受巨大的苦难。

今天，当经济出现衰退时，是否应该责备外国劳工给我国经济增加了负担？怪罪他们领取一份失业救济金？或说他们生育子女太多，使社会福利基金出现了亏空？这些非难全都言过其实。但是，难道问题就不该提出了吗？早已在我国定居的外国移民对法国的经济增长，对我国部分无产者上升为中产阶级，对法国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作出了贡献。我们今天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给予报偿，甚至以略微降低一点自己的购买力为代价，应该说是完全合理的²¹⁶。

种族主义问题

不幸的是经济危机激化了种族冲突。例如，在法国人和北非人的一些稠密居民区，种族冲突变得严重起来；这些穷伙伴往往不得不并肩谋生，但又互不混杂，他们因此成为两个对立的群体，强烈地表现各自的特性。

这是一个老问题，但始终具有现实性。问题的根源在于相异性，即是觉得相异一方的存在便是对自己，对自己的特性的否定，因而这种真实的或臆想的差异使双方都感觉不快，甚至互相表现轻蔑、恐惧或仇恨……我们为了求生，难道必定要与对方势不两立吗？民族主义曾使欧洲分裂，变得疯狂和野蛮。我们法国人曾对西班牙人、英国人、德国人恨不能饥食其肉，渴饮其血……这些先生们也以同样的办法回敬我们。1815年时，普鲁士军官佩戴的红色领章据说意味着“法国佬的鲜血”。相异性最残酷的发明无疑是轻蔑，英国人铁板着脸对法裔加拿大人说：“请像白种人一样说话”！

你觉得以上这一切可笑吗？每个时代都无不藏污纳垢，无不夹带违背真理的、荒谬愚蠢的东西，当时的人身在其中，并不始终都能觉察。正因为如此，纳塔尼埃尔·韦尔的《卡尔·马克思是种

族主义者》一书²¹⁷可能使读者觉得有趣,却并不能说服人。马克思在其信件或著作的某个角落,似乎有一点“赞成奴隶制”的味道。他写道:“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进步最快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①(这句话至少可作多种解释)。照这么说,马克思也是殖民主义者了,因为他相信白人对非白人的优越。1849年,正当美国人从墨西哥人的手里夺得加利福尼亚的时候,马克思写道:“没有暴力,历史便一事无成……富饶的加利福尼亚从对它毫无作为的懒惰的墨西哥人手中摆脱出来,这有什么坏处呢?”^②这段话又意味着什么?无非是说,人在一定的时代生活,必定打上时代的烙印,即使马克思也不例外。种族主义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不占统治地位,但肯定也略微有所沾染。他在世界殖民帝国的中心伦敦生活已久,不能完全不受惩罚。

照这么说,你是否认为,种族主义在我国既没有落脚,又没有生根,不像水底的气泡那样,穿过深深的水层,冒到自由的空气中炸裂?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让一般的社会新闻充当见证,借用它们的语言作出回答。社会新闻所报导的都是些市井琐事,但它们屡次反复,层出不穷。一位朋友为此责备我说,这种怪癖不符合科学。我坚信自己的理由,如果读者愿意评判孰是孰非,这里不妨举两、三件事作证,这些事例都是我的亲身经历,虽然并非出于自己愿意。它们与许多其他社会新闻不同,即至少不带悲剧的色彩。

我住在巴黎的十三区,那里有许多来自非洲和亚洲的移民。一天下午,我同妻子一起正不慌不忙地在路边走着,来到一个路口,

^① 马克思随后写道:“如果从世界地图上把北美划掉,结果看到的是一片无政府状态,现代贸易和现代文明十分衰落的情景。消灭奴隶制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美洲。”见“哲学的贫困”第二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5—146页。——译者

^② 参看马克思“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6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版)。——译者

另一条路与它呈直角交叉，由高往低，坡度很大。突然，一个十五六岁的黑人青年，身高至少1米80，穿着相当讲究，脚蹬旱冰鞋，从呈斜坡状的街道直滑而下，顺势来了个急转弯，冲到这边的行人道上，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他片刻不停，擦着我们的身体快速转了过去，差一点把我们撞倒。我怒气冲冲地大声呵斥，不过两、三句话，滑旱冰的小伙子已经走远了！但是，他立刻又朝我飞奔过来，对我高声叫嚷，怒不可遏地喊道：“还让不让我们活”！他重复了一遍这句令人吃惊的话。显然，我这个糟老头子，不该挡住他的去路，而我的抗议对他也就成了种族歧视的挑衅行为！我没好气地宽慰自己，心里说，换一个白人孩子跟他一样在这里滑旱冰，说不定也会对我出言不逊。不过，要是早十年，恐怕我就要对他不客气了。

另一次，我安详地坐在一辆出租汽车里。我包乘一家出租汽车公司的车子已有15年了，认识出租车的司机。他是马提尼克人，身材魁梧、壮实，和华盛顿的那些黑人司机差不多。路途很长。他跟我说，他晚上还得干活挣钱，为一个乐队伴奏。他跟一个法国女子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并且说个个长得很漂亮。其中一个儿子是牙医，娶了一个芬兰女孩子为妻。“先生，您想得到吗，我还有个满头金发的小孙女哩”！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这一情景我描绘得不太好，但它确实使我很开心。一个多么幸福的移民！不知道为什么，晚上当我乘坐这家公司的另一辆出租车回家时，我对司机讲到了这件事。开车的换了名法国年轻妇女。没料到这回竟惹了祸！她大发雷霆，破口大骂那些外籍司机。我认识她丈夫，也是出租汽车司机。我还知道他们没有孩子。难道他们像恨外国移民一样恨孩子不成？于是，我忍不住打趣说了这么一句：“要是你们生儿育女，今天在巴黎也就不会有这么多外国人开出租车了”！

另一件事可能只对我个人才有意义。我要说的是一位阿尔及利亚的年轻姑娘，是加入法国籍的第二代移民。这位女大学生在电

台里诉说——可能你们也听到了她的讲话——她生活中的艰辛、苦恼和困难。她的法语说得那么地道，那么讲究（法国学校确实有它的长处），以致我产生一个愉快的、或许有些荒谬的信念：至少对她来说，成功只须待以时日。

我们且把这番不着边际的话放过不谈。但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会记起这一类琐事，从而证明种族主义始终是双方的事情：正因为互相格格不入，双方的隔阂才得以保持。与爱德华·德鲁蒙（1844—1917年）——《犹太人的法国》一书罪不容赦的作者——那时相比，排犹运动在法国已大为缓和；但令人不安的是，随着针对其他外国人（他们的数量更多，也更难同化）的种族歧视在法国蔓延，排犹运动又会死灰复燃。由此便产生出日常的摩擦和各种危险。

然而，在法国，谁又能把“人种”问题说清楚？马格里布地区的人是白种人，而我国南方的人却带有萨拉森、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血统。社会学家奥古斯丹·巴尔巴拉说，“看看巴黎的地铁里或里昂、马赛、里尔、格勒诺布尔等城市街道上的行人，当可一目了然。”²¹⁸肤色和脸型的极端多样性不但使人们注意到我国人口的成份异常丰富，同时也表明，“外国佬滚出去”这类口号何等荒谬。“法国人是由分属许多地区、许多人种的人共同汇集而成的一个有机整体，100多年以来，又增加了来自欧洲或更遥远地区的其他国家的一批又一批移民²¹⁹。从史前时代直到不久以前，“众多移民”不声不响地淹没在法国人群之中，以致我们可以打趣说，如果往后追溯几百年或几千年，所有的法国人都是外来移民的子孙。以多样性为特征的法国难道就不能让人口组成也变得多样化，甚至更加多样化吗？

一个文化问题

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唯一现实而又令人担心的问题，那就是文化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更应该借用贝尔纳·斯塔齐在其作品中说过的话：“在有关移民问题进行的艰难的论战中，最缺少的是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²²⁰。人们把“融合、同化、接纳”这些词犹如黑和白一样截然对立起来，从而掩盖了事实的真相。

文化与文化的联姻从来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犹太人问题就是佐证。很久以前，有位历史学家在斯特拉斯堡执教，我对他留有深刻的印象。当时有人向他提了一个问题，要他站在犹太人立场上进行回答，他毫不犹豫地：“我不是犹太人，我是法国人”。我对他的答复真想高声叫好！但是，塞尔日·科斯泰在最近接受的一次调查中，表现更为坦诚，他说：“法兰西是我的祖国，我的语言、我的爱心都从属于它。以色列不是我的国家，但我对它怀有绵绵不息的感情”²²¹。大概是1958年的一天，我去利普家吃午饭，在座的有雷蒙·阿隆。他当时对我解释说，作为犹太人，在某种场合，他必定以某种方式行事。我的回答是：“不过，雷蒙，您并不是犹太人，您是洛林人”（他的家庭，就像他享有盛名的亲戚马塞尔·莫斯的家庭一样，原籍都是这个省份）。我记不起他是否面露微笑，但我肯定他没有作答。的确，这位以色列后裔对他最初完全陌生的各种不同文明的了解已经达到了融会贯通、炉火纯青的地步，但他的内心却始终以一种文明作为归宿，即使想要超脱也不能完全超脱得了。

然而，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不过1400万（其中法国为60万，人数之多仅次于美国）。犹太移民的辉煌成就在历史上真是不胜枚举：15世纪的意大利、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的波兰、18世纪的德国、今天的美国，还有巴西和法国……他们为什么没有与当地

居民融为一体呢？为什么他们不像许多其他移民群体那样，在接纳他们的土地上长期生活后，便与当地打成一片呢？

一位记者²²²最近解释说，这可能是“每当犹太人团体趋向接受同化时，打击便不期而至，使他们恢复原状，回到受苦受难的过去，困守对外隔绝的小天地。假如我在1933年前会见雷蒙·阿隆，难道他会用同样的言语跟我讲话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在经历过希特勒的大屠杀后，任何一个犹太人，即便在内心深处对以色列民族主义的某些表现有所抵触，怎么可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呢？

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1980年的近东之行以及他对巴勒斯坦人表示的关切立场，由于新闻媒介的渲染，招致了旧病复发，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犹太人论坛报》曾扬言在选举时采用“惩罚”措施，对方则以谩骂和责难进行反击，形成了一股反犹浪潮。所幸的是，双方的知识界发出了保持冷静和理智的呼吁。但这起事件本身确实发人深思。

小群的犹太移民在我国苦心经营，奇迹般地存在了几百年时间；相比之下，最早几批移民的同化却显得极其迅速。当然，他们的处境最初曾相当困难，甚至出现了骇人听闻之事。1896年，意大利移民在我国共有29.1万人，但主要集中在南方：10%在瓦尔地区，12%在罗纳河口地区，20%在阿尔卑斯滨海省……这些“意大利佬”被公开指责为抢了法国人的饭碗，到处遭人追逐。为此曾发生过流血冲突，出现过名符其实的种族迫害暴行，甚至在阿莱斯还有私刑处死的事件²²³。30多年后，波兰移民大批来到法国，他们主要聚居在北部地区。他们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生活圈子，自己的手工工匠，与外界几乎隔绝，因而遭到普遍的敌视。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天主教都没有起到凝聚的作用。恰恰相反，马赛港的那不勒斯码头工人干活时在胸前画十字，竟遭人耻笑，并被冠以“受难基督”的绰号。波兰人表达宗教感情的形式，如对神父行垂手礼，被

北部地区的法国人视为滑稽可笑。这些移民要求由波兰人出任神父；他们说：否则，我们又怎么忏悔²²⁴？教会对这一要求设置了重重障碍。总之，一谈起他们，各省的省长异口同声地说：“波兰人是同化不了的”！但是，毕竟有学校，主要是学校。有时还有工会活动，有政治组织（共产党在意大利移民中尤为活跃）。从第二代开始，无论如何，从第三代开始，同化便相当彻底了。到了今天，只有他们的姓氏以及某些传统习惯才使人想起移民的原籍。看来，随着最近一次移民高潮来到法国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除了已到退休年龄、带着积蓄返回家乡的人以外，同化进程似乎相当迅速。

那么，为什么今天涉及到在我国定居的穆斯林移民（他们绝大部分来自马格里布地区），情况竟截然相反了呢？困难出现在第二代移民的子女当中，他们不被当地社会所接受，并且自己也拒绝实行同化，虽然他们的父辈或祖辈过去却有时做到了这一点。障碍是严重的：互不信任，恐惧感，种族偏见，还有信仰和习俗的隔阂。由此出现了两种文化的并存和对立，而不是融合。这同美国有点类似：尽管美国生活方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那里的文化差异问题仍然存在。在我国，情况比美国更紧张和更不稳定；表现形式也更加细腻，因为我们是个古老的国度，移居我国的外国人的原籍国与我国接壤相邻，也是古老的国度。我们的北非工人只用几小时时间就可以抵达机场，在阿尔及尔下飞机，重返卡比利亚山区，重温或追忆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幸福生活。美洲则距离遥远，中间还有大西洋的阻隔，使人望而却步。人们只在发财致富以后才荣归故里，那也并非全都如此！西班牙探险家斐尔南·科尔特斯登上墨西哥海岸后，毅然把船付之一炬。

我对国内的犹太教堂和东正教堂没有任何看不惯的地方，我同样也不反对在法国日见增多、出入人数也越来越多的清真寺。但

是，伊斯兰不仅是一门宗教，也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文明和生活方式。一位来自马格里布地区的姑娘被她的几个兄弟所劫持和禁闭，因为她想嫁给一个法国人。数百名法国妇女在与北非人结婚、又离婚后，她们的孩子被生父夺走，并送回阿尔及利亚，他们只承认自己对子女的拥有权。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普通的社会新闻，而是象征着北非移民所遇到的主要障碍：不同于伊斯兰文明的另一种文明。这是一种权利，一种法律，它不承认建立在《古兰经》——伊斯兰的最高准则——基础之上的任何权利。父权也好，妇女地位也好，无疑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们触及到社会的基础结构：家庭。在法国，每年平均有2万对男女结成混合型婚姻。其中的离婚率高达三分之二²²⁵。原因是这类婚姻势必要求一方放弃自己原来的文明方式，如果不是双方的话。然而，没有这种通婚，移民的同化也就失去了可能。

马格里布移民中年轻一代的犹豫和痛苦正是由此产生的，他们难以忍受我国的经济危机和大城市对移民的敌视。他们出生在我国，从法律上讲已是法国人，但是或者出于对故国的忠诚，或者对不公正待遇耿耿于怀，往往拒绝接受法国国籍，仍然编织着返回故乡的美梦，尽管他们对此很难相信，甚至也不情愿这样做。

这些难忍的痛苦有时是致命的，并且也导致了一些轻生事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为此感到歉疚。一名北非青年被投入了克莱沃的监狱，他在狱中自杀，留下了一份奇特的遗书：“度日如年，痛苦难熬，恨不得立刻去死。就像癌症正在吞噬着我。我满怀仇恨和爱心离开你们：我所丧失的爱，没有得到的爱，我想给人的爱”。这篇感人至深的遗书虽说经过塔哈尔·本·约鲁恩²²⁶的文字修饰，但我们确实听到了发自内心的呼喊！

还有另外一些不幸的牺牲者：两名越南人“孤苦零仃地生活在法国中部的一座城市里，没有工作，没有住所，远离家乡的天空和

土地，丧失了求生的勇气。他们经受了两次死亡的痛苦。作为负责接纳他们的法国人，我们对此又于心何忍”²²⁷。

这些社会新闻的确让人感到痛心，甚至为之悲伤，但与前法国殖民当局雇佣的“北非民兵”的厄运相比，也就算不了什么。这些拖儿带女的“民兵”至少有40万人来到法国定居，而我国的统计材料并不把他们列入移民一类。他们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曾为法国军队效力，作为报偿，他们有权获得法国国籍。在签订埃维昂停火协议后，为了免遭屠杀——他们中已有数千人蒙受杀身之祸——他们逃到了法国。他们在这里处境维艰：一些人作为外国劳工流落各地，但处处遭到排斥，首先被一般的阿尔及利亚移民视为“阿奸和叛徒”；另一些人至今依然生活在洛特—加龙省的比亚斯和加尔省的圣莫利斯—阿尔多瓦兹接待营里，“此外还有散居在洛泽尔省、利穆赞地区和孚日山区……的36座守林人村落中”²²⁸。他们挤在简陋不堪的棚屋里，靠军队提供的微不足道的津贴艰难渡日，靠拚命生养孩子获得一点多子女家庭救济金……这些人，甚至连他们的后代，再也没有重返阿尔及利亚的可能。以往对他们作过的一些慷慨许诺，如今被付诸实施了吗？我们对他们的命运负有责任，不论这些人昔日效忠法国出自什么动机，忠诚程度如何，他们毕竟都为法国卖过命。我承认，再没有别的景象能同样深刻地打动我。不过，话说回来，善良的感情又有什么用处呢？

难道唯独法国才有过错吗？过错双方都有，而且历来都是如此。例如，某些偶然在法国住得过久并且习惯了这里生活的马格里布人，尤其是那些在法国出生的人，一旦他们返回马格里布，临时也罢，永久也罢，不是也都受到相当恶劣的对待吗？请听在里尔大学上学的一位26岁的阿尔及利亚大学生忧伤的自白吧：“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重返阿尔及利亚还是留在法国。这种选择似乎十分简单，但它确实让我左右为难……在我们的故乡，我们被当作外

国人，并且处处让我们感觉到。在接待我们的国家，我们同样是外国人，因为我们没有法国国籍（这位大学生出生在阿尔及利亚），而且因为我们有着黝黑的皮肤”²²⁹。

被戏称为“伯尔人”的第二代北非移民，不仅在法国感到格格不入（他们有权加入法国国籍，但不论他们加入与否，情况都是一样），而且在阿尔及利亚也都觉得有许多隔膜，因为他们仍然被看成是“半外国人”。受到这种排斥的原因是什么？有时是因为他们喜欢吹嘘，在回国渡假期间以他们的穿着、汽车等等到处摆阔，炫耀自己的“奢华”。他们有时也对家乡表现轻蔑。其中的一个“伯尔人”返回法国后说，“那边没有东西吃，简直像倒退回中世纪一样”²³⁰。另一个说：“那里实在太闷气了，休想有玩乐的可能，家里总是盯住你不放”²³¹。“伯尔人”还经常触犯当地的风俗习惯，尽管并不总是有意，但他们的所作所为特别惹人反感。哈桑曾断断续续地来过巴黎几次，但都没有久留，他认为“移民的环境……简直乌烟瘴气”。他说：“在我们这边，有一些传统需要尊重。你看，那里，你就丧失自己的人格……在法国出生的年轻人，完全失去了传统的观念……说真的，我不能与他们为伍……他们压榨父母的血汗……至于我，即使到了60岁，我也尊重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一句话，正如一位阿尔及利亚心理学家所说的，“这些移民让人觉得可怕，因为他们携带着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危险因素”²³²。

至于移民方面，他们确实也有自己的苦恼。一位阿尔及利亚姑娘说：“往往在大街上，就有人高声地评头评足：‘瞧，她准是移民’。原因十分简单，无非是我没有低着脑袋走路”²³³。要让家乡的人重新接纳自己，哪能是件容易的事！贾迈尔这位22岁的小伙子，全家都在法国，只身返回故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能客居他乡，卡比利亚山对他比“眼珠”更要珍贵。于是，他在提济乌祖进了医学院求学。“头几个星期真不好过，我豁了出去，想方设法与其他

大学生打成一片……他们还把我当移民看，但总有一天会再不提这事了……几年以后，我将在一处设备简陋的诊所里当医生，靠国家的薪水生活。这里的条件远不完美……但我相信并希望事情会发生变化，我愿意在这里尽一份力量。”²³⁴

可是，有这种勇气、这种激情的人又有多少？出生在圣莫尔的阿马尔已经作过两次尝试，将从此打消这个念头：“我算让鬼迷了心窍，以后可再也不这么干了，再干岂不成了犯病。官方把‘安置移民’说得天花乱坠，实际上可全是空话。没有人做任何事来帮助我们，接待我们。你甚至不能上阿拉伯语课，整天就是讨论所谓移民或巴黎人的问题”²³⁵。

但是，面对这些纠纷，阿尔及利亚政府大概同我国政府一样无能为力。1983年，阿尔及利亚计划部的一名年轻官员在评论局势时，毫不留情地指责这些移民是“高利贷者”，说他们“在外汇交易中牟取了暴利”后返回阿尔及利亚，并且成为“唯我独尊、不可一世的新资产阶级”。这位官员不赞成“强迫遣返”，不赞成利用暑假期间“强迫在法国出生的阿尔及利亚姑娘突击成婚”。他说，“对移居国外的人，确实存在一些不可思议的排斥和反感。比如说，在我们大学的院系里，移民学生处境孤立，受到冷遇。人们对他们冷嘲热讽，女孩子则简直被当成妓女。对属于第二代移民的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通常只能保持几个星期的克制。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我们需要这些不同于我们的新人。在法国谴责种族主义，自然是件好事。但要在这里制造新的种族主义，那是不可容忍的”²³⁶。

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应对在法国的穆斯林移民团体中最近出现的、几乎截然对立的两种潮流之间的争论感到惊异呢？

第一种潮流继续大肆鼓吹找回自己的根，回到《古兰经》和“普救人世的伊斯兰”那儿去。德里斯·艾尔·雅扎米认为，“只有宗

教才能把我们，把所有的马格里布人，甚至包括‘北非民兵’的后代在内，汇聚在一起”；才能面对法国的特性，捍卫马格里布自身的‘特性’²³⁷。但是，这种“面对”不就很容易变成对立了吗？这是鼓动原籍马格里布的法国人拒绝参加选举，并将参加选举当作一种文化反叛行为。这是在伊斯兰教的宗教义务和法国的公民义务之间制造冲突，在离婚、父权等问题上制造纠纷。

特别在一个多文化和多种族的社会里，宗教的作用难道不应该仅限于个人信仰和个人伦理的范围之内吗？在1980年的争论中——我在前文已提及那次争论——雷奥·哈蒙在呼吁对立双方保持理智时，明确指出了任何一个“信仰犹太教的法国人”应该履行的职责。在我看来，这也正是愿意生活在一个像我们这样一个没有官方宗教的国家中所有人应尽的职责。他写道：“‘存异’的权利应以不损害‘求同’的原则为前提。在现代社会里，任何人都从属于宗教、哲学、职业、文化、民族等不同的范畴。但是，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只能有一个国家，因此，对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他只能从属于一个具体的民族。在这个条件下，每个人才能充分享有权利，才能同整个社会协调一致……如果我不这样想，如果以色列成了我的主要从属对象，而我又不在以色列生活，这也就是犯下了不可宽恕的罪过”²³⁸。

简而言之，必须作出选择，而这恰恰正是另一种潮流所代表的倾向，并且在有关选举问题所展开的争论中表现尤其突出。“阿尔及利亚在法劳动者协会”秘书长、年仅26岁的贝尔卡塞姆解释说：“大家知道，90%的马格里布人将留在法国。我们的口号是：我的未来在这里，我决定投票”²³⁹。29岁的经济学家斯利马纳·蒂尔是鲁贝市的“马格里布文化研究行动中心”的创办人，他毫不犹豫地，大多数移民认为“实实在在的国家在今天就是法国”，想要返回故里只是“逃避现实”的“神话”。他们应该参与政治，参加选举，

接纳新文化，“进而成为新公民”。为此，“必须作出抉择。但太多的年轻人却陷于逃避选择的境地”²⁴⁰。

让·弗朗西斯-赫尔德在《事件》杂志同期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作出选择，这是第一道关口，决定未来前进道路的关口。属于第二代移民的年轻人已开始领悟到，一张选民证给他们带来的希望，比对《古兰经》的诚惶诚恐或对返回家园的憧憬更加实际得多。且不说展望未来，等到“第二代移民，人数众多的第二代移民，经过艰苦的拼搏，当上了教师、外科医生、商人、议员、市长以后”，他们将能改变“与绝大多数的居民的关系”²⁴¹。

但愿他言之有理！到那一天，来自马格里布地区的移民将会出人头地，将在我们生活的大家庭中出人头地。尤其因为，在当今世界上，移民归属问题的发展的确使人担心会因宗教导致十字军战争。法兰西肯定不是非基督教国家，但它已变得比较宽容，宗教狂热已缓和多了。很久以来，我们法国人已经摆脱了宗教战争的纠缠。但几个世纪的时间并没有使我们忘却这场战争的残酷。我们之中又有谁愿意看到新的宗教战争在我们的土地上重新爆发呢？

注 释

第二编 引言

1. Joan ROBINSON, *Hérésies économiques*, 1972, p. 229.
2. Guy BOIS, *Crise du féodalisme*, 1976, p. 16.

第 一 章

1. Alfred SAUVY, Lettre du 29 février 1980.
2. Pierre CHAUNU, *La France*, 1982, p. 33.
3. Henri LERIDON et Michel Louis LEVY, "Populations du monde: les conditions de la stabilisation", in: *Population et sociétés*, déc. 1980, n° 42.
4. Ange GOUDAR, *Les Intérêts de la France mal entendus*, 1756, I, pp. 255 et 342.
5. Jean MARKALE, *Le Roi Arthur et la civilisation celtique*, 1976, p. 9.
6. Cité par Gilles DELEUZE et Félix GUATTARI,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L'anti-Œdipe*, 1972, p. 169.
7. Ferdinand LOT, *La Fin du monde antique et le début du Moyen Age*, 1968, pp. 11-13, 1983, pp. 28-29.
8. Colin RENFREW, *Les Origines de l'Europe*, 1983, p. 29.
9. Isaac NEWTON, *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 amended*, in: *Œuvres complètes*, 1779-1785, tome V, cité par C. RENFREW, *op. cit.*, p. 29.
10. C. RENFREW, *ibid.*, p. 282.
11. Sur cette révision radicale, voir C. RENFREW, *ibid.*, Chapitres III, IV, v et *passim*.
12. Gabriel CAMPS, *La Préhistoire*, 1982, pp. 125-140.
13. Gabriel CAMPS, *op. cit.*, p. 54.
14. *Ibid.*, pp. 55 *sq.*
15. Selon la remarque d'André LEROI-GOURHAN, cité par G. CAMPS,

- op. cit.*, p. 59.
16. Jean GUILAINE, *La France d'avant la France. Du Néolithique à l'Age de fer*, 1980, p. 14.
 17. Henri DELPORTE, "Les premières industries humaines en Auvergne", in: *Préhistoire française. I, Les Civilisations paléolithiques et mésolithiques de la France*, 1976, p. 803, p. p. Henri de LUMLEY.
 18. H. de LUMLEY, S. GAGNIÈRE, L. BARRAL et R. PASCAL, "La grotte du Vallonet Roquebrune-Cap-Martin (Alpes-Maritimes)", in: *Bulletin du Musée d'Anthropologie préhistorique de Monaco*, 10, 1963, pp. 5-20.
 19. Franck BOURDIER, *Préhistoire de la France*, 1967, pp. 55 sq. et *Préhistoire française, I, op. cit.*, tableau chronologique, p. 10.
 20. On sait que dans un passé extrêmement lointain, la dérive des continents a pu déplacer des continents entiers. Par exemple, l'Inde, jadis rattachée à l'Antarctide, a été finalement percuter l'Eurasie, au nord de l'Equateur et s'y est soudée (le processus a duré 50 millions d'années).
 21. H. de LUMLEY, S. GAGNIÈRE, L. BARRAL et R. PASCAL, art. cit.
 22. E. W. PFIZENMAYER, *Les Mammouths de Sibérie. La découverte des cadavres de mammouths préhistoriques sur les bords de la Berezovka et de la Sanga-Iourakh*, 1939, *passim* et pp. 17-21.
 23. H. de LUMLEY, J. RENAUL-MISKOVSKY, J.-C. MISKOVSKY, J. GUILAINE, "Le cadre chronologique et paléoclimatique du Postglaciaire", in: *La Préhistoire française. II, Les Civilisations néolithiques et protohistoriques de la France*, p. p. Jean GUILAINE, *op.cit.*, 1976, p. 3.
 24. Marie-Antoinette de LUMLEY, "Les Anténéanderthaliens dans le Sud", in: *La Préhistoire française*, p. p. Henri de LUMLEY, I, *Les Civilisations paléolithiques et mésolithiques de la France*, 1976, p. 547.
 25. Jean ABELANET, *Le Musée de Tautavel*, 1982, pp. 32-36.
 26. *Ibid.*, pp. 1 et 25.
 27. G. CAMPS, *op. cit.* p. 157.
 28. *Ibid.*, pp. 380-381.
 29. *Ibid.*, p. 381 et F. BOURDIER, *op. cit.*, pp. 223-224.
 30. G. CAMPS, *op. cit.*, pp. 162-176; F. BOURDIER, *op. cit.*, p. 208.
 31. Philip LIBERMAN, "L'évolution du langage humain", in: *La*

- Recherche*, 1975, pp. 751 sq.
32. G. CAMPS, *op. cit.*, pp. 173-174 et 178.
33. F. BOURDIER, *op. cit.*, p. 262.
34. André LEROT-GOURHAN, "L'art paléolithique en France", in: *Pré-histoire française, op. cit.* I, pp. 741 sq. G. CAMPS, *op. cit.*, pp. 203-20.
35. Pierre GAXOTTE, *Histoire des Français*, 1951, I, pp. 16-17.
36. G. CAMPS, *op. cit.*, p. 194.
37. G. CAMPS, *op. cit.*, pp. 187-190; F. BOURDIER, *op. cit.*, pp. 240-244.
38. F. BOURDIER, *op. cit.*, pp. 249-256.
39. G. CAMPS, *op. cit.*, pp. 229-232.
40. Robert ARDREY, *La Loi naturelle*, 1971, pp. 390-391.
41. J. GUILAINE *op. cit.*, p. 29.
42. *Ibid.*, pp. 29-30.
43. Raymond RIQUET, "L'anthropologie préhistorique", in: *La Pré-histoire française*, pp. Jean GUILAINE, II, 1976, p. 151.
44. J. GUILAINE *op. cit.*, p. 34.
45. J. GUILAINE *op. cit.*, p. 37.
46. R. RIQUET, *op. cit.*, p. 140.
47. J. GUILAINE, *op. cit.*, pp. 40 sq.
48. On désigne sous ce nom aussi bien les constructions faites d'énormes pierres dressées, comme à Carnac, ou à Stonehenge en Angleterre, que les tombes à toitures en encorbellement, comme celles de l'île Longue, en Bretagne, qui utilisent de petites pierres.
49. J. GUILAINE *op. cit.*, pp. 66-67.
50. J. GUILAINE *op. cit.*, p. 94 sq.
51. J. GUILAINE *op. cit.*, p. 94.
52. R. RIQUET, *op. cit.*, p. 144.
53. J. GUILAINE, *op. cit.*, pp. 95-96.
54. J. GUILAINE, *op. cit.*, p. 103.
55. Statuette d'ivoire, découverte dans la grotte du Pape, à Brassempouy (Landes).
56. J. GUILAINE, *op. cit.*, pp. 104-105.
57. *Ibid.*, pp. 129-130.
58. *Ibid.*, p. 131.
59. J. GUILAINE, *op. cit.*, p. 149.

60. Le forgeron, dans les sociétés primitives modernes, a toujours été un personnage à part, respecté, généralement redouté.
61. J. GUILAINE, pp. 160-161.
62. *Ibid.*, op. cit., p. 167.
63. *Ibid.*, op. cit., pp. 174 sq.
64. *Ibid.*, p. 177.
65. G. RACHET, op. cit., p. 38.
66. J. GUILAINE, op. cit., p. 203.
67. *Ibid.*, p. 241.
68. *Ibid.*, op. cit., pp. 241 sq.
69. *Ibid.*, pp. 242 sq.
70. *Ibid.*, pp. 248-250.
71. Bien que, récemment, on ait mis en doute qu'il s'agisse bien d'une femme.
72. J. GUILAINE, op. cit., pp. 254-255.
73. Jacques HARMAND, *Les Celtes au second Age du fer*, 1972, pp. 16-17.
74. Venceslas KRUTA, *Les Celtes*, 1976, pp. 68-70.
75. *Ibid.*, pp. 34-35.
76. Barry CUNLIFFE, *L'Univers des Celtes*, 1981, pp. 14-15.
77. Sur l'étonnante civilisation unitaire du Levant au II^e millénaire, cf. W. CULICAN, *Le Levant et la mer, histoire et commerce*, 1967.
78. Jacques HARMAND, *Les Celtes au second Age du fer*, 1972, p. 15.
79. *Ibid.*, p. 40.
80. *Ibid.*, p. 42.
81. Jules MICHELET, *Histoire de France*, 1876, I, p. 12.
82. J. MICHELET, op. cit., I, p. 15.
83. Jan de VRIES, *La Religion des Celtes*, 1963, p. 14.
84. Henri HUBERT, *Les Celtes et l'expansion celtique jusqu'à l'époque de la Tène*, 1950; *Les Celtes depuis l'époque de la Tène et la civilisation celtique*, 1950.
85. Gustave BLOCH, "La Gaule indépendante et la conquête romaine", in: *Histoire de France*, p.p. Ernest LAVISSE, II, 1911, p. 33.
86. Vital-Fleury VIMAL de SAINT-PAL, "Le Celte, homme de cheval", in: *La Cavalerie celtique*, 1952.
87. J. HARMAND, op. cit., p. 80; B. CUNLIFFE, op. cit., p. 120.

88. Karl Ferdinand WERNER, *Les Origines*, in: *Histoire de France*, p.p. Jean FAVIER, 1984, I, p. 202.
89. Paul-Henri PAILLOU, *L'Anti-César*, 1965.
90. J. HARMAND, *op. cit.*, pp. 88-89.
91. *Infra*, tome III, Chapitre IV.
92. *Dictionnaire archéologique des techniques*, Éditions de l'Accueil, 1964, II, p. 1008, article "transports".
93. Alain GUILLERM, *L'Etat et l'espace de la guerre*, 1982, dactylogramme, I, pp. 37 sq., p. 49.
94. G. BLOCH, *op. cit.*, p. 43.
95. Venceslas KRUTA, *Les Celtes*, pp. 112-115.
96. *Ibid.*, p. 105.
97. *Ibid.*, p.p. 102-103 et 108-110.
98. G. BLOCH, *op. cit.*, in: *Histoire de France*, pp. E. LAVISSE, II, p. 42.
99. CICÉRON, *De provinciis consularibus*, 12, cité par G. BLOCH, *op. cit.*, p. 37.
100. G. BLOCH, *op. cit.*, p. 95.
101. Albert GRENIER, «Aux origines de l'économie rurale: la conquête du sol français», in: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30, pp. 32-33.
102. A. GUILLERM, *op. cit.*, p. 66.
103. Pierre BONNAUD, «La ville: deux origines, deux filières», in: *Géographie historique des villes d'Europe occidentale*, Actes du colloque du 10-12 janvier 1981 à l'Université de Paris-Sorbonne, t. I, *Villes et réseaux urbains*, p.p. Paul CLAVAL, 1984, p. 29.
104. Emmanuel de MARTONNE, conférence, à São Paulo, Brésil.
105. Colin RENFREW, *Les Origines de l'Europe*, 1983, p.p. 165-168.
106. Raymond RIQUET, «L'anthropologie préhistorique», in: *La Préhistoire française*, p.p. Jean GUILAINE, II, 1976, pp. 150-151.
107. Ferdinand LOT, *La France des origines à la guerre de Cent Ans*, 5^e éd. 1941, p. 8.
108. C. RENFREW, *op. cit.*, pp. 133 sq.
109. K.F. WERNER, *op. cit.*, p. 71.
110. Louis-René NOUGIER, *Le Peuplement préhistorique*, 1950, p. 65.
111. G. CAMPS, *op. cit.*, pp. 310-311.
112. R. RIQUET, *op. cit.*, p. 146.

113. Cité par Marcel REINHARD, André ARMENGAUD, Jacques DUPAQUIER,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population mondiale*, 1968, p. 43.
114. G. BLOCH, *op. cit.*, p. 35.
115. Eugène CAVAIGNAC, cité par Marcel REINHARD, André ARMENGAUD, Jacques DUPAQUIER,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population mondiale*, 1968, qui adoptent ce chiffre "assez solidement établi", p. 43.
116. K. F. WERNER, *op. cit.*, p. 167.
117. Jean BERNARD et Jacques RUFFIE, *Hématologie géographique*, 1966, I, cité par M. BORDEAUX, "Voies ouvertes à l'histoire des coutumes par l'hématologie géographique", in: *Annales E.S.C.*, 1969, p. 1275 (carte p. 1282, à titre d'exemple).
118. Robert FOSSIER, *Histoire sociale de l'Occident médiéval*, 1970, p. 22; Michel ROBLIN, *Le Terroir de l'Oise aux époques gallo-romaine et franque. Peuplement, défrichement, environnement*, 1978, p. 297.
119. G. BLOCH *op. cit.*, p. 101.
120. A. GUILLERM, *op. cit.*, p. 44.
121. J. MICHELET, *op. cit.*, I, p. 52.
122. Jérôme CARCOPINO, *César*, 1936, p. 707; Camille JULLIAN *Histoire de la Gaule*, éd. 1971, II, pp. 437-447, pp. 449-452.
123. Gustave BLOCH, *Les Origines. La Gaule indépendante et la Gaule romaine*, in: *Histoire de France*, pp. Ernest LAVISSE, I, 1911, p. 101.
124. *Ibid.*, p. 104.
125. Ferdinand LOT, *La Gaule*, 1947, p. 170.
126. C. JULLIAN, *op. cit.*, pp. 508-509.
127. K.F. WERNER, *op. cit.*, p. 137.
128. A. GUILLERM, *op. cit.*, p. 143.
129. Siegfried Jan DE LAET, «Romains, Celtes et Germains en Gaule septentrionale», in: *Studia historica gandensia*, 1964, p. 92.
130. *Ibid.*, p. 93.
131. Marcel LE GLAY, «Les Gallo-Romains», in: *Histoire de France*, p.p. G. DUBY, 1970, I, p. 114.
132. Maurice BOUVIER-AJAM, *Dagobert*, p. 19; Pierre LANCE, *La Défaite d'Alésia. Ses causes dans la société celtique, ses conséquences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1978, pp. 155 sq.
133. André FIGANIOL, *Histoire de Rome*, 1962, p. 273.
134. Jules MICHELET, cité par François GEORGE, *Histoire personnelle*

- de la France*, 1983, g. 91.
135. Pierre LANCE, *op. cit.*, *passim*.
136. Pierre BONNAUD, *Terres et langages. Peuples et régions*, 1981, I, pp. 37-39 et 45. "La situation des Gaulois par rapport au latin au cours du haut Moyen Age rappelle [...] celle de la langue d'oc par rapport au français entre le XVI^e siècle et nos jours." Yves FLORENNE, "Les peuples fidèles", in: *Le Monde*, 21 juillet 1983.
137. J. MARKALE, *Le Roi Arthur*, *op. cit.*, p. 24.
138. Jan DE LAET, art. cit., p. 91.
139. Référence égarée.
140. F. LOT, *op. cit.*, p. 69.
141. Karl Julius BELOCH, *Die Bevölkerung der Griechisch-Römischen Welt*, 1886, p. 507.
142. Voir *supra*, note 115.
143. K. J. BELOCH, "Die Bevölkerung im Altertum", in: *Zeitschrift für Social und Wissenschaft*, II, 1899, pp. 512 et 519. Cet article est d'une quinzaine d'années postérieur à l'ouvrage cité note 141.
144. Robert FOSSIER, *Histoire sociale de l'Occident médiéval*, p. 51.
145. Heinrich BECHTEL, "Städte und Bürger vom 13.-15. Jahrhundert", in: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utschlands*, 1951, p. 256.
146.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1979, I, p. 232.
147. F. LOT, *op. cit.*, p. 397.
148. R. FOSSIER, référence non retrouvée.
149. Jean-Louis VATINEL, *Les Années terribles du III^e siècle en Gaule*, 1978, p. 17.
150. Lucien MUSSET, «Les Gallo-Romains», in: *Histoire de France*, p.p. Georges DUBY, 1970, I, p. 159.
151. André FIGANIOL, cité par Robert FOSSIER, *Le Moyen Age. I. Les Mondes nouveaux (350-950)*, 1982, p. 33.
152. Michel ROUCHE, "L'éclatement des mondes anciens", in: *Le Moyen Age*, *op. cit.*, I, p. 107.
153. Pierre DOCKES, *La Libération médiévale*, 1979; "Révoltes bagaudes et ensauvagement", in: *Sauvages et ensauvagés; analyse épistémologique, histoire économique*, mars 1980, n° 19, pp. 145 sq.
154. M. ROUCHE, *op. cit.*, p. 108.
155. Roger AGACHE, "Détection aérienne des vestiges protohistoriques,

- gallo-romains et médiévaux dans le bassin de la Somme", in: Numéro spécial du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Préhistoire du Nord*, n° 7, 1970, pp. 179-180.
156. Guillaume FOVET, *Gallia*, supp. 20, 1969.
157. Roger AGACHE, «Archéologie aérienne de la Somme», in: Numéro spécial du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Préhistoire du Nord*, n° 6, 1964, planche 32: fig. 103 et 104.
158. Monique CLAVEL, *Béziers et son territoire dans l'Antiquité*, 1970, pp. 606-607.
159. Pierre DUBVIN, *Essai sur l'économie gallo-romaine dans la région de Creil*, 1972, pp. 9-16.
160. Sidoine APOLLINAIRE, *Lettres*, II, éd. 1970, p. 46 et note 9.
161. Henri DUBLED, "Quelques observations sur le sens du mot *villa*", in: *Le Moyen Age*, 1953, 1-2, pp. 1-9.
162. P. DUBVIN, *op. cit.*, p. 68.
163. Lucien GACHON, *La Vie rurale en France*, 1^{re} éd. 1967, 3^e éd. 1976, p. 39.
164. Michel ROUCHE, «L'éclatement des mondes anciens», in: *Le Moyen Age*, p.p. R. FOSSIER, *op. cit.*, p. 57.
165. *Ibid.*, p. 59.
166. Marie-Bernadette BRUGUIÈRE, *Littérature et droit dans la Gaule du 6^e siècle*, 1974, p. 321: Lampridius, ami de Sidoine Apollinaire, assassiné par ses esclaves; le même Sidoine Apollinaire signale l'enlèvement d'une femme, vendue comme esclave au marché de la ville de Clermont.
167. Régine PernoUD, in: *Histoire du peuple français*, p.p. Louis-Henri PARIAS, I. *Des origines au Moyen Age*, p. 29.
168. Pierre DOCKES, *La Libération médiévale*, 1979, p. 118.
169. P. DOCKES, *Révoltes bagaudes et ensauvagement*, *op. cit.*, pp. 152-154.
170. Henri HUBERT, *Les Celtes depuis l'époque de la Tène et de la civilisation celtique*, 1950, p. 184.
171. Salvien se retira à l'abbaye de Lerins en 420, puis à Marseille où il fut ordonné prêtre en 430. Ce passage est extrait de *De gubernatione Dei* où il présente les Barbares, chargés par Dieu de châtier le monde romain, comme les promoteurs d'une société

régénérée.

172. Cité par Robert FOSSIER, *Histoire sociale de l'Occident médiéval*, op. cit., p. 45.
173. M.-B. BRUGUIÈRE, op. cit., p. 53.
174. P. DOCKES, *Révoltes bagaudes et ensauvagement*, op. cit., p. 237.
175. Jan DHONDT, *Le Haut Moyen Age (VIIe-XIe siècles)*, 1976, pp.27-28.
176. Hans DELBRÜCK, *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in Rahmen der Politischen Geschichte*, I, 1900, pp. 472 sq.
177. Henri PIRENNE, *Conférences à Alger*, 1931.
178. Lucien ROMIER, *L'Ancienne France des origines à la Révolution*, 1948, p. 45.
179. Ferdinand LOT, "La civilisation mérovingienne", in: *Les Destinées de l'Empire en Occident de 395 à 888*, Première partie: De 395 à 768. *Histoire du Moyen Age*, p.p. Gustave GLOTZ, 1940, p. 383.
180. P. DOCKES, *La Libération médiévale*, op. cit., p. 109.
181. Référence égarée.
182. R. FOSSIER, *Histoire sociale de l'Occident médiéval*, op. cit., pp. 33 sq.
183. Paul DUFOURNET, *Pour une archéologie du paysage*, 1978, p. 163.
184. Robert FOLZ, André GUILLOU, Lucien MUSSET, Dominique SOURDEL, *De l'Antiquité au monde médiéval*, 1972, pp. 94-99 et 243.
185. R. FOSSIER, *Histoire sociale de l'Occident médiéval*, op. cit., p. 36.
186. Jean-Louis VATINEL, *Les Années terribles du III^e siècle en Gaule*, 1969, p. 29.
187. Collection des historiens de France, I, p. 275, cité par Emile LEVASSEUR,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I, 1889, p. 107.
188. Paul-Albert FÉVRIER, *Le Développement urbain en Provence de l'époque romaine à la fin du XIV^e siècle (archéologie et histoire urbaine)*, 1964, p. 212.
189. Henri LABROUSSE, *Toulouse antique. Des origines à l'établissement des Wisigoths*, 1968, p. 571.
190. Alexander RÜSTOW, *Ortsbestimmung der Gegenwart. II, Weg der Freiheit*, 1952, p. 243.
191. Edmond FREZOULS, «Études et recherches sur les villes en Gaule», in: *La Gallia romana*, Actes du colloque de l'A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Rome, 10-11 mai 1971), 1973, p. 164.

192. M.-B. BRUGUIÈRE, *Littérature et droit...*, op. cit., pp.391 sq.
193. 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 *La Monarchie franque*, 5^e éd. 1926, p. 520.
194. Marc BLOCH, "Le problème de l'or au Moyen Age", in: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V, 1933, p. 18.
195. Etienne SABBE, "L'importation des tissus orientaux en Europe occidentale au haut Moyen Age", in: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XIV, 1935, pp. 811 et 1231.
196. François-Louis GANSHOF, "Notes sur les ports de Provence du VIII^e au X^e siècle", in: *Revue historique*, 184, 1938, p. 128.
197. Elyas ASHTOR,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roy of the Near East in the Middle Ages*, 1976.
198. Pierre BONNASSIÈ, *La Catalogne du milieu du X^e à la fin du XI^e siècle*, 1975, I, p. 379.
199. Je ne crois pas qu'un réchauffement du climat, à partir du VIII^e siècle, autre explication plausible de dernière heure, nous mette sur la bonne voie des causes et conséquences.
200. Marcel REINHARD, André ARMENGAUD, Jacques DUPAQUIER,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population mondiale*, 1968, p.p. 62 et 64; Karl Ferdinand WERNER, *Les Origines*, in: *Histoire de France*, p.p. Jean FAVIER, 1984, p. 360.
201. K. F. WERNER, op. cit., p. 302; Lucien MUSSET in: R. FOLZ, A. GUILLOU, L. MUSSET, D. SOURDEL, op. cit., pp. 118-120.
202. Lucien MUSSET, "Les migrations barbares", in: *Histoire de France*, p.p. Georges DUBY, I, 1970, p. 165 et Pierre RICHE, "Les temps mérovingiens, VI^e-VII^e siècles", *ibid.*, I, p. 171.
203. Renée DOEHAERD, *Le Haut Moyen Age occidental. Economies et sociétés*, 1971, pp. 125-126 et 223-224.
204. *Ibid.*, p. 223.
205. Michel ROUCHE, "L'éclatement des mondes anciens", in: *Le Moyen Age*, p.p. Robert FOSSIER, op. cit., p. p. 97.
206. Jean-François LEMARIGNIER, *La France médiévale, institutions et société*, 1970, p. 52.
207. Pierre RICHÉ, op. cit., in: *Histoire de France*, p.p. G. DUBY, I, p. 170.
208. Léopold GENICOT, "Aux origines de la civilisation occidentale,

- Nord et Sud de la Gaule", in: *Miscellanea L. Van der Essen*, 1947, pp. 1 sq.
209. *Ibid.*, p. 98.
210. Renée DOEHAERD, *op. cit.*, pp. 90 sq.
211. Thomas REGAZZOLA et Jacques LEFEVRE, *La Domestication du mouvement, Poussées mobilisatrices et surrection de l'Etat*, 1981, p. 20.
212. Marc BLOCH, cité par Michel LE MENÉ, *L'Economie médiévale*, 1977, p. 26.
213. Henri PIRENNE, "L'instruction des marchands au Moyen Age", in: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29, p. 18.
214. P. RICHÉ, *op. cit.*, in: *Histoire de France*, p.p. G. DUBY, I, p. 170.
215. *Ibid.*, pp. 180-181.
216. R. FOSSIER, *Histoire sociale de l'Occident médiéval*, *op. cit.*, p. 52.
217. Jan DHONDT, *Le Haut Moyen Age (VIIIe-XIe siècles) traduction française*, 1976, p. 73. Sur le traité de Verdun, voir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I, pp.282-284 et carte.
218. J. DHONDT, *op. cit.*, p. 75.
219. Jacques MADAULE, *Histoire de France*, 1943, I, p. 77.
220. C'est-à-dire un événement qui a des conséquences à long terme et s'annexe ainsi un temps très supérieur à sa propre durée.
221. Ernst Robert CURTIUS, *La Littérature européenne et le Moyen Age latin*, 1956, p. 23.
222. Nicolas JORGA, *Histoire du peuple français*, éd. en roumain, 1919, p. 93.
223. P. BONNASSIÉ, *op. cit.*, I, p. 131.
224. Robert FOSSIER, *Le Moyen Age*, I. *Les Mondes nouveaux 350-950*, p. 14; II. *L'Eveil de l'Europe 950-1250*, p. 7.
225. J. DHONDT, *op. cit.*, pp. 2-3.
226. Fisc: produit des diverses contributions levées dans les provinces de l'Empire romain. Le mot désigne ensuite le domaine particulier du souverain ou de l'Etat et le produit des droits seigneuriaux que le roi percevait comme possesseur ou suzerain des fiefs.
227. Comtes: gouverneurs de provinces qui avaient autorité administrative, judiciaire, financière et militaire. Les *Missi Dominici* ont été établis par Charlemagne pour les surveiller.
228. Honneur. On donnait le nom d'honor ou *honos*, sous les Carolingiens,

- aux terres, revenus ou délégations d'impôt que le roi concédait en forme de bénéfice à ses principaux fonctionnaires pour leur tenir lieu de traitement pendant la durée de leur fonction.
229. Voir supra I, pp. 274-275 et J. DHONDT, *op. cit.*, p. 55.
230. *Ibid.*, p. 55.
231. *Ibid.*, p. 58.
232. Lucien GACHON, *La Vie rurale en France*, 3^e éd. 1976, p. 42.
233. Paul ROLLAND, "De l'économie antique au grand commerce médiéval. Le problème de la continuité à Tournai et dans la Gaule" du Nord, in: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35, VII, pp. 245-284.
234. Anne LOMBARD-JOURDAN, "Du problème de la continuité: y a-t-il une protohistoire urbaine de la France?", in: *Annales E.S.C.*, 1970, 4, p. 1127.
235. Jacob van KLAVEREN, "Die Wikingerzüg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die Belegung der Geldwirtschaft in frühen Mittelalter", in: *Jahrbuch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1957, Bd. 168, H.5/6, pp. 405 sq.
236. Maurice LOMBARD, "Mahomet et Charlemagne", in: *Annales E.S.C.*, 1948, n° 2, p. 197.
237. Michel ROUCHE, "La rénovation carolingienne", in: *Le Moyen Age*, I, *Les Mondes nouveaux 350-950*, 1982, p. 371.
238. T. REGAZZOLA et J. LEFEVRE, *op. cit.*, p. 19.
239. *Ibid.*, p. 23.
240. Voir par exemple l'abondante collecte réunie par Renée DOEHAERD, concernant les ventes faites par les villas royales aussi bien que par les seigneurs, les abbayes et les paysans eux-mêmes: *Le Haut Moyen Age occidental*, *op. cit.*, pp. 224-230.
241. Il s'agit de l'Edictum Pistense de 864, in: Alfred BORETIUS et Victor KRAUSE, *Capitularia regum Francorum*, II, p. 319, in: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1890.
242. J. DHONDT, *op. cit.*, p. 194.
243. *Ibid.*, p. 36 et pour le commerce à longue distance, pp. 152 sq.
244. *Ibid.*, pp. 172-190.
245. *Ibid.*, pp. 160 sq.
246. Renée DOEHAERD, *op. cit.*, pp. 103-109.

247. Mozarabes: chrétiens d'Espagne soumis à la domination musulmane.
248. Polyptyque: registre plié en plusieurs parties où l'on inscrivait les états officiels et authentiques des biens et droits d'une abbaye.
249. John RUSSEL, cité par Marcel REINHARD, in: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population mondiale*, op. cit., p. 64.
250. Karl Julius BELOCH, "Die Bevölkerung Europas im Mittelalter", in: *Zeitschrift für Socialwissenschaft*, 1900, p. 408.
251. M. ROUCHE, op. cit., pp. 460-461.
252. Sur le concept d'économie-monde, voir: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op. cit., III, pp. 12 et sq.
253. Henri PIRENNE,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yen Age*, éd. 1969, p. 20.
254. J. DHONDT, op. cit., p. 183.
255. J. DHONDT, op. cit., p. 189.

第 二 章

1. Jan DHONDT, *Le Haut Moyen Age (VIIIe-IXe siècles)*, 1976, p. 186.
2. Guy BOIS, *Crise du féodalisme*, 1976, p. 299.
3. 70% en Normandie, 64% en Haute-Provence, 70% dans le Champsaur, à peu près autant dans la région parisienne. Ces chiffres sont cités par G. BOIS, op. cit. pp. 62-63, d'après Edouard BARATIER, *La Démographie provençale du XIIIe au XVIe siècle*, 81 et 59; Alfred FIERRO, "Un cycle démographique: Dauphiné et Faucigny du XVe au XIXe siècle", in: *Annales E.S.C.*, sept.-oct. 1971, pp. 941-949; Guy FOURQUIN, *Les Campagnes de la région parisienne à la fin du Moyen Age*, 1964, pp. 364-366.
4. G. BOIS, op. cit., troisième partie: "Les étapes de la crise".
5. Cf. Karl Ferdinand WERNER, *Les Origines*, in: *Histoire de France*, publiée sous la dir. de Jean FAVRE, I, 1991, p. 492.

- Moyen Age (XIIIe-XIe siècles)*, 1976, pp. 143-144.
10. Édouard PERROY, *La Guerre de Cent Ans*, 1945, p. 41.
 11. Alleu: héritage tenu en franchise par opposition aux fiefs.
 12. Ce qu'à la fin du XI^e siècle, on commencera d'appeler le "fief", Jean FAVIER, *Le Temps des principautés: de l'an Mil à 1515*, in: *Histoire de France... op. cit.*, II, 1984, p. 22.
 13. Charles PFISTER, *Études sur le règne de Robert le Pieux (996-1031)*, 1885, pp. 167-168.
 14. E. PERROY, *op. cit.*, p. 18.
 15. François SIGAUT, "Moulins, femmes, esclaves", in: *Colloque Techniques, technologie et histoire dans l'aire méditerranéenne*, Aix-en-Provence, 21-23 octobre 1982, à paraître.
 16. K.F. WERNER, *op. cit.*, p. 424; J. DHONDT, *op. cit.* p. 27.
 17. J. DHONDT, *op. cit.* pp. 24-25 et Georges DUBY, *L'Économie rurale et la vie des campagnes de l'Occident médiéval*, 1962, I, pp. 100-102.
 18. Sur la formation de ces deux pôles d'activité, cf.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III, 1979, pp. 78 sq.
 19. *Ibid.*, p. 77, note 17.
 20. Josiah Cox RUSSELL, "Late ancient and medieval population", in: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58, pp. 95 sq., cité par Wilhelm ABEL, *Crises agraires en Europe (XIIIe-XXe siècle)*, 1973, pp. 35-36.
 22. Josiah Cox RUSSELL, art. cit., p. 96.
 23. W. ABEL, *op. cit.*, p. 37.
 24. G. DUBY, R. MANTRAN, *L'Eurasie... op. cit.* pp. 18-19.
 25. *Ibid.*, p. 85.
 26. Amédée THALAMAS, *La Société seigneuriale française 1050-1270*, 1951, p. 46, note 18.
 27. Marc BLOCH, *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 I, 1976, pp. 5 et 9.
 28. A THALAMAS, *op. cit.*, p. 43.
 29. M. BLOCH, *op. cit.*, I, p. 9.
 30. Louis BADRÉ, *Histoire de la forêt française*, 1983, p. 27.
 31. E. MOREL, "En Champagne, le bois dont on fait les villages", in: *Marie-France*, octobre 1982.

32. Sur l'importance de l'usage du bois, cf.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1979, I, p. 252.
33. Le Multien, ancienne région de France, entre la Marne et l'Ourcq.
34. L'Orxois, petit pays de la Brie.
35. Pierre BRUNET, *Structure agraire et économie rurale des plateaux tertiaires entre la Seine et l'Oise*, 1960, pp. 430 sq.
36. Voir les étonnantes photographies aériennes de Roger Agache qui révèlent l'emplacement d'anciennes villas gallo-romaines aujourd'hui invisibles, et le village, construit parallèlement à la limite, parfois irrégulière, des terres de la villa. Ce qui suppose une première implantation au temps où l'exploitation existait encore. R. AGACHE, "Archéologie aérienne de la Somme, recherches nouvelles", *Bulletin spécial de la Société de Préhistoire du Nord*, n° 6, 1964, figure 218; «Détection aérienne des vestiges protohistoriques gallo-romains et médiévaux dans le bassin de la Somme et ses abords», *ibid.*, n° 7, 1970, figure 637 et figure Q, pp. 210-211.
37. Emile MIREAUX, *Une province française au temps du Grand Roi: la Brie*, 1956, pp. 70 sq.
38. P. BRUNET, *op. cit.* p. 434.
39. François JULIEN-LABRUYÈRE, *Paysans charentais, histoire des campagnes d'Aunis, Saintonge et Bas-Angoumois*, I, 1982, p. 43.
40. Guy BOIS, "Population, ressources et progrès technique dans un village du Mâconnais (x^e-xviii^e siècles)", in: *Des labours de Cluny à la révolution verte*, actes du Colloque Population-ressources, 1985, p. 38.
41. Jan DHONDT, *op. cit.*, pp. 115-117 et note p. 330.
42. Jean FAVIER, *Histoire de France*, II: *Le Temps des principautés de l'an Mil à 1515*, 1984, p. 58.
43. Cf.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op. cit.*, III, p. 77, note 19.
44. *Ibid.*, p. 77, note 18.
45. J. FAVIER, *op. cit.*, p. 56.
46. Guy BOIS, *Crise du féodalisme*, 1976, p. 264.
47. K.F. WERNER, *op. cit.*, pp. 426-428.
48. *Ibid.*, p. 58.
49. *Ibid.*, p. 60.

50. Pierre CHAUNU, *Le Temps des Réformes*, 1975, p. 77.
51. Robert PHILIPPE, *L'Énergie au Moyen Âge: l'exemple des pays d'entre Seine et Loire de la fin du Xe siècle à la fin du XVe siècle* (thèse inédite) I, 1980, p. 173.
52. André CHEDEVILLE, *Chartres et ses campagnes, XIe-XIIIe siècles*, 1973, p. 196.
53. *Ibid.*, p. 194.
54. La puissance moyenne d'un moulin étant fixée à 6 HP, l'énergie mise en œuvre est de 120 000 HP, alors que le cheval, animal tracteur, représente 1/7 de HP et l'homme, 0,3 HP, mais il faudrait tenir compte de l'intermittence du travail fourni par l'homme ou le cheval, et aussi de l'intermittence saisonnière de l'activité des moulins.
55. Robert PHILIPPE dans une de nos discussions.
56. Robert PHILIPPE, "Les premiers moulins à vent", in: *Annales de Normandie*, n° 2, juin 1982, p. 100, note: "En 1802, 66 000 moulins à eau, 10 000 moulins à vent; en 1896, 37 051 moulins à eau et à vent; en 1921, 20 168."
57. P. BONNAUD, *op. cit.*, I, p. 18.
58. Même si l'on ne retient pas le chiffre très bas de Russell cité plus haut (6 200 000 habitants), la population au début du XIIe siècle ne peut dépasser un maximum de dix millions, soit une population active d'environ deux millions. En admettant que les 20 000 moulins de cette époque soient l'équivalent de 600 000 travailleurs (voir *supra* et note 54), ils augmenteraient l'activité générale d'environ un tiers. Tout cela hypothétique, mais qui suggère un ordre de grandeur.
59. Témoignage recueilli au hasard d'un voyage de l'intéressé lui-même.
60. R. PHILIPPE, *L'Énergie au Moyen Âge*, *op. cit.*, I, p. 15.
61. W. ABEL, *op. cit.*, chapitre I, en particulier pp. 49-51.
62. P. CHAUNU, *op. cit.*, p. 13.
63. Léopold DELISLE, *Études sur la condition de la classe agricole et l'état de l'agriculture en Normandie au Moyen Âge*, 1850, cité par R. PHILIPPE, *op. cit.*, p. 66.
64. Pour plus de détails sur cette première économie-monde euro-

- péenne, cf.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III, 74-94.
65. Félix BOURQUELOT, *Études sur les foires de Champagne, 1865* (I, pp. 72-75); Robert-Henri BAUTIER, "Les foires de Champagne", in: *Recueils de la Société Jean Bodin, V, La Foire, 1953*, p. 14.
 66. Michel BUR, "Remarques sur les plus anciens documents concernant les foires de Champagne", in: *Colloque Les Villes,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eur développement en fonction de l'évolution économique*, Troyes, octobre 1970, 1972, p. 60.
 67. Philippe DOLLINGER, "Le chiffre de la population de Paris au XIV^e siècle: 210 000 habitants ou 80 000 habitants?", in: *Revue historique*, juil.-sept. 1956, pp. 35-44.
 68. E. PERROY, *op. cit.*, p. 16. Charles V (1356-1380) construira au-delà des murailles le quartier du Marais.
 69. "Georges Suffert fait le point avec Régine Pernoud: des cathédrales à recolorier", in: *Le Point*, 24-30 janvier 1983, pp. 112-122.
 70. Ernst CURTIUS, *La Littérature européenne et le Moyen Age latin*, trad. française, 1956, p. 68.
 71. *Ibid.*, pp. 588-589. Michael Blaunpays, dit aussi Michel de Cornubie, natif de Cornouailles, fit ses études à Oxford et à Paris.
 72. Lando BORTOLOTTI, *Le Città nella storia d'Italia*, 1983, p. 36.
 73. Robert FOSSIER, *Le Moyen Age*, III, 1983, p. 55.
 74. François SIMIAND distingue la phase A, phase de montée, et la phase B, phase de descente dans les crises cycliques.
 75. R. FOSSIER, *op. cit.*, p. 21.
 76. Guy BOIS, *Crise du féodalisme*, 1976, p. 10.
 77. *Ibid.*, p. 11.
 78. André CHEDEVILLE, *Chartres et ses campagnes, XIe-XIIIe siècles*, 1973, p. 528.
 79. R. FOSSIER, *op. cit.*, III, p. 25.
 80. Michel BELOTTE, *La Région de Bar-sur-Seine à la fin du Moyen Age*, thèse 1973, p. 37.
 81. R. FOSSIER, *op. cit.*, III, p. 44.
 82. Robert PHILIPPE, *op. cit.*, I, p. 265.
 83. G. BOIS, *op. cit.*, p. 52.
 84. *Ibid.*, p. 62.
 85. *Ibid.*, p. 299.

86. Adolphe VUITRY, *Etudes sur le régime financier de la France avant la Révolution de 1789*, 1883, II, pp. 295-299, cité par G. BOIS, *op. cit.*, p. 267.
87. Jean-Noël BIRABEN, *Les Hommes et la peste en France et dans les pays européens et méditerranéens*, 1975, I, p. 55.
88. En provenance du Proche-Orient, où la peste n'avait pas disparu comme en Europe (cf. note 90).
89. J.-N. BIRABEN, *op. cit.*, I, p. 309.
90. Dans l'Empire ottoman, la peste continuera à sévir, imposant des quarantaines dans tous les ports de la Méditerranée; comme en Europe, elle disparaîtra complètement, mais vers 1850 seulement, Daniel PANZAC, *La Peste dans l'Empire ottoman 1700-1850*, thèse inédite, Aix-en-Provence, 1982.
91. Jean de VENETTE, *Continuations de Guillaume Nangis (1300-1368)*, II, éd. 1844, cité par Noël COULET, "Le malheur des temps. 1348-1440", in: *Histoire de la France*, p.p. Georges DUBY, II, 1971, p. 11.
92. J.-N. BIRABEN, *op. cit.*, p. 159.
93. N. COULET, in: G. DUBY, *op. cit.*, II, p. 9.
94. Thomas BASIN, *Histoire de Charles VII*, éd. 1933, pp. 88-89.
95. F. JULIEN-LABRUYÈRE, *op. cit.*, p. 132.
96. Noël COULET, in: G. DUBY, *op. cit.*, p. 18.
97. Jean FROISSART, *Chroniques*, V (1356-1360), cité par N. COULET, *op. cit.*, p. 14.
98. *Journal d'un bourgeois de Paris (1405-1449)*, éd. 1881, cité par N. COULET, *op. cit.*, p. 32.
99. *Ibid.*, p. 9.
100. Emile LEVASSEUR,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1891, I, p. 179.
101. N. COULET, in: G. DUBY, *op. cit.*, II, p. 28.
102. R. FOSSIER, *op. cit.*, III, p. 65.
103. John DAY, "The Great Bullion Famine of the 15th century", in: *Past and Present*, mai 1978, pp. 3-54; "The Question of Monetary Contraction in late Medieval Europe", in: *Nordisk Numismatik Arsskrift* 1981, pp. 12-29.
104. F. BOURQUELOT, *op. cit.*, I, p. 190.
105. André LEFEVRE, "Les finances de la Champagne aux XIII^e et XIV^e siècles", in: *Bibliothèque de l'Ecole des Chartes*, 1859, p. 69, cité

- par M. BELOTTE, *op. cit.*, p. 156.
106. Renée DOEHAERD, "Les galères génoises dans la Manche et la mer du Nord à la fin du XIII^e et au début du XIV^e siècle", in: *Bulletin de l'Institut Historique belge de Rome*, 1938, pp. 5-76.
107.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III, p. 123.
108. Enrique OTTE, "La Rochelle et l'Espagne. L'expédition de Diego Ingenios à l'île des Perles en 1528", in: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59, I, p. 44.
109. F. BRAUDEL, *op. cit.*, III, p. 95.
110. *Ibid.*, pp. 475-477.
111. *Ibid.*, pp. 95 sq.
112. Pierre CHAUNU, Georges SUFFERT, *La Peste blanche*, 1976, p. 57.
113. Franck C. SPOONER,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Monetary Movements in France, 1493-1725*, 1972.
114. F.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op. cit.*, II, p. 217.
115. Père Roger MOLS, *Introduction à la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des villes d'Europe du XIV^e au XVIII^e siècle*, II, 1955, p. 516.
116. Jean-H. MARIÉJOL, *La Réforme et la Ligue. L'Edit de Nantes (1559-1598)*, t. VI, de l'*Histoire de France*, p.p. Ernest LAVISSE, 1911, pp. 111 sq.
117. Pierre GOUBERT, *Beauvais et le Beauvaisis de 1600 à 1730.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sociale de la France du XVII^e siècle*, 1960, p. 30.
118. E. LEVASSEUR, *op. cit.*, I, p. 189.
119. F. LE ROY LADURIE, *Les Paysans de Languedoc*, 1966, I, pp. 149-150.
120. *Ibid.*, p. 163.
121. *Ibid.*, p. 189.
122. M. BELOTTE, *op. cit.*, p. 266.
123. *Ibid.*, p. 310.
124. Claude HARMELLE, *Les Piqués de l'aigle. Saint-Antonin et sa région (1850-1940)*, 1982, p. 22.
125. Pierre de BRANTÔME, *œuvres*, IX, éd. 1779, p. 249.
126. Cité par Karl HELLEJENR,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éd. E.E. RICH et H., HABAKKUK, IV, 1967, p. 24.
127. Omer LUTFI BARKAN, cité par F.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 monde méditerranéen.*, I, 1982, p. 363.
128.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I, 1979, pp. 163 sq.
129. Cela dépend probablement des régions. En Normandie, par exemple, Guy Bois constate que le plafond atteint vers 1550 est sensiblement inférieur du quart environ à celui de la fin du XIII^e siècle, *op. cit.*, p. 71.
130.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III, p. 69; Guy BOIS, *op. cit.*, p. 10 en donne une saisissante illustration; en 1473, le Nord de la Normandie est anéanti par les Bourguignons: villages rasés, récoltes totalement brûlées, la désolation est la même qu'un siècle plus tôt, mais cette fois, en pleine reprise économique, tout est réparé en quelques années seulement.
131. André ARMENGAUD, *La Famille et l'enfant en France et en Angleterre du XVI^e au XVIII^e siècle*, 1975, p. 81.
132. Oudard COQUAULT, *Mémoires...* (1649-1668), éd. 1875, I, p. 34.
133. Pierre GOUBERT, "Le régime démographique français au temps de Louis XIV",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p.p. Fernand BRAUDEL et Ernest LABROUSSE, II, 1970, p. 37.
134. Jean FOURASTIÉ, "De la vie traditionnelle à la vie tertiaire", in: *Population*, 1959, n^o 3, p. 418.
135. André ARMENGAUD; Jacques DUPAQUIER, Marcel REINHARD,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population mondiale*, 1968, pp. 175-176.
136. *Ibid.* p. 195.
137.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1979, I, p. 136.
138. *Histoire de l'Aquitaine*, p.p. Charlés HIGOUNET, 1971,
139. Alain CROIX, *La Bretagne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1981, I, pp. 44-45.
140.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I, p. 141 et notes 233 et 234.
141. E. JUILLARD, *La Vie rurale dans la plaine de Basse-Alsace. Essai de géographie sociale*, 1953, pp. 213-215.
142. Earl J. HAMILTON,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 1934.
143. Huguette et Pierre CHAUNU, *Séville et l'Atlantique 1504-1605*, 1955-1960.
144. Michel MORINEAU, *Incroyables Gazettes et fabuleux métaux. Les retours des trésors américains d'après les gazettes hollandaises*

- (XVI^e-XVIII^e siècles), 1985.
145. P. GOUBERT, *Beauvais et le Beauvaisis...*, op. cit., p. 382 et note 77.
 146. Witold KULA, *Théorie économique du système féodal...*, 1970, p. 48.
 147. Frank SPOONER,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Monetary Movements in France 1493-1725*, 1972, p. 306.
 148. Karl Julius BELOCH, "Die Bevölkerung Europas zur Zeit der Renaissance",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1900, pp. 774 et 786.
 149. A. ARMENGAUD, J. DUPAQUIER M. REINHARD, op. cit., pp. 241-271, 328-339.
 150. Charles-Henri POUTHAS,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pendant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IX^e siècle*, 1956; P. GOUBERT, "Les fondements démographiques",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op. cit., II, 1970, pp. 9-84; André ARMENGAUD, "Le rôle de la démographie",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op. cit., III₁, 1976, pp. 161-238.
 151. A. ARMENGAUD, J. DUPAQUIER M. REINHARD, op. cit., p. 252.
 152. A. ARMENGAUD, op. cit., in: F. BRAUDEL, et E. LABROUSSE,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III₁, 1976, p. 173.
 153. C.E. LABROUSSE, *La Cris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et au début de la Révolution*, 1944.
 154. B.H. SLICHER VAN BATH, *Yield Ratios 810-1820*, 1963, p. 16.
 155. Richard GASCON, "La France du mouvement: les commerces et les villes",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I₁, 1977, p. 238, qui cite MACHIAVEL, *Tableau de la France en 1510*.
 156. Paul BAIROCH, "Les grandes tendances des disparités économiques nationales depuis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in: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isparit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7^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économique, 1978, pp. 43-45.
 157. L.M. POUSSEREAU, "Changements survenus depuis un siècle dans la condition des bûcherons et des ouvriers forestiers du département de la Nièvre", i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scientifique et artistique de Clamecy*, 1927, pp. 30-54.
 158. Jean-Charles SOURNIA, *Histoire et médecine*, 1982, p. 236.
 159. *Ibid.*, p. 235.
 160. Jean BERNARD cité in: "Le 28^e Congrès d'histoire de la médecine,

- tromper la mort", in: *Le Monde*, 8 septembre 1982.
161. Emile LITTRÉ, *Journal des débats*, 18 Juin 1856, cité par J.-Ch. SOURNIA, *op. cit.*, p. 237.
162. Claude BERNARD,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a médecine expérimentale*, cité par J.-Ch. SOURNIA, *op. cit.*, p. 236.
163. Alfred SAUVY, "Préface" à *Demain le Tiers-Monde: population et développement*, n° spécial de la *Revue Tiers Monde*, XXIV, n° 94, avril-juin 1983, p. 236.
164. Alfred SAUVY, *La Population*, 1963, p. 66.
165. A. SAUVY, Notes de lecture *Le Monde*, 14 septembre 1982.
166. John NAISBITT, *Megatrends*, cité par Jacques DUQUESNE, "Spécial 1983-2000, l'agenda du futur", in: *Le Point*, 7 nov. 1983, p. IV.
167. 10 pour mille en 1980, huitième place dans le monde, derrière la Suède, le Japon, la Finlande, la Suisse... avant les Etats-Unis et l'Allemagne (*Population et Sociétés*, août 1982, n° 160). En 1985 ce chiffre est passé à 8,3 pour mille (*ibid.*, n° 200).
168. Georges VALRAN, *Misère et charité en Provence au XVIIIe siècle*, 1899, pp. 22-23.
169. A. SAUVY, *H.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entre les deux guerres*, *op. cit.*, II, 1974, pp. 340-341.
170. Ange GOUDAR, *op. cit.*, 1756, I, pp. 271 et 275.
171. Jean AUFFRAY, *Le Luxe considéré relativement à la population et à l'économie*, 1762, pp. 29-30.
172. A. GOUDAR, *op. cit.*, p. 96.
173. Jean NOVI DE CAVEIRAC, *Paradoxes intéressants sur la cause et les effets de la révocation de l'Edit de Nantes, la dépopulation et repopulation du Royaume, l'intolérance civile et rigoureuse d'un gouvernement...*, 1758, p. 253.
174. Denis-Laurian TURMEAU de LA MORANDIERE, *Appel des étrangers dans nos colonies*, 1763, p. 21.
175. Chevalier de CERFVOL, *Législation du divorce*, 1770, pp. 62-63.
176. M. MOHEAU, *Recherches et considérations sur la population de la France*, 1778, éd. 1912, p. 258.
177. Père FÉLINE, *Catéchisme*, 1782, p. II, cité par Jean-Marie GOUESSE, "En Basse-Normandi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le refus de l'enfant au tribunal de la pénitence", in: *Annales de démographie*

- historique, 1973, pp. 255-256.
178. M. MESSANCE, *Nouvelles Recherches sur la population de la France 1788*, p. 27.
179. Jean-Pierre BARDET, *Rouen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les mutations d'un espace social, I*, 1983, p. 263.
180. Guy ARBELLOT, *Cinq Paroisses pu Vallage, XVII^e-XVIII^e siècles. Etude démographique historique*, 1970, p. 225.
181. J.-M. GOUESSE, art. cit., p. 231.
182. *Ibid.*, p. 251.
183. John NICKOLLS (pseudonyme de PLUMARD DE DANGEUL), *Remarques sur les avantages et désavantages de la France et de la Grande Bretagne par rapport au commerce et autres sources de la puissance des Etats*, 1754, pp. 18-19.
184. Jacques DUPAQUIER, Marcel LACHIVER, "La contraception en France ou les deux malthusianismes", in: *Annales E.S.C.*, 1969, n° 6, p. 1401.
185. J.-P. BARDET, *op. cit.*, p. 265.
186. *Ibid.*, p. 272.
187. Jean GANIAGE, *Trois Villages d'Ile-de-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I.N.E.D., cahier n° 40, 1963, p. 131.
188. Antoinette CHAMOIX et Cécile DAUPHIN, "La contraception av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l'exemple de Châtillon-sur-Seine", in: *Annales E.S.C.*, 1969, 3, pp. 662-684.
189. Raymond DENIEL, et Louis HENRY, "La population d'un village du Nord de la France, Sainghin-en-Mélantois de 1665 à 1851", in: *Population*, 1965, 4, pp. 563-602. Pour la Vendée, J.-L. FLANDRIN, *Les Amours paysannes (XVI^e-XIX^e siècles)*, 1975, p. 242.
190. J.-M. GOUESSE, art. cit., p. 323 et note 6.
191. Marquise de SEVIGNE, *Lettres*, I, éd. Pléiade, 1953, pp. 432, 433, 450, cf. aussi *La Prévention des naissances dans la famille, ses origines dans les pays modernes*, cahier de l'INED, n° 35, 1960, pp. 156-159.
192. J.-P. BARDET, *op. cit.*, p. 264.
193. Michel de MONTAIGNE, *Les Essais*, éd. Pléiade 1962, I, XIV, p. 58.
194. Textes du xv^e siècle cités par Jean-Louis FLANDRIN, *op. cit.*, pp. 83 et 86.

196. Bricquebec, sept. 1708, cité par J.-M. GOUËSSE, art. cit., p. 258.
197. M. de MONTAIGNE, *op. cit.*, I, XXX, p. 196.
198. Pierre de BRANTÔME, *Les Dames galantes*, éd. Maurice RAT, [1917], p. 25, cité par Jean-Louis FLANDRIN, "La vie sexuelle des gens mariés dans l'ancienne société: de la doctrine de l'Église à la réalité des comportements", in: *Communications*, 1982, pp. 108-109.
199. P. DE BRANTÔME, *op. cit.*, pp. 32 et 27-28, cité par Jean-Louis FLANDRIN, "Contraception, mariage et relations amoureuses dans l'Occident chrétien", in: *Annales E.S.C.*, 1969, 6, pp. 1383-1384 et note 4.
200. P. de BRANTÔME, *op. cit.*, pp. 38-39, cité par J.-L. FLANDRIN, art. cit., p. 1385.
201. J.-L. FLANDRIN, "L'attitude à l'égard du petit enfant et les conduites sexuelles dans la civilisation occidentale", *Annales de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1973, pp. 182 sq.
202. Cité par Hélène BERGUES, *La Prévention des naissances dans la famille*, INED, cahier n° 35, 1960, pp. 229-230.
203. M. DE MONTAIGNE, *op. cit.*, I, XIV, p. 62.
204. Alfred SAUVY, "Essai d'une vue d'ensemble", in: *La Prévention des naissances dans la famille, ses origines dans les temps modernes*, *op. cit.*, pp. 389-390.
205. Ferdinand BUISSON, *Souvenirs (1866-1916)*, 1916, pp. 30-32.
206. Sur ce groupe, sa vie et son rôle social au XVI^e siècle, cf. George HUPPERT, *L'idée de l'histoire parfaite*, 1973; *Bourgeois et gentilshommes. La réussite sociale en France au XVI^e siècle*, 1983. Pour la fondation des nouvelles écoles, au XVI^e siècle, George HUPPERT, *Public School France in Renaissance*, 1984.
207. Edgar QUINET, *Histoire de mes idées. Autobiographie*, [1878], pp. 78-79.
208. Cité par M. REINHARD, A. ARMENGAUD, J. DUPAQUIER, *Histoire de la population mondiale*, 1968, p. 336.
209. Michel-Louis LEVY, "Les étrangers en France", in: *Population et société*, juillet-août 1980, n° 137. Les chiffres qui précèdent sont empruntés à ce même article.
210. *Ibid.*

211. *Ibid.*
212. Cité par F.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op. cit.*, II, p. 129.
213. Augustin BARBARA, "Un muscle seulement?", in: *Le Monde*, 25 juillet 1980.
214. En 1984, aux Etats-Unis, certaines industries de pointe trouvaient plus avantageux, pour réduire leurs coûts, de recourir à l'off-shore manufacturing (en Asie le plus souvent) plutôt qu'à la main-d'œuvre mexicaine.
215. Jean-François DUPAQUIER, "Les familles d'immigrés ne veulent pas jouer les 'bourgeois'... mais avec 8 ou 9 enfants, les appartements sociaux leur sont interdits", in: *Le Quotidien de Paris*, 27 mars 1980.
216. C'est ce que pensent d'ailleurs la majorité des Français: selon un sondage du Figaro-Sofres (novembre 1985), 90% trouvent normal que les immigrés qui cotisent reçoivent allocations de chômage et allocations familiales, bien que 71% souhaitent le renvoi dans leur pays des immigrés clandestins.
217. Nathaniel WEYL, *Karl Marx, racist*, 1980.
218. Art. cit. in: *Le Monde*, 25 juillet 1980.
219. Ce que confirme une étude biologique réalisée par l'INSERM, à partir de milliers de tests sanguins, tant en ce qui concerne les groupes sanguins que les combinaisons de gènes. Réalisée sur des familles installées dans leur région depuis au moins trois générations, elle prouve "la grande diversité de nos origines ethniques", avec des différences régionales parfois surprenantes, révélatrices de très anciens courants migratoires. Franck NOUCHI, "Une étude biologique démontre le 'métissage' du peuple français", in: *Le Monde*, 25 octobre 1985.
220. Bernard STASI, *L'Immigration, une chance pour la France*, 1984, p. 13.
221. "Après les accusations de Begin, les Français sont-ils antisémites? Oui, dit Serge Koster, qui pense qu'il n'y a pas de discours innocent sur Israël", in: *Le Quotidien de Paris*, 12 août 1982.
222. "Un équilibre sans cesse remis en question", in: *Le Quotidien de Paris*, 2 avril 1980.
223. Jean-François DUPAQUIER, "Quand les bougnoules étaient ritals...",

- in: *L'Événement du jeudi*, 13-19 juin 1985, pp. 48-49, qui se réfère à *L'Emigrazione italiana in Francia prima del 1914*, J.-B. DUROSELLE et F. SERRA, Milan 1978.
224. Jean-François DUPAQUIER, "Quand les bougnoules étaient polaks...", in: *L'Événement du jeudi*, 13-19 juin 1985, pp. 50-51.
225. Judith SAYMAL, "Si ma soeur épouse un Français, je la tue!", in: *L'Événement du jeudi*, 13-19 juin 1985, pp. 40-41.
226. Tahar BEN JELLOUN, "Les jeunes et la mère amnésique", in: *Le Monde*, 25 juillet 1980.
227. G. LECLERC-COUTEL, "Ne pas mourir deux fois", in: *Le Monde*, 25 juillet 1980.
228. Jean ANGLA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immigrés en France de 1919 à nos jours*, 1976, pp. 105 sq.
229. Débat: "Les immigrés parmi nous", *Le Monde*, 19-20 juin 1983.
230. Jean-François MONGIBEAUX, "L'album de voyage de petits maghrébins au Maghreb", in: *Le Quotidien de Paris*, 7 septembre 1982.
231. Enquête en Kabylie de Jacques MAIGNE, "Le double exil des immigrés qui choisissent le 'grand retour'", in: *Libération*, 7 novembre 1983.
232. Enquête à Alger de Michel AREZKI, "Les émigrés étrangers de l'intérieur", in: *Libération*, 9 novembre 1983.
233. *Ibid.*
234. Enquête en Kabylie de J. MAIGNE, art. cit.
235. *Ibid.*
236. *Ibid.*
237. Jean-François DUPAQUIER, "L'Islam ou le bulletin de vote?", in: *L'Événement du jeudi*, 13-19 juin 1985, pp. 34-38.
238. Léo HAMON, "Une seule appartenance", in: *Le Monde*, 23 mai 1980.
239. J.-F. DUPAQUIER, art. cit., p. 37.
240. *Ibidem*, J.-F. DUPAQUIER, "Le pays réel, c'est la France", *ibid.*, p. 41.
241. Jean-François HELD, "Comment faire des Français avec du Beur?", in: *L'Événement du jeudi*, 13-19 juin 1985, pp. 32-33.